AUSSER DIENST

不在其位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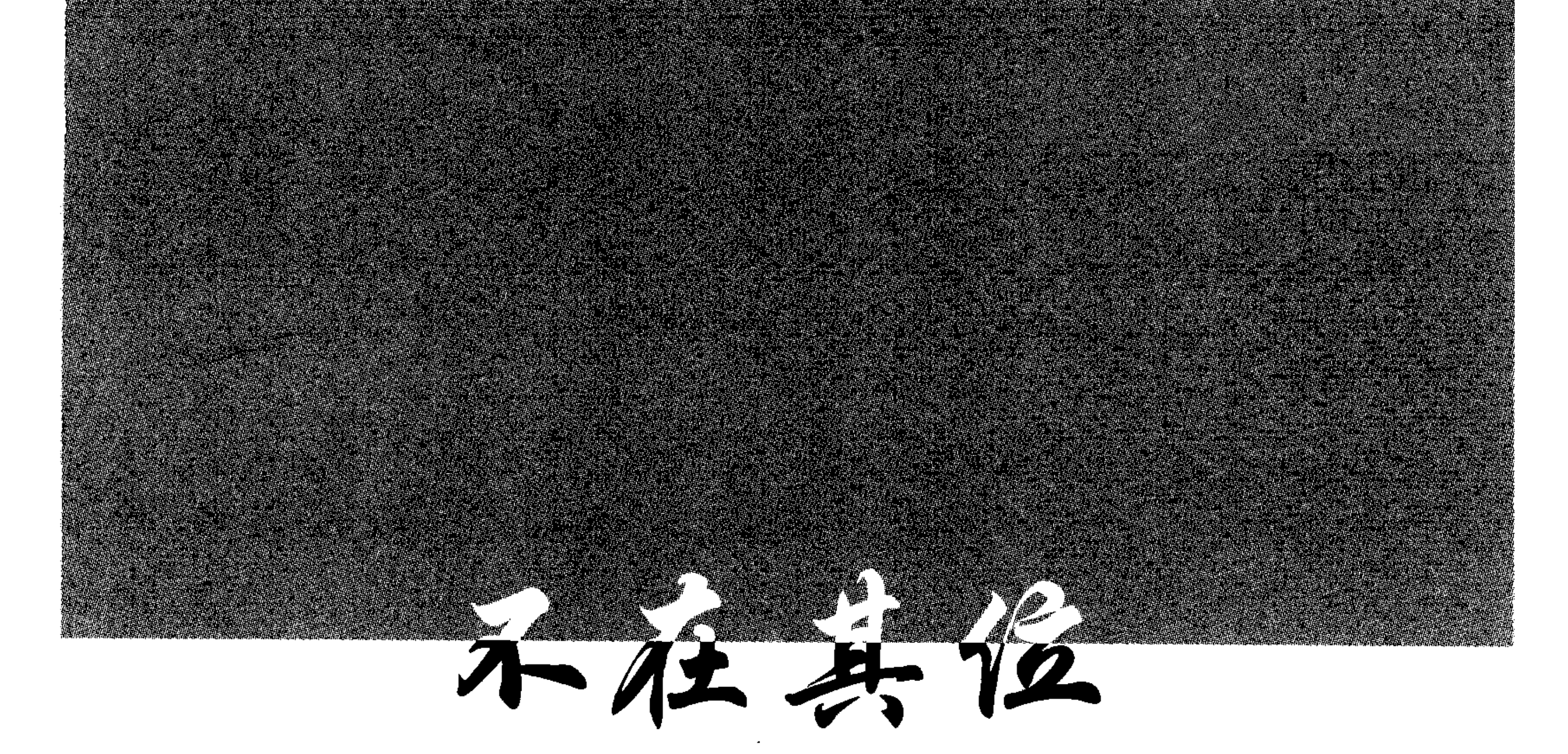


这是一位伟大政治家的“理性作品”，也是一位理性政治家的“良知呼唤”。

每次德国进行评选最优秀领导人的民意测验，名列榜首的总是施密特。赫尔穆特·施密特于1974年至1982年任联邦德国总理。

本书汇集了施密特先生毕生的思想成果，充满了真知灼见，闪耀着智慧之光，充分展现了一名伟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整本书纵横捭阖，论说天下大事；条分缕析，饱含哲理思辨；犀利幽默，一语中的。





不在其位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在其位/(德)施密特著;许文敏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436-6080-9
Ⅰ.不... Ⅱ.①施...②许... Ⅲ.国际政治—通俗读物
Ⅳ.D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3987号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09-036号

书 名 不在其位
作 者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
译 者 许文敏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0532)80998664
责任编辑 曹永毅 周 莉 **E-mail**:cyyx2001@sohu.com
装帧设计 于文涛
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润华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640 mm×960 mm)
印 张 21.25
字 数 20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6080-9
定 价 2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文学

前言

在人生旅途结束之前,我想把自己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所学习到的集中写下来,后来者也许会从中获得启迪和有价值的东西。当年的那些政治同僚和交往者绝大部分已经彻底更换了地址(离开人世),在12年前出版的《同代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回忆录》一书中,我已经向读者讲述了自己对他们的回忆和看法。本书中所要谈的,主要是我在许多方面的经验和感受,故此它们将不会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因为我无意写传记。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也不打算按照题目归类去系统地论述。况且,我在自己人生旅途中所获得的许多观点和想法,原本归功于所有那些一直关注着我的人们,在过去25年的"不在其位"期间,正是他们一直关注着我,并给我以力量。在本书中,我将围绕着主题记录一些对他们的回忆。想请读者注意的是,在对往昔的回顾中,我无法对所有的人和事面面俱到,因为我在某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上有所侧重,各个章节也因而在分量上有所区别,故此出现某些内容上的重复也就在所难免。

我是在希特勒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开始对政治感兴趣的。尽管对我来说,步入政坛更多的是由于偶然

因素,但自从我踏入这个门槛以后,从政便完全出自个人的意愿了。当我在出任联邦议员30年后于1987年重新告别议会的时候,我丝毫没有离开岗位的那种不在其位的退休感觉。所以,以《不在其位》作为本书的书名,多少有点儿自嘲的意味。在离开了政府部门以后,也就是在退休之后,我还真的没有那种“不在其位”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我一直保持有那种自我责任感的缘故吧。

很早以前我就把古罗马的一句名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公众的福祉是最高法则。后来我发现,这个准则似乎对那些把个人的利益、权力或者个人的财富摆在首位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不适用。我已经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经历并意识到:尽管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人们可以在理性和道德的基础上,使不同的利益群体、思想围绕着公众福祉这个原则达成协议,可不仅仅是对于内部的民主,而且对于外部的和平都需要有妥协和宽容的思想准备。

一名政治家的责任感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相反,这种责任感总是不断地以新的直接、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每种境遇中,在每个问题上,在每个冲突中,每个政治家都必须明确回答如下问题:我在此时此事上的任务和责任是什么?如果两个或者更多的利益主体发生冲突,我应该怎么办?此时,某种个人利益或者我所在党派的利益是否可以优先?假如民族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话,那么民族和国家利益在此的具体表现究竟是什么?

这种态度和提问方式曾经在西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从1950年的舒曼计划和欧洲融合开始，经过了哈尔施泰因主义过程，加入北约，通过紧急状态法，东方政策、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及1978年的北约双重决议，一直到战后两个德国的统一，这种争论一直在继续。尤其是在东部德国，要想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判断是十分困难的。在西部德国，我们也是在50年代末期才形成这样的一致看法：两德同属于欧洲共同体大家庭。同样在1989年时，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法国、英国、意大利或者荷兰和丹麦政府以极不乐观的态度看待并反对两德统一。两德的统一，其实是美国基于他们本国的利益——也就是出于他们与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与东方共产主义派别进行抗衡的需求——在获取我们邻国同意的基础上促成的。

当时，我们在德国对这些事件以及我们周边国家的利益要求知之甚少，尤其是对我们的东欧邻国以及他们与我们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知之甚少。时至今日，我们不仅对波兰人、捷克人依然缺乏了解，而且对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丹麦人也知之甚少。而他们对我们了解的程度，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欧洲各民族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与邻国之间的痛苦经历和感受深深地根植在他们的潜意识中。

难道我们德国人从自己历史中所获得的教训还不够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成功地把两德统一这件伟大的幸事转化成一种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福利的成果吗？为什么我们有能力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国，却无力解决国内那危险的大规模失

业问题呢？究竟是德国的政治阶层认识不到公众的福祉所在呢，还是他们没有勇气把高深的真理通俗地告诉选民？究竟是选民们不愿看到这种真实的存在呢，还是大家都觉得这事原本就无所谓呢？

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是否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究竟是否知道，我们到底想成为什么人？今天的德国人在许多方面已经有别于他们的前辈。与19世纪、20世纪相比，与纳粹时期以及东部40年的共产党执政时期相比，我们的法律和政治文化显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有这些变化无疑对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以及他们的行为规范产生了影响。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更成熟了。

我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们，可是我们能否因此而有资格说我们脱胎换骨了？我们的心灵曾受到过严重的挫伤，我们也因此受到了惩罚，但问题是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形象究竟修正了多少？我们现在的形象又究竟如何？不管怎么说，我们德国人给邻国所造成的伤害只医治和恢复了一部分，这伤口有可能复发。我们德国人依然被看做一个危险的民族，这个危险不仅仅是就内部而言，而且也在于外部形象。

在20世纪，德国人曾经两次试图抢夺世界政治的帅旗，可均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我们的政治阶层以及整个国家、民族从中汲取了教训，故此德国不可能会有第三次尝试，邻国其实对此不必担心。这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东西方冷战时代似乎彻底成为历史了。自1950年舒曼计划以来，

西方国家一步一步地进入共同市场，加上随后的整个德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大家庭，这一切都使我们免于再冒只身挺进的危险。

从70年代起，我就支持和赞成德国自觉加入欧洲多民族共同体这个大家庭。我在此所推动的绝非是欧洲理想主义，我认为，它更多的是我们德国的战略利益所在。到了21世纪，出于我们战略利益的理智考虑已经初见成效。因此，我还希望欧洲共同体大家庭今后继续深化内部融合，并希望德国继续在这一方面发挥其影响和作用。

欧洲各国也许感受到了现在所面临的一连串危机，其中包括来自欧洲之外的危机。因此，各国的政治家们希望这些国家密切联合起来。但由于各个国家的语言不同、历史不同、政治结构不同，这种愿望的实现仍然路途遥远。故此，欧洲共同体联盟的建设依然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其发展有可能经受沉重的打击，也可能会走弯路。

我们德国人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中部，因而相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我们更加负有维护这个联盟成功发展下去的责任，缺乏耐心或操之过急都有可能危及它的发展。任何意欲让德国成为领导者的要求——即便没有公开——也可能对此发展造成难以预见的负面影响。试问，所有的德国人都弄明白这一点了吗？

萌发写这本书的念头当追溯到2003年。在随后的几年中，写作一次次被中断，有些章节也被重新改写。许多人对本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我感谢我夫人露凯以及简丝·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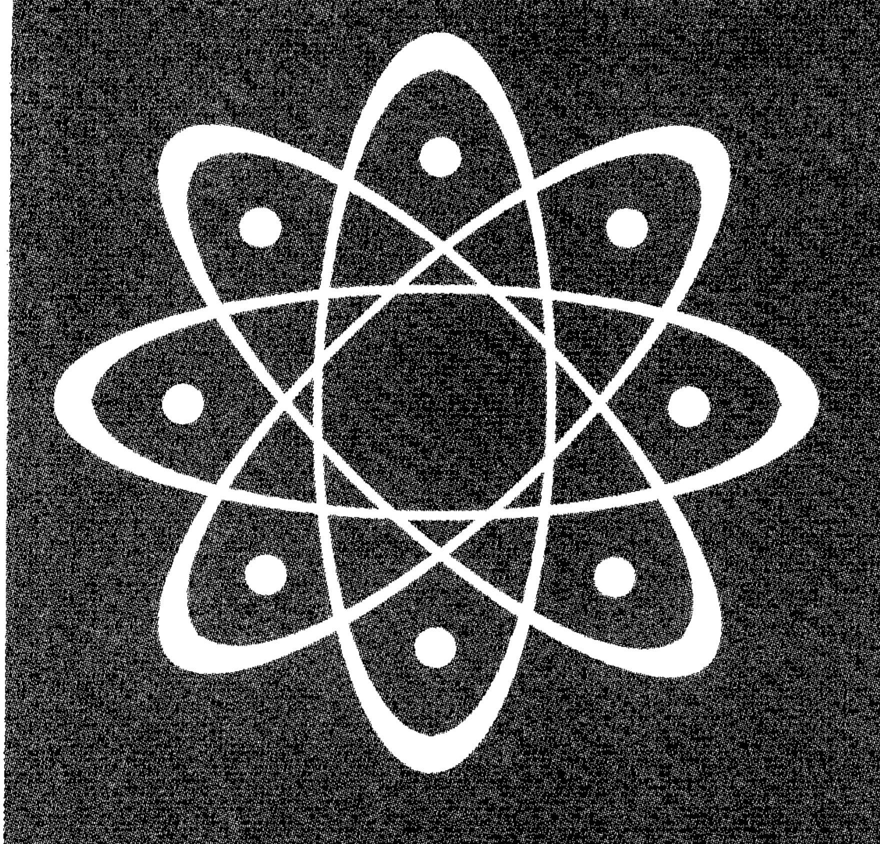


舍、托马斯·卡尔劳夫、比尔盖特·克吕格-本斯客、海克·莱穆克、吴塔·劳阿、迈茨纳·马撒雷卡、露瑟马蕾·尼迈尔、阿明·奥芬克和特奥·邵麦尔。

赫尔穆特·施密特

于汉堡

目 录



Ⅰ 经验会逐渐改变衡量事物的标准

朋友和可信赖的合作者

从政是与人打交道,但从政的人实际上各有所异:有些人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重要决定都由他们作出;有些人只是自己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也参与重要的决定;还有些人只需要给一些注意力,听一听他们说什么即可。有些人朝令夕改、行无主见;有些人尽管想实施和兑现自己的承诺,但却力不从心。所有这些的原因就在于,每个政治家都必须在他的国家,在其选区和党内拥有自己的基础,从这里获得基本的保障和支持。在民主政治中,很少有哪一位政治家在作决定时,能够说是绝对自由的。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无论是在国内事务方面,还是在外交政治方面,我自己周围就一直有那么一批政治家,对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我可以完全信赖。在个人生活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党内,一名政治家所遇到的首先应当是那些其判断可以相信、其建议可供参考的人。我在此想介绍的第一个例子是汉斯-尧赫・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1],他曾经是我的

---

① Hans-Jochen Vogel(1926—):德国社民党政治家,曾先后出任慕尼黑市长、柏林市长、社民党主席、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司法部长、城建部长等职。



内阁成员。早在60年代末期，福格尔就以其特殊的能力和性格特征被我看做特殊人才。他曾经说过“有权就应做公仆”，而且他随后确实就一直这么做的。正是由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所以他的个人威望和信誉提高很快。他是我非常重要的个人顾问，尤其是在红色旅恐怖主义最严重的那个时期。作为不可缺少的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他严格职守，监督着不让任何人践踏、伤害我们的法制社会体系。我清楚地知道，他以周密严谨的思维和超人的智慧赢得了我的完全信赖。

赫尔贝尔·威莱尔(Herber Wehner)[①]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最初是40年代末期在汉堡认识威莱尔的，而真正深一些的了解则始于1953年，也就是在我进入了联邦议会以后。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周都遇见他。他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他有过在某种程度上讲比较严重的愧疚和忏悔的个人经历，这场经历造成了他不稳定的特殊个性。但威莱尔富有自我控制能力，我所说的是指那种在人生动荡中的控制力。他的内心完全与工人的事情联结在一起，基本法第20条——论述“民主和福利的联邦国家”那一部分——变成了他个人的政治目标。威莱尔是一个道德完美主义者，他那朴素节俭的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助人为乐精神就是其伦理道德的充分显现。

威莱尔想使国家和社会更加人性化，因此他倾注全部力

①Herber Wehner(1906—1990)：德国社民党政治家，曾任社民党副主席、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在缓和、解决西德与东德以及与东欧关系问题上有特别影响。



量于社会民主,要证明政府具有社会民主的能力,并且要把它带入联邦政府。可是到了1969年,大联盟政府走到尽头。他也许对这种结局并不意外,因为这些社会民主党的高层在执政期间已经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政治特点。在这3年期间,威莱尔是全德事务部部长,这个位子显然是他比较喜欢的,至少他在这个位子上有能力帮助许多由于德国被分开而陷入危难的人。即便如此,他在1969年也同意,离开自己的部长席位,并作为主席回到议会党团。我当时认为,这种人事变动所带来的要求对于威莱尔是太苛刻了,因此提出作为一个条件,让他接任国防部长职位,因为这个职务原本就是勃兰特和威莱尔强加于我的。其实我早就感受到,左派势力将很快会在我们社民党内占上风,而我也就会到处遇到绊脚石。但我也知道,赫尔贝尔·威莱尔作为议会党团主席会成为我的后盾,而他也确实就是这么做的。

在13年的社民党和自民党联盟时期,尽管我与威莱尔在个人经历、个人判断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性格等方面截然不同,但我一直很信任他。我们二人既非关系密切的私人朋友,也非遇事时个人反应、表述和用词方式相近者,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信任。在此,就涉及一个常见的然而却错误的观点:在国家或者党派内部,最高层的领导人物之间必须保持有私人朋友关系。其实真正应该保持和维护的,当属忠诚、互助、信任,所有这一切最终要拧成一股绳,汇成一股力,朝着共同的目标和方向。

信任也是与其他党派的政治家进行交往的基本前提条

件，当然这里所讲的信任是有条件的。在这一方面，我也遇到过许多人，他们所表述的方针、路线是不含水分的。在这些人中，有社民党和自民党联盟时期的在野党的两位挂帅的政治家：一位是讷尔·巴尔茨勒(Rainer Barzel)[1]，另一位是瓦勒特尔·莱斯勒尔·凯普(Walther Leisler Kiep)。稍后些的有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尤其是他1985年5月8日那篇可以说是揭开新历史的讲话。从真诚感谢的角度，我在此还想提及两点：一是自民党的议会党团高层的沃尔夫岗·密什尼柯(Wolfgang Mischnick)[2]的可信性，二是其党内朋友约瑟夫·艾尔特勒(Josef Ertl)的明确政治路线。尽管艾尔特勒与我有时意见相左，但我一直称他为“约瑟夫兄”，而他也就风趣地以“赫尔穆特兄”回答。

有时候，人们也会被要求着去信任某些人，即便是你压根儿就不了解他们。譬如，乘坐飞机的人就得相信飞机驾驶员，就得相信这条航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更容易相信那些自己并不了解的人。也正是这种缘故，我的许多老关系保持了下来，其中包括中学时期的学友，当兵时期的战友，战后大学时期的那些朋友，尤其是我在汉堡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任职时的那些朋友。同时，也包括那些一起从政所结识的朋友们，也就是那些从开始在汉堡参加社民党工作初期，即从40、50年代起，一直到80年代进入波恩后的整个

---

①全名 Rainer Candidus Barzel(1924—2006)：德国基民盟政治家，1962年出任内阁部长，为当时最年轻的部长。

②Wolfgang Mischnick(1921—2002)：德国自民党政治家，曾任联邦工业部部长、自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等职。

时期所结识的朋友。即便时过境迁，可一旦重逢，就知道彼此之间依然可以信任，可以放手做事情，而且也能一起干些大事。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也有些是我离开了联邦总理府后才遇到的，其中许多则是我退休后才真正认识的。是的，当人成为舆论焦点时，他就可以凭借知名度轻易获得结识那些他所感兴趣的人并与这些人直接交流的资格。人的兴趣、新鲜感和某种精神上的灵活性是赢得帮助的前提。交谈者肯定能够感受到，我是出于对他个人或者是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感兴趣而去找他的。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从一种纯粹的认识继续发展下去，前提是第一次的交流也让这位谈话人感兴趣，他从中也获得某些有认知价值的东西。只要第一次打造了一个基础，那么一旦重逢，就马上会回想起来，她或他处事为人认真可信，就有可能开始坦诚交谈。

由于我经常显得缺乏耐心，有时对周围的人不太注意礼节而特别的直截了当，因此有时不免引发对方的不满。所以我经常乐于压缩谈话开始时的过渡，这样一来，在我的谈话对象可能反驳之前，就得让他思考一下，即便是在他回答时，也还得让他能斟酌，这样就有可能使一次谈话很快地进入比较深的层次。尽管如此，我还得承认，自己在此类实践中并非总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和友好的气氛。

对于形成一种可信赖的友好关系来说，坦诚相待和尊重对方是关键的前提条件。几年前，我收到好友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的一封信。我们是1972年相识的，他当时在

尼克松总统的内阁任财政部长。出于对水门事件丑闻的愤怒,他辞职进入了工业界。1982 年,里根又请他出任外交部长。在他给我的这封信中,他提及我们几周前的一次谈话,结果他把这个话题转到了我身上,并写到:“您总像专家一样”。这话当然只能作为奉承来理解,要知道,舒尔茨说话历来是言简意赅的。有关美国民族政治精神实质的绝大部分,我都是从他身上学来的。从他那里,我看到了美国政治的三大美德——共同意识、公正和爱国主义。

在观点和看法上,人与人之间未必一定要始终保持一致。对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作为尼克松总统安全顾问时期所做的那些事情,我确实不敢恭维。而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他对我任德国国防部长时的所作所为也可能未必赞同。我们彼此之间的个人评价就这样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令我不安的是,他对我的印象是基于我的行为方式,而不是我的言辞,尽管我们从 1958 年就认识了。我最初的印象是:作为德国出生的犹太人,这位年轻的哈佛大学副教授不仅有着惊人的分析判断能力,而且见识甚广。随后不久,他就先后结识了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尽管基辛格没有正式的政府职务,但他从 1976 年起就作为美国战略思想的非官方最高领导,而且作为外交分析家为世界所认可。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有关如何从美国立场出发去看世界的观点。可一旦向北跨出边界,也就是进入了加拿大,似乎这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样了。我把这一点也告诉了朋友、

原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eudeau)。

用另外的眼睛去看世界,也就是用自己队友的眼睛和用对方队员的眼睛,而且要从他们的利益角度去看世界,这是一门艺术。只有在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进行对话交流过程中,才有可能学习这种艺术。对于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长期冲突的整体性战略问题,我是通过与纳胡姆·古德曼(Nahum Goldman)①、牧夏·达扬(Moshe Dayan)②、安瓦尔·萨达特(Anwar as-Sadat)③以及沙特国王法赫德(Fahd)的对话交流才逐渐认识到的。可以说,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程度要比某些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更深刻,因为他们只是从自己的观点、立场出发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且正是由于他们的先入为主,使他们彼此很难对对方作出一种客观的判断。也正是我的新加坡朋友李光耀,使我至少对中国历史的基本原则以及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产生了好感。在多次访问日本后,我发现,许多日本的政治家对中国患有一种文化传统上的自卑情结,其中潜藏着他们对中国(也包括韩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在这一方面,我的朋友福田赳夫④以其对中国的坦诚态度,当属日本政治家中的佼佼者。从韩国总理申铉确(Shin Hyon-Hwak)那里,我了解到韩国人民在日本统治下所经受的许多痛苦历史。与邓小平近乎10年的持续

---

①Nahum Goldman(1895—1982):曾任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

②Moshe Dayan(1915—1981):以色列将军、政治家,曾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

③Anwar as-Sadat(1918—1981):原埃及总统。

④福田赳夫(1905—1995):原日本首相。

性交流，使我对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重新崛起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邓小平创造了一个并非普通的国家领导人所能创造的奇迹性成就！

旅行是在这个世界上与朋友有规律地进行交流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在离开联邦总理职位后，我在这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个人旅行的可能性从开始出现到今天，已经有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而真正去旅行，那只是到了 20 世纪末期才可能的，而且也只是富裕者的事情。当然也有例外，譬如手工业者的流动工作，以及其他的流动工人。数百万计的欧洲人流向北美和拉丁美洲，他们带去了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但完全不同的生存关系迫使他们去适应新环境，从而他们就不得不去确立标准尺度。他们之中也有人有时给故乡写信，可这信在路途中需要辗转数周。这种信件被保留下来的很少，而且绝大部分也就保存到第二代人。那时候，既没有航空邮件，也没有收音机；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网络，故此欧洲大陆对美国的认识极为有限，而仅有的一点儿也只是来自能识文认字的阶层。大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北美文化借助于美籍非洲人的爵士音乐迅速地传播到欧洲，尤其是影响到了工业生产的技术方法。起初是 20 年代，随着新的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美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不断扩大。到二战后，西欧在东西方对垒的“铁幕”之后，只扮演了一个配角。

就享有旅行的权利和可能性来说，我们是第一代，当然，此前上流社会的人除外。譬如，即便像我父母，他们虽然在

汉堡属于中层公职人员,可度假的最远地方也不外乎奥地利蒂罗尔州的首府因斯布鲁克(Innsbruck),而且这是他们生平唯一的一次乘火车,维也纳、意大利或者法国远在他们旅行范围之外。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先是遇上了希特勒所发动的战争,把我们驱赶到了外国的土地上。然后是到了50年代,去国外旅行从经济上对许多人已经不算什么问题了,所以也就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国际文化交流。这个时候,我们的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已经被打开了。

在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还无法理解市场经济和自由价格体系。这是正常的,因为那时为了购买面包和香肠,我们不仅需要钱,还需要购货卡!住房由政府官员来分配,这是正常的,黑市或者说地下市场也是正常的。甚至在那个时候前不久,执行命令,并且按照密令去行事,这也是正常的。

在短短的几年里,不仅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而且社会价值体系也得到了改变。精神和道德的标准一下子被推广起来了,尽管人们对它们并没有作公开的表述和刻意的宣传。不习惯的自由和日新月异的新事物汇集在一起,推动着我们这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向前迈进。我们很幸运地度过了艰难时期,现在最终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可这里有许多需要学习。

我对60年前在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附近参观一家美术馆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在一个大厅里,许多百年前的油画一下子被影射到一幅完全现代风格的图上。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但这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埃尔·葛雷柯(El Greco)[①]的油画(准确地讲,只有一幅他的早期画)。对于既喜欢德国的表现主义(其中包括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②])艺术作品,又喜欢法国的印象主义作品的我来说,这张已经350年的古油画——也就是这张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③]为题的油画——是一种启示录。在我参观这家美术馆前些年,纳粹把我最崇拜的恩斯特·巴拉赫[④]、凯绥·珂勒惠支[⑤]、埃米尔·诺尔德[⑥]以及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⑦]诋毁为"堕落艺术家"。在我的眼中,这就是一个发疯的信号。现在我明白了,我的艺术审美标准尽管并非错的,但确实是片面的。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天才的葛雷柯,而且至今依然对他的作品爱不释手。后来,我也获得了与戈雅[⑧]和日本的木版画大师葛石北斋[⑨]以及安藤广重[⑩]类似的经验,那就是:以直观的方式去理解亚洲文化的特殊性,此外,伟大的艺术家也能在其他的文化中诞生。

---

①El Greco(1514—1614):西班牙著名画家。

②Framed Art 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浪漫时期德国重要的风景画家。

③Gethsemane:据圣经记载,在被出卖的那晚,耶稣用过最后的晚餐后,就来这个园子做祷告。

④Ernst Barlach(1870—1938):德国雕刻家、版画家及文学家,德国表现主义雕刻家的代表。

⑤Käthe Kollwitz(1867—1945):德国表现主义派的女版画家。

⑥Emil Nolde(1867—1956):德国表现主义画家。

⑦Ernst Ludwig Kirchner(1880—1938):德国表现主义画家。

⑧Francisco Goya(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派的重要画家。

⑨Katsuhiko Hokusai(1760—1849):日本画家。

⑩Ando Hiroshige(1797—1858):日本画家。

在战争年代，当我作为通讯员把一个装满信件的书包带到巴黎去时，我获得了类似的感受。要知道，直到那时为止，我所认识的大城市也就只有汉堡、不来梅和柏林。不来梅议会大楼、德国北部的砖结构的哥特式教堂以及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的辛克尔的新守望者纪念堂，这些都曾是令我感到振奋的建筑艺术杰作。而此刻此时，当真正的都市巴黎就像一个庞大的艺术杰作整体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简直是目瞪口呆：沿着塞纳河的那条河道，东部的巴黎圣母院，西部的凯旋门，协和广场，大大小小的宫殿，宽阔的大街和侧街小巷中那些装饰漂亮的小饭店、餐馆。我那时只是德国占领军的一名小兵，但巴黎却令我真的流连忘返。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曾多次到达巴黎，可第一次巴黎之行所留下的记忆却铭刻心头。尽管有令人发指的暴力区，尽管今天的外环大道已成为密集相连的高速环城公路，而且它令城市感到喧闹不安，但在我的心中，巴黎依然保持着世界城市之母的伟大风范。法国文化与我们的特别相似，但它确实又是完全另外的一种，我们德国人没有任何理由瞧不起它。这是我第一次在巴黎短暂逗留时所明白的道理，尽管我当时只是一个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

多次旅行的经历已经向我充分证明，从外部来看自己的国家，并把本国的组织结构和法律体系与其他国家的进行比较，那是何等的重要。这种看法对我帮助不小，尤其是在我离开联邦总理府后，它引导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此期间，我对这个世界所了解的深度和广度，在某些方面甚或比我在

任时所了解到的还要深、还要广。不可否认，就下一个活动的准备工作而言，一名联邦总理或者一名内阁部长的时间安排表上所允许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从早上 9 点到深夜 12 点，他们紧追快赶地从一个会谈到另一个会谈，一日之中经常要与多个不同的谈话对象就完全不同的题目进行交谈。在这些会谈之间，有时还得穿插着出席联邦议会，甚至作一个小发言或者报告。所有这些通常都有秘书、助手们准备好的稿子，当事人自己极少有机会对稿子上的内容进行认真消化，更不可能就有关题目去查看资料。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路途中，而且常常是在飞机上，当然时差也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困扰。

现在，我有的是时间。这也是我现在的感觉比以前更好些的原因之一。是的，唯有那些有时间集中精力、关注世界的人，才能拓宽自己的视野。而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接触的人多了，眼界也随之就更开阔了。尽管我当年并非完全听凭外交部门的安排，而是自己选定谈话对象，但许多时间却只能由有关部门确定，自己无法随意改变。现在，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谈话对象了。另外也得承认，随着年纪的增大，判断力也相应地提高了——至少我希望如此。当然，人通过旅行也在学习着理解这个迅速发展和变化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落差随着发展而增大。譬如，我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上海的实情实景，也目睹了下班后数百万人徒步行进在马路上的情景。而今在上海，人们却驾驶着汽车，甚至乘坐磁悬浮列车上下班。

有这么一句中国谚语："百闻不如一见。"基于这个动因，我在每次旅行之后写一份报告，并把它发给外交部，而且把这个当作自己的责任。外交部长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①]对此很感兴趣，并请我按内容结构进行详谈。我之所以写这些报告，不仅是出于对刚刚访问过的国家的责任，也是出于对外交部的责任。另外，我所掌握的信息，至少我的外交部长也应该知晓。而这一点真正地被确定下来，那是在约瑟夫·菲舍尔(Josef Fischer)出任外交部长以后。

社会发展到今天，一名年轻的联邦议员也有许多出国旅行的机会，所以我也建议他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我所指的并非是度假旅行，而是出国访问、学习、参加会议，是与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合作者去交流。如果同时顺带地加上一天来休假，或者去了解风土人情、参观名胜古迹，这也不失为一件乐事，但绝对不可以主次颠倒。我们的许多政治家对邻国以及美国有印象，但一名从来就没有去过中国和印度，没有去过俄国、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政治家，就从政的基本准备而言，至少可以说他尚未及格。

在我对后来的年轻政治家提出更进一步的建议之际，我也想谈一下自己的教训。在70年代，我意识到错失了机会并想方设法去弥补，可为时已太晚。我这里所说的错失机

---

①Gerhard Schröder(1910—1998，另外的一位施罗德)：德国基民盟政治家。1953—1961年任联邦内政部长，1961—1966年任联邦外交部长，1966—1969年任联邦国防部长。



会，指的是自己在法语方面的严重缺欠这件事。我与朋友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只能用英语进行交流，因为他的德语有限，而我的法语几乎为零。一旦谈话中涉及专业词汇，我们就只能求助于翻译人员。我觉得，这是相当不利的因素！我当年在汉堡上的那所中学不太重视外语，我最初也就只学了些中学英语和一些基础拉丁语。令我后悔的是，作为年轻的联邦议员，在我还不到 40 岁时，真应该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进修法语。当我在 50 岁出任联邦内阁部长时，学习外语已经为时太晚，况且也没有时间了。年轻时错失了的东西，我再也无法挽回了。

在 21 世纪，在这时空都被剧烈地浓缩了的时代，英语似乎不言而喻地已经成为许多职业的前提条件。一个在外语方面只是熟练地掌握了英语的德国政治家，他对世界的理解力也极有限。对于德国的年轻人来说，只要有学习的能力和愿望，那么所有的中学、大学都向他们敞开着大门。谁不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去学习、掌握至少两门外语，那么他就可能面临着落入社会底层的危险。

[1]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26—)：法国政治家，1974—1981 年任法国总统。

经济工作经验

回顾多年的政府工作、30 年的议员工作以及 60 年的政治家生涯,我坚信,自己在这些年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不过其中某些重要的思想、观点,恰恰是在告别了活跃的政治生涯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形成的。也正是出于这个缘由,我要把自己人生旅途结束前的思考与政治生涯开始时的一些看法予以区别。因为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学到了一些东西,所以我感谢所有向我敞开胸怀的人们,其中也包括那些一直与我意见相左者。下面我将谈到一些人,他们的经济和管理经验对我非常重要。

我最初开始了解国民经济之间的关联和影响,那是在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①]所领导的汉堡经济交通局工作的那 4 年。我先是做席勒的政治秘书,后来出任经济政策处处长,再后来就是 1952 年出任交通局局长。其中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也就是收发驾驶证。事实上,交通局不仅要负责汉堡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以及地铁,而且还要负责飞机场

---

①全名 Karl August Fritz Schiller(1911—1994):德国科学家、社民党政治家,曾任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



以及所有与空中有关的交通。我清楚地记得,1952 年时与沃尔夫·劳艾(Wolf Loah)计划在汉堡北部的卡尔腾凯辛(Kaltenkirchen)地区修建一个大型机场的事情。而此事最后无果而终,因为不仅汉堡人太小气,而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州的人也不大方。具体地讲,汉堡人担心他们的钱都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的兜里去,而吉尔(Kiel)的政治家们却认为,那机场只利于汉堡人。可现在,取代这个大型机场建议的是修建了三个国际机场:吉尔一个,吕贝克(Lübeck)一个,富斯比德(Fuhlsbüttel)一个。

在筹建汉莎航空公司时,我才总结出了汉堡的经验。参与汉莎公司建立的不仅有以交通部长泽博姆(Seebohm)为代表的联邦,还有黑森州(Hessen)、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以及汉堡,而且各方都想从中切到一块儿蛋糕。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要被建成交通枢纽,那么这个地理位置是无可变更的;作为一种补偿,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拿到了汉莎的总部管理,它至今还设在科隆(Köln);而技术支撑就放到了汉堡,它到现在还呆在那里。

一直到 80 年代,我还缺乏营销和企业管理经验,尽管我作为奥厄(Auer)印刷业集团的监事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认知。奥厄公司作为社民党的企业,还与其他公司合作经办着《汉堡之声》这份日报。它的编辑们坚持要保持这份报纸在 1933 年时所拥有的那种风格,可是对这种风格

感兴趣的读者却日益减少，它的命运因此也就不言而喻：终结在所难逃。传统是很重要的，但它绝非生存的主要目的。赫尔贝尔·威莱尔(Herbert Wehner)是当时的编辑之一，他曾经用了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来报道芬兰的一次木工工会大会。结果后来，记者海维希·勃劳莱(Heinrich Braune)用大幅度改进了的马路小报《汉堡晨报》兼并了这份大报。通过这件事我也明白了，硬要把大众不喜欢的东西推向市场，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多年后，我尽管接任了德国发展银行(缩写：KFW)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它当时的业务还不属于银行的范畴，而只是一个政府机构，准确地讲是财政部的派出机构。故此，我在这家所谓的银行并没有学到什么经济工作方面的东西。

真正的企业管理经验是我结束了政府工作后，也就是从1983年才开始的。起因是以前的基民盟议员同事，后来的朋友格尔德·布策鲁施(Gerd Bucerius)请我出任《时代周刊》发行人和经理。我和布策鲁施是1949年相识的，而《时代周刊》属于他的私人出版社，社里设置了两名经理。1954年后，我和布策鲁施与另外两位来自汉堡和不来梅(Bremen)的政治家一起，试图逆着盟军(Alliierten)的意愿，重新建立德国海军。当时《时代周刊》的常务女经理是个大胆心细、目光长远的人，从她身上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还有这位充满激情的出版社所有者，他几乎参与每天的业务，而且积极主动。我的任务主要在出版方面，尤其是与特奥·佐默尔(Theo Sommer)所领导的编辑部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玛蕾恩·登霍夫伯爵夫人（Marion Gräfin Dönhoff）和格尔德·布策鲁施已经告别人世，而编辑部的人员也已几经换班，就连这家出版社也已经卖给了霍茨布林克集团公司（Holtzbrinck-Gruppe），可《时代周刊》以出版和发行的成就依然保持着它的声誉和地位。从经营的角度讲，它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赤字，但很快就摆脱了困境。我对那段时间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每周都被发行量、收支报表的数字追得坐卧不宁的时期。也正是在那时，我真正地感受到了企业家风险的含义，尤其使我真正地学会了如何去办报纸。同时，它也使我明白，一名记者无权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去写作，但出版物必须给读者以兴趣。

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是既对立又并存的。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存在。但他们彼此无友好可言，而且潜意识中都以极不信任的目光关注着对方。但他们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具有共同性：其一，他们今天所讲的或者所写的，是他们明天甚至后天才能真正弄明白的；其二，他们都尝试着向公众显示，自己最关注民众。两种职业因此都使出全身解数，争取选民的意愿，争取发行量，或者争取读者的反应。二者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但从政治家到犯罪分子，无一不试图在这两种职业中编织自己的网络。

当我 1983 年从活跃的政治生涯转入《时代周刊》时，有些新闻记者说我转到了“另外一个堡垒”，可我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这家出版商所发出的这份邀请更多的是给予我一种机会。而在这种所谓的“转变”中，我自己并没有

感到有什么不适，因为这里所给予我的，基本类似于政治生活所给予的，区别是这里有更多的透明度，而且对全局可以一目了然。这两个领域的情况彼此相近，都需要人们对自己的判断能够做到准确无误，而且始终保持真实。一名不能正确保持自己责任感的新闻记者，他对民主的危害，无异于一名不负责任的政治家。

我在国内外都认识了许多这样的记者，他们基于社会责任意识，对于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某些消息，保持沉默而不马上公开。譬如，在 1969 年底作为联邦德国国防部长接过了联邦军的最高指挥权时，我发现了一个正在准备的军事计划：修建一条横穿德国的核地雷带，其中的一些地雷孔已经钻好了。因为军方想阻止外界对其核能防卫能力的政治监控，所以有关这些的计划甚至对联邦议会都保密。有几个记者获悉了这些核地雷的消息，但却保持沉默。他们后来得知，我与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悄悄地停止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并宣布撤销这些计划，还罢免了除联邦军总监乌尔里希·德·梅齐埃尔(Ulrich de Maiziere)之外的有关军方领导，此时，这些记者依然保持了沉默。如果这些计划当时被曝光的话，那不仅在德国会引发民众的恐惧性骚乱，而且会导致我们与美国关系的恶化。正是基于社会责任意识，没有哪一位记者在大众媒体中披露此事。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从东德监狱买犯人的事。这是一项经联邦政府审批，由最年轻的内阁部长讷尔·巴尔茨勒一手

策划并长期进行的一项秘密计划。一些记者也知道了这个秘密。如果他们把这件事捅了出去，那么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会因此而丢面子，而这项计划肯定由此刻起就会终结。第三个例子就是，派遣德国GSG9特种部队(德国边防军第九大队的简称，属反恐部队)去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机场的事[1]，这个消息也被少数几个记者偶然获悉。如果他们马上把消息刊登到报纸上，那么营救这架被恐怖分子所劫持的飞机的行动就有可能失败，与此同时也就可能伴随着许多人的死亡。

有些记者出于虚荣心或者增大发行量和读者效应的目的，喜欢越过界限(不守新闻规则)、把他人的隐私爆料出来，也因此而经常伤及个人。尤其是有些大众媒体乐于把一些小道消息随意夸大，搞成所谓的轰动性丑闻。人们也许还记得，在2005年联邦议会大选提前举行之后，一些新闻记者(也包括一些政治家)如何对离职联邦总理施罗德被选为(俄罗斯煤气集团公司的)北欧输气管道建设公司监事会(股东委员会)主席这件事进行炒作。也许，施罗德应该先等上一两年。但无论如何，我以为如此炒作舆论有些过头。

我自己是离职后未加思考就马上接任了一连串的监事会、董事局成员职务的。这些机构、企业有加拿大、美国、比

---

①1977年10月13日，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客机在飞往德国途中被4名恐怖分子劫持，机上有87名乘客。被劫航班最后被迫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途中，恐怖分子枪杀了一名人质。德国政府急调30名GSG9队员实施营救行动，他们追踪被劫持的波音737抵达摩加迪沙。深夜经过不足5分钟的战斗，所有的人质和机组人员获救。这是GSG9反劫机战的辉煌战绩。

利时的,也有沙特阿拉伯以及德国的,而且绝大部分在国际上颇有声望。它们的业务都是全球性的,它们的高层管理委员会也都是国际性的。对我这样的成员,他们所期望的是个人的判断,而我们自己也是独立的(所支付的佣金几乎无一例外都很低),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会见许多有意思的人,而且彼此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譬如一个泛国际康采恩在如何运作,它究竟应该如何运作以及何以泛国际化是必须的,等等。也正是以这种方式,我不仅经历了美国泛美航空(PanAm)的没落,也经历了德国邮购公司奥图(Otto)的崛起。

我出任监事会会员有多种原因。去著名的机械制造公司柯尔柏集团(Körber AG),那是由于这家私人企业的老板,也是朋友的库尔特·柯尔柏(Kurt Körber)请我担任其个人股东代理,而我也刚刚就董事与职工之间的一个争议发表了支持职工的意见。去德国空中客车公司,那是汉堡市上议院委任我做股东代理。在那里,我经历了一家国际化企业在美元贬值时被拖入灾难的困境。我们必须在国际航空市场上把空中客车以美元为货币单位出售,而一个大订单的最后一架飞机却是在几年后才交货,那么在此期间,德国马克兑美元的协议比价却远比交货时低得多。也就是说,直到交货这一段时间的工资和所有其他开支,都必须由这家飞机生产商以德国马克来支付,这就意味着它是一桩纯粹赔本的生意。我由此又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信念,要设立一种覆盖面大、坚挺的欧洲统一货币,尽管私有经济条件下货币价值的稳定性问题还没有得到探讨。

去大众保险集团(Volksfürsorge AG),那是受股东和职工双方之托,介入监事会的。在那里,我再次经历了一名董事局董事不喜欢更换审计机构的事情,而这是在美国新经济的审计丑闻爆发之前。我曾经在三家集团公司提出过更换审计公司的要求,可惜三次都同样的无果而终。在此期间,监事会和国家立法机构也意识到,要把定期更换审计公司作为一种规定,以便杜绝董事会与审计公司之间的串通。

如果对在这三家工作的经验进行总结,我可以说:假如董事与企业职工选出的工会发生分歧,那绝大部分责任肯定在董事们。如果涉及企业的生存和工作岗位的维护问题,那选出来的工会代表在经济学方面的理智性通常远比工会专职干部们追求权力和信念方面的干劲儿要大些,尽管专职工会干部常常坐在监事会的位置上,口才常常也比职工代表更好。总体来说,我没有理由以社会和谐来制约自己一直所坚持的共同决定的原则。至于企业联合会官员以及一些新自由主义代表们对工会法以及共同决定原则的政治口号式批评和指责,我还是不作评述为宜。

在鲁尔煤炭工业集团公司任监事会成员,那是基于好友阿道夫·施密特(Adolf Schmidt),也就是当时的煤矿工会主席的建议,被矿工们作为职工代表派进监事会的。说真的,我特别乐于接受这个角色,因为我在波恩任职时已经介入了形成鲁尔煤炭工业集团公司总工会的游说工作,而且还参与了那个名为"世纪协议"的工作,该协议使得另外 15 年的煤炭销售以及补助在 1980 年就得到了确认。我曾多次访问矿

山，也多次下到矿井，从而对这项最繁重工作的日常情况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可以说是从尘肺到平日的事故危险程度都有所掌握。坦率地讲，我在这个新领域确实额外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

尽管我清楚地知道，鲁尔煤矿的价格和费用是极不经济的，它所需要补助的成分太多、太大了，因此难逃被放弃的命运。我了解这一方面的法律法规，它们所考虑的更多是社会承受力，因此对有关矿工所能做的也就是尽可能地让他们提前退休。此时，我要面对这些问题，而且年复一年地不断重复。因为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这种“增大福利的弹簧压力”，而这些都属于工作岗位减少的行业、部门，所以我在80年代晚些时候才真正地意识到，我们社会保险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在我的眼中，那时的鲁尔煤矿根本就没有出路，而我所做的，也只是基于所涉及的矿工们的利益，在他们提前退休方面尽力提供一些帮助而已。

为了更准确地弄懂整个经济发展的情况，并且着手就具体问题找出有效解决办法，我早就开始在经济界寻找智者，与他们进行交谈，而且经常是一对一的私人谈话，以便逐步、系统地对问题进行探讨并寻求解决办法。大量的谈话也使我日渐明白，企业家和高级经管人员并不是一种统一、固定的类型，他们在判断力方面的差异也像所有人一样非常的明显。

个别私人企业家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好印象，其中的一些我早年在汉堡就已经结识。譬如，特别低调的影视片生



产商古纳·特雷比奇(Gyula Trebitsch)[①],观众想看什么、想听什么,他对此有特殊的第六感觉。可是他所追求的,绝非只是电影的生产量和营业额的增加,恰恰相反,他更多的是追求电影的道德价值和质量水平。我认识威莱尔·奥图时,他还是一家中型邮购公司的销售员,他的行为举止类似于特雷比奇,比较低调、谦逊,但有特别的销售和组织天赋,而且不露声色地组建了一家大型康采恩。而库尔特·柯尔柏却完全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一个富有成果的工程师和不断提出新想法的发明者。他尽管对自己的企业成就非常自豪,但却很少外露。事实上,他所创建的财富,尤其是那快速增长起来的财富已经使他得到了足够的社会认可。格尔德·布策鲁施和阿尔夫雷德·陶普芬(Alfred Toepfer)在此也要提到。这些汉堡的中型企业家们以其低调的生活方式,在德国不让外界知晓,而且他们之中没有哪一个有兴趣或者力量与某个工会去进行斗争,至于公开露面,那更非他们所愿。

截然相反的是,当时的矿山官员,也就是那些在六七十年代被称为"鲁尔巨头"的人,尽管他们是受聘的经理——其中也有几个是从父辈或者祖父辈继承下来的——却打扮得特别出众,不仅用昂贵的钻石珠宝来装饰夫人的脖子,而且乐于炫耀自己富有。他们之中不乏招人厌烦而却自以为是者。当然一些经理却以其实事求是的精神博得我的好感,譬如拜耳公司(Bayer in Leverkusen)的赫尔贝特·格仑瓦尔特

---

①Gyula Trebitsch(1914—2005):成就卓著的德国籍匈牙利电影制作商。

(Herbert Grünewald)、设在斯图加特的博世公司(Bosch)的汉斯·默克勒(Hans Merkle)以及设在埃森的克虏伯(Krupp)公司的贝特豪德·拜茨(Berthold Beitz)。尽管他们的兴趣在于自己的公司和业务利益,但这并非他们的全部追求。他们以自己的专业判断力、行为和处事方式,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在我的印象中,默克勒多年来一直就像德国经理层的非官方首席代表,他沉默寡言,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但他那实事求是的判断力以及道德规范却是坚定不移的。

在工会领导人中,个人的素质、水平也有很大的区别。有些面对地位变化所遇到的金钱、物质诱惑而不能自拔;有的作为监事会成员或者作为工会方面或者工会在企业的代表经理,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他们要对"共同福利银行"和"新家园"[①]的没落负责。我所认识的绝大部分工会领导人要么是高层职员,要么是带薪的经理,他们都非常正直而且坚持原则。当然,由于他们是特定工会的代表,首先要考虑其会员们的物质利益,所以他们对眼前、短期利益的追求,要比长远影响的兴趣更大。在此还有另外的一重缘由:他们能否再次当选要由会员来决定。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就必须把工会的权力、影响以及威信时刻放在第一位。应该承认,我所接触过的德国工会领导人,绝大部分颇有见地,而就对整个经济的责任感而言,这些人都是可以让人信赖的,譬如化学工业工会的赫尔曼·拉帕(Hermann Rappe),钢铁工业工

①此二者均属德国工会参与的福利性企业、项目。



会的奥根·劳德尔(Eugen Loderer),德国总工会的恩斯特·卜莱特(Ernst Breit)等。当然也有像戴特雷夫·亨舍(Detlef Hensche)那样的极左的工会领导人,他是工会干部中的先锋派人士,但到了21世纪初却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建立左翼党派。

从总体上讲,西德在后来的40年中所作出的选择,即不再重建魏玛时代那种与宗教信仰或者党派政治相挂钩的工会形式,而代之以建立统一工会的方式,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明智决策。以此不仅防止了工会的党派政治化,而且也增大了工会自身的政治独立性。我依然清楚记得作为这项决定之前奏的那场剧烈争论,尤其是作为统一工会决定富有成效的辩护人汉斯·博克勒(Hans Böckler)以及耶稣会的神父奥斯瓦德·冯·莱乐-博劳宁(Oswald von Nell-Breuning)。

在民主德国,工会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在英国,工会不仅党派政治化,而且在70年代时,工会领导人热衷于权力,并且以毁灭经济来威胁,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行使权力打击工会。在法国、意大利,工会又是另外一种情况。相对于所有这些国家,可以说我们德国统一工会的原则是利大于弊,因为它极大地有益于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尽管企业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会存在,但我们的经济却超然于此而保持运行,因为他们之间矛盾的协调和疏导只是一个固定的工资标准协调问题,而对此还有一个双方都尊重的独立工资标准调节,它享有领导权。这是一个基本法、基本权利以及基本价值观都无法直接予以干涉的地

带,而更多的只能是靠实际的经验以及现实的理解力来予以调节。

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反对党人士,或者政治家,他们都需要洞察和了解经济,所以他们无不与经济界建立联系,无不与企业家、经理们和工会人士保持交往。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在我所找的谈话对象中,银行界的人士居多数。在我就经济和金融政策问题进行交流的人员名单中,有许多的银行界人士,既有德意志银行的早期负责人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Hermann Josef Abs)、他的接班人以及总裁阿尔夫雷德·赫尔豪森(Alfred Herrhausen)、德国国家银行的卡尔·克拉森(Karl Klasen),也有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以及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既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兼执行董事会主席霍斯特·克勒(Horst Köhler),也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可事实上,常常正是那些小型私人银行的总裁们,他们小心谨慎的管理、经营自己客户资产的认真态度和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银行董事们的聪明程度越来越不敢恭维了。

机构、管理与诚信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相当多的人确实具有良好的综合判断力和很高的知识水平。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受益匪浅，可惜我很少从职能咨询机构那里获得这样的感受。专业委员会、职能小组或者其他的咨询委员会，只是提出评估、给予建议，却不需要自己去实施，所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很有限。许多部、委都有一个所谓的“专家委员会”，这些机构通常都是由选拔出来的大学教授和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名誉性的。一位内阁部长，或者其下属的司、局长，就某个特殊的问题向本部、委内部的专业委员会寻求评估或者建议，那是极少见的。这些专业委员会经常是就自己所选的题目进行工作，而部长们却很少给予什么有兴趣的题目。对于部长们来说，能够同他们的专业咨询委员会打一声招呼，这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所需要的也就是有一个专业委员会这块儿牌子。

在原德国内务部有一个专业研究委员会，其中一直下设一个“两德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室”。在几十年间，该研究室定期就东德经济发展提出一个全面性报告。在 1990 年两德

统一进入决定性阶段时，经济无疑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势必涉及如何正确评估东德经济状况，可是该办公室所提出的那些研究报告却无人过问，因为联邦政府压根儿就不需要这一方面的知识(而这个办公室也就于 1994 年被取消了)。

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S. V. R.)[①]是由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组成的，它几十年来一直是联邦政府最重要的咨询机构。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特别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受过非常好的经济学教育，而且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他们所提交的年度评估达 700 页之多，不仅内容广泛，而且包含有大量的数字、图表和分析、说明。几乎可以说，每次所看到的就是博士论文和教授资格论文的合订本。遗憾的是没有哪一位财政部长或经济部长——至少我从未听说过——把这份内容浩瀚的评估从头到尾读过一遍，更不用说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概括、总结了。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巨额开支项目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保留价值有限的。

另外，许多大学的、私人的和国家的经济研究所与该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上层公开进行竞争。他们在该委员会提交年度评估前，就围绕现实题目定期出版短小精悍的评估报告，同时还定期地出版他们的解释和说明，譬如，他们上期的预言何以没有出现，或者何以只兑现了一部分，并随之提出

①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即“经济五贤人”委员会，由五名经济专家组成，其成员由政府提名，总统任命。该委员会成立于 1963 年，主要任务是在每年 11 月中旬就德国总体的经济发展形势提出评估报告，作为各决策部门的参考依据。虽然“经济五贤人”委员会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没有约束力，但他们的观点和意见还是非常有分量的。



新的预测,而老板们也就借以出现在电视机里。因为许多德国经济学家与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些影响着他们的形象或者视野,所以在他们那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评估除了大本的出版物之外,也就再没什么用了。对政治家而言,充其量也就是从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中翻来查去,找出些适合于自己观点的东西而已。如果其中的某个观点碰巧在别的国家得到证实,那至少也算得上是一种安慰吧!

德国的这种专业顾问委员会,最早的可能是联邦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KMK),它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48年时一位东德部长的倡议。1949年基本法生效,此后文化(在一个狭窄的意义上)就属于各州法律权限内的事情,但联邦政府觉得,对于整个联邦来说,有些文化政策是有必要统一的。因此,联邦政府筹建了各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只是一直没有东德的参与。

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各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按照政府部、委的模式,建立了自己庞大的下属机构,并且形成相应完整的高度专业化建制。但它的官僚机构既不受基本法的限制,也不受联邦议会的控制。通过德语正字法的混乱,人们就能够看出该机构的专业成就和能力。在这件事上,他们所赢得的批评和责骂声最高。即便如此,各州的政府首脑们丝毫还没有撤销这个运作在合法边缘上的官僚机构的意思。这里同时也就涉及一个典型的人生经验:一旦一个官僚机构被建立,其趋势就是,只要它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专业能力,

那么它的存在就似乎被合法化了。

没有哪一位政治家能够通晓所有领域，所以他们都需要其他同事的帮助，也就是那些他们认为在某个领域具有特殊判断能力而且可以信赖者的帮助，而这些人就是所谓的“专家”，如经济专家、交通专家、国防事务专家等等。每个议会都需要一连串的专家代表，他们对于专业相关领域的决策经常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在50年代末以及60年代，法律学家阿道夫·阿恩特(Adolf Arndt)以其惊人的判断力和严格的道德规范，还有他那杰出的雄辩口才，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政治生活中，无疑也有那种八面玲珑的人，也就是那种凡事都为自己留后路者。他们把聪明智慧用之于精心选择关键词以及如何使个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最典型的技巧，当属那种“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的说法！与这类人您千万可别走得太近。在我的联邦议会以及政治生涯中，所遇到的女士和先生们绝大部分都与之不同，即他们坦诚而且富有责任感。他们的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议会的激烈争论中，从个人的谈话中也能领略到。尽管议会讨论时各党派必须形成黑白阵线，出现高嗓门的争论，但是，只要某个人雄辩的口才、敏锐判断力令人信服，那么人们就会认为此人具有领导才能。这样的素质，我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从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和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身上看到了。再稍晚一些，就有赫尔贝尔·威莱尔以及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β)，他们那风格迥异，但却同样火山爆发式的进攻性论战方式，

常常使得联邦议会的一半被惹恼并发出抗议，而另外的一半则不时地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伴随着这类领导人物的出现也同时出现了追随者，也就会出现狂热的个人崇拜。在20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大型议会辩论的电视实况转播给普通民众以政治化和感情化的寓意，因此也就经常使得政治上的争论越出了议会大厅。

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有的人失却了个人的判断力，有的人则变成了应声的好好先生，而这些好好先生中也不乏浑水摸鱼、借以到达个人目的者。譬如，汇集在联邦总理勃兰特周围的，不仅有他的专业顾问和文字秘书，而且也有崇拜者和怂恿者。勃兰特不喜欢求助于法律的、军事战略的或者经济的分析报告，他经常通过与自己身边人谈话来寻求并获取他的判断。这个圈子从政府官员埃贡·巴尔（Egon Bahr）[①]和霍斯特·艾姆科（Horst Ehmke）[②]一直到古特尔·高斯（Günter Gaus）[③]、古特尔·格拉斯（Günter Grass）[④]或者克劳斯·哈普雷西特（Klaus Harpprecht）[⑤]，他们都对这位联邦总理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勃兰特自己也给予下属很大的活动空间，尤其是艾姆科，他可是总理办公厅反应最灵活的老板。也正因为如此，艾姆科可以用勃兰特之名大量地发号

---

①全名 Egon Karl-Heinz Bahr(1922—)：德国社民党政治家，曾任联邦政府特别部以及经济合作部部长。

②全名 Horst Paul August Ehmke(1927—)：国家理论专家、德国社民党政治家，曾任联邦总理办公厅主任、科技部长等职。

③全名 Günter Kurt Willi Gaus(1929—2004)：德国记者、外交官和政治家。

④Günter Grass(1927—)：德国作家、画家，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⑤Klaus Harpprecht(1927—)：德国记者、作家，曾任勃兰特政治秘书。

施令，甚至可以用所谓的"上边说"，尽管那根本就不是"上边"要办的事情。

在一个部委中，如果一把手不是学着去驾驭那庞大的官僚机构，而以听取个人所信赖的"糖果"内阁小圈子的意见来取代高层、专业官员的支持，那么就可能形成类似于勃兰特时遇到的情况。一个这样的"糕点"内阁常常只走自己党内部单钢丝绳，所以他们的专业知识难免不足，而且也难逃受制于党内的命运，在人事问题上尤其如此。

按我的经验，德国的职业官吏——至少就高层职业官僚的能力、水平而言——绝不亚于他们的英、法同事（与美国高层官员相比特别困难，因为在那里压根儿就没有终身官僚这么个设置）。在我的整个联邦总理任职期间，只要涉及提升，都是量体裁衣，无论是提升一名司局长、三星将军，还是"比较大的"使节，我所感兴趣的只是候选人的专业水平和个人能力，而对他的党派所属或者政治倾向并不感兴趣。在我看来，任何一种凭借党员证来选拔公务员的人事制度都是一种灾难。可惜在我们的基层组织，尤其在劳动局以及社会福利局管辖范围中，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经常有某种"认党证"的倾向。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以纵容和继续的。无论如何，我在任命官员方面坚持任人唯贤，甚至在任命业务副部长时也如此，即便是他们的政治倾向属于反对党。在与许多基民盟所属的司、局长的默契合作方面，我深感欣慰并真诚感谢所有当事人。

作为一位部长，他最常征询和交换意见的人，无疑是他

的业务副部长。同时，他还会向下属的司、局长以及议会中那些负责同一专业领域的本党同僚征询意见，但他把其他党派的议员，通常当作主要对手。至于司局级以下的官员，一名部长所能认识的极为有限(秘书以及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则属例外)。在部、委的文职人员中，有工作积极性的人比较少，除非他们在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上，有望随着工龄的增加而不断得到晋升，逐步从科员提升到科长、处长，最后到司局长甚至业务副部长。

文职人员晋升的连贯性及其在党派政治上的中立性有其合理、合法性，况且一名部长也需要其下属以积极、创造性的工作来协助自己实现政治目标。故此，部长把业务副部长作为他的“政治官员”，并对他拥有不受其他方面制约的任免权，这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我接管一个部(也包括作为联邦总理)，尽管我要更换业务副部长，但未必解除司、局长。任国防部长时，我尽管不得不解除一名二星将军的职务，让他提前退休，但这纯属政治的需要，因为他把内部领导的原则称为“假面具”，言外之意这些是早晚都得被揭开的骗局。除此之外，在我的管理中，文职官员、军人的政治倾向以及政党关系在晋升和任命上没有丝毫影响。我后来满意地看到，来自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几位部长的工作表现也同样出色。

当然，任命部长所使用的是规范方法，它完全不同于任命文职人员，尽管一些善良、淳朴的市民总希望最好任命专业人士出任部长。无疑，一名部长应该具有比较好的专业知识，或者至少有能力在短时期内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在一

个议会民主的国家里,部长中的绝大多数必须从议会和执政党中或者联合执政联盟中来选出。有时也允许有一两个例外,但如果例外太多,那么部长的人选名单就既不能在议会获得批准,也无法在联合执政联盟委员会中通过。用一句话来概括:部长需要从那些在他们的议员同僚中赢得了威望者中选拔。

一名正在组阁的政府首脑,多少有些像一名导演,为莎士比亚剧本寻找的演员与为布莱希特的“三个铜子歌剧”所寻找的演员绝对不同。同时,作为组阁的政府首脑,在合适人选问题上还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诸如:谁在此方面的资格最老?谁在议员中的影响力最大、拥护者最多?巴伐利亚人、东部人或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人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如果没有,那么我是否要从相应的州再寻找平衡地方政治的人选?许多地方政治家尽管富有管理经验,但在对外政策或者在欧洲政策方面,或者对税收政策方面,却知之甚少。

有时你不得不把某个人任命为部长,尽管你明知,他也就是能把自己家收拾干净、管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绝无法再带来什么景致。有的人尽管得到一个部长的席位,可是他凭这照样什么也干不了。从联邦邮政部长这个位置上,人们早就明白,在那个位子上什么也干不了。给这么一个国有的邮政企业设置一个部长席位,而不是采取与它同样重要的国有企业联邦铁路的做法,实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传统。当然,我自己也曾基于完全不同的缘由,要把一位同仁任命为

邮政部长,他就是汉斯·马迪豪夫(Hans Matthöfer)。马迪豪夫担任那令人极度神经紧张的财政部长职务多年,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他因此在1982年春向我提出辞职。但我需要他出现在内阁会议上,所以就与他商谈,请他接管邮政部。他就这样成为邮政部长:在不需要担负太多工作的同时,继续留在政府内阁,而每当我需要时,也就总能获得重要的一票支持。

一名拿到一个剧本的导演,可以从那些有过演出经验的人中寻找候选人,所以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演技作出估计。而对于一个组阁的政府首脑来说,他与自己的绝大部分同事还没有行政合作的经历。他所了解的,绝大部分也就是作为讲话人、议论者的他们,却很少知道,他们究竟属于创业者还是官僚主义的滋生者。所以,政府首脑在确定其内阁名单方面担负着极大的风险。

风险最大的就是机构庞大、层次繁多的国防部。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国防部出了许多差错,因为自特奥·卜岚卡(Theo Blank)和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以来,14任国防部长不仅都没有预先学习过军事指挥,而且只有3位具有管理经验。在我的国防部长任期内,联邦军的军事和文职人员总数就达到70万。没有哪一家大型企业把如此多的员工交由一名董事长领导,可国防部就靠一名部长指挥。在国防部中不仅有命令与服从之类枯燥的原则问题,尤其还有一个文职人员的优先权问题:文职人员有权在连队就有关事务进行讨论,因此使他们的权威甚或要比他们的军事领导还大。当

然,我把这种不合理的规矩给取消了。即便如此,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国防部的军事素质还是有了明显的提高。

为了克服政治家在管理和行政工作中的不足,我们在六七十年代通过大联合政府实施了国务秘书结构制,这是英国的实践经验。以此要使年轻的国会议员通过在任部长的指导、帮助,积累从事部委管理和领导的经验。随后,在每届联邦政府中,都设置许多国务秘书,尽管这种体制结构只是在部分领域继续保持着。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地有助于强化在任部长与议会的联系和交流,同时事实上,一些年轻的政治家也确实通过当国务秘书为自己后来出任部长积累了许多经验。也有个别的之所以任国务秘书,只是由于他要么为政府首脑、部长或者自己的党派所欣赏,要么因为他作为某个政治方面,或某个地区的代表。从总体来讲,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人事组织培养方式。假如我现在仍在联邦总理之位,我可能会对这种组织机构予以加强,至少它给部长增加了一名个人助理,人选当然是从他们自己党派中选拔。

从借喻演戏作比较的角度讲,政府组阁类似于首次演出:绝大部分观众所感兴趣的主要是主角和名角。政府的持续性首先就取决于主角发挥得如何,也就是作为"导演"的政府首脑是否能够把握住全局。不可否认,政府首脑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一届政府是由许多不同的人构成,其中有的是坚决要进入内阁,而有的是作为联合政府配额进来的。从游戏规则讲,政府首脑要把政府工作作为团队工作来

理解，并把内阁作为有机协作的团队来指挥。譬如，我从未想着要独断专行，尽管基本法授予我这样的权力。当然，有些意义重大的决定是我自己拿的主意。

幸运的是，我年轻时在汉堡市议会就学习了团队工作。内部官员之间的组织、协调也是一种团队运作，具体地讲，每周的科室领导例会，它就是关键的领导机构。后来，在波恩，也就是在议会党团以及早期部委工作中，即当我作为领导者时，我便一直保持这个工作原则。一个部委或者政府越大，就越需要其高层人员保持忠诚，形成一种内部的领导团队。

出任国防部长后，我对形成一种这样的团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因为对我来说，自我控制和征询意见是绝对必要的。对我们这个紧密合作的圈子，我引用了“苜蓿叶”[1]这个词，因为我们当时的国防部有四个人，三个副部长：维利·贝科汉(Willi Berkhan)、汉斯·毕克豪茨(Hans Birckholtz)以及恩斯特-沃尔夫·莫姆森(Ernst-Wolf Mommsen)再加上我这个部长，而且一个幸运的苜蓿叶是四瓣。当然介入这个团队的还有一名速记员，有时还有联邦国防军的总监参加——最初是乌尔里希·德·梅齐埃尔，随后是海军上将阿尔敏·策默曼(Armin Zimmermann)。再后来，到了联邦总理府，我们又是4个人：克劳斯·波菱(Klaus Bölling)、曼夫雷德·舒莱尔(Manfred Schüler)以及汉斯于尔根·威施莱维斯克(Hansjürgen Wischnewski)，当然还有我这个联邦总理。经

[1]苜蓿叶通常一支有三个叶瓣，故又称三叶草；偶尔也有四个叶瓣的，但少见，因此德国人称四叶瓣的为幸运草。

常参加这个团队的还有一位速记员以及当时的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雷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有时还有财政部长,先是汉斯·艾普勒(Hans Apel),稍后些是汉斯·马迪豪夫(Hans Matthöfer),或者司法部长汉斯-约西·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

总理府的这棵幸运草经常遇到毫不留情的批评,也经常遇到不同意见,然后争论,最后决定并取得一致。我们每个人都熟悉自己的专业,这里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敏锐、精干、实际的判断力。在这里,保密和相互坦诚而又绝不彼此伤害也同样重要。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领域,波菱的领域是民意和对外观点,他对这两方面有一种特殊、敏感的嗅觉。舒莱尔负责总理府的日常事务和安排,负责与所有业务副部长的联系,并且安排每个周末的内阁会议议程。威施莱维斯克属于全才,因为他对阿拉伯问题那非同寻常的理解力而被称为本·威施莱维斯克①。如果他说:"赫尔穆特,这事你不能做!"那么他绝对言中。回忆往事,我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所获得的和谐是无法比拟的,在这种苜蓿叶团队中所学到的东西也是难以计数的。

回想所参加过的党派的以及议会党团的主席团会议,或者社民党中央会议,我在几十年中参加过的会议也许有上千次之多,说真的,心情舒畅的次数极为有限。参加这些会议,

---

①意即幸运的威施莱维斯克。他以其奇特的手法不仅迅速、有效地解决了在非洲、美洲发生的波及德国的突发性事件以及红色旅对德国高层政治家的一些恐怖事件,而且顺利地改变了阿拉伯地区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故此当时在任的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称他为本·威施莱维斯克。也有德国人因此称他为007。



我所获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学会了认识极限，围绕形成统一的可能性寻求各方的共同点并在万不得已时进行自卫。这里也是判断力和行为能力的综合交集，但同时也夹杂着其他成分，譬如报复、嫉妒、有意挑起事端的兴趣、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但是，共同的基础、共同的社会民主价值观却很少受到伤害，即便有也是个例。在艾威希·奥霖豪尔(Erich Ollenhauer)和维利·勃兰特任社民党主席时，经常要为消除党内同仁的分裂而作出很大努力。这个过程中的风风雨雨，作为中央主席团成员的我都经历过。我估计，其他党派也不外乎如此，因为一个政治性党派的发展也不可能是其他样子。我在此并非想给政治党派作什么社会学或者心理学方面的专业报告或者总结，而是想引述到政府结构建制中文职人员的忠诚性问题上来。

一名活跃于社会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家能够对下属文职人员的忠诚度放心，这也是我一直所期盼的。为了从正常渠道——譬如在工作岗位上——所获得的信息至少能比从国内外的交流者或者谈判者那里所获得的稍微多一点儿，我不得不为了获得某些特别的认识而经常直接求助于下层文职人员。在我任联邦总理期间，所有给我的信函、报告都必须一目了然地显示谁是原始起草人(由下到上部门负责人逐层画阅、联邦总理府行政负责人签字的，然后呈交总理的)。一名起草人有时也得有思想准备，我有可能去电话，请他直接就此与我通话。这样的做法曾经引起了一些骚动，尽管如此，可一旦看到有关两个银行合并的报告，或者听到美国驻

布鲁塞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将军打算通过武力方式解救伊朗人手中的美国人质，我无疑会马上直接召集具体银行的负责人，或者德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将军进行询问。要知道，在经历了多道关口的长途跋涉之后才到达上面的信息，有可能失却其重要的细节或者有价值的东西。

一个部委的情况就像一家大型企业，一旦没有认真、严谨的层次结构，势必会形成一片混乱。按我的经验，一名老板需要这么两个方面：既要考虑到熟练的个人成就能力，他因此需要其工作人员按部就班；同时又要考虑到，大凡官僚主义都制约人的创造性，他因此需要尽可能地直接与"做具体工作的层面"联系。作为老板，还需要知道，他所领导的整个系统究竟如何运转，所属领域到底如何动作，还有这风向经常究竟怎么刮。

正好是在离开联邦总理岗位 15 年时，我经历了一次由于准备不足而作决策所带来的小教训。此事是围绕国际货币基金(IMF)高层管理人选的提名而发生的。经过多年的争吵，联邦政府总算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意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管理这个位置正式提出了一个德国候选人，而且是一个出自联邦财政部的高级人才。但是向那些在这个组织中握有多数表决权的美国同仁，德国的官僚机构却没有及时进行通报，结果就是：美国行政管理机构觉得不了解这位德国候选人，便否决了他。联邦德国总理因此大失面子，这时有人向我寻求补救办法。我回答说，你们要设法证明，这位候选人的国际知名度很大。他们便问我，如果是我的话，

会推荐什么人。我马上回答，推荐汉斯·迪特马雅(Hans Tietmeyer)，他曾出任联邦银行行长，国际声誉很高。可惜，迪特马雅不愿意做国际货币基金的高层管理候选人。作为第二个候选人，我提议霍斯特·克勒，他曾在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任部长的联邦财政部担任过业务副部长，而且还多年在伦敦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最终，克勒确实在国际货币基金当选了。回想这件事开始时的失误，我估计问题出在联邦总理府上层的官僚，他们似乎缺乏对国内以及国际关系的了解。如果能够在行动开始前，预先向联邦银行，向德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向德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的高级经理(直接在董事会之下)以及美国财政部作一些询问，就不至于令联邦总理那么难堪。

相反，也有一个参与的机构太多的例子，我想在此也介绍一下。2005年时，《时代周刊》准备刊发一篇关于欧元如何保持其坚挺性的文章，我准备就此与联邦财政部的一位科长交谈一下，并让我的秘书与他预约见面时间。这位科长认为，他先要请示一下他的处长。这位处长认为，他尽管是基本规则处的处长，但欧元坚挺性这个题目是与整个欧洲有关的，所以欧洲处的处长也应该参加这个面谈。最后，他们来了4位，因为也牵扯到了联邦总理府。如果要求获取信息的不是一个早就退休的政治家，而是一位在职的部长，只要被问询到的文职人员稍微有些责任意识，那么他势必也采取类似的态度，作出类似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大型组织、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也不外乎如此。通过许多组织、部

门参与的方式，也就形成了横向同一水平的部门相互交叉，纵向不同级别的部门彼此重叠工作的局面，而这也就有可能形成某种中间地带。类似于这种情况的有一个笑话，说的是应该设计一匹马，结果最后拿出了一只带翅膀的五蹄动物。所以对于那些最高层的人物来说，也就是作为部长、康采恩的董事，或协会的主席，最好在作出决定之前，先就近或向现场的专业人员咨询。

作为《时代周刊》出版人，我并非凡事都自己作决定，而更多的是咨询、建议、表扬和批评。通常情况下，我给具体的作者、撰稿人或者编辑签发出版社公函，同时复制一份给主编，这样既保障了联系的直接性，同时又不打乱内部的管理秩序。在此，我想加一个补充：我在人生旅途中所学到的第一点就是，切记不时地表扬自己的工作人员。

网 络

许多年以前，我的办公室还在波恩，一位年轻的议员在拜访我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您当年究竟是怎样对自己的从政业绩进行计划的?"这问题令我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一个政治家可以计划自己的人生轨道?！我从未有过这念头。反正我自己对政治上的成就从没有预先想过，况且我步入政坛实属偶然。一位想被选入议会的议员，首先就得从众多的专业政治领域内至少选择一个领域，并在其中做出成绩，以便对整体作出个人贡献。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回答，尽管这话有些生硬。我后来尽管多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但它一直令我感到难以回答。

谁想进入政治，那么他先应该学一门专业或者手艺，并且熟练掌握它，以便他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来，只有这样他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性。他要熟记、消化基本法的第 20 条，并且把它们渗透到自己的行为中去。他至少应该了解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德国历史，同时还要了解我们重要邻国的历史，此外还有欧洲的民族融合史。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最迟在他当选为议员后，务必要钻研一个专业领域，使自己在

此领域的判断力达到完全专业的水准。

人们可以把这里所陈述的规范，也就是一名职业政治家必备的前提条件，进一步扩展和修补。但是在对认知的要求方面，我认为德国史和欧洲史这两条无论如何都要保留。我清楚地知道，对于那些来自工人或者文秘圈子，或者那些学习电子技术、牙医的人来说，要想获得足够的历史知识，那是相当困难。当然，我也想强调，这对于被选为议员来说，不是必需的。但一个人如果很认真地作出了决定，准备把从政作为职业，那他就必须多学，学习所有那些他只是泛泛了解了的东西，其中自然包括那为绝大多数人简单阅读的德国现代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可能明白现在；不能明确判断他何以要在议会投票的人，就不可能正确地行使自己作为政治家所拥有的权力。如果有些基层组织的新人以为，只要有一个坚定的政治信念就足以从政，那就错了。政治家还得具有新奇感和学习能力。

在现代人常讲的“成功计划”中，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网络”，在经济和政治圈中的人们也称之为“维生素 B”。在我从政的那个时代，尽管还没有网络这个说法，但人们都非常注意建立多方面的个人联系，并长期地维护它。一个善于交际、外向型、主动寻求交往的人，远比一个拒绝与同事交往者要更容易获得别人经过斟酌而得出的判断。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如此，一些政治家正是借助于个人关系网而获得杰出成就的。在我这里，与其说这样的关系网有助于某个具体的利益，或者自己的事业，不如说更多在于有助于观点和

意见的坦诚交流。

在我的故乡汉堡市，有一个周五协会，就是以跳出政党和职业局限，开展一种长期、持续的交流为目的而建立的。20 多年来，这个协会定期聚会，每年大约举行六七次讲座或讨论，以便彼此了解、认识。大约 20 位参加者来自不同的职业领域，有过去的政治家，也有现在正活跃的政治家，但无论从选民还是从会员的角度讲，我们在政治观点上都属于不同的党派。我们的共同兴趣是：追求公众福祉、社会透明度以及和谐。在这个周五协会建立后，玛蕾恩·登霍夫伯爵夫人和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柏林以类似的方式，重新恢复了久负盛名的周三协会。在 1863 年到 1944 年期间，周三协会从思想和精神上曾经给予会员们以巨大的帮助和指导。

周五协会和周三协会的讲座和讨论我很少缺席。这两个协会一直是那样的活跃而富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总是以饶有兴趣的主讲人给参加者以丰富多彩的话题和刺激力。德国民族基金会的情况也类似于此，该委员会是以同样的方式、由来自不同州的人组成。由于理查德·施罗德（Richard Schröder）和库尔特·彼登考福（Kurt Biedenkopf）的积极活跃，从而使这个基金会给我们的公众舆论注入了许多刺激素，而所有这些主要以加深德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意识，同时以加深欧洲人在政治、历史以及文化方面同一的意识为指导思想的。

如果允许我在此对这三个机构作进一步评述的话，那么可以说，它们给我以希望，它们是令人感到欣慰的范例。以

前，在德国的许多城市中，都有类似于读书会那样的社团，文学作品在那里被朗诵、阅读，然后与会者就内容进行讨论。进入电子时代以后，语言交流遇到了枯竭的危机，因为许多人把自己的交流范围单一地定位在电视、计算机网络上，同时朋友和熟人的圈子也仅仅局限在自己的职业范围。老总们有老总的圈子，企业家们有企业家的圈子，工会人士有自己工会的圈子，科学家、医生、律师以及工程师们都各自围绕自己的职业形成圈子，而政治家们也以政党为基础形成圈子，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走近亲繁殖之路。我们的社会由此就面临双重危险，一是社会文化的浮浅化，再一个就是整个社会趋于兴趣团体式鸿沟裂变。

发展是随着我们的阅读文化而逐步继续的。从专业书籍到多种参考书籍、旅游以及消遣性书籍，而见多识广，大量的阅读就使人不至于总是眼光狭窄。譬如，在我看来，作为一种基本知识，重要的历史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我的眼中，阅读并理解世界文化遗产中那些最重要的著作，是理解错综复杂世界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我自己的文化教育是极不完善的：18 岁时必须去当兵，在 26 岁终于可以脱下军装时，尽管获得了战争和人生的酸甜苦辣，却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故此，在 1945 年末，我很晚才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这也是我集中精力读书之时。在这段时间里，我补充了许多知识。

在中学时期，我阅读了一些有关德国历史的书籍，尤其是著名文学大师们的著述，有德国的、俄国的、斯堪的纳维亚

的、法国的和英国的。汉堡老火车站所能提供的这些书籍五花八门,既有德国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也有俄国的伊凡·屠格涅夫(Iwan Turgenjew)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jodor Dostojewski),还有法国的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和左拉(Emile Zola)。而政治性著述我不太问及,唯一的例外是从我父亲的书架上翻到的两本:一本是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而另一本是西班牙人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阅读这二位的著述使我第一次对群众这个概念以及他们在政治和心理上易于受骗的特征有了清楚的了解。此外就是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他那不同寻常的现实主义令我对战争感到恐惧。还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2],他那《西方的没落》一书对我来说,尽管内容丰富,但却实在难懂,因为他所拥有的广博知识是我当时所没有的,可他关于一种文化的成长、开花、结果和没落的生物链性介绍,给我以启示。在战争时期,古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是我每日必读的经典。正是他一次次把我从恐惧、彷徨之中召回,并警告我要履行责任。

战后,多亏了汉堡的罗沃尔特出版社,它把大量的美国作家介绍给了德国读者,这在纳粹的时代是绝对不可想象

①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真名埃里希·保罗·雷马克(Erich Paul Remark),20世纪德裔美籍作家。

②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

的。作为对自己所受高等教育的完善，我此刻特别注重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述，尤其阅读法国的卢梭(Rousseau)、孟德斯鸠(Montesquieu)，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威廉·亨利·贝佛瑞吉(William Henry Beveridge)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的著述。从而，我第一次获得了对道德、经济、法律和国家问题进行判断的基准。可是在大学学习阶段，我却无可奈何地抽出时间去阅读一些没用的内容，因为我们大学的绝大部分国民经济学家仍然生活在遥远的远古时代，沉醉在过时的理论之中。从这里我仿佛明白了魏玛民主尝试何以失败，而纳粹统治者何以是一个犯罪政府之缘由。

当我第一次能以所学的经济学为职业去挣钱时，已经30岁了！4年后，我首次被选为联邦议会议员。此时，我从政的时间不多，在政治教育方面的欠缺都必须“在干中学”。在30年的仕途中，我依赖自己的标准化判断圆满地完成了工作，虽然小心谨慎，但也许还能改进和完善。而真正的学习，也只能是在完全离开了联邦总理公职之后才开始的。我尝试着对自己教育中所缺少的部分，尤其是就我在实践中明确感到不足的部分开始系统地补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不在其位的这25年确实属于充实自己的岁月。

再回到所谓的“网络”这个题目上来。在许多年以前，原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是在科罗拉多(Colorad)州的魏尔市(Vail)举办美国高级经理夏季聚会，他也惯例性地邀请几位老友和伙伴，如英国的吉姆·卡拉汉

(Jim Callaghan)[1]、法国的瓦雷利·吉斯卡尔(Valery Giscard)[2]和我。在此,人们学习着从美国企业家方面来进行理解,当然还可以自己组织一个小型的座谈、报告,尤其是整个晚上 4 个人围在一起。但在桌边,人们所谈的与其说是过去,不如说更多的是今天和未来。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由于荷兰的约瑟夫·伦斯(Josef Luns)[3]退休而在 1983 年末需要一名秘书长时,我们 4 人认为,英国的皮特·卡灵顿勋爵(Peter Carrington)的才干很适合于这个位置,并商定共同推荐他来任这个职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在 1984 年发出聘任令,卡灵顿由此开始,富有成效地做了 5 年的北约秘书长。与吉斯卡尔和卡灵顿的朋友关系,我至今仍然保持着,与福特和卡拉汉的朋友关系一直维持到他们去世。

另外一个不任政府职务却产生政治影响的例子是"欧洲货币联盟委员会",这是我和吉斯卡尔在 80 年代初共同建立的。我们从当时的欧洲经济联盟 12 个成员国召集了一批颇有名望的政治家、银行家和老总们到一起,此事引起了舆论界的特别注意。在我们的政府任期内,吉斯卡尔和我把欧元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从一开始就明确,要用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来取代我们的小国货币,因为小国货币在世界金融市

---

[1] 全名伦纳德·詹姆斯·卡拉汉(Leonard James Callaghan,1912—2005):工党政治家,1976—1979 年任英国首相。

[2] 全名瓦雷利·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1926—):1974—1981 年间任法国总统。

[3] Joseph Luns(1911—2002):荷兰政治家、外交家,曾任荷兰外交部长、北约秘书长(1971—1984)。

场那疯狂的投机和湍急的旋流中都无力支撑。80 年代中期，解决这个题目的时机似乎成熟了。

我们先向当时驻在布鲁塞尔的欧盟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挑明此事，而正是他把欧共体中央银行联席会议建立了起来。当时的欧共体只有 12 个成员国，并非像现在有 27 个。当然，当时欧洲各国中央银行的上层人物对这个举动并不太感兴趣。这个经验也充分证明了一点：没有哪一个官僚机构愿意主动削弱或者交出自己的权力。尤其是德意志银行，它发出了强烈的抵制声音，甚至还提出了一种自己的“高潮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只有当一个欧洲联邦国家建立之后，统一的货币才是必要的、有生命力的，而且这种统一货币的建立也就作为统一的高峰而诞生了。

但到了 1990 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出于对两德统一后德国马克实力剧增的担心，把建立一种统一的欧洲共同体货币作为一个附加条件提出来，而且当联邦总理科尔(理智性地!)予以应诺，这时，我们和德洛尔预先所做的工作便马上显示出其价值和必要性。就这样到了 1992 年，形成并签署了建立欧洲共同体统一货币的协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如果当时有些成员国要求对此条约进行公民投票表决，那么这件事情也许就会流产。至今为止，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就其购买力而言，欧元在欧盟内部(也考虑到它的贬值比例)如同美元一样的坚挺，但在与世界其他货币的兑换率方面，它远比美元要坚挺许多。可以说，我们的共同货币已经发展成为欧洲国民经济全球竞争力以及欧洲

开发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

不在其位而产生政治影响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国际互动委员会(InterAction Council)[1],这是一个在80年代中期建立的离职政府首脑协会,我参加了这个协会的筹建工作。1992年,我们向西方各国政府发出了这个信号:重新与中国建立对话。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加上西方媒体的过度炒作,在西方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的极大不满。所有的访问和交流全被中断,而且宣布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此刻面临形成一种针对中国的冷战危险。为了形成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我于1990年飞往北京,不仅与中国领导人,而且也与一些普通人进行了交流,同样也与工作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商务人员以及记者们进行了交流。情况并不乐观,但也并非毫无希望,按我的判断,如果此时此刻继续采取孤立中国的做法,那么就只能使情况更加恶化。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对国际互动委员会的同仁们进行了说服。我们最后决定,阻止、改变目前的这种势态发展。故此,我们邀请离职的政府首脑们到中国去耳闻目睹、现场观光。1993年春,我们飞往上海、北京,访问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高层。这次访问代表团的组成规格相当高: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英国前首相吉姆·卡拉汉、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 Fraser)、法国前总统瓦雷利·吉斯卡尔、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前总统奥卢

---

①InterAction Council(缩写IAC)是由原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和原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于1983年共同计划建立的离职政府首脑非正式联系委员会。

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作为特别成员,《纽约时报》的弗洛拉·刘易斯(Flora Lewis)、亨利·基辛格和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也参加了这次访问。

作为国际互动委员会的主席,我特别投注精力于1997年通过的《世界人类责任和义务宣言草案》的修订工作。我们在这份倾注了十余年心血的草案中,为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设置了19款的具体条例。在此,我们以各大宗教那些共同的"金科玉律"为出发点,也就是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我在此想引述第15条款,因为这一条在21世纪的初叶恐怕远比其在上世纪末所具有的作用还重要:"当宗教的自由必须受到保护时,宗教界代表尤其有责任,要避免对不同信仰者发表偏执意见和采取歧视行为。他们应当促进全人类之间的宽容和相互尊重,而不应当煽动仇恨、宗教狂热和宗教战争,或者为其辩解。"(完整的条款在我的《寻求公同道德规范》一书的附录中全文刊登了。)

从吉米·卡特[1]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2],从希蒙·佩雷斯[3]到萨利姆·胡斯[4],从李光耀到肯尼思·卡翁达[5],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国家首脑们都参与了这份文件的修订工作。我们随后把它寄交给联合国秘书长,他把这份文件提交给联

①Jimmy Carter(1924—):曾任美国总统。

②Michail Gorbatschow(1931—):曾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

③Shimon Peres(1923—):以色列前总理。

④Salim al-Hoss(1929—):黎巴嫩前总理。

⑤Kenneth Kaunda(1924—):赞比亚前总统。



合国大会讨论。尽管到此刻为止,世界舆论中依然有极端的反对声音,但我并没有放弃希望:借助于这个文件,总有一天会赢得各国政府对国际道德和宽容的兴趣。

有关那些在不同宗教之间还亟须进行交流的问题,我在应爱资哈尔大学[①]长老穆罕默德·S.坦塔维(Mohamed S. Tantawi)之邀,参加他受埃及总统穆巴拉克(Mubarak)之托于1996年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认知。这个大会的主题是“伊斯兰的理解与对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六十个穆斯林代表团,也有几个其他宗教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我对许多报告和讨论都不太明白,因为缺乏这一方面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但是,有一点我完全弄清楚了,绝大部分的与会者——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政治家——所讨论的首要问题都不是与其他宗教或者通常意义上的与西方的理解和对话,而更多的是伊斯兰教内部的问题,因为伊斯兰教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中心。这既不同于千年前在哈里发领导下的情况,也有别于教皇和梵蒂冈领导下的天主教,毛拉(Mullahs)、阿訇(Imams)以及阿亚图拉(Ayatollahs)彼此之间对于自己国家之外的教友显然知之甚少,而且这些代表团几乎都是基于求知欲和新鲜感而来到开罗的。对于其他宗教不甚了解所造成的鸿沟无处不见,而且在会议上也都可以感受到。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坦塔维后来请求我,为他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见面会谈牵线搭桥。可惜,即便是有红

①Al Azhar-University建于公元972年,是开罗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也是伊斯兰世界最古老的高等学府。

衣主教柯尼希(König)的帮助,也未能说服梵蒂冈。这就是我对宗教之间的宽容性所获得的感受。

只要年龄和健康状态允许,我就接受大量的非官方邀请去访问、去参加会议。永远忘不了的就是第一次国际会议,那是我在二战后不久,准确地讲是在货币改革之前,与我的朋友恩斯特·海森(Ernst Heinsen)一起,为那时颇有影响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DS)所组织的活动。德国由四个盟军占领区构成,那时既没有联邦德国,也没有民主德国,那些被邀请来的大学生来自世界各国——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以及比利时,他们相聚在汉堡附近的小村庄巴斯卜特尔(Barsbüttel)。几天中,与这大约 50 名大学生交往的有 20 多名德国人。这些外国客人中,有些 3 年前还是在战场上与德国作战的士兵。而现在,他们不仅带来了人际和政治方面的新鲜感,更带来了相互理解的意愿和友谊(此外还有大量的香烟和一箱箱的食品)。我们德国人被客人们的坦诚、毫无偏见所感染,从中确实学到了许多珍贵的东西。后来,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了自己故乡的市长或部长,而当时所建立的朋友关系我们都保持终身。

在 50 年代,我参加了彼尔德伯格国际会议(Bilderberg-Konferenz)[1],这是荷兰王子博纳德(Bernhard)建立的,而这

①Bilderberg-Konferenzen 是一个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媒体、工会、高校以及贵族诸方面颇有影响的人物的非官方性聚会。首次聚会于 1954 年 5 月在荷兰境内的彼尔德伯格饭店举行,故以此命名。

个创举很快地对英德两国的克尼斯温特国际会议也产生了影响。赫尔贝尔·威莱尔推荐我去让·莫内(Jean Monnet)领导的欧洲国家联合会。稍后,我当时的政治榜样弗里茨·埃勒(Fritz Erler)把我派往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从而我在出任联邦议员最初的8年(1953—1961)中,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富有政治经验、头脑清醒的欧洲人,也开始理解不同民族观点下的欧洲统一问题。从莫内的身上,我特别学到了两点:树立远大的政治眼光;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政治目标。还要特别感谢的是,在我任联邦总理时,莫内为了欧洲内部的融合,不顾高龄来到德国,给我提交建议和忠告。

对我而言,最有意义而且富有生活气息的国际性聚会当属每年一次的日本天皇艺术奖颁奖大会。在举行庆祝性活动之前,先是国际问题咨询、交流,在那里我可以与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重逢,还可以见到特德·希思(Ted Heath)、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阿明托莱·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以及许多熟人和朋友。同时,我也结识一些著名的艺术家,譬如大提琴家罗斯特波维奇(Mstislaw Rostropowitsch)、印度作曲家纳维·香卡(Ravi Shankar)等。在我的审美观里,特别出众的建筑设计师当属贝聿铭(Jeoh Ming Pei)、丹下健三(Kenzo Tange)以及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可惜我忘记了,是哪一位建筑设计师身着黑色西装,配着绿色短袜,显得特有趣。当然,我也

永远忘不了自己那一个尴尬的瞬间：我问意大利导演费德里柯·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电影《大路(La Strada)》中那位出色的女演员朱丽媛塔·玛希娜(Giulietta Masini)近况如何。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位老年妇女对我说："站在那儿的那位就是。"显然，她是他的老伴。



也要倾听不同的声音

在这一章的最后,几件不该忘记的事情也值得一提,尽管它们并非是让人感到愉快的事情。我不想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我不仅认识了为数众多的朋友和可信的交流者,此外也认识了不少不愿坦诚,或者不能坦诚的政治家,还有不少令人感到乏味,甚至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人。在最后的这类人中,令我记忆最深的是津巴布韦的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和罗马尼亚的元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这二位都为自大狂妄所害。与穆加贝相比,我的尼日利亚好友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是人口密度极大、最难领导的非洲这块土地上的不可多得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1]作为另外的一位著名的非洲领导人,可惜我与他只见过一面,而且匆匆而过)之一。

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以及法治国家,其建立和维护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也许忘记了,为了实现民主和人权,

①Nelson Mandela(1918—):非洲著名的黑人政治家,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

在欧洲、北美曾爆发了无数次革命和内战。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历史与我们完全不同，并且这些国家中有的是寡头政治，有的仍然是由权威主义政府领导，若要求这些国家按我们的方式实行民主，那恐怕是没有弄明白这些国家与我国的不同之处。尤其是，谁要想以强制的方式迫使其他民族实施民主，那么所引发的只有战争。绝大部分非洲、亚洲（包括中亚）以及拉丁美洲的国家和地区，目前还是权威主义政府，比较好的是民选的极权式总统，而且许多都靠军队的支持。当然，这样的观点无法通过美国、欧洲大学的研究报告获得，也不可能从西方的媒体中得到，唯一的方法只能是靠自己的旅行，凭借自己的眼光在当地、在现场去获得个人的观点。

在这类政府和国王那里，我遇到过各种不同个性的人物。譬如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①，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内，他是冷酷无情的，可一旦论及世界政治问题，那他就是一个特别风趣而富有判断力的健谈者，但他不仅与华盛顿保持着距离，而且与莫斯科也如此。在他的邻国匈牙利，亚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在70年代则以相对比较温和的方式领导着自己的国家，我在同这两个人的个别交谈中发现，其实卡达尔的坦率和开放性就像铁托一样，但在对世界问题的视野上，他就明显地窄一些。而波兰的爱德华·吉瑞克（Edward Gierek）也类似于此，今天的

①Josip Broz Tito(1892—1980)：前南共联盟总书记、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斯拉夫元帅、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不结盟运动发起人之一、共产主义者。



波兰人已经停止了对他的批评,从个人的角度上,他给我的感觉是坦诚,且言而有信。大权在握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schnew)却是一个视野比较狭窄,而且不招人喜欢的人。当他的前任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Chruschtschow)以特别专断的方式进行领导时,勃列日涅夫却更多依赖于政治局内部的绝对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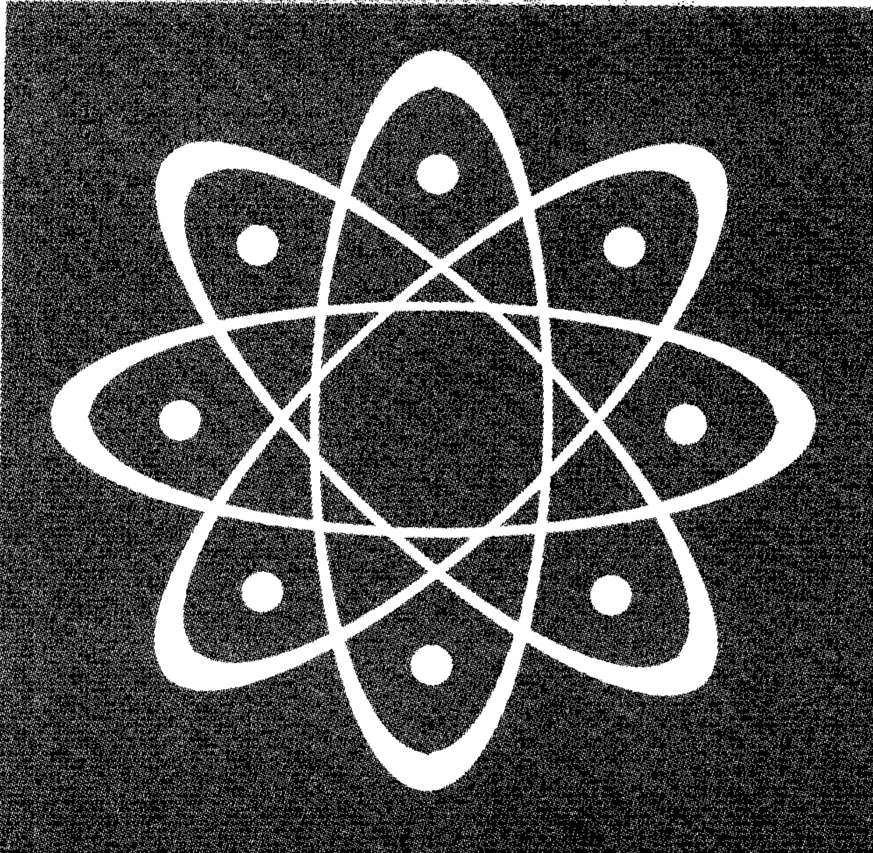
与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触,有助于我对世界权力状态以及有可能带来的变化形成一个现实的判断,并且不断地形成并矫正自己对世界局势的观点和看法。对于埃里希·昂纳克,我更多的是同情,因为他几乎完全依赖于莫斯科,尤其是他自己对苏联究竟如何考虑未来、今后到底怎么发展这些关键问题竟然一无所知。所以,他讲话给人以特别谨慎小心的感觉,也因此而平淡无味。当我 1987 年在波恩与他最后一次交谈时,对戈尔巴乔夫(Gorbatschow)在苏联内部所引发的这场巨大变革,他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以为,改革与“新思维”只是纯粹的“换墙纸”,整个建筑物将不会被改变。昂纳克相信国际共产主义,在其整个政府领导阶段,他一直都是一名典型的共产党干部,对于他来说,党的利益是唯一的,没有什么个人的判断,也谈不上国家利益。

在我所认识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就判断力和开放程度而言,中国那位精力充沛的爱国主义者邓小平堪称最杰出的。即便是随便聊天,邓也是直截了当、言简意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邓所讲的所有话,都是他的心里话。我也承认,他和我很对脾气,他也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中

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而邓小平强有力地领导着这个党。

在过去的25年中,我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尽管每次的时间都非常短,但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欧洲的一些标准没有办法在中国用。这延续、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法则、规范性。在世界历史上所有其他那些辉煌帝国所创造的高度文化都已经烟消云散之际,中国文化却突然、意想不到地焕发出惊人的力量。这应当感谢邓小平,是他结束了教条主义的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作方式,从而使中国数亿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便是不出门也能感受到,而且通过阅读和思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理解,但亲眼目睹所获得的更多的是直接、印象深刻的感受。我的每次东亚之行(在中国之行的安排中,通常还有对日本、韩国的访问)都使我对当地民族文化的认识更深一层。

从这第一章中,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名政治家不想做井底之蛙,那他就必须学会询问陌生人,并且斟酌他们所作的回答。善于倾听,当属每个政治家都亟须具有的一种美德。



Ⅱ 历史的脚步

21世纪初叶的德国

应该是1945年11月的某一天，汉堡大学重新开学了。也像这座城市一样，汉堡大学已经完全被炸毁了，所以各种课程就只好分到临时拼凑起来的其他楼里去上。我与大约200名年轻人一样，坐在人类史博物馆音像厅里，等待着大学教学具有普遍性的那15分钟开场白。在座的年轻人有的还身着军服，当然肩章全都给摘去了。

我那时已经27岁，而且高中毕业也快9年了。毕业将近9个春秋，这就是我服兵役的时间，其中有5年半是在前线。作为士兵，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战胜了一些恐惧，在积累的经验中，既有胆战心惊的，也有激动人心的，同时也懂得了互助协作和共命运。那时，我们早已经成熟了，我们之中有些不仅已婚，而且有几位已经当了爸爸。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活下来了，而且现在真正开始了正常的人生，尽管此时此刻要先从职业教育或者学习开始。大家彼此低声交谈着，但是特别谨慎，先彼此认识，交换地址。

突然一下子寂静了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矮个老人稳健地步入了这个大厅，他就是来给我们讲授罗马法的教授。



60多年过去了，可我仍然记着法学院这位雷欧·拉布（Leo Raape）教授的课前致词："同学们，与你们在故乡重逢，我实在心有余悸！"

在随后的几天甚至后来的岁月中，我偶尔也反问自己：以如此关心我们士兵命运的动情句子作开场白，他究竟要说明什么？以"心有余悸"作为对这场战争的表述，还是对这场战争结局的评述？"在故乡重逢"是对我们活着回来了表示庆幸？还是其中含有某种责备的寓意？在战后初期的岁月中，我认识了一些教授，他们那些在纳粹时代所开始的成就破灭了，所以就对坐在他们面前、依赖于他们的大学生特别的苛刻。对这样的教授，我不敢恭维。但是，拉布先生作为我人生中的第一位教授，他给我留下来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深刻的印象和记忆。我相信，他的话充满了富有人性的与他人共存的气息。这种气息在我的记忆中将永远这样保持着。

战友、休戚与共、江湖义气、博爱，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词，尽管它们的读音不同，可都是一个意思：与他人共存。它总是给人以与你同在的感觉、力量，这是最好的动力，也正是凭借着这种期望和鼓励，我们一个个从纳粹的时代以及战争的岁月中活了下来。

60年代末的一天，我们一家三代坐在一起：我们兄弟俩、俩妯娌、女儿们以及孙女们。早已成年的孙女提出了人生意义这个话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自我之存在。这观点令我们这些老人们回想起战时的岁月：在深夜的掩体中，与陌生人挤在一起，身旁是一名身受重伤的战友，精心照

料着那些素未相识的孩子们。我所想的就是:与他人共存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我对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回答。

如果我现在反问自己,从那场毁灭性的战争中、从那惨无人道的纳粹时代、从魏玛民主尝试的错误中,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教训?从那狂妄自大的威廉时代、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我们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那么,我最后都回到这同一个答案上。当然,我们从德国历史上所获得的绝非这么一个经验教训。从德国历史上,我们有许多值得总结、学习和借鉴的。

对于学习历史来说,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首先获得历史知识,尤其是那些对我们生存环境、对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责任范围非常重要的历史。绝大部分人只了解很小一部分主观、修饰、加工了的历史,一部分剪辑过的历史,它们所包含的知识通常仅仅局限于自己生活必需的那个范围之中。其中的一部分有可能还是从父母那里或者在学校听说的,或者从报纸上读到的,或者从电视中看到的。所有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小知识,可他们却视之为一幅全面、完整的图像,所以他们所获得的历史图像显然是极其贫乏的。

如果我们被选为政治决策者,那么常常是那些我们自己的,甚至是特别自私的个人利益左右着我们的决定。此外还有个人的喜好和厌恶、社会舆论以及各种关系会影响我们,所以决策通常先在内阁作出,而且是以在选票上画叉的方式进行,以便把其他人为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这种做法与古希腊时代的公民投票和陶片放逐法没有什么两样。包括



那些获选成为执政党者，一旦涉及决定，身为执政者的他们，也如同在野党的候选人一样，几乎只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很少有人例外。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意识受到极大程度的限制。在我所认识的社会政治家中，有一些特别出色的，他们不仅对俾斯麦或者贝弗里奇(Beveridge)[①]所推行的福利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比较了解，而且对促进整个社会变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也比较了解。我怀念那些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们熟悉自古希腊以来的所有历史，但他们只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从主观的基本原则推导出他们的整个政治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我见过不少政治家，他们参与了或者愿意参与外交政策和环球战略决策的确定，也就是介入了那些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他们国度的重大决策。作为参与者个人，他们对这些决策所涉及的国家和民族缺乏了解，对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及其当前的需求和利益更是一无所知。

在20世纪的进程中，尤其是到了20世纪末期，世界人口的剧增以及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世界各国以及各国经济彼此交错，相互依存，但是绝大多数人看世界的角度却依然如故，只是从狭隘的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法国，或者是在德国，在这个世界上、在大众的观念中，几乎到处都笼罩着一种狭隘的民族理解力——正如在政治阶层中一样。

在绝大部分国家中，历史学家们至今尚未开始从自己的

---

①William Henry Beveridge(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1919年到1937年间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民族社会中拉开一个缺口，把邻国及其民族的历史介绍进来。当医学、整个自然科学以及艺术随着贸易、交通和金融界的国际化和网络化而同步向前时，民族历史意识却远远地僵化在各民族自身的局限中。德国人也是如此。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①在1824年就提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去证明“事情的本来面目”。与此同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注解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普鲁士集权王国是上帝之意。稍晚些时候，亨利希·冯·特莱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②把德国的夜郎自大(以及思想文化上的反犹太主义)推向高峰。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追随他们，直到希特勒辩护士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③的简单化证明。不仅历史学家们以其不同的历史哲学形成了一种混乱(因为他们所提出的都是片面的历史意识观)，而且从有些神学家和有些令人肃然的基督教篇章中，我们也读到了关于“犹太人邪恶”的论述，理由就是犹太人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可是，他们在此却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耶稣自己原本就是一名虔诚的犹太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考茨基(Kautsky)向我们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宣称这场革命会使所有的一切发生变化，而且我们一定会更好起来，就连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也对这场“声

---

①全名 Franz Leopold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

②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出版人、第三帝国议员。

③Ernst Nolte(1923—)：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势浩大的宣传"内容坚信不疑。在那些左右着德国公众舆论、观点的历史哲学家中，有的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失去了他们对民众的吸引力。凡尔赛条约的悲哀铺天盖地，而历史学家们却热衷于对"战争罪责谎言"进行历史科学的批驳。

直到德国第一次民主尝试结束，德国人还没有真正地弄明白，民主究竟为什么会在英国、荷兰、法国、斯堪的纳维亚有效运行，在那里又是怎样地运转。不仅历史学家，而且国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都没有为德国的公众就民主状况的不同形式、它们各自的长处和弱点作出解释。我们邻国实行民主政体的实践经验，德国人却并未亲眼所见，所以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借鉴。在 1919 年时期的德国议会中，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尽管觉醒的声音不断通过言词显示出其增长的趋势，但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结果。

在 1930 年德国议会被解散时，那些在实现民主以及国家公民个人权利的学说中所描述的可能性机会依然渺茫。在纳粹独裁统治的 12 年中，它们被完全放到了一旁。在希特勒进入权力中心的时候，我刚刚 14 岁，可直到 1945 年，我还是从未认识民主这个概念。

如果从政治这个角度出发来历数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德国人就只能哑口无言。尽管英国人爱德华・乔治・巴韦尔-赖谭(Edward George Bulwer-Lytton)在 1837

年就有把德国人当作“批评家和诗人的民族”的说法，但如果随心所欲地把它翻译成德意志民族是“思想家和诗人的民族”，那么这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①]、哥特弗里德·威廉海姆·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②]、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③]以及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④]到席勒(Schiller)、赫尔德(Herder)[⑤]、歌德(Goethe)和海涅(Heine)，再一直到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⑥]以及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⑦]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二兄弟，我们德意志民族对于欧洲文化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谈到贡献，还有(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n Großen)、卡尔·冯·施泰因(Karl von Stein)、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首相、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将军、威廉皇帝二兄弟、普鲁士的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以及巴伐利亚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冯·蒙特哲拉(Maximilian von Montgelas)，同时还有在 1848 年到 1849 年间一些无果

---

①全名 Christian Freiherr von Wolff(1679—1754)：德国著名的数学家、法学家、哲学家。

②全名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

③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评论家和剧作家。

④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

⑤全名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者。

⑥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国作家。

⑦全名 Luiz Heinrich Mann(1871—1950)：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



而终的民主反抗运动。谈到贡献，还有那些考古学者、语言学家、艺术学家，同时也有大量工业化的成就以及工人解放运动，还有德国人文主义、悲观主义的绘画以及德国音乐。所有这些成就无不带有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的烙印，而且渗透在社会各个阶层。

其中非常可惜而且相当重要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在公民意识教育方面，也就是围绕古希腊人所说的“人是政治动物”开展教育、引导方面，我们一直欠缺。那些国家学思想、经济学思想在德国总不那么流通，譬如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约翰·洛克（John Locke）[①]，或者大卫·休谟（David Hume）[②]、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③]，或者那些已经成为他们民族和国家政治教育榜样的美国“联邦主义文集”的作者们，在近现代德国历史中都很难找到相应的踪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特奥多·埃申堡（Theodor Eschenburg）、威廉海姆·亨尼斯（Wilhelm Hennis）、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④]等才作为在舆论界有影响的民主教育工作者出现了。在这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德国经历了4次国家的裂变：1918—1919年普

①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之一。

②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③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④布拉赫、埃申堡、亨尼斯以及施特恩贝格尔都是颇有影响的德国现代政治学家或者历史学家。

鲁士王国终结;1930—1933 年魏玛共和国的沉沦;1945 年第三帝国的崩溃以及 1989—1990 年民主德国的解体。面对如此频繁的跌宕起伏,德国根本就无暇去消除国民民主意识教育方面的欠缺。

1990 年,两个德国的重新统一终于非常幸运地实现了(但全面的经济融合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从根本上讲,我们当感谢东欧那些革命的先驱们,感谢苏联实力的明显削弱,尤其是感谢美国乔治・布什政府的国际化国家指导思想。相反,德国政治家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相对有限的,面对法国和英国的反对,仅凭联邦总理科尔就无法迈过这个坎儿。不可否认,德国方面早就确定了这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属于其中的有老联邦德国与西方的联盟,以及 1969 年后的东方政策;还有西德方面的合作精神,特别是接受法国所提出的欧洲融合建议;还有,如果没有我们整个民族,也就是东西两个德国方面的基本意愿,没有我们坚持追求国家的统一,那么这个统一就不可能实现。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进程中,我们德意志民族从这个世纪前半叶那灾难性的历史中,吸取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教训。从历史中我们德国人获得了教训。

尽管德国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高额赤字(我随后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但是在 21 世纪初叶,我们国家和民族无论是在内部的协作还是在外部的交往方面,其状态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作为战后的第一代人必须承认,仅仅凭借德意志民族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创造出这些成绩。没有



加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我们邻国以及二战西方胜利国的帮助,所有这一切就是不可能的。希特勒以及他的残暴战争所造成的道德和政治上的颓废是如此的深重,其毁灭性程度是30年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但我们实现了民族统一,我们与邻国没有了边境和领土问题,也没有了分裂主义,有的却是为社会各阶层对一系列原则的普遍有效性的深刻共识,这些原则包括民主、法治国家、联邦以及社会平等、公正等原则。一种这样的从基本社会和价值观上的广泛一致,不仅在皇权时期没有过,在魏玛共和时也没有过,而且在战后初期的那些岁月中也没有过。尽管在后来出生的几代人中有许多不满和批评,甚至发生有一些反对共同协作原则的事情、暴力事件,当然也有忌妒。但是,绝大多数的德国人还是接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今天的共和国比过去的国家好,他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度中。

不同于魏玛共和时期的还有,我们现在的各大党都尊重宪法。在所有的争论和辩论中,这些党派在其政治方面,都受着启蒙精神的指导。所以,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就不可思议。无论是国家还是党派,在打击暴力恐怖方面都不会偏离法治国家的原则。在我们的历史上,军、警力量在民主界限内肩负责任。我们经历了多次的政府(也包括议会党团)更迭:1966年、1969年、1982年、1988年以及2005年,绝大多数的德国人今天都把这种更迭理解为民主构成的一部分,绝对不会有哪一位正常人因此而担心"祖国没落"或者"法西斯主义再生"。前几十年中那些沉重的基于世界观偏

见和猜疑而引发的竞选争斗已经成为过去，而其原本只是对事不对人的。

尽管在未来的德国，竞选依然摆脱不了违规、谎言和夸大，但这些将与我们邻国的竞选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总有那么一天，竞选会在一个比较高的道德水平上进行。如果它们早日跳出那深深的沼泽，那么无疑将是个体的巨大贡献。然而，很少有哪位主教、议会领袖、总理或者总理候选人能够非同寻常地那么高大。说真的，也就只有联邦总统真正地把自己的职务看做国家元首，并且以极大的责任意识行使着总统权力，并尽自己的责任。

在此还有一个关于德语词汇使用上值得一提的事情。我知道，“领袖”、“领导”这些德语词由于纳粹的领导狂热后遗症，使人们不愿意使用这些词，可我们的语言中又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词。不同于英美的是，在那里“leader”这个词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我们却总是回避“领导”这个词。但是，一名联邦总理无疑是国家和政府的领导，假如是等同于其他人的话，他如何去对“政治方向”进行确定？而基本法又何以授权于他？在企业中，人们说老板、董事长，或者英语的说法“首席执行官”，而轮船上称之为“船长”。如同一家企业一样，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国家也有一个政治党派，有议会党团，而且一个政府也无疑要有一个领导。即便是在野党，也需要有一个领导，而且对“在野党领导”这个词，似乎德国人不觉得有什么别扭之处。在任联邦总理时，我曾经默认一个把我称为联邦德国“领导性职员”的笑话，可绝大部分人认为

这个说法不好。

除了几个特别出色的例子外,德国战后的第一代政治家,譬如说库尔特·舒马赫、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以及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等,绝大部分出自当年的纳粹队伍,而且属于当时的参与者。从卡尔·席勒、库尔特·乔治·凯森格尔(Kurt Georg Kiesinger)一直到后来的联邦总统吕布克(Lübke)[①],他们都是"第三帝国"时期的适存者。在1949年以后,德国与它的政治领袖们是如此的一帆风顺,我想,这不仅归之于这些政府,或者各州的某几个出色的州长,而且也归之于那些高层政治家,譬如恩斯特·鲁特尔(Ernst Reuter)、弗里茨·埃勒以及讷尔·巴尔茨勒和汉斯-尧赫·福格尔等。这些人作为领导者,或者在野党发言人,通过他们的批判性精神以及他们的特殊风格,从而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幸运的还在于有一种在批判性同时又有指导性的政治大众化传播,尤其是新闻媒体。其中的有些人我已经介绍了,但作为真诚的感谢和追忆我还想再次提说,譬如保罗·塞瑟(Paul Sethe)、鲁道夫·奥格斯丹(Rudolf Augstein)以及玛蕾恩·登霍夫伯爵夫人。

他们都属于既具有同情心,又善于争辩的人。他们不仅给予了许多次的赞成票,也投出了许多的否定票。根据同代人的观察,他们之中也许有些人在争论中走得太远,但这种

---

①全名 Karl Heinrich Lübke(1894—1972):德国政治家,曾任德国总统(1959年—1969年)。

对政治和谐的市民式渴求最终并没有影响民主原则的最大优势。仅当各种讨论、争论甚至冲突被看做正常时，民主的气氛才能获得充分发展。文化和政治的进步需要冲突，民主与其说是一种状态，不如说是一个过程。这种认识既不可能在帝王时代、贵族时代形成，也不可能在军人政权和资产阶级或者工人运动中形成。后来，纳粹尝试着借助于他们的独裁从外部强制形成和谐。

我现在明白，民主意味着公开冲突，同时也要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和法律界限，它适用于参与争吵和斗争的任何一方，保护所有各方都不至于受到伤害。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德意志民族实际上向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所以悲观是没有理由的。



最沉重的债务

20 世纪后半叶，在德意志民族经过许多弯路之后，我们终于从自己国家历史上发现的，是一桩留给这个民族的沉重债务，一桩德意志民族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数百万的欧洲犹太人被屠杀。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仅为我们与犹太人、与以色列国的关系套上了枷锁，它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的邻国关系，因为欧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原谅纳粹以毁灭性大屠杀去对付犹太人的罪行。即便是在今天，我们德意志民族融合于欧盟之中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也无权忘记过去，无权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理解为“一般的战争”。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各国之间发生了无数次战争，其中不乏为了扩展领土而进行的侵略战争。可是以这种大屠杀的方式来对付某个民族的行为不仅从未出现过，而且其本身就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毁灭性战争。在此所涉及的绝非国家之间的武力争斗，而是谋杀数百万人的犯罪。

在二三十年代，我上中学时，对犹太人还是一无所知。犹太同学是普通的同班同学，与其他同学没有什么区别。最初是在 1945 年后，我才听说了，我的中学好友赫尔穆特 · 格

尔松(Helmuth Gerson)是犹太人。正是希特勒和纳粹把犹太人同乡给分离出去,而且要把他们变成另外的样子的。我的朋友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就以特别苦涩的口吻说道:“就是那位领袖,是他把我变成犹太人。”事实上,斯特恩1926年出生在布雷斯劳市,而且在那里长大成人。

1980年7月,我朋友纳胡姆·古德曼在阿姆斯特丹庆祝他的85岁寿辰。他谈到了犹太人和德国人,也提到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赫茨尔(Herzl)、诺道(Nordau)和赫斯(Hess),他们全都用德语进行写作。然后,把谈话转到了这个至今依然震撼着我的篇章。这位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主席这么说:“当我来到德国时,刚刚5岁。我的语言、文化首先是德国的。如果我爱,是以德国方式;如果我恨,是以德国的方式;如果我幻想,也是以德国的方式。”我被惊呆了,并且私下里想:上帝啊,你为什么允许发生犹太人大屠杀这样的事呢?

上帝是公正的,人们这么说,而我却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上帝所允许的犯罪太多、太大了。尽管公正也是古希腊的基本道德,而且绝大部分人正是靠着公正的支撑而走向人生终点的。包括我们的福利民主,也把公正与另外的两个基本价值观——自由和互助——相比拟,但人类的历史至今并没有显示出公正。在德国历史上,1933年以后的驱赶和剥夺犹太人生命权利之举明显意味着严重地违背了公正的原则,也严重地违背了仁爱的原则。

后代的德国人也只能带着这屠杀犹太人的沉重枷锁生



活,但是他们越来越难以理解,这场灭绝人性的大规模犯罪何以发生?!即便是今天在世的德国人,也就是那些对纳粹时代还能有所记忆的德国人,充其量对此也只是有限的解释。尽管我们逐渐地了解到,在欧洲历史上长期蔓延的反犹太主义扮演了一个有害的角色,而这是基督教教会所引发的;尽管在我们的书架上,陈列了一大批专著,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观点来阐述历史的缘由,并持续地以各自的兴趣点解释着历史的分歧,这些观点在公众舆论中不断地被更新着,但事实上我们不妨扪心自问,难道在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传统上有某种特殊的遗传,某种在所有其他民族传统上都从来没有过的,然而它却造就了这样的基因,以至于能让成千上万的党卫军、盖世太保官员、士兵以及国家官员都去参与或者帮助屠杀犹太人?!

对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作出一个明确或者简短的回答,尽管在过去几十年的讨论中,情况已经相当具体化了。正像七八十年代那从意识形态上引发的歇斯底里现在已经感受不到了一样,从另一方面看,那典型的偏见、过激显然也是极少见的。对于整个德意志民族"整体有罪"以及整个德国军队有犯罪特征这样的说法,我出于深思熟虑而不敢苟同;可是反过来,那种以德国士兵出于"荣誉"和一般化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来解脱责任、宣布无罪的声音也不能说服我。无论作为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绝大部分生活在纳粹时代的德国人都卷入这场灾难的漩涡,百万、数百万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父亲、兄弟,甚至母亲、姐妹,所有财产也都

荡然无存。

可后人中又有谁能够从心灵深处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在战争中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尤其是那种恐惧感呢? 对地毯式轰炸的恐惧,对严重伤残的恐惧,对苏联战俘营的恐惧;同样还有对盖世太保的恐惧,对党卫队的恐惧,对军事法庭的恐惧,对纳粹上司的恐惧。"第三帝国"的高压式宣传加速了人的钝化,还有战争本身所带的那种野蛮对待敌军的变态,最后,那几代人所训练形成的绝对服从显然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之所以提及这些因素,并非是要为德国人解脱,而是想说明,获得最终的判决是一件何等艰难的事情。

请求世界上的犹太人原谅我们,我们德意志民族没有这个资格! 我忘不了 1953 年马丁·布伯(Martin Buber)[①]在汉堡公开演讲时说的那句话:"我算什么,有何德、何能去说'宽恕'?"在这次演讲中,他还谈到:"我那脆弱的心曾保持了沉默,而我的后人因此而诅咒,因为他即便是一身清白,却也不得不成为殉葬品。"马丁·布伯的这句话使我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

由于我们对 1939 到 1945 年欧洲犹太人的灾难所负的责任,使得我们与以色列的国家关系一直不同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那些为我们好邻国们所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德国人已经提出来的建议,对于缓解我们与犹太人国家的关系是

①Martin Buber(1878—1965):奥地利—以色列—犹太人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



远远不够的，恢复与犹太人国家的关系绝对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邻邦关系，无论在广义上还是在狭义上，都是如此。应该承认，整个联邦政府，也包括两德统一后的政府一直致力于打击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敌视外国人，并且支持以色列国家自主。这一方面的努力必须继续保持。

无论是以色列原来的总理高勒达・梅尔(Golda Meir)还是外长莫夏・戴扬(Moshe Dayan)，或者耶路撒冷前著名市长泰迪・科勒克(Teddy Kellek)和后来的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这些都是以色列著名的奇迹般的政治领袖，他们都没有因为我是德国人而对我报复。但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以色列的政治家们以极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德国人，其中有的甚至认为，德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是对以色列的背叛。

因此，我想告诫德国的政治阶层，务必要尽快地介入我们自70年代以来在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所做的艰辛努力。但我们应该放弃幻想，因为一方面，在影响和平进程这个问题上，我们在近东和远东并没有任何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要改善我们在双方所形成的信誉：许多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都不认可，我们德国人扮演一种中立的角色。他们认为，我们从根本上就站在以色列的一边。许多以色列人认为，我们出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原因，只是从道义上承担对以色列的责任。我们德意志民族只能让双方感到失望。另外，欧盟在寻求解决中东问题方面不可能有任何贡献，所以它们其实不应该致力于这样的政治权力目标。

"只要持续以讨好的方式来处理与以色列的国家关系，那就能逐渐化解存在于德意志民族与犹太人之间的芥蒂"，这种观点本身也许就是一个错误。世界上有大约150万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的至少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从欧洲、美国以及以色列以严厉而敏锐的目光关注着德国的发展。尽管许多人相信，我们从责任和义务的角度有意识地防止反犹太主义思潮，而且不允许它在德国再现，但我们也清楚，在这一点上我们自己恐怕也很难有那种绝对安全的感觉，所以这确实是一种两难选择。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在大规模的狂热和骚动中不受伤害，我们德意志民族也不例外。70年代时，红色旅的谋杀恐怖主义已经显示，仇恨不仅仅出自社会的贫困和高压之下，而且也起源于意识形态上的迷茫。30年代时的境况完全类似：从寻找替罪羊开始，接着就是焚烧书籍，然后就上升到以暴力砸毁东西，再接着就是打人，最后发展到屠杀数百万人。死亡的链锁随着谋杀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厄兹伯格(Erzberger)和莱德纳(Rathenau)开始转动起来。在我当政的那个时代，也曾有过一个死亡链锁，那是从对几所大学的抗议开始，但在短短几年内就升级为基于意识形态而开始的谋杀行动。甚至人们觉得，其中的有些参与者原本是挺纯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

以我们的历史意识聚焦纳粹时代，聚焦魏玛民主尝试的失败，聚焦希特勒所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灾难性后果，那么纳粹时代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越发让我们对德国



的政府工作以及国家管理感到紧张，也越发对历史变化感到恐惧。在50年代时，绝大部分德国人对核电站似乎特别感兴趣，可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德国出于对核动力的恐惧而作出了“开始下马”的决定。尽管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出于理智的缘由，准确地讲，是出于经济和生态的原因纷纷修建核电站，可德国至今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60年代末期，当美国的许多大学生由于越南战争而游行抗议时，德国的年轻人把这种抗议运动继续向前推进，因为他们担心“法西斯主义的回潮”。在70年代，“罗马俱乐部”以两份报告不理智地宣布了“增长的终点”，该俱乐部在德国人中所获得的追随者，恐怕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在80年代，数万德国人两次游行，抗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双重决议(NATO—Doppelbeschluβ)[①]。展望未来，并不排除一种持续的大规模失业有可能造就某种精神、心理上极端反应的沃土，尽管立法者尝试着以理性却有限的就业市场政策，或者福利政策方式去缓解这个问题。这就像2003年联邦总理施罗德的“2010年改革纲要”所遇到的命运一样——它虽然是一个理智而必要的计划，但是人们却要拒绝它。

把大学和中学历史课的重点放到纳粹时期，我对此举的正确性或者说价值性表示怀疑，因为我认为，这种启蒙的方

①NATO—Doppelbeschluβ：1979年12月，美、英、法三国驻西德联军决定拆除设置在西德的中程导弹，同时就拆除这些导弹给苏联发出协商性建议。此举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意味着武力重新装备，二是意味着武力监督和裁减军事力量。从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之间在军事力量上的平衡势必将得到重新协调，而减缓军事对峙的要求势必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式是不得要领。把历史课内容集中在12年的纳粹时期，势必导致对其他时期德国历史的忽视，尤其给年轻人以这样的感觉(且不说他们未必乐意接受)：似乎在纳粹时期之前和以后，我们德国一直是一帆风顺，情况良好。其实，那意识形态的沃土早在1933年以前就已经成熟了，几代人以来的教育早就出了问题。具体地讲，教育应该注重个人的尊严、自由以及仁爱和民主。

今天，在所有议论我们教育体制的改革之处，应该更多地把这种教育的观点、把教育形成个人批判性判断力的方向放在首位。对后来者进行一种在手工业方面、在工厂或者在办公室的职业教育，或者对他们在英国语言文学、在机械制造、在医学或者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教育，这是远远不够的。教育者、中学教师、大学教授们应该更多地独立于自己的专业，不断给学生们提供富有特色的例子，让学生们看到，自由在一个开放性社会中就是保障每个人独立判断和行为空间，但同时对于每个人以及每个群体，都有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无权超越的界限。



与德国人为邻

在民族国家发展方面，我们德意志民族远比其他比较大的欧洲国家要晚几百年。比其他国家更痛苦的是，我们经历了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宗教分割的剧痛，以及 17 世纪上半叶的 30 年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剧痛。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依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也仅仅凭借着共同的语言来确认自己的归属。直到帝国的创立者通过俾斯麦在 1871 年才使德意志民族带着内部的争吵而拼凑在一起，也正是因此而使它成了欧洲诸国争夺权力的焦点。在德国，一个有效运作的议会民主开始于 1949 年，尽管在魏玛时代有那么几十年的例外，而且是唯一的。准确地讲，也就是从 1999 年 10 月开始，统一的全民族的议会民主才投入运营。

昔日德国昙花一现的然而却灾难性地冲进世界政治舞台的历史，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在 19 世纪末期，德国以要求"太阳光下的坐席"①开始了狂妄自大：德意志民族要求，在

①"阳光下的坐席"出自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1900—1909 年的帝国总理)伯恩哈特·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在 1897 年 12 月 6 日帝国议会讨论时的一句话，这是他对德意志帝国殖民政策的表述。原话是："一句话，我们不是想遮住别人头上的阳光，但我们要求获得我们在太阳光下的坐席。"这成了后来德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口号。

瓜分殖民地时得到重视。最初,先是这两位疯狂的挑头者:从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和威廉二世到希特勒,一条发疯的、不自量力的领土扩张路线直通到底。这场由他们挑起的灾难性连锁反应与在远东由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的类似灾难一起载入人类历史。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要重新抢夺自己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自 1947 年以来得到了全面冷战以及被分解为两个德国的惩罚,这种对德国人的紧箍咒是必要的。当瓦尔特·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①和东德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迫跟随莫斯科时,西德的政治家们却以康拉德·阿登纳和库尔特·舒马赫为代表,东西两个德国各持一端:莫斯科与华盛顿。双方领导人的争吵使西德转而加入了为华盛顿所要求和支持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而当舒马赫既不愿追随华盛顿,又不愿追随莫斯科的时候,阿登纳选择了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一体化。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舒马赫的选择是无可指责的,但历史却把"作出了正确选择"的嘉奖颁发给了阿登纳。

苏、美联合起草并竭力推行了一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围绕着西德加入这个条约组织问题,德国人介入世界政治事务的兴趣在 70 年代又开始增长(在这个问题上,联邦的社民党政治家是正确的)。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从 70 年代开始,小心谨慎地先从东西方冲突之外的世界政治入手,而联

①Walter Ulbricht(1893—1973):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1971—1973),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60—1973)。



邦德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这是迈出的第一步。但是，不仅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而且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所形成的《欧洲安全和合作最后文件》(KSZE—Schlussakte)，都在努力去减缓冷战时局下的对立程度。同样，197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双重决议以及1978年以来一系列积极的、肯定性的世界政治战略，都在缓解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和对立冲突。2003年，重新统一的联邦德国以其反对那场由美国所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第一次展示了德国人在世界政治中那不起眼的角色，尽管这次努力的影响有限，而且没有带来必要的结果。

似乎有些观察家认为，德国想以此回归到由于希特勒的缘故而不得不退出的世界政治中心来。在现在的联邦政治家中，也确实有那么几位，认为回归世界政治舞台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世界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遗憾的是，德国的政治阶层以及社会媒体对此却了解得太少。如果说一些德国政治家和外交官半个世纪以来持续努力着，要在联合国安理会为德国争取一个席位，这更多的是说明了他们的虚荣心，同时也显示了对自己的实力严重估计不足，过高地夸大了德国在未来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

我们现在尽管还是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很快将被中国所超越)，但值得考虑的是，我们对世界经济起伏跌宕的高度依赖性是否允许我们在世界政治中扮演某种角色，或者说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高份额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这些范围内只能

扮演某种有限的角色。不管怎么说，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在世界政治区域内的经验极为有限。对于欧洲之外的政治、外交，我们的政治阶层没有什么传统可循，尽管有些德国人自认为，有权利向其他的大国、大民族在政治方式、民主以及人权诸方面去传授自己的理论、经验。

我们自己的外交政治范围立足于欧洲，不是在高加索，不是在近东和中东，也不在亚洲或非洲。德意志民族最大的兴趣和利益是欧盟的稳定。对1990年以来，欧盟从12国迅速扩展到27国（还将继续增加）缺乏思想准备，尤其是欧盟内部对扩展规则、程序以及相应法则考虑不足。尽管有人认为，这种快速扩展具有世界政治意义，事实上，欧盟扩展速度过快影响了自己的对外能力。到20世纪末，那个原来由12个国家所组成的欧洲经济联盟（EWG）所具有的对外力量，远比21世纪初欧盟所具有的要强大许多。

在不久的将来，德国在世界政治中不会有什么固定的角色可言。是否、何时能有欧盟自己的固定角色，这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难以回答。究竟美国人是否还要给北大西洋联盟和北约某种超越欧洲的角色，此举从长远上是否有意义，同样也是未知数。

我们德国人有能力在壮大欧洲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尤其是改善与我们所有邻国关系，这就是未来几十年德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我们的方向不在世界政治，而在我们的欧洲邻国，在于与这些邻国和平相处。



如果一名波兰人或者一名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或者捷克人、丹麦人、挪威人，或者意大利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德国人究竟是否从他们的历史中获得了足够的教训？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邻国中有人感到并不放心。据丘吉尔记述，大约也就是 20 年前，一位英国女首相还说，人们也不可能揪着德国人的脖子，也没法押着他们的脚。要我们所有的邻国忘记了德国人侵和占领那恐怖的回忆，这也许还得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在人们的意识中，对波兰的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的回忆，对德国人在希特勒领导下对 600 万犹太人大屠杀的回忆，绝对不会像记忆中对尼布甲尼撒王(Nabukadnezar)在其时代所搞的犹太人监狱那样成为过去。

对于我们的邻国来说，他们与德国相处，无疑首先要参考自己国家的历史。因为毕竟对于曾经降临在他们头上的悲剧，生活在今天的德国人知道得比较少。所以他们始终处在纳粹统治者所造成的二战后遗症中。正因为我们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曾扮演过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我们的大多数邻国都一直投以怨恨的目光。那么一个偶然事件，或者一个不小心的举动，一次过激的讲话，就可能勾起邻国人对德意志民族那不可饶恕的负面形象的回忆，旧伤疤随之就有可能被触及。所以，我一直表示怀疑，绝大部分的德国人是否确实明白了这些连锁反应，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真的在他们的欧洲政策以及外交政策中意识到这些危险。

德国人在邻国方面拥有一个特别大的数字，确切地讲就是 9。在这 9 个邻国的同时，我们还要基于它们在德国历史

上所起的作用，把意大利、瑞典、俄国和英国作为邻国看。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像中国、俄国和巴西这样的大国是被许多邻国所包围的。所以在处理邻国关系方面，我们必须要有相当高的外交艺术。

事实上，这里摆放着一副沉重的担子。只要我们回顾过去一千年来的欧洲史，就马上会发现，有一种政治重心力和中心点不断转移的图像。有时德国人向外扩张，开往意大利、进入波罗的海，稍后又开向法国。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的势力从挪威最北部到北非，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有时，这块大陆的中部异军突起，譬如有时匈牙利、土耳其，有时瑞典，有时拿破仑，最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保持欧洲的稳固、和平，首先是德国的利益要求。实现欧洲的稳定与和平并非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而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应对邻国对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政治阶层、中学、大学以及公众媒体至今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两德统一以来，这个任务额外地加重了，因为德国以其 8000 万人口增大了我们许多邻国眼中的不安因素。法、英、意诸国的人口数量分别在 6000 万左右，德国的人口是波兰的两倍，是荷兰的 5 倍，捷克的 8 倍。除英国之外，各国都忘不了那个为超重量级的德国邻邦肆意蹂躏的岁月。

对于德国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外交政策领导人来说，面前是一个两难选择：我们一方面位于欧洲大陆的中部，因此不免有许多的邻邦；另一方面，我们的人口总数又比任何一个邻国多出许多。基于这两个问题，一名德国政治家必须



看到，保持良好的邻国关系在未来异常困难，但我们对这种良好关系的必要性远比欧洲其他国家都更加迫切。譬如，葡萄牙只有一个邻国，挪威只有 3 个。即便是像法国这样的大面积国家，也只有 5 个邻国。而英国由于其所具有的岛国特色，根本就没有直接的邻国，况且以海为邻的国家之间的海上冲突也早已经成为历史了。

大吨位有可能成为扩张的有利条件，因此仅仅国家大这一条就有可能令一个邻国感到担心和不满，况且还有战争以及德国占领时给人们所留下的愤怒回忆。也正是由于这些令人不安的背景原因，所以形成了“不与德国捆在一起”的愿望，也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 50 年代欧洲融合的战略。从其他方面看，德国的利益在于，这个统一的德国不为它的邻国所孤立，这无疑是其外交政策的战略所在。因此可以说，我们依赖于欧盟的存在和我们的归属。“似乎德国要以其大国和经济强国想在欧盟争夺领导地位”，这样的印象我们绝不能任其形成，更不用说去引发了。这种警告对于我来说似乎是迫切的禁令，因为一种这样的印象也许在短期内问题不大，然而它有可能导致欧盟的瓦解。如果欧洲民族再次发生争斗，或者欧盟从外部被瓦解，那么不仅是欧洲的一些民族国家受害，首先而且尤其是德国人可能会深受其害。一个以和睦的邻国关系以及与所有邻国合作为指导方针的德国外交政策，在今后将越来越难。

在所有的欧洲邻国中，法国是在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之后

第一个表示与德国合作,并在稍后表示原谅德国的国家。而欧洲大融合也是法国发起并不断提出重要建议。这些进步并非出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他在1849年提出了欧洲统一的观点——的理想主义理念,而更多的是基于法国的战略利益。法国不仅那时,而且今天也愿意与德国联合。同时,许多法国人也早就明确,只有法国自己内部的联合,才能赢得与德国的持久联合。我们德国人也认可了这个目标,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对我来说,让法国人走到世界政治舞台的前台(以法国总统在前台指挥的方式,我所获得的都是正面的记录),这是理所当然的。

基于其历史的作用以及现在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法国无疑是我们最重要的邻国。法国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以上,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法国也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当"德意志民族的罗马帝国"的占领区远远超出德语语言区之外、几百余年还作为皇帝与教皇权力角逐场时,尤其是当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地带还作为无数大公、勋爵以及大大小小的王朝的争夺场时,法国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有机运行的中央国家。几百年来,巴黎不仅是法国唯一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其文化和经济中心。

尽管法国也经历了流血的宗教战争,但绝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宗教的分裂一直到俾斯麦时代仍然具有负面的影响。在法国民族的记忆中,1572年巴黎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Bartholomäusnacht)以及随之而来的数千名胡格诺派(Hugenotten)教徒大逃亡,并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成分。可是

即便到了威廉二世的时代,在德国还有许多人以为,他们的国家建立在"王权和基督教神权"这两个支柱上。而法国则相反,至少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起,就仅仅是一个世俗国家,那个为马萨林(Mazarin)和黎塞留(Richelieu)等红衣主教来领导国家政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在法国,启蒙运动有着深厚的根源,民主也是如此,而且这二者对于政治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尽管在政治和法制化的发展中,法国经历了很大的倒退,然而从总体上,法国人所获得的进步,远比德国人要大得多。如果不考虑法国人在殖民地上所受的血淋淋的沉重打击的话,那么法国的政治历史远比我们的要幸运许多。

也正因为如此,当法国人在1950年用"舒曼计划"启动了包括当时的联邦德国在内的欧洲融合计划时,我觉得是喜从天降。当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向德国人民伸出了原谅之手时,我又一次觉得是无功受禄。他1962年来到汉堡时,我负责安全事务。当戴高乐走下汽车,走向群众并且不断与众人握手,我实在是担惊受怕、紧张得要命。他凭借着自己的高大身躯,不仅承受了所有一切,而且参加了与汉堡议员的合影。所有这一切都令我感到特别的富有象征意义。

戴高乐在汉堡作了三次大型演讲。他在联邦军指挥学院的演讲令我想起了我祖父,祖父在我童年时曾讲述了有关"可恶的法国人"的故事。那还是在1928年,我就读的小学举行庆祝活动来纪念1870年秋的色当日,色当日是一个战

胜"世仇"的纪念日。基于这个背景因素,我迫切地希望,千万别把法国人提出的谅解德国人的愿望给弄丢了。虽然提出把西德融合到欧洲中去的建议是从法国利益出发的,但它也完全符合德国的利益(即便是在开始时并没有看清楚)。

1969 年作为国防部长第一次从工作中开始接触外交关系时,我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结识了法国同行米歇尔·德布雷(Micheal Debre)。他的经验远比我要丰富,他甚至在戴高乐时期就担任政府总理职务,在戴高乐 1970 年 11 月去世后,他在法国外交政治中成为戴高乐主义的代表者。其中还包括那原则上拒绝美国领头羊权力的要求,以及对英国极为失望的外交路线。在德国问题上,德布雷的态度特别谨慎,但我们在高层合作默契,彼此完全信任对方,而且在此基础上后来甚至发展成一种朋友关系。

希望我这话没有让人感到特别惊讶:我把那 7 年与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密切合作和私人朋友关系看做最幸运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作为一名政治家在人生中感到最满意的时期。当时,德法之间的密切合作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尽管早在莫内领导的欧安会见过面,可我们真正的深入接触是在我两年的财政部长任期上。1972 年,在蓬皮杜(Pompidou)总统任主席的欧洲经济联盟高峰庆祝活动上,我们以同仁身份首次相见,在那里,我们小声交换着彼此对刚听到的空话报告的讽刺性笑话。

我们当时共同面临一个亟待解决的严肃课题:美国与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货币危机。美国为了解脱自己,早在 20



多年前，就要确定一个运作相对有效的固定的国际货币兑换率，然后由美国中央银行来解决美元的稳定性问题。欧洲各国政府反对美国这种兑换政策，但却无力阻止。原因很简单，为了阻止美元的持续贬值，我们就必须极大限度地购买美元，同时也就是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发行量，从而也就导致了我们国家的通货膨胀。面对这种强人所难的棘手状况，我与德斯坦达成了共识和合作。正是基于这种共性，在几年后，欧洲货币体系（EWS）和欧洲货币单位（ECU）逐渐成熟起来，并以此形成了欧元的基本前提。

尽管我们经历了一些倒退：1989—1990 年密特朗反对两个德国的统一，随后是雅克·希拉克与格哈特·施罗德之间的分歧与争吵，而且在未来也难免还会出现某些利益冲突和争吵。但我可以肯定，德法两国的政治家们会在这样的基本原则上保持一致：为了能够获得安全感，两个民族和国家彼此需要对方。我同时也期望，政治家的个人关系、政治阶层之间的友好交往以及各个层次上的密切合作能不断地得到加强。这样，吉斯卡尔·德斯坦所说的德法外交成果的延续，也就不用担心了。

法国不仅将继续保持欧盟融合的原则，而且在未来将置身于顶峰，尽管在法国人中不时出现对法国自身能力的担忧。可法国确实依然是独立在欧洲担负着领导角色，同时，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以及它的核武器能力使它足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欧盟内部，法国将继续作为一号，除非欧盟改变目前这种缺乏外交政治能力的局面需要形成某个

新的内部核心，可一旦这个问题真的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还将靠法国来给予方向和速度。

与波兰以及这个民族建立友好邻邦关系，这是最难的事情。其中不仅有俄罗斯帝国、普鲁士帝国以及奥地利帝国在18世纪末期将波兰三次瓜分的历史因素，还有在几乎整个19世纪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波兰的国家主权被完全剥夺的影响。在波兰人的记忆中，更为严重的是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第四次暴力性分割，对这个时期的记忆与欧洲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密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希特勒在波兰境内的奥斯威辛所建立的屠杀场。随后，还有那第五次灾难，即为斯大林所强制实施的驱赶政策，以及奥地利和波兰边境西迁，从而使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其中被驱赶和迁移的，不仅有波兰人，也有德国人。而这迫使波兰国土从东向西推进百公里的史实，不过是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的一个直接后果。

1977年，当我作为联邦总理与赫尔贝尔·威莱尔和沃尔夫岗·密什尼柯在奥斯威辛就德国的罪孽忏悔时，我内心深处在颤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就在当天晚上，赫尔贝尔·威莱尔对我说："仅凭这一点就得对波兰人特别关照，因为他们所受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我没有忘记这句话。如果人们回顾波兰的历史并且追忆到1772年，也就是追溯到第一次被瓜分的那一年，那么这种痛苦的分量就会更重。



遗憾的是，大部分德国人对波兰历史、波兰的文化知之甚少。我们尽管知道著名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Frederic Chopin），但有些却以为他是法国人；我们也许听说过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和他的“塔杜斯先生”，或者听说过著名作家亨利克·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的“君往何处（Quo vadis）”，但是更深一层呢？卡尔·德修斯（Karl Dedecius）和位于达姆施塔特市的德国—波兰研究院在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把50名波兰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德语，并予以出版。但从整体上讲，德国人对波兰的认识远比波兰人对德国的认识要少得多。

只有极少数的德国人知道，有一位波兰国王，他在公元966年就已经建立了基督教的波兰国家，而且波兰这个国家的名称比德国要悠久许多。德国人听到坦能堡（Tannenberg）这个名字，就会想到德国与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场战争，却不知道，早在500年前，在这个地方就爆发了一场战争（波兰人称此地为格伦瓦德村或者绿林村）。在那时，一名波兰国王打败了德意志条顿骑士团。包括对于后来几百年的波兰历史，我们也知之甚少。也许有这位或者那位知道“自由否决权”[①]，那是波兰贵族时期给予贵族在议会中阻止某个决定的权力。同时，在波兰那时就开始了启蒙和教育改革。

---

①自由否决权（拉丁文：liberum veto）是波兰历史上的一种贵族民主政治权力，类似于一票否决权，即一名贵族可以在议会反对由多数人发动、支持的决定；通过“自由否决”可以令议会宣布通过的所有法规无效。此权力适用于地方议会、国家议会。

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相互厌恶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但在1919年波兰国家新建以来，双方政治层面上的矛盾依然在继续加深。譬如，魏玛时期的外交部长(Gustav Stresemann)就拒绝了按照1925年德法和解协议模式签订一个德波协议的尝试。而希特勒的战争还要让波兰从地图上完全消失，它所留下的则更多的是愤怒。库尔特·舒马赫在1950年还讲，对维斯瓦(Weichsel)和纳雷夫(Narew)战事是德国的干预性抵抗。甚至40年后，基民盟和基社盟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不愿意承认这场战争与斯大林所留下的德波边境。

我一直认为，波兰和法国一样，是我们最重要的邻邦国家。基于德波和解意识，我作为联邦议员在1966年曾以私人身份访问华沙，并由此建立了与波兰领导人米茨斯洛维·戈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的交往。在1974到1975年间，尽管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形成了《欧洲安全和合作最后文件》，可杰拉尔德·福特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而苏联领导人对欧安会总部同时所搞的"人权保障"活动也特别恼火，为此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去游说。勃列日涅夫和中欧东部共产党领导人的签字对这些国家的自由运动——想一想波兰工会(Solidarnosc)，想一想77宪章(Charta 77)——有所帮助，而且对下年形成赫尔辛基的"最后文件"实际上也有所帮助。还有那些作为对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合作的补偿而形成的边境确认，也是对和平的一种贡献。基民盟、基社盟与阿尔巴尼亚一起，反对赫尔辛基的"最后文件"，只能说明德国人难忘旧怨的顽

固性。

与作为反对派的波兰天主教教会建立联系，这是我自己所作的尝试，但是却没有收效。我没法联系上红衣主教维新斯基（Wyszynski），而与卡罗·沃依提拉（Karol Woityla）——也就是后来的教皇保罗二世——见面的尝试又被克拉科夫（Krakau）教区的大主教否决，所以未能如愿，因为大主教担心华沙的社会安定。唯有红衣主教哥兰普（Glemp）可以与我秘密会面。在1989年这场大转变之后，我在与塔杜施·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sowiecki）、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以及乌拉迪斯拉沃·巴特茨乌斯基（Wladyslaw Bartoszewski）[①]的多次谈话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对于他们所讲的，我表示相信。他们对我所说的话，既没有政治性失真，也没有外交性辞令。

在波兰方面，今天还能感受到许多人对德国人的怨恨。此外还有积怨，那就是夹在俄国与德国之间，有可能威胁到波兰人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的认同性。对波兰人那种特殊的民族自豪感和对自由的渴望，我一直觉得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他们对痛苦历史的自然反应。经过半个世纪——先是希特勒，然后是苏联——的侵扰之后，一种独立自主的渴求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对于波兰的有些政治家来说，要加入欧盟，成为成员国，就得放弃某些国家主权部分，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①这三位是波兰政治家，分别任政府总理、部长等职。

情。波兰的爱国主义在欧盟中无法得到体现，可是一旦遇到做决定或者谈判，它就会情不自禁地冒了出来，尤其是在涉及与德国和俄国的关系问题上。所以说，波兰亲美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我们德国人必须主动去寻求与波兰的和解，我们的政治家应该尽力使我们的公众舆论和我们的媒体导向定位于此。譬如，应该尽可能避免外交和法律上有关相互退还所谓战利艺术品的争论，但关键是，所有艺术品和书籍应向普通市民以及全世界科学界敞开通道。我们的政治家同样还应该关注德国公民向波兰占有者追讨过去的私人财产问题，而且尽可能通过法律方式进行解决。如果德国人向波兰市民提出索要前辈人所拥有的财产，并且想着从父辈或者祖父辈的不幸中获得益处的话，那他就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那他的举动就既伤了波兰人，也害了德国人，因为那不是一个好邻居之所为。

那些老一代，那些经历了这场战争、被驱赶并且失去了他们财产的一代人，早就清楚，在任何法庭面前都无法要求获得对自己过去命运的修改。数百万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家人的德国人，早已经把这些看做不可更改的宿命。1990年，绝大部分的德国人已经接受了永远失去当年普鲁士东部省区的事实。玛蕾恩·登霍夫伯爵夫人有一句经典的话："爱，不需要占有。"在历史上我们已经吃尽了苦头，因此我想说，让那还潜伏在心中的反波兰情结见鬼去吧！



同样,捷克与德国的关系也处在彼此猜忌和偏见之中。早在哈布斯堡(Habsburger)皇帝以及他们的王朝统治着波希米亚(Böhmen)、摩拉维亚(Mähren)和斯洛伐克时,不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且德意志民族也都归属维也纳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建立,才结束了这种状态。“第三帝国”的崛起使德意志这个小民族对柏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很快地驱使“苏台德党”与希特勒的德国公开接上了头。凭借希特勒的霸权,1938 年 9 月慕尼黑条约将捷克边界向德国强制推移,尤其是德军侵入布拉格,从而使第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 1939 年 3 月就被埋葬。这是捷克人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页,而且对所有现在生活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来说,德军统治时期在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和利迪策(Lidice)所犯下的罪行,都是记忆犹新。

因为 1945 年重建的捷克斯洛伐克位于“铁幕”的东面(冷战的前沿),所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直到 1989 年依然如此。在苏联 1968 年出兵布拉格前两年,我在布拉格认识了弗朗迪斯克·克里格(Frantisek Kriegel)。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也是一位令我敬重的爱国主义者。1968 年,当杜布切克(Dubcek)和他的捷克领导人同事在莫斯科被迫投降时,克里格是捷克代表团中唯一一位拒绝签字者。我在此之所以提及他,就是想说明,在共产党人中也有勇于站起来反抗的人。

生活在今天的德国人,也许听说过 300 万德国人被驱赶

并逃离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这些被从东欧驱赶或者被迫逃离的苏台德的德国人，绝大多数与其他 900 万德国人并没有区别。他们反对 1945 年时的捷克有关总统令的鼓动宣传，“苏台德日耳曼”老兵们其实也是受害者，而他们却成了捷克政治家和公众舆论对德国批评的靶心和替罪羔羊。这些批评被留在德国人的记忆中，而且始终不能释怀。

相互采取不理智的做法，此举的通常原因就在于彼此缺乏了解。尽管所有去过布拉格的德国游客，无不对那里的地铁、赫拉德欣古堡群（Hradschin）以及查理大桥（Karlsbrücke）赞叹无比，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的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完成的杰作“1989—1990大转变”，但我们对捷克却知之甚少（对斯洛伐克则更加少了）。我们喜欢作曲家贝多伊齐·斯美塔那（Smetana）和德沃夏克（Dvorak）的音乐，也许有人也知道“好兵帅克”。在我眼里，捷克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sek）所塑造的这个迷人的形象属于欧洲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今天的捷克共和国与其说是一个音乐会文化之乡，更不如说是欧洲文化的一个核心。我希望，我们德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此的认识能越来越深刻。

如果允许我把法国和波兰作为我们最重要的联邦，那就让我们再重温一下过去百年的历史以及重大的事件。以此我不想再顾忌所谓哪个民族或国家更优先等枝节问题，我更多的是坚信联合国宣言和民族法，坚持无论国家大小，都享

有同样的主权。此外,德国的政治阶层也许看到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相邻的一些小国家,那些视野宽、有勇气的政府和议会,是怎样在同样人口老化的社会基础上富有成效地融入世界一体化,并且在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的。我所想到的是荷兰的总理维姆·科克(Wim Kok)、奥地利总理弗朗茨·弗拉里茨基(Franz Vranitzky)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中一连串精干的政治家。就像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一样,我们德国人把一个无情的诊断给耽误了很久。

在欧洲基于政治权力较量而分为两大营垒的半个世纪中,对于西德人,尤其是对于西德的政治家来说,寻找与奥地利人、荷兰人或者丹麦人接触,远比寻求与"铁幕"对面的进行对话要容易许多。在这边的国家中,他们能够并且愿意开诚布公地进行个人谈话。可是与一位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或者一位俄国人进行私人谈话,这对于生活在当年东德的人来说,由于彼此国家的秘密警察的缘故,就相当的艰难,而且交谈的机会也比生活在西德的人更少一些。长期的规定性宣传以及诋毁性论战(这不仅在东方,在西方也同样如此!),导致了彼此间的深深厌恶。遗憾的是,有些怨恨、误解的消除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值得欣慰的是,在东欧长期受到压制的民族传统和本能,现在重新开始回归了,它将有助于和解的实现。

理论上讲,即便是邻里之间并不认识,也有可能形成友好关系,如果了解邻里的秉性、喜好和忌讳的话,无疑会更好一些。尤其是,如果一定程度上了解邻里的出身、与我们在

历史上有过什么往来，那会更好些。基于这种观点就容易理解，何以瑞士人和德国人之间没有什么怨恨，因为百年来我们彼此就没有对对方做过什么坏事儿。

奥地利与我们之间所保持的友好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在过去的岁月中，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战火连绵不绝。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奥武装联盟以及维也纳庆祝 1938 年的“德奥合并”和希特勒进军把以前的所有矛盾都解决了。奥地利无疑不愿意回想 1938 年的情景，也不愿意回想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那一段历史。1945 年后，奥地利历史以比德国温和许多的程度发展着。奥地利不仅没有受到分割，而且在整个冷战时期也以相当中性的方式保持着。许多不知情的人甚至认为，奥地利是希特勒扩张性进攻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此，维利·勃兰特还编了一个笑话，如果他朋友布鲁诺·克莱斯基(Bruno Kreisky)向全世界介绍说，贝多芬是奥地利人，而希特勒出生在德国，他肯定成功。不考虑这个讽刺性笑话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关系不错，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看德国与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的关系。德国 1940 年袭击并随后占领了这三个国家的这段历史，还深深地留在这三国人民的记忆中。比利时早在 1914 年就被德国控制。1938 年，我夫人与几个对北部德语感兴趣的大学生骑着自行车前往比利时、荷兰，途中与当地村庄的妇女们闲聊。当学生们刚刚冒出德语口音时，当地妇女们马上警觉起来，因为她们的客人是德国人。一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德国对比利时、波兰又一次进军、又一次占领，而且还把犹太人赶往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

德国人对比利时了解得不多。有的也许知道佛兰德的画，有的也许知道菲利克斯·廷默曼斯(Felix Timmermans)，或者斯蒂英·斯道威勒斯(Stijn Streuvels)，即便有些人知道这个国家是1830—1831年荷兰王室分裂后才形成，但他们对其之前的历史也很少知道。我们经常听到和谈到的也就是布鲁塞尔，这是欧盟委员会及其管理机构所在地。

德国人对荷兰的了解程度比这要好些。对法律界来说，胡古·德·格鲁特(Hugo de Groot)是现代人权的奠基者之一。有些人也许听说过鹿特丹那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埃拉斯穆斯(Erasmus)，而画家伦勃朗(Rembrandt)、佛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和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令我们感到安慰。许多德国人知道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命运故事。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个国家知道得并不多，既不了解它与西班牙和英国的战争，也不了解它作为海上霸主以及殖民地强国的历史，而它们在这一方面的重点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和拉丁美洲。荷兰与莱茵河下游德国地区之间密切的关系，也就只有德国北部的人了解。那里的人们还知道，我们德国人修建池塘和水闸的技术还是从荷兰人那里学来的，可是这个技术却没有传到斯图加特或者慕尼黑去。对于我们邻邦的道德规范，我确实钦佩，尽管荷兰的天主教在我看来类似于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en)。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相对于德国人来说，荷兰人比较客

气、谨慎。再进一步讲,就我所知,有些荷兰人觉得,德国总是令他们感到有些别扭,所以当他们私下议论到德国人时,就以轻蔑的口吻把德国人称为"废物、蠢货"。所以,建立荷兰与德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荷兰人在90年代就把他们福利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先于我们而调整好了,在此方面,我们也许可以向他们学习、借鉴许多。

丹麦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他们在80年代就开始进行着一个富有成效的福利经济改造。在丹麦人的潜意识中,也存在着对德国人潜在的不信任。只是这些巧妙地潜藏在他们的谦虚之中,而且对我们特别客气、和蔼、富于礼节。其中的原因并非来自野蛮远古的时代,也非百年来围绕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争吵,或者(1864年的)普丹战争,而是围绕着1940年的德国突然袭击以及后来的占领,在这个时期,丹麦人被迫对德国人谨慎小心。如果说丹麦人喜欢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联邦,与远方英国的关系远比德国紧密,对此我们并不奇怪。

北德的帆船尽管熟悉丹麦南海的每个小港和几乎所有的餐馆,但在其余的德国部分也就只有哥本哈根的"美人鱼"和童话诗人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作品能够流通,尽管如此,多年来在欧盟中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使德国和丹麦拉近了许多。对于参与欧洲融合计划的所有其他直接邻邦来说,在这一点上也是同样的。不仅有共同的市场,还有申根协定,自1985年以来不需要签证、护照就可以自由

地经过边境，从而也促进了各国人之间的合作交往。这一点也适合于稍微远一些的邻邦，如意大利、瑞典、芬兰以及并非欧盟成员国的瑞士。相反波兰和捷克这些在刚刚结束了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之后，马上加入欧盟，无疑还需要时间，才能克服对欧洲融合的有所保留的态度。

英国人是否愿意和能够克服自己的有所保留的态度，这对我仍然是一个问号。因为我是在汉堡的英国人圈子中长大的，所以我不能想象，一个有效运作的欧洲融合竟然在没有英国人和他们国家艺术影响下能够这么长时间地持续。在 1957 年涉及批准罗马协议问题上，我在联邦议会投了保留意见票，因为我那时认为，欧洲没有英国是无法想象的。即便是到了 60 年代，我依然强调英国加入欧洲经济联盟是绝对必要的。一直到了 70 年代，我才开始明白，绝大多数英国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多地把紧跟美国作为自己国家的好牌。且不说民主化语言的共同性，这张王牌就足够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与美国的联盟，英国绝不可能获胜。

英国在晚些时候才宣布加入欧盟。如果由此认为英国人、英国政治家像我们德国人一样，从战略利益上致力于欧洲的融合，那就错了。尤其是通过那位令人捉摸不透、精明能干的哈洛·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后来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不久的过去又是托尼·布莱尔)的交往，我已经领教过了，对于英国政治阶层来说，英国的港口城市丹佛(Dover)与法国港市加来(Calais)之间的海峡远比大西洋要宽许多，

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与美国特殊的关系远比欧洲融合要重要得多。无论首相出自工党,还是出自保守党,有一点是同样的:有共同市场就足够了,而一种共同的货币就走得太远了(爱德华·希斯或者罗伊·詹金斯则例外)。

即便如此,我仍然把坚韧和冷静看做英国政治家的优秀特点。吉姆·卡拉汉、罗伊·詹金斯、皮特·卡灵顿或者丹尼士·希利(Denis Healey)在这一方面经常给予我帮助,我相信他们所讲的话。阿拉斯代尔·布肯(Alastair Buchan),即伦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建院院长,让我弄明白了核战略计算的基本理由。从那位先在新西兰,然后又到伦敦学习的卡尔·波普(Karl Popper)那里,我把这个社会逐步变化的原则用于政治。在二战刚刚结束时,我就从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里学会了抉择。凯恩斯已经去世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一书很难读懂,但是有两名德国凯恩斯信徒,即艾威希·施莱德(Erich Schneider)和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教授,他们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文章让我明白了国民经济问题。我因此也没有像那些英、法、德国的左派一样,成为幼稚的凯恩斯主义狂热者,以为由此就在国家赤字经济中找到了一把万能钥匙。相反,在70年代初期,我就在自己领导制定的“85指导框架”中,尝试着对总理勃兰特的债务消费刺激快速增长法进行缓解。更晚些时候我发现,英国银行家埃里希·罗勒(Erich Roll)与我志同道合。

对我来说,英国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那种在两党体制基础

上的多数选票制。属于其中的首先是传统,按照这个传统,政府首脑首先要出自议会席位中;第二,他的政治履历要有不同的国内政府部门的经验,也就是说,在他登上国家最高行政管理位置之前,必须积累足够的工作经验。诸如此类,确实也是德国政治家从他们的英国同仁那里可以学习的。

另一方面,英国对两德统一的反对也清楚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在此不会忘记:绝不仅仅是英国,我们的许多邻邦也在1989—1990年时坚决反对两德的统一,只是英国女首相清楚、明确地表示出来罢了。事实上,这种反对的声音从罗马和巴黎到哥本哈根普遍存在,也就是说,对德国人维持和平方面,我们邻邦的信心不足。赫尔姆特·科尔从美国方面得到了决定性的帮助。与我们邻邦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不可能凭空而降,它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这一点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一样,尤其是对英国来说。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想谈及这个尽管与德国并非直接接壤,可几百年来一直对德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俄罗斯。一位沙皇在1762年拯救了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大帝;而另一位沙皇在1815年彻底战胜了拿破仑之后,把俄、奥、普的反动"神圣同盟"救出苦海;从1941年到1945年,面对希特勒的侵略战争,斯大林被迫进行自卫,并且最终建立了某种程度上横贯中欧、穿越德国的"铁幕"。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联盟在1979年12月派兵入侵阿富汗。

在此之后再没有扩张、侵略的尝试。苏联在10余年间的解体并非外部武力的结果(谢天谢地!),更多的属于体制内部力量扩展,从而导致同心爆炸的结果。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有合作意愿而且和平相处;即便是苏联解体后,在鲍里斯·叶利钦(Boris Jelzi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Wladimir Putin)的领导下,俄罗斯仍然保持着和平。俄罗斯政府现在把政治上的注意力转到集中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上来。

在为俄罗斯赢得自信心方面,普京毕竟获得了成功。一个令人自豪的经济腾飞已开始出现,只是这种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俄罗斯的地下能源财富,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在工业生产以及生产能力的提高方面,这个国家依然比较落后。在这个国家去筹建新党派、新的社会团体和机构、企业以及协会,人们还没有这种意识。甚至领导人至今还没有强大到对叶利钦时期所形成的早期国有资本转移进行回收。政府和总统最重要的支持就是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机构、听从于他的普通公务人员以及军队。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至今依然是很有分量的,它仅次于美国,在世界上名列第二。从内政上讲,这个新的俄罗斯国家显然并非比较强大的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解体留下了一个真空地带,尽管民主在新的俄罗斯人的眼中并不乐观,但是从信仰上讲,重新接受基督教的可能性却很小,因为他们认可了叶利钦时代的这个概念,尽管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但是他们却这么讲:"荒蛮的西部岁月"。同时,国家高层

领导人的更迭问题，似乎没有从规则上予以解决。基于所有这些原因，叶利钦所经历过的那个一定程度的混乱时期，有可能重新出现。相反，普京在整个国民中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权威，几乎所有基于经济增长和幸福生活的期望值，都与他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果要说不同于苏维埃时代的新现象，当然还有自斯大林时代以来首次出现在社会中的经济中产阶级。而随着经济自由的继续发展，权威政府获得继续的可能性就画上了问号。

可惜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既没有明白俄罗斯严峻的内部问题，也就是那些今天或者明天任何一届俄罗斯政府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没有在那里看到这样的事实证明：自戈尔巴乔夫以来，我们一直在与一个愿意与西方友好合作的俄罗斯政府进行交往。而且，小布什的内政策略的反对者们公开讲，俄罗斯是“中东和近东全球安全的第二大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事实上，自 1990 年以来，俄罗斯就再也没有扩展它的军事实力，可西方却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一直推进到俄罗斯的边境，甚至把乌克兰（Ukraine）和格鲁吉亚（Georgien）发展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美国在几个直到 1990 年还是苏联领土的中亚国家设置军事基地。美国不仅解除了与苏联签署的防止形成核武器绝对霸主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Vertrag），甚至还计划在东欧（波兰和捷克）设立自己的导弹拦截系统。还有，西方至今对遵守《常规武器条约》（KSE—Vertrag）保持沉默，就像 1990 年在“2＋4”谈判时对

苏联所应诺的那样,这可是保障在欧洲驻扎的战斗力在尽可能低水平程度下保持平衡的协议。面对这个实力今不如昔的俄罗斯,美国就背弃了 1990 年对苏联所做的承诺。

不仅美国政治阶层的一部分,而且欧洲政治家中有些人也对俄罗斯倨傲自负、盛气凌人。有些继续保持冷战的姿态,尽管俄罗斯并没有任何举动。甚至有些德国政治家以及追随他们的记者似乎很乐于找上门去给俄罗斯人提建议,对他们的内政指手画脚。我对此比较担心,因为一个政治家过多的干涉难免在俄罗斯激发起民族反应。我们德国人有一个与俄罗斯保持融洽的战略利益,因为俄罗斯与波兰之间有隔阂,因此与波兰的友好邻邦关系是我们的迫切利益,我们需要谨慎、小心地对待俄罗斯、对待波兰以及他们的民族与国家舆论。对这一点,我从 1966 年第一次访问华沙和莫斯科起,就领悟到了。

尽管我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及其民族的认识有限,但在 40 年的交往中,我有一个明确的印象,一个令我起初就感到惊讶的印象:在俄罗斯人中几乎很少感受到反德的怨恨情绪。这原因也许在于,俄罗斯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也许还在于,他们知道彼此在二战中的巨大损伤,或者完全在于俄罗斯人民的自我意识。不管怎么说,我在俄罗斯没有感受到人们对德国人的怨恨,这是值得欣慰的。因此,我们就不能允许反俄罗斯情绪的发展。如果有人想就此向我们做宣传,就应该明确地回绝。友好的邻邦关系也包括同那些与德国距离比较远的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民主是人类的杰作

民主的原则是德国人较晚些时候接过来的，绝大部分德国人最初是在50年代接受议会民主的。如果我们没有路德维希·艾哈德1948年的西德货币改革，没有马歇尔援助计划促进经济发展，那么我们也许持续更长的时间，才能使民主的原则在我们的意识中生根开花。在21世纪，不需要担心统一的德国会对民主构成某种严重威胁，况且我们也随时排除有可能破坏民主的因素。我介绍两个例子。

其一：一方面，我们的许多市民认为，对于民主的认识，执政党与在野党有明确的区别，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许多人就认为，在议会和政府中形成“大”联盟既是一种危害，也不利于民主。在1966年，有些人甚至把当时的大联盟误解为“向法西斯主义的倒退”。另一方面，许多人觉得很难接受那种在政治党派多样化的整个欧洲蔓延着的比例选举权的趋势，这就迫使多党派构成联盟，也就经常会形成“比较大的”联盟。

其二：一方面，我们在竞选中进一步接受了英美的方式，在两个候选人之间的二人竞选法（从库尔特·舒马赫与康拉

德·阿登纳面对面竞争开始，到后来的施特劳斯和我之间，一直到后来总理施罗德和总理候选人默克尔之间的二人竞选)。另一方面，我们也许忽略了，在英美几乎是某种天然的多数选票民主。当德国在议会实施至少5%选票方可获得议席的规定，并且至今分解为五个议会党团，未来依然不得不进行联合执政时，英美事实上一直是两党体制构成，并以此一直引发反复不断的二人竞选。

这在一种简单的联邦法中而不是在基本法中所确定的比例选票制，在德国民主形成中所具有的影响，远比基本法具体条款的影响作用还大。60年代大联盟所搞的(尽管可惜是徒劳的尝试)用多数选票取代比例选票的努力，从基本法上是合法的，而且也是理智的。我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力量。但现在，我对重新进行这样的尝试会进行劝阻。因为这样的尝试会因类似于当年的理由而告失败。许多选民和议员都认为，这种多数选票法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并不考虑一个选区给那些不出名的候选人的选票，只简单地把它们放到了一边，尤其是几乎半数的议员反对这种选票法，因为他们的重新当选和政治生涯完全依赖于此。

对于令基本法完美的不断尝试，我建议不要再费这劲儿了。我们自1949年以来五十余年间所做的修订、补充，赶上美国自1787年以来200多年间所做的一切。至今为止，我们在修改宪法方面的步子走得太快。不要让我们的开放性社会在其发展中为新的国家规定、调节和机构所阻碍、所僵化，这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即便是联邦宪法法院也应该学习

着，不要在其判决理由中，用自己所习惯了的东西来制约自己没有想象到的东西。“组建社会”（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话）这个提法是误区之一。那些从官僚机构出发，直到易拉罐法律责任以及在酒吧、餐馆禁止吸烟的法律规定，是联邦议会和历届政府所制定的，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形成一种僵化的精神、心理传染病，而且我们现在的政治阶层几乎多多少少都被感染上了。

对于“扩大公民表决的功能”（其中包括正在流行的直接投票选举总统，强化总统分量的观念）的想法，我也想进行劝阻。面对的问题越复杂、越难于决定，那么公民表决就越容易出错。2005 年法国和荷兰举行公民表决，结果使欧洲融合进程停滞。那予以投票表决的欧盟宪法草案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太复杂，是很难理解的文本。反对者就以此为借口继续扩大宣传，从而加深了公民对官僚主义和文本主义的反对。在当时的德国，一个类似于此的公民表决同样难逃此劫。事实上，欧洲各国绝非不满欧洲融合。

一名政治家之所以启用公民表决，要么就是有很高的威信，要么就是合法性重于议会表决。事实上，那些发起者常常或出自于国内利益，或者出于党派需求。尽管在议会选举中选民都是独立的，但一次具体的选举——譬如联邦议会选举——就意味着对今后数年基本方向的一种确定，所以选民们的选票也就难免直接落在对某个具体问题的确定性回答上。唯有在国土面积比较小的瑞士，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公民表决实践。我们应该在德国发挥自己之所长，即继续议会民

主制。

因为我们德国在民主方面经验不多,所以有少数人就倾向于把这种不足之处归之于时间太短的原因。许多德国人恐怕先要学习、了解,在这个世界上,民主都与尝试、放弃和误解相联系。事实上,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而言,民主都是以出色的国家、政府形式表现出来的。按照卡尔·波普的说法,关键就在于政府的领导没有暴力和流血,政府的更迭只是依靠所得选票来进行,而且为了获得连选连任,执政的政治家以及议会议员们对领导这个国家尽职尽责。

在德国民主过程中遗留下来的误会,常常来源于不合实际的理想主义。社会的发展不像自由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完全交由“市场”来调节。许多问题和冲突需要国家干预,当然是通过政治家。政治家借助于法律的干预以及由法律所创立的监督机构也有可能走得太远。而通过文职官员和官僚所运行的国家行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某种书面条款性可信度,但这种方式在西方也就是法国还稍微行得通。一方面,今天的福利国家是我们在 20 世纪的最大社会文明成就;另一方面,德国的社会法典内容浩瀚,竟多达 1300 页!我们德国成了一个规则癖的典型,仅仅收入税一项的法典就在 450 页以上(还不包括注释),而且仅仅是条款。从 1990 年到 2006 年间,联邦议会通过了 2360 条新法,在此还不算对原有法律条文的修改案。没有哪一位聪明、能干的法律工作者能把这些法律通读一遍。

认为通过多立法就能增进社会公正性的想法,是另外的

一个误区。事实上，法律泛滥不仅会导致官僚主义的僵化，而且还会造就贪污受贿和黑工等许多漏洞和玩手腕的机会。德国北方有一句名言："刀快豁口多。"因此，政治家不要热衷于在一个法规中再加上一个条款，相反却应该在提高民众对法律了解程度上下功夫，诸如取缔那些脱离社会、鲜为人知的法律条文，或者至少使它们简单化。

民主和法治国家是相互制约的。一方面，剧烈的群众性精神恐惧和民意有可能迅速形成过激反应；另一方面，重叠的国家机构会对国家法制形成束缚。有时这两方面交叠在一起。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历过，那就是 2001 年 9 月，当肆无忌惮的恐怖分子袭击了曼哈顿的两栋高楼时，美国一下子为恐惧所淹没，这种感觉很快就在总统的领导下，转化成了一股激烈的战争情绪，直到最后把国家机构上层所一直保持的宽容法律原则，一股脑儿全部推到了一边。1968 年，我们在法国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对这个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戴高乐总统被迫辞职，原因就是游行的大学生和工会对大街暴力不满的冲动。稍晚一些，我们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直言不讳地对红色旅表示同情。

在德国，群众性歇斯底里的例子不少：人们不必追随到魏玛民主的晚期，也就是当民主思想倾向的选民基于对失业和社会贫困的恐惧，纷纷转向纳粹这个极端党派，而议会民主则被摔到一边。我非常惭愧地想起来一个小例子，那是我自己的党派所为：在 1965 年，社民党参与了"图片报"所搞的

一个反对提高电话费的宣传活动，而且根本不管情况如何，把联邦议员从议会休假的时间硬给召了回来。

任何民主都为群众的声音所决定，并随之而改变。在此，群众性媒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古希腊或者古罗马时期，政治家首先是看他们演讲的影响。到了杰斐逊、本杰明·迪斯雷利(Disraeli)或者俾斯麦的时代，政治争论是在报纸、杂志以及书籍中进行。现在，电视早就取代了收音机，而且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因特网已经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源泉。在现在的群众宣传方面，这些电子媒体属于传播声音速度最快、覆盖面最广、力度最强的工具。对于发动者来说，常常仅凭它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媒体公司创造群众声音，那么可能出于两个动机：一个是政治目的，也就是借以扩大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罗勃特·姆道赫(Rupert Murdoch)、希维沃·贝鲁斯库尼(Silvio Berlusconi)，或者更早一些的艾柯斯·斯勃仁额(Axel Springer)等仅仅是几个例子，而另外的一个则是群众性媒体与大量的广告收入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收入与印刷量、收视率以及覆盖范围有关，所以大印刷量、高收视率以及覆盖面对于群众性媒体的经济效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名总编所发出或者所播出的东西越敏感、越富有刺激性，那么越是有益于提高收视率。这就像足球变成了一个娱乐产业一样，它给足球明星们不断加载上各种信息。当然，这种媒体也得不断提高自己的娱乐价值和水平，以便保障它们的盈利。在此无疑还有敏感性的趋向，但也难免浅薄化、表面化。

即便是少数高质量的报纸和很有分量的电视频道，有时也难逃这个俗套，因为它们也得照顾到不同群体的娱乐需求（包括《时代周刊》对我的一个短采访，题目是“一支雪茄”，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尽管已经私有化的电视台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可是政治家和立法者至少应该对媒体权力的过分集中进行阻止。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政治声音的控制者就可能把政治性事件的消息控制起来。即便是还有独立的高质量报纸如《南德日报》、《法兰克福汇报》、《每日反照》以及《时代周刊》等，但它们也有可能被带有政治倾向的媒体集团在某个时候以特别优惠的报价吞并掉。

从“森林病死”到“增长终结”，从“核战”到“气候灾难”，对所有这些形式的恐惧，我们德国人的抵抗力都特别的弱。这种病态是上世纪那可怕的灾难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重大责任的后遗症。这也使得我们势必更加理智地考虑、抉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独立而富有批判性的新闻业。

批判性记者也像政治家一样，会提交不实或者错误的判断。他们也受职能机构方面的暗示、影响，譬如来自企业主联合会或者工会的，来自校长联席办公会议的，来自领航员联合会或者火车司机联合会、私人银行联合会的，或者来自储蓄银行的。同样，那些大型康采恩和名牌产品生产商也尝试着对记者进行影响。企业以及各种协会把相当一部分的钱和精力用于社会和新闻工作，以此对记者和媒体形成影响力，而各联合会尤其集中精力于相应对口的舆论制作方面。

所以，维护独立的新闻媒体，特别是维护独立的电视台，这对于我们的民主来说是生死攸关。

记者阶层不仅对事件、个人以及发展的报道负责，也对批判的分析和评估负责。但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作出分析和个人的判断，远比在内外政策或者文化、艺术方面要难，所以出色的经济记者相对比较少，而且有些被康采恩或者协会以高薪从编辑部给挖去从事管理工作了。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批判性的、通俗易懂的经济新闻业，因为记者层从整体上不仅对公众情绪，而且对国家的道德和精神领导产生重要的影响。总体上讲，记者在教会、中学和大学中的影响相对比较弱。所以说，如果新闻业的独立性由于大型康采恩或者联合会而继续受到削弱的话，那将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对于基本法所确定的基本价值观，德国人的认识从内心是一致的，它所包括的就是：人的尊严，民主的原则，法治国家的原则，以及社会平等的原则。有关每个原则中的具体内容虽然在过去、现在争吵不休，并将继续争吵下去，可这种争吵也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和特征。因此说，那句从德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话就把人民引入歧途，因为它说："政治是丑陋的。"关于民主的争论也许在进行中是丑陋的、喧闹的、不稳定的，但如果把民主理解为纯粹的理想状况，那绝对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是一个很糟糕的误解。民主是人的民主，而且对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

自从孟德斯鸠起，分权的原则就被引入民主国家中：立



法、司法和刑法应该分离，并且相互独立，尽管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中，它们彼此交替、重叠。譬如，在一个议会民主的国家中，司法的负责人（总理或者首相）是被立法机构（联邦议会）选举出来的，而他自己也属于立法机构一员。最高法官绝大部分是通过立法机构或者司法机构确定的。我在此所要谈的问题就是，强调国家行为透明度的重大意义，因为没有透明度，选举（甚至也包括公民公决）就没有任何意义。仅凭分权的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三权都必须置于透明度的原则下。对于一个公民来说，如果有关他的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如果议会是在特别委员会中背着公众商量、决定，或者政府借助于秘密法令和秘密行动组织去处理，那么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对于这个公民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同时，没有一个独立于三权之外的开放性言论自由，民主也是不可能的。而开放性的言论自由也绝非仅靠一张嘴，或者同一口径来讲，更多的是多种观点的原则，口径一致也只是例外。观点和判断的多样性——也包括偏见在内——恰恰是民主的标志。政治党派、企业、整个经济界、联合会、工会、单个的行业、教会以及宗教团体，都尝试着用单方面的信息、党派性证明材料甚至以他们所认为的恐惧、威胁、许诺，向公众舆论界施加影响，这是人的本性。正是基于这个目的，在 20 世纪社会舆论已经产业化，广告企业和公共关系代办处应运而生，它们向不同的利益团体提供服务。自从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越来越多地为个人（一

定程度上也为泛国际化康采恩)所控制以来,一种威胁正在持续增长:公众舆论以及选民将被那些控制着媒体的康采恩所诱导,片面地围绕着这些企业的需求而转动。

一种独立的新闻业不仅推进着民主声音的形成过程,而且也维护着政治决策必要的透明度。国家行为的透明性是言论自由的必要前提条件。没有这个规则,民主是不可能的。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的谈判处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如果把所有的底线提前向公民公开,那是不可以的。同样,这也许适得其反,就如同派一个身穿警服的警察去跟踪一个间谍。事实上,需要派遣的是一名秘密警察或者隐蔽的特别警察,同样,监视一个恐怖或者违宪组织、团体,也应如此。

这仅有的几个关于透明性的例外同时也证明,这些例外也有可能导致对民主的危害。一名驻外间谍或者国内秘密警察隐身在护宪官员的外衣下,那主管的议会(联邦或者州)、政府就很难对他进行监督,因为这些人员的隶属不易被外界认识,其中有些人因此而发展得心理变态。譬如,他们中有的就自负地认为,在了解这个国家的幸福生活所面临的威胁方面,他们甚至比政府和议会还要强得多。有的怀疑政府官员,甚至跟踪他们,在联邦德国初建的那几十年,确实发生过这种情况。因此,在我出任部长和联邦总理时期,总是与他们个人之间保持距离。这些年中,全世界可能都经历了,美国的秘密警察是如何以伊拉克有大量的毁灭性武器以及伊朗有核武器企图的"情报"而误导公众舆论的。一个国

家所设置的秘密警察人数越多、涉及的范围越广，那么对其政治上的监督就越难。议会和政府无法进行政治监督之处，就是秘密警察以自己的手段进行控制之地。

如果对武装力量缺乏有效的警察监督，也同样可能是危险的。从俾斯麦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德国一直缺乏武装力量的有效警察监督。就是从 1919 年到 1933 年，国防军不许政治监督介入，尽管它们形式上归属于议会领导，而不归德国总统指挥，所以把他们称为“独立王国”并不为过。1934 年，在亨登堡(Hindenburg)去世后，国防军绝对地归属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机器。

阿登纳在 50 年代初开始筹建军队时，首先面临这样的危险：未来的国防军有可能远离议会的监督而存在。1956 年，联邦议会迫使总理对基本法(第 63a 和第 87a 条款)进行补充，从而有效地阻止了那种军队立法的出现。但直到 60 年代，议会的监督事实上依然不够。现在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联邦军从整体上是可以透视、控制的，而且在联邦军指挥官的思想上明确地打上了议会民主的烙印。在忠于宪法这个标准下，我觉得今天的联邦军属于最好的军队，是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在未来持续进行议会和政治上的监督仍然是必要的。

不仅秘密警察和联邦军，所有国家行政机构包括警察都需要议会和新闻媒体的政治监督。哪里秘密公章癖蔓延，哪里的透明度将受到阻碍，也就孕育了发展失误和怀疑的危险。1962 年所谓的“镜报丑闻”(也许直接称之为施特劳斯丑

闻更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镜报》基于某些消息发现了联邦军的一些弱点,并把它曝了光。一位要维护自己尊严的联邦部长、一些军方官僚和联邦检察院坚信,这危害到祖国,就连联邦总理甚至也说,这是“极端的卖国”,所以专横地逮捕了出版人奥格斯丹和几名报社编辑。我反复阅读了那篇由康尼·阿勒斯(Conny Ahlers)所写的文章。怎么个卖国法?我觉得需要有人帮着给予解释才行。后来,这起人为打造的起诉就那么不了了之。

这起镜报丑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言论自由需要一种独立的新闻业,因为任何民主国家都是而且总是缺乏抵抗力的。因此,在我们的学校和大众媒体中,民主不应该被介绍成为纯粹的理想状态,只要把它当作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好的,就足矣。任何民主政体都带有缺陷。谁把它绝对理想化,那么就面临这样的危险:它会给那些最初对民主深信不疑的人带来特别意想不到的失望,而且这种失望会转变成反民主的情绪。

德意志诸小联邦

我们在政治生活中所遇到的有些问题，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也就是说，了解历史有助于某些特定的发展。在所有的历史遗产中，也就是那些我们德国人今天仍在艰难面对着的遗产中，德意志诸小联邦给我们内政所带来的后遗症问题最严重。

在中世纪末期，帝国的权力已经处在衰落时期，德国由许多小国和小邦联组成。所有这些侯爵国家、公爵领地和自由的帝国城市，都拥有自己相对的主权，有自己的政策。宗教改革和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事实上造就了继续的分化，"教随国立"原则给予诸侯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的权力(不接受者就得出卖产业后离境)。在德国，提及宗教法庭的残酷，当数所谓的"宗教和约"为最。因为它把宗教上的不容异端上升为有效的法律原则。宗教的对立和诸多的小联邦不仅把外交势力变成武力干预，尤其是这三十年的战争把形成一种德意志民族国家意识的进程从根本上给推迟了。

如此多的德意志小邦联同时也使启蒙运动的政治影响在德国受到极大的阻碍和延误。当民主的原则在英国、法

国、荷兰以及北欧国家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时，许多德国的邦联仍然僵化在专制主义之中，而路德以及天主教那些绝对服从教会的要求也在此推波助澜。到 1800 年，德国大约有 300 个邦联国家。拿破仑随后从德国这张打满补丁的地毯上，顺道并购了一些。譬如，他建立了威斯特法伦王国（后来成了普鲁士的主体）、符腾堡王国（至今基本上保持原样）、拜恩（巴伐利亚州）王国。但直到 1803 年的帝国特派代表团决议时，仍然还有 30 个邦联小国。

1848—1849 年，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德国人首次提出要建立一个德意志国家，建立一个民主选举的德国议会。（当然，保罗教堂这次聚会的动因源自法国，在这次聚会上所提出的一部分思想出自美国。）保罗教堂的努力和尝试无果而终。普鲁士王国在这几十年的进程中，兼并了一连串享有主权的公爵邦国，到 1871 年打败法国时，作为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把霍亨索伦王朝带到了这个由他所建立的王朝之巅。尽管民主选举的德国议会建立了，但是权力有限，也就批准财政预算这么个例外。所以，财政预算的讨论一直扩展到反对派可以发表他们意见的地步，而且至今一直在我们的联邦议会中保持着。俾斯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可绝对不会有人把他看做一位民主者。他之所以在 1871 年还让那么多的小公爵国家保留下来，实属无奈。

普鲁士的扩张态度一直持续到 1918 年帝国的没落。直到魏玛共和国终结，埃尔富特这座城市还不是图林根国的首都，而仅仅是普鲁士萨克森省的省会。汉堡市的阿托纳（Al-

tona)、万茨贝克(Wandsbek)以及汉堡的威廉堡甚至属于普鲁士两个不同的省份。尽管到了1918—1919年,走到了尽头的普鲁士帝国开启了通向议会民主政府之路,它却没有消除小国数量过多的问题。在纳粹统治的12年期间,多数国家的联邦为中央集权所取代。在纳粹的灾难结束后,这种中央集权也结束了,战胜国一纸公文就放弃了普鲁士。

今天的德国由16个州组成。它们有极不同的经济生存力,同时也都有类似的权力。众多小国的历史至今还在产生影响,围绕着各州与联邦的权限划分问题,几乎每十年都得有一次重新的讨价还价。一个跨越各州的统一的国民经济以及日益增大的欧盟共同市场这一经济和政治的模式,产生了凝聚力,也就是以前向波恩、现在向柏林和向布鲁塞尔的聚集,但16个联邦州政府仍然顽强地维护着它们的独立性。因为它们以此所获得的成果是有限的,所以各州州长们就尝试着,而且不断加大力度,对联邦参议院的政治家、联邦政府的立法部门以及联邦议会施加影响。与此同时,还有每个官僚机构自身权力向外扩张的尝试,这不仅存在于各联邦州,也存在于联邦内部。

其结果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不断增加的然而却又搅混在一起的责任不明确的境况。1969年为形成所谓的三个"共同任务"而进行基本法修改,1992年为把州政府在欧洲融合政策中的共同影响确立下来而进行基本法修改。在每种混合的财政形式中,也都包含混合责任。所以,即便是对政治感兴趣的公民,一旦谈到某个具体问题或者失误,在绝大部

分情况下也分辨不出究竟谁应该对此负责。因此，人们经常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说，这都是“上边儿”的错。

我一直坚持宪法的这个观点：在权限分配中应该实施“小者优先”的原则。这个观点是耶稣会神父奥斯瓦德·冯·莱乐-博劳宁提出来的，他由此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延伸出了法律救助原则。法律救助原则在德语上的含义也就是“帮助的方式”。在那些对当地人要求过高而现有资源又不足的地方，上层机构的帮助方式方可介入；所有那些当地人能够自己作出决定并完成的事，必须在实践中让他们作出决定并自己完成。在此首先是要尊重他们的意愿！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城市自己所能决定的，它们的代表会也就有权自己决定！一个州议会不需要联邦的介入能自己解决的，它就有权自己处理！如果我们失却了这种“小者优先”的帮助原则，那么我们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这种联邦结构就无法继续保持其生命力。

在宪法中，原本没有“帮助原则”这个词，尽管在我们的宪法中，联邦与各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在法律规则中包含着这种基本的思想，而且把县、市的自理看做正常的。在趋于中央化的发展中，联邦国家体系的这种自我帮助原则却被推到了后面。基于必要性，尤其是税收、福利保障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全国化，在实际中出现了一种多样化的财政平衡组织结构，因此不断地引发争吵。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柏林、不来梅和萨尔州，它们属于经济实力比较弱的州，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利用各种各样的财政平衡补助制度，所以它们

一直尝试着，甚至通过违宪上告的方式施加影响，以获取联邦更多的财政补贴。

联邦经济发展并不同步、不平衡。譬如，在1949年到1969年间，不来梅一直为联邦的财政平衡作贡献，而巴伐利亚则一直是一个享受贴补区。也正是因为未来联邦各州在经济发展上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东部的六个州在经济方面明显落后于其他十个州(我后面将就此详细介绍)，所以保持财政上的“联邦制”在未来依然是必要的。这一点对于柏林这个联邦州尤其重要，因为国家的首都同时也是失业和社会救济的中心城市。

在所有对我们联邦结构及其形式的修改中，必须考虑到如何去形成明确责任的问题。相对于其他理论上的国家形式来说，由于我们那种深深植根于历史中的复杂的联邦国家建构是把权利分摊在不同的层次上，所以它们明显具有某些优势。但我们在未来将不断地面对这么两个问题：一是联邦与所有各联邦州作为整体之间的问题；二是数目众多的实力相对弱的州与需要帮助的小州之间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也许从理论上可以通过一些小州合并的方法得到解决，可我对这样的尝试并不乐观。

譬如对柏林和勃兰登堡州的合并(这已经失败)并不能消除这个合并后的州对经济补助的需求，也不能令它强大起来。也许合并可以减轻地方计划方面的一些工作，但也有可能引发柏林这个都市官僚机构与昔日勃兰登堡的居民之间在财政方面的问题。而柏林从高高在上的一个独立市降为

一个地区,这种变化不可能不遇到剧烈反对。所以,柏林在财政方面的问题,也就只能靠这个城市与联邦慢慢地消化。从理论上有许多可能性解决办法:一种方法是一种置于联邦之下并由联邦承担财政支出的首都模式(在此方面有许多不同的例子,譬如美国的华盛顿、加拿大的渥太华、巴西的巴西利亚或者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再一种就是选择权:联邦承担首都的所有开支,尤其是作为国家形象的文化、艺术类开支,但这从经费上也许还不足。最后就是这两种之间的一种折衷方法。但是,只有真正地从生产力、就业率、收入以及税收方面使整个东德更接近西德的水平,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柏林的问题。

小州合并期望得到的成就也小。那些发生在柏林和勃兰登堡州的情况,也在萨尔州和莱茵兰一普发法耳次遇到了。但是大州的合并相反却获得了丰厚的好处,而且推进了州政府以及管理机构的理性化程度,譬如下萨克森、不来梅、汉堡、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以及梅克伦堡一前波美尼亚等的合并。德国北部形成大州的做法从理论上讲是值得的,但是遇到反对也是可以想见的,而阻止合并的事情也可能发生。

实际上,对故乡的骄傲和自豪在德国是特别明显的,最强烈的当属那些著名的老城和州,譬如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这样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州。但那些在近现代或多或少有意识建立的联邦州的居民,以及它们的政治家,也特别地维护本州的特殊感受。刚刚半个世纪的联邦州巴登一符腾堡州以及几乎全新的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黑森州或者石勒苏益

格一荷尔斯泰因州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发展，几乎在所有16个联邦州，都形成了这样的合作性认可。因此，对于那种全面重新进行联邦州组合的想法，我们不应该考虑。德国并不适合形成中央集权国家，我们的人民也不乐于实施中央领导，或者中央组织的各州重建。即便是在历史上，我们也只是在战败或者国家没落后有可能重组。

在这一点上，通过基本法修改而对联邦州做更多的调整，我觉得是有价值的，而且是有可能的。我所指的就是这种不正常情况：我们的州议会每4年选一次，而每个州的议会选举都对整个联邦的工作产生影响。联邦政府以及联邦议会的知名成员必然介入州选举，他们甚至改变立法机构，推迟或者提前某些在他们党派朋友眼里有益于自己参与州选举的事情。4年一次的州选举也就因此而偏离了初衷，因为它诱使这些州的政治家，尤其是州长的候选人基于个人政治上的需求而卷入联邦政治，因为它也同时反过来诱导政治党派的委员会和中央主席团成员定期地卷入各州的政治中。

以膨胀的党派利己主义为指导的16州议会选举令联邦政府的政治工作陷于麻痹，所以用一种基本的法律性规定来取代目前的做法也许更好些，譬如那种类似于美国的做法：所有有效选举在同一天进行，并且每两年一次。无论一届是两年还是四年，无论所选的是州长还是总统，无论所选的是上议院还是下议院成员，所有美国50个州都是两年一次在“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的星期二”举行。一个相应的德国规则和一个通用的选举时间，也许有助于减轻现在的这种4年

一次的重复政治神经质和混乱。既然在一个联邦州中基于某种原因有必要提前选举，那么基本法就可以针对现状把今后的选举周期调整到一个统一的时间。尽管会有一些人对一个统一的选举日持怀疑态度，但其本质上纯粹出自党派考虑。因此，必须在基本法的补充方面把第一次统一选举日尽可能往后放，以便不至于引发某个党派的不满。我自己对此并不十分乐观，因为一个这样的改变也许会违背某些政治家的利益和虚荣。我知道，竞选是民主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我认为，声势浩大的竞选是一种可以避免的病态。

在本节的结尾，我想至少指出一个与这里所论述的内容密切相关的问题：党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作为例外的巴伐利亚州的基社盟事实上已经是我们政治党派中的一个联邦范围内的统一党派（尽管它们的党章中写着，自己属于某个联邦性组成部分），因为它的领导机构、主席团成员以及高层党魁已经搬到了柏林办公。与极端的德国联邦趋势相反，我们的绝大部分政治党派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央平衡均势，尽管位于党派中央权力中心的人士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观念上是非常明确的。而这种以个人捐款和国家补贴为主的党派财政体制，又特别有助于中央化的形成。

国家补贴通常相当于党派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部分直接进入中央。另外那部分两倍于国家财政补助的财源——也就是基于个人、机构以及它们服务所获得的进入所谓的“党派收入基金会”的那些，随之也归中央支配。人们还得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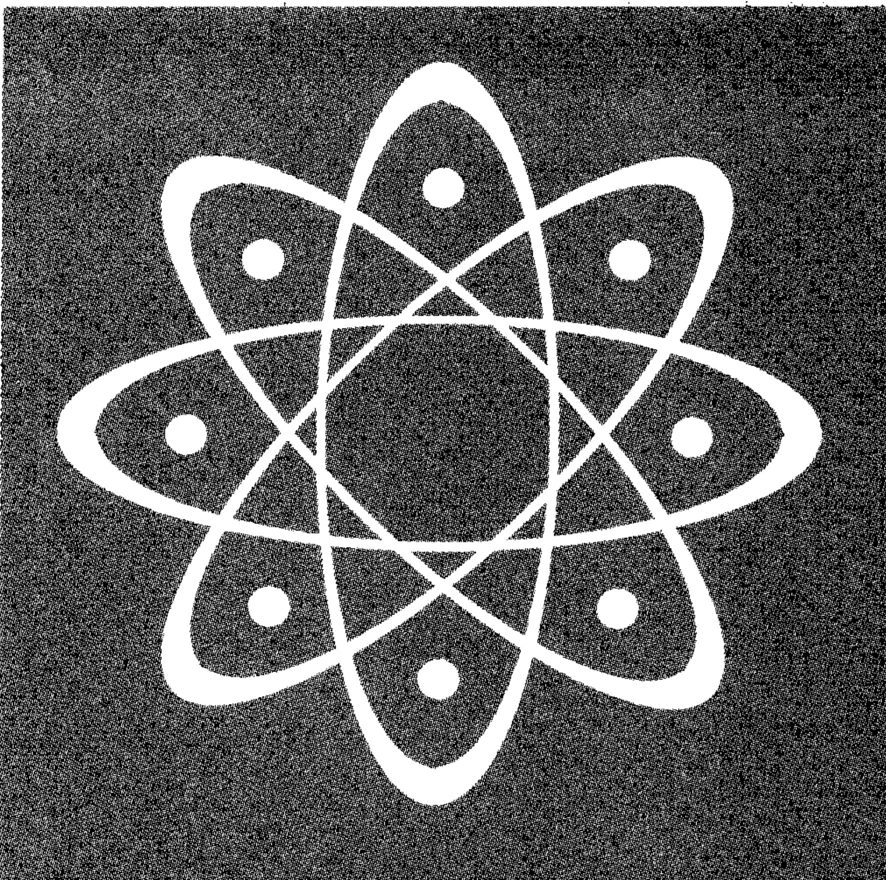
联邦议会党团的国家财政计算在内,它大约为国家党派财政的三分之一,并且基于各党派中央的意愿来支配。以此方式,2003 年时政治党派经过这种直接拨款和自己基金会所获得的经费共计 5 亿欧元(由此以后经费一直持续增长)。最新数字是,大约 20 个党派接受国家的党派财政拨款!

我不准备继续批评国家的党派财政补助做法,但是我想就这种调节提出警告,因为 60 年代末期所引入的这种奢侈的国家竞选费用补贴,实质上加速了竞选的机械化和职业化。以前是数千计的志愿者到处去义务张贴广告、散发传单,而今却以付费的方式由广告公司来承办。党中央是经费中央,并以此使政治权力更加集中。如果各党派的中央财政大臣们下一次就某一个法律补充达成一致,而且联邦议会可能批准的话,那么议会务必要特别谨慎地观察它的长期影响。

党派的个人捐款收入充其量是国家财政补贴的三分之一,而基民盟/基社盟,尤其是自民党明显要高一些,社会党则明显低一些。令我担忧的不是这种不平衡,而是我在其他国家所看到的情况,尤其是美国,不仅它的竞选捐款数额庞大,而且国家的党派财政补贴也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这种堕落的政治实践已经蔓延,它也可能会把我们的民主引向丑陋的变态。我个人的理想集中在以下三条简单的规则:一是国家不给党派补贴;二是任何党派都不得从企业、协会或者法人获得金钱;三是取消私人捐款减税。可以说,这是我的一个愿望,难道不许我做一次空想吗?

总而言之，我希望后来的德国政治家们，至少从德国历史上把这三个关键性教训铭刻心中：不忘犹太人大屠杀的罪行；不忘与我们所有邻邦建立友好关系；不忘联邦与各州之间可信赖的平衡工作。只要我们的政治家有勇气抵制德国人任何狂妄的尝试，那就意味着，我们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了关键性的部分。





Ⅲ　漫漫人生路

一些失误

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学习，所以随着历史的进程都会不断修订自己的判断准则。这就是我何以在本书的开始就介绍了那些对我产生影响、令我发生改变的经验和经历的原因，我同时也声明，在离职后25年间，我学到了许多在总理任上就根本不了解的知识。另外，在离职的这些年中，我也遇到了许多自己以前意想不到的问题。

譬如在我任职期间，如果德国参与美国所领导的武装干涉巴尔干行为，或者进军阿富汗，这是绝对荒唐的。对我而言，所有判断的标准，都是以理性和道德为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富汗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基地，它使世界政治局势发生重大改变。德国距离阿富汗就像歌德时代离土耳其那样遥远。可今天，我们与这两种文化的冲突确实是可能的。即便是德国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5年前，一位劳动和社会部部长可以说："退休金没有问题！"在此，他所依据的是法律及其保障。可今天，我们都知道，简单地照搬昔日的标准恐怕是行不通了。不仅年轻人太少了，而且老人的寿命也比以前明显地延长了。因为这个世界变化了，所



以我们就得确立另外的标准。

一名政治家不可以迎合大众情绪或者群众心理，他必须服从自己的理智，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道德价值观根植于基本人权以及基本法第20条所规范的条款中。政治家在从政中也有可能犯错，或者进入误区。基本法不仅允许人犯错误，允许好的和比较好的政策，甚至也允许某种在结果上不好的政策，但是一位政治家的错误决策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这位政治家在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者发现了自己的误区，那么他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否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直面真理？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政治家的表现都很人性，换句话就是，也像普通人一样。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在公众面前坦然面对真理，这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政治家还有另外的一个难题：认错有时会被社会舆论曲解为软弱的表现。就此来说也就意味着，真理中似乎包含有可以对证据进行狡辩的成分。

早在2000年前民主的雅典，雄辩之术就已经被看做政治家重要的艺术能力之一，当然雄辩之术也有助于掩盖某个真理。如果一名政治家想当选，那他就得尽可能地向选民正面介绍自己。如果他把自己的想法、计划或者至今为止的成绩向他们摆出来，那他就难免陷入夸大自己的险境中，因为许多从主观愿望出发所作的许诺，最终也就只能兑现一部分。这个基本的问题是所有民主国家都经常遇到的。

自从退出职业政治家生涯以来，我不时扪心自问，我是否令自己或者公众失望过？在联邦总理位上是否对所作的

许诺努力去兑现？也许人们难以相信，但说真的，出任汉堡议员、国防部长以及财政部长这些职位，实非我之所愿。今天，尤其是按照一些心理学的说法，我反倒愈加吃不准。也许在潜意识中，我还真愿意为官。在下意识中，类似于做梦，许多因素穿插交替发生作用，我们对此作用确实还无法施加影响。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可以说：从内心讲，我对所有这些职务都并非所愿。我所热衷的并非为官，而是被认可，类似于一名艺术家，或者一名运动员那样，通过个人成绩为大家所接受。

在我的职业政治家生涯开始时，也就是我在 1953 年作为联邦议员参加竞选时，情况还不那么典型，因为我作为候选人更多的是从其他方面考虑的。我自己并不想步入政坛，而想进入汉堡港口或者转运领域的管理层。因为我当时的上司卡尔·席勒议员不同意，我就接受了作为候选人去竞选联邦议员的这个条件。一次当选，我就被放到了这个位置上，作为年轻的议员就得尽可能出头露面，以便下次再当选。后来的所有政府职务，我就这样逐一给接了过来。1966 年，当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的黑红大联盟形成时，我拒绝出任交通部长，因为我不想当部长。三年后，当黑红联盟结束，开始了社民党和自民党的红黄联盟[①]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接任了国防部长。而赫尔贝尔·威莱尔则接替我，出

①德国人以颜色标志党派政治特色：社民党为红色，基民盟、基社盟为黑色，自民党为黄色，绿党为绿色。党派联盟执政也就以颜色称之。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联盟为黑红联盟，社民党与自民党联盟为红黄联盟，社民党与绿党联盟称为红绿联盟，等等。



任联邦议会党团主席。

我自己决定去竞争一个政治职位只有唯一的一次，而且那是一个随之就令我十分后悔的错误：1966年，我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去竞选汉堡地区社民党主席。这是一个无薪的名誉职位，但却与权力和影响联系在一起。在1961年到1965年间，我是汉堡议员，但按照维利·勃兰特的愿望，我回到了联邦议会，那么就要积蓄自己的势力，而当时的媒体以及社民党内也是这么说的。我的竞选对手是当年的市长保罗·莱沃曼(Paul Nevermann)，由于一个不太起眼的原因，汉堡社民党要求他辞职。他比我年长几十岁，最后在党代会上以绝对优势获选。后来，我不仅把自己这次参选看做一个错误，而且也看做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因为莱沃曼的当选是主席团搞的一种平衡补偿，而我压根儿就不该去自讨没趣。我由此得出了这样的教训：不了解清楚自己的等级和分量，就无法与大重量级的竞选者进行竞争。

这种经验在大约十年后，即1974年5月，在遇到维利·勃兰特辞去总理职务这个问题时，也许从心理上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接替总理的人选问题(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因为对这个职位及其所承担责任的认识尚未成熟)，还有社民党的主席问题。我还认为，君特·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间谍丑闻还不足以令联邦总理辞职。与此同时，各种媒体也在沸沸扬扬地议论勃兰特的绯闻，这令我想起了要求莱沃曼辞职那类似的不合理理由。不管怎么说，我坚决反对维利·勃兰特辞职，但勃兰特的决心

已定,谁也无法动摇。赫尔贝尔·威莱尔随后建议,勃兰特应该继续保持社民党中央主席职务,我也有此同感,没有细想就马上表示赞同。此时,我当年与莱沃曼竞选基民盟汉堡地区党主席的这段记忆对我影响很大。多年后,我把这次决定看做政治决策失误。

至今为止,我是唯一任联邦总理却没有兼任执政党主席的人(在格哈特·施罗德领导下的红绿联盟执政晚期,这两个职位也曾分开,但时间很短,故不足为例)。两个职位由两人分别担任,这就埋下了一个政治分歧的危险,而这在 1982 年,也就是在社民党和自民党联盟的末期,则变得明朗化了。后来的联邦总理科尔、施罗德以及默克尔就堵塞了这个危险漏洞,他们同时担任所在党的中央主席。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德国政党在财政和人事上极其奢侈地装备了中央,从而使中央主席团及其核心成员的权力实际上相当大。这种中央对人事、财政上的控制还在于有所谓的党派基金会。各党中央还可以经常地对政府以及议会党团确定政策方向,并不需要公民的表决、投票。不管怎么说,在波恩社民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中,我的建议当时几乎很少产生作用,相反社民党明显向左倾斜。最后就是 1983 年春在联邦议会所发生的事情,也是许多人所熟悉的:社会民主党显示,失却执政能力。赫尔贝尔·威莱尔早在 1982 年 10 月就预言,并且等着这一天。

到维利·勃兰特去世后,我认为,1974 年我在出任联邦总理时不要求兼任党中央主席,这确实是我的一个失误。可

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我反倒觉得自己当时的动机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我对维利·勃兰特的真诚以及自己对双重角色负担过重的忧虑是理智的、重要的,况且我在1974年春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担任联邦总理那么长时间。我当时所想的是,通过1976年秋的联邦总理大选,我的总理任期就告结束,而我的任务也就是,把社民党和自民党联盟政府稳定而富有成效地引向任期结束。

结果事实的发展却是完全另外的一个样子。社民党和自民党联盟连续在1976年、1980年两次连选连任(社民党两次的选票均接近43%),而我的联邦总理任期从开始到1982年秋结束,长达8年之久。在1980年秋的竞选中,自民党仍然把我的名字写在它们的宣传画上。尽管在随后不久,自民党主席汉斯-迪特雷西·根舍开始提到已经出现并面临的"转变",尤其是经济部长奥拓·格拉夫·拉布道夫(Otto Graf Lambsdorff)在自民党内大力促进那种还比较弱的与基民盟/基社盟建立黑黄联盟的倾向。1981年时,我还坚信,在1982年春根据基本法第68条通过向议会提出"信任问题"议案,就能把自民党稳定在我们的红黄联盟上,但这是一个错误。尽管自民党议会党团的议员们对我表示信任,可拉布道夫和(有些犹豫不决的)根舍继续着他们在换届和重组联盟、重组政府方面的活动。有的人已经开始与基民盟/基社盟的政治家私下就此秘密接触,而且与大出版商艾柯斯·斯勃仁额商谈,以便获得"图片报"和"世界报"对他们改换门庭的支持。我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些,但对作出明确决定仍感到犹豫

不决,不想让红黄联盟执政在我手里结束,不想引发提前选举。

这是又一个错误。围绕着自民党所策划的反对共同选举而且针对在任的联邦总理的竞选宣传,拉布道夫和根舍陷入重围,其党内也发生分裂。我的选举委员会也同样如此。事实上,我在 1982 年 9 月(在拉布道夫发表了一篇挑战性文章以后)作出决定,撤销所有自民党的内阁部长职务,并以此结束红黄联盟执政。随之,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正式通知根舍前来与我会晤,并且宣布解除与自民党的联盟,根本没有考虑他的意愿如何。

对所谓的市民保守派和丰富多彩的政治中间派来说,他们乐于政府重组。为了转移人们对自民党背叛的不满情绪,一部分亲自民党的媒体误导读者说,是社民党让我陷入危机,这方面的文章人们现在还可以查询到。事实上,直到 1982 年秋还没有出现社民党反对我的事情,因为联邦议会党团相信我的话,而且支持我这位总理(当然有极个别例外)。最早是 1983 年,也就是我结束了联邦总理工作后,科隆市社民党党代会(不是议会党团)在维利·勃兰特、艾哈德·艾裴勒(Erhard Eppler)以及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并非第一次)的影响下,第一次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反对我所负责制定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双重决议的政策。

所有这些使我产生一个疑问:我对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的社民党左倾是否作出了正确的估计?我想,在这一点上我



没有必要太多自责,因为我早就注意到这种偏斜倾向,而且也采取了相应的纠正措施。但领导这个党并非我的工作,而是维利·勃兰特的任务,可他对我所批评的倾向与其说是在制止,不如说是在鼓励。我内心所考虑的,更多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福祉,而不是这个党的事情。

辞去总理职务后,我给维利·勃兰特写了一封长信,力图对我的总理任期作一个总结。我对自己的现状作了类似于上面那样的表述,并希望勃兰特能够接受。可返回来的只有那么六七行字,他的做法令我感到深受侮辱。因为我们二人有截然不同的政治风格,所以彼此无法和解对话。勃兰特认为,我作为联邦总理早就失败了,如果是他的话,绝对不至于走到这一步。而我认为:如果不是我任总理的话,就他最近几年所领导的社民党,那政治上的发展早就没有办法肩负政府领导的担子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朋友关系也就慢慢地由于双方的缘故而冷却了。在勃兰特去世时,我从内心确实深切感到,我失去了一个朋友。

我作为社民党党员已经有 60 多年的时间,按照我那有限的考虑,这个党在道德价值观上更符合我的追求,可我同时依然必须坚持与党内的一部分人公开斗争。这种斗争开始于 1958 年 10 月,那时我和一批来自所有三个议会党团的议员去参加正在组建的国防军武装训练。在这一年,正是这些参加训练的议员共同抵制阿登纳的意愿,从而使一个理智的军事防御法得以通过。我们这些人的共同愿望是,以议会党团亲近国防军的方式,向联邦议会示威。维利·贝科汉和

我特别热衷在社民党与新的德国军队方面建立起一座桥梁，可社民党与帝国防卫军之间在魏玛共和时期所形成的难以抚平的切齿之恨像一个惊叹号，就那么无情地拦在我们面前。几个愚蠢的左派同仁甚至还把我们的武装训练误解为军国主义或者崇尚武力的结果，而我也因此在议会党团主席团的重新选举中落选。当我1968年为勃兰特和威莱尔所迫而出任国防部长时，同样的误解和诽谤就马上出现，东德的秘密警察甚至有意张贴这样的标语："诺斯克（Noske）①的继承人！"这些污蔑之所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应当感谢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威莱尔，他先后连续支持、保护了社民党的三位国防部长：施密特、乔治·雷波尔（Georg Leber）和汉斯·艾普勒。而且后来，维利·贝科汉作为联邦议会的最高代表，在国防部任职10年之久。

我接任财政部长以及后来出任联邦总理时，与党内多数派的激烈冲突就在所难免了。维利·勃兰特作为总理所燃起的一些希望之火，原本只有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没有钱。当他1974年把总理的座椅转给我的时候，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社会福利计划都必须紧缩。在第一次政府说明会上，当我作为总理开始谨慎地用到"持续和集中"这个词时，一些左派人士就把它理解为改变方针和提高价格。与左翼意识

---

①全名Gustav Noske（1868—1946）：社民党政治家，魏玛共和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在1918—1920年间，他镇压了多次国内起义，并与李卜克内西以及罗莎·卢森堡等社民党左翼领袖的被谋杀有关。



形态的冲突,以及与他们围绕福利政策的具体冲突由此继续不断。属于这些的还有年轻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新福利运动”:从自然和环境保护,到女权主义、同性恋的解放,再到渴望自由运动。在这些“68 学生运动”[①]所推出的“选择性”奋斗目标中,绝大部分都潜藏着某个合理、有价值的内核,但以这种极端和绝对排他方式所提出来的要求,就使其中的合理性成分以及重要题目被完全推到了一边。而我的政府面对这种状态必须及时调整我们的内外政策,因为苏联的军事势力发展和 1973 年底出现的世界大衰退,都直接地威胁到我们。

尽管现在人们已经看到,所谓“我与我的党派闹翻了”的说法显然纯属信口开河,但类似的观点却依然存在。譬如说,我原本是合适的人选,可是却入错了党(部分基民盟人士的一个特洛伊木马式的特别危险的礼物,旨在贬低我在本党人士心目中的地位)。不过,这里也确实道出了一个实情:我在公众舆论中经常获得的支持,远远超越了社民党及其追随者这个范围。可事实上我一直是一名社民党党员,尽管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我对党内少数人士所走的路持保留态度;尽管到了 80 年代后期以及 90 年代时期,这条路为党内绝大多数人士所认可。我所期待的也许是更高的服从国家的理智,尤其是服从经济的理智。

到了 90 年代末期,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多年的

①指西德大学生在 1968 年时以反越战为导火索而开展的造反运动,代表人如原联邦总理施罗德、外交部长费舍尔。

自由运动者们怎么在巴尔干问题上就那么快地变成了“武装干预者”。联邦总理施罗德2003年拒绝参加美国对伊拉克第二次大规模战争,社民党对他表示支持(而且他也公开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双重决议之后的所有事态发展证明,我力促形成这个决议是正确的抉择),由此开始,我重新从内心找回了与党内大多数在政治上的一致性。

虽然我并非以卡尔·马克思、卡尔·考茨基,或者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为榜样,但却以恩斯特·鲁特尔、威廉海姆·凯森(Wilhelm Kaisen)、马克思·勃劳尔(Max Brauer)、威廉海姆·许格勒(Wilhelm Högner)、瓦尔德马·冯·克劳容恩(Waldemar von Knoeringen)、弗里茨·埃勒(Fritz Erler)、海因茨·库恩(Heinz Kühn)[①]等为楷模。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围绕实现的目标对必需的方式、方法和可行之路有一个现实的判断。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论证艺术说服大多数人;他们可以与激动的群众对话,并且使大家冷静下来。在这个语言艺术方面,维利·勃兰特实属大师,而库尔特·舒马赫和赫尔贝尔·威莱尔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达到这个效果。相反,我尽管在议会演讲和辩论中是一个好手,但我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尝试着用证据和理智去说服人,而且带有论战性结尾,当然,如果是必须这样的话。我不太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鼓动宣传。我从没有把这个看做一个错误,尽管这在从政上

①鲁特尔、凯森、勃劳尔、许格勒、冯·克劳容恩、埃勒、库恩等均属现代德国社民党著名的政治家。



属于一种缺陷。

在我自己所犯的政治错误这个单子上，还有三个要填上去：失职、错误的回避态度以及不通盘考虑便自作主张。

我先从失职谈起。在我主持政府工作时期，那种在我们社会已经开始了的老龄化和走向萎缩的趋势还没有被人们注意到。出生率的下降其实早在60年代就已经出现，到了七八十年代，由于大量的年轻人从东德以及国外(尤其是欧洲南部和土耳其)来到德国，掩盖了这个问题。到了科尔和施罗德政府任期时，与东德的福利经济统一成了最重要的问题。2003年时，施罗德宣布了包括所有方面的"2010发展计划"，迈出了解决老龄化社会后果的步伐，只是力度还不够。

1976年，在接手维利·勃兰特转交的联邦总理坐席后两年，我作出了一个错误的许诺。尽管我们对养老金提高以及国家支付能力及其后果做了认真仔细的预算，但随后很快就发现，这个预测太理想化，而且国家经费不足，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个计划进行修正。这时爆发出来的"养老金骗子"的呼声可比后来自由运动的所有讨伐声调都要高。我们所做的计算尽管很细致，而且不含任何水分，但我们低估了世界经济萎缩的后果。财政部长汉斯·艾普勒对经济的观察力相当敏锐。我最终也意识到，把提高养老金兑现的时间推迟半年是必要的，以免它过多地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失业和财政等产生负面影响。

当时，虽然还没有"全球一体化"这个词，但各国经济的相

互依赖以及从根本上的国际网络化已经出现。联邦德国的社会总产值在全世界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约占二十分之一,但是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却已经占到十分之一。这种与世界经济密切纠缠在一起的关系,使德国在油价爆炸性增长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世界经济萎缩中所受到的打击,远比其他大型工业国家严重得多。瞟一眼价格变化率和失业率就会发现,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遇到的危机远远超过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尽管这种说法——从行政和国有的货币、政策性的机构方面去解除出口经济高度依赖性,也许能减缓这种不协调的危害——不无道理,但我从理论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措施和方式、方法。

第二个错误早在 1969 年随着把法律 91a 和 91b 条(所谓的三个共同任务以及联邦立法机构法规框架)引入基本法(的高校建设、地区经济结构、农业结构和海岸保护)就出现了。这是一个对国家政策有着深远影响的失误。出于大联合政府的动因,在财政部长施特劳斯和经济部长席勒的领导下,一批专家共同搞了一个草案,而且联邦议会几乎以全体同意的投票结果批准了这个法案(我当时是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直到很晚我才明白,我们以这种立法者的身份,最终导致了联邦和各州之间在权力界限上的混合,而且造就了财政上的责任和义务模糊不清。这种局面持续了 40 年,直到大联合政府再一次由于重新修改宪法而使各方都陷入一团混乱为止。

最后是个人主观意志,这是我务必要作为错误来看待的,尽管媒体和大众几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因为它更多地属于个人方面的问题。这是有关 1980 年底任命库尔



特·贝克尔(Kurt Becker)接替克劳斯·波菱,出任联邦政府发言人那件事。贝克尔是我们这一代的一名政治新闻大记者,一位有思想、有独立判断力的人。我认识他已经多年,而且每次阅读他的文章都有所收获。他从《世界报》开始从事媒体工作,后来与保罗·塞瑟一起来到了《时代周刊》。我又与特奥·佐默尔(佐默尔 1969—1970 年已经是很有成就的国防部规划司的负责人)一起,从《时代周刊》调来了一名高级编辑。出于方便我工作的考虑,我征求库尔特·贝克尔的意见,看他可否接替波菱的工作(波菱要出任我国东柏林“常驻代表”)。整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但很快就发现,贝克尔对于脏水横溢的波恩新闻机构太认真了。作为副部长,他把对国家的忠诚看得高于对政府的忠诚,社民党的党派利益就更被他放到脑后了。在这一点上他没有错,但许多社民党的党员却抱怨、责备他。我非常了解贝克尔,因此我也许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早就应该对他忠诚于工作的态度与社民党内已经相当明显的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有所考虑。大约一年多后,我不得不向贝克尔挑明这个问题,他没法继续撑下去了。调离他确实应该说是我的决策失误,我之伤心不亚于他。我们依然是好朋友,而且后来在《时代周刊》还继续合作。但我的这个失误,以及由此而对贝克尔所造成的伤害,却是我永远无法挽回的。

以上就是我在此要补充的三个失误:这三个失误没有一个是我可以挽回的,充其量有些是可以借鉴的,使我不至于重犯而已。

谨慎的良心决定

下面我想从自己的政治经验出发，介绍一些例子，通过这些例子，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名政治家所面临的状况以及在各种状况下他如何作出某种政治的或者法律的、道德的抉择。对一名政治家来说，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确实是无所适从：不仅翻阅基本法无助于他，而且宗教信仰也无法帮他；不仅没有什么哲学观点能助他，也无法凭什么人的尊严来支持他。我在此要介绍三件事情，其中任何一件都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认真考虑并斟酌应该赞成还是反对。

一个令我震动的联邦议会辩论就是关于谋杀过时失效问题。联邦议会在 1960 年到 1979 年间，多次讨论这个题目。按照原来的法律，对谋杀罪追究刑罚责任的有效期限是在犯罪 20 年内，但是 50 年代末期出现了许多人难以承受的问题：纳粹杀人犯在过了追究谋杀罪有效期限后才被揭露出来，那么他们就不能被惩罚。从 1960 年开始，出现了许多文章，要求终止谋杀罪过时失效法或者延长过时失效期限。在当时联邦议会的三个议会党团中，意见分歧很大。社民党的阿道夫·阿恩特认为，简单延长过时失效期限的做法本身就违反

了基本法。大部分的社民党议会党团议员不同意他的意见。自民党的托马斯·戴勒尔(Thomas Dehler)和艾瓦特·布赫尔(Ewald Bucher),基民盟/基社盟的理查德·耶格尔(Richard Jäger)、阿道夫·苏斯泰衡(Adolf Süsterhenn)以及马克思·古德尔(Max Güde)等也同样反对设法延长过时失效期限的做法,因此各议会党团都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尽管这个问题在1965年、1969年以及1979年以相当严肃的态度进行了讨论,而且议会从道德和法律角度上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最终也只是勉勉强强而且有限地形成了一个解决办法。

当谋杀罪过时失效法在1979年终于又被提出来的时候,所有三个议会党团成员就赞成和反对进行了表决。我对废除此法投了赞成票,并同时提议,议员以个人身份就此投票,而不必受议会党团原则的限制。基于尊重个人良知的决定,作为联邦总理我也就不再寄希望于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意见。譬如,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司法部长汉斯-尧赫·福格尔在议会辩论中就明确地表示,他是以议员的身份,而不是以主管部长的身份发言。

这个决定过程就这样一步步、一点点地持续了几乎20年的时间。每一位联邦议员都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性去慎重考虑,没有任何人面临时间的压力。最后,投赞成票的人清楚地知道这会有哪些不合理之处;投反对票的人同样清楚其中都有什么弊病。人人都明白,基本法不仅允许人们投赞同票,也允许投反对票,同样也允许对宗教持信仰和不信仰的态度。每个人都是自己作出一个道德和法律意识的决定。

至今为止，20 多年过去了，它也就只有法律历史上的意义。

我的另外一个例子是 60 年代末期的西德开放性问题，这是大联合政府的议会折腾起来的一个问题：联邦德国是否应该签署不扩散核武器协议？尤其是美国施加压力，希望我们签署这个协议，以此放弃核武器。然而也就是几年前，他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动员、鼓励我们加入多边核力量部队。一如既往，德国作出了决定，尤其是希望美国的核武器保留在西德，这就像苏联的核武器留在东德的土地上一样。对于签署不扩散核武器协议，许多人是出于道德原因表示支持，也有的出于大西洋方面的原因表示支持，也有人——譬如我——是出于理智和合理性表示支持的。当时反对在这个协议上签字的绝大部分是基民盟/基社盟议员，他们的理由也是基于道德和理性方面的考虑：因为德国面临苏联的核威胁，所以德国方面无疑应该保留进行核武器装备的权力。再次出现了一个基本法和圣经都没有确定的方向：对不扩散核武器协议，议员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签字，都是允许的。最后的结果是，黑红大联盟决定推迟决定，直到后来社民党和自民党的红黄联盟成为执政党，才作出在不扩散核武器协议上签字的决定。1970 年春，联邦议会以绝对多数批准了这份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协议。

我的第三个例子是围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双重决议的争论，一个在道德与理性之间长期、持续的冲突。70 年代中期，我对苏联核武器发展给德国和中欧所带来的特殊威胁问题越来越担心。此处所涉及的首先是中程和中短程导弹

的核装备,这些从有效距离上飞不过大西洋,所以对美国没有威胁,而只是以德国为目标设计的。我向美国总统福特讲了我的担心,他打算与苏联方面就此商谈,可他的后任卡特(在1977年进入白宫)却持有另外一种想法。卡特向我展示美国的核实力,并表示对于苏联攻击德国的任何行动,美国都可以从本土用远程核导弹给予回应,从而以此来帮助德国。这并不能吓倒苏联领导人,当时的卡特在军事问题上还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自50年代起,我就开始着手探讨核恐吓与防御问题,并在1961年以"防御还是报复"为题出版了一本书。我知道,一场核攻击和核报复足以毁灭德国,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坐视美国以核"报复"来吓唬苏联的做法,也不能置美国的核战略优势原则于不顾,我们应该设法寻求一种军事力量上的平衡战略。尤其是我始终并不清楚,在未来的某种世界政治状态下,当苏联以某种方式对联邦德国施加压力——譬如要以核导弹摧毁德国时,美国政府是否真的会愿意为了德国而使自己陷入核战争的危险。我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公众舆论和德国政府能否面对苏联的压力坚持住。

由于卡特仍坚持强硬政策,我只好于1977年10月在伦敦的一个小型外交和军事专家圈子里点火。从那天晚上起,一年后,也就是1979年初,卡特、吉斯卡尔·德斯坦、吉姆·卡拉汉和我四人在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的瓜德罗普(Guadeloupe)碰头,我们在英、法朋友的帮助下,共同集中精力于这个双重决议。就在这年的年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

事会接受了这个决定：一方面，西方向苏联提出建议，就销毁中程武器进行商谈；另一方面，它宣布，如果与苏联商谈 4 年还未达成协议，那北约就开始以苏联为目标，部署中程导弹，以便欧洲与苏联保持核力量平衡。

尽管有后来社民党内的意见变化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由于新总理科尔继续维持我的决定，所以这个双重决议实际上得到了落实。随着潘兴 II 型导弹在欧洲的部署，这第二个部分就产生了影响。1987 年，东西方自 1945 年来的第一份裁减军事装备协议，即《中导条约》正式签署。双方在欧洲所部署的中程核武器被销毁了。当时，我虽然已经离开总理府 5 年了，但从内心深处对这个成果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长期所奉行的理性外交战略在东西方问题上得到了落实，而世界政治也走上了一条更好的路线。

走到这一步，取得这样的好成绩，确实不错。可是在 80 年代初，这个北约双重决议在一部分德国人心目中所引发的非理性恐惧和茫然，却一点儿也不好。不仅针对着我，而且后来也针对着联邦总理科尔，在波恩以和平运动的名义，分别举行了两次数万群众的集会，表示抗议。政治家、神父、作家以及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把我们看做战争头子、投机冒险者，而把他们自己变成害怕核战争的鼓动宣传者，更把我们归为核战争的推动者。把自己的恐惧感变成公众的，这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时髦心态。许多人甚至到处去宣讲，有几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把他们的城市宣布为“无核区”。对于这种政治宣传和财政上的帮助，也许东德的国家机器乐

于接受。这是一种心理运动,实质上是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鼓动而炒作起来的。

1983 年初,一直在联邦议会上支持北约双重决议的维利·勃兰特开始转向反对,而社民党的大多数也随之改变。有些甚至组织起来,以和平运动为基础,要推倒联邦总理科尔,以便自己去组织政府。可是,科尔面对这场政治风浪依然不动。1987 年的苏美销毁中短程导弹协议,使我和科尔都看到,北约双重决议是完全合理、必要的。随后,这场和平运动就销声匿迹了。抵制核动力电站不过是它的翻版(尽管社民党原本对于核电站作了富有深远意义的扶助)。在科尔的联邦总理时期结束后,后来的社民党高层领导对于形成 10 余年间的误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联邦总理施罗德。此事已经随着时间而过去了,北约双重决议成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即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中,道德辩论性的冲动一旦与煽动搅和在一起,那么它就足以把理智推到一边。

本能的决定

在上节所介绍的例子中,政治家都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讨论和对所有证据的认真考虑,从容地作出决定。相反,如果一名政府领导人迫于时间的压力,必须匆忙地作出某个重要决定,那恐怕就只能看他的运气了。可见,迫于时间压力去作决定,就意味着高风险,而这个风险绝不仅仅涉及他个人,在特别情况下会涉及他的国家和整个民族。

有些高层人士比较幸运,使自己的决定从道德方面可以获得国民的支持。譬如联邦总理科尔,当他在 1989 年 11 月看到了两德统一的机遇时,决定凭借国民力量。再如联邦总理施罗德,当 2001 年 9 月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了恐怖袭击后,他向美国朋友们本能地表达了德国人民的互助友爱。在两年后,当美国进攻伊拉克时,他再次对德国人的参与保持了沉默。

联邦总理科尔在 1989 年 11 月 28 日所作出的举动具有国际意义(我以私人身份从远处经历了)。条件在东欧中部已经成熟了:在波兰、在匈牙利、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东德,大规模的自由运动席卷全国,犹如潮水般的人流涌上街头。

顷刻间,共产主义领导在这些国家失败了。对这样的一种状况,既没有程序,也没有理论、法则,也没有与同盟国的协议。科尔也许谨慎小心地等待着这一事态的深层发展,因为强大的苏联在上述那些国家都驻扎着自己的军队。可是这位联邦总理本能地想到了这个动因,以他的"十点建议"去加速两个德国的统一这个国际进程。这是一个理智的杰作,它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在我的眼中,这个抉择也暴露出了当年同样的错误:考虑到英、法、俄三国的反对,科尔必须冒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他的动因失败,那么许多人会把脏水浇到他头上。这种情况在这个民主国家已经发生过:如果一名政治家获得成功,人们都会说,他是对的,而且表示祝贺。如果失败了,那么人们就既不会想起他的好心,也不会在意他的努力。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两次要求立刻作出抉择的极端情况。这些决定必须马上作出,我根本无法依据法律的或者其他行为范例作参照。1969 年 2 月,我刚刚出任汉堡内政局负责人几周,汉堡突然受到一场大风暴的袭击:第一天晚上就死了一百多人,而且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遇难,甚至可能高达千人。出于本能——我当时顾不上考虑许多法律法规,甚至可能都违反了基本法——我未经授权就带着联邦国防军出发,把许多面临危险的人根据他们的意愿从他们家中救了出来;根据生活费标准向抢救出来的人发放救济金,让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城区购买必需的生活品。我必须承认,关于违法这一点,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我内心被人道责任所

驱使，只想着抢救更多的人脱离危险。幸运的是，后来没有人控告我。

15 年后，我们在德国经历了一场灾难，后来电影制片商和记者以“德国 1977 年秋”为题对此作了记录。在序曲中，再现了 1972 年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绑架以色列参加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队的恐怖事件。尽管防御红色旅的问题并非是一个马上决定的题目，但却是一个连任三届政府的题材，故此包含着许多必须马上决定的一瞬间。我不愿回忆那些不眠之夜，究竟以何种方式处理问题的焦虑令人辗转反侧，怀疑和恐惧也常令人突然惊醒。后来有人写到，我们也许应该本着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处理所有这一切，但这个词听起来是这样的苦涩，那是被绑架的人质及其家人所经受的，那是许多德国市民而且也包括我们必须经受的苦涩，而我们的决策则与此密切相关。国家利益至上？事实上，这一瞬间我们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是对我们政治经验、人生道德观的痛苦历练和考核。

勃兰特—谢尔[①]政府把三名被抓获的慕尼黑袭击事件的恐怖分子在判刑 8 周后，用于交换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和机上人质。3 年后，红色旅在柏林绑架了柏林的政治家皮特·罗伦茨(Lorenz)，并以杀戮相要挟，迫使政府释放被关押在监狱的一些恐怖分子。政府再次陷入道德矛盾之中。柏林市长、波恩的在野党领袖科尔和作为联邦总理的我共同决定，

①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1919—)：曾任德国总统(1974—1979)。

营救罗伦茨,并释放被关押的恐怖分子到国外去。由此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第二天早上才意识到的。我决定,再不做这样的交换,因为释放恐怖分子会助长犯罪气焰,导致恐怖分子寄希望于抓获人质,从而他们的犯罪活动就将不断地继续下去。这个思路在随后的事件中就占了主导地位,包括我们驻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大使馆的人员被绑架时,我们也毫不犹豫地决定,不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联邦议会各党派领导人对此决定都表示支持。

随后,1977 年秋,在遇到汉斯·马丁·施莱耶尔(Hanns Martin Schleyer)被绑架这件事时,这种思路再一次确定了我的方向,尽管我与施莱耶尔很熟,而且我很看重他。那次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希望找到这些犯罪分子藏匿这位企业家协会主席之处。为了拖延时间,我们采用了所有可能的办法。正像人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原本已经到了正确的地方,也就是人质藏匿之处,但是一个可恨的意外影响了我们。对于施莱耶尔的家人来说,保住他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家求助于宪法法院,希望依据基本法强迫联邦政府去满足家庭救人的目的而向恐怖分子妥协。基本法在此所能提供的帮助是极有限的,同样在圣经和哲学中也很难找到好的建议。我们只能借助于理性和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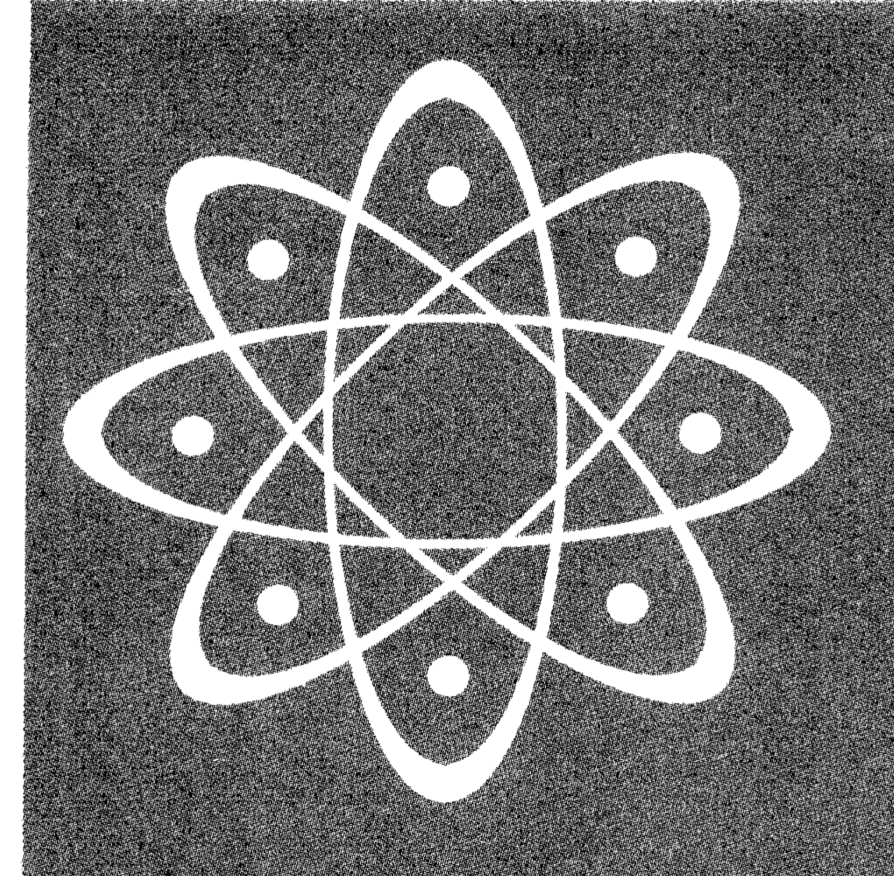
即便是最后,当一伙恐怖主义者帮助红色旅,把一架汉莎航空公司飞机连同乘客、机组人员等约 90 人,劫持到索马里的摩加迪沙(Mogadischu),并以杀害人质要挟时,我的态

度依然是不搞交换。我对此也非常清楚,持此态度将使自己以负罪的心理卷入这场事件中。所以,我决定自己承担所有责任。如果我们的大胆尝试失败,也就是以特殊边防军对劫持在摩加迪沙机场的人质实施解救的办法未能如愿的话,我们就得承担如此多的人死亡的责任,那我就马上宣布辞职。

我们当时在这件事上非常幸运,可我们却未能阻止谋杀汉斯·马丁·施莱耶尔的活动。如果今天,30 年后,重新反思 1977 年秋天的这件事,我不认为我们当时做错了什么事情。尽管我知道,我们对驻斯德哥尔摩的两名外交官以及汉斯·马丁·施莱耶尔的死也负有责任。

一名政治家本能地作出决策,这是常见的。譬如在议会讨论中,这种必要性有可能会作为抨击反对党的一个有效手段。对于政府领导人来说,它也许因为某场突然发生的自然灾害,也可能因为突然出现在某个国际会议上的紧张气氛。无论如何,那种涉及生与死的紧急状况,那种要求一名负责人必须在一瞬间作出决定的状况,总的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主要凭借自己内心的道德本能,或者依据他的"感觉"。当然,面对重大的意外,人们也不会要求政治家们从责任感这个角度作出此或者彼的抉择,而只是事后对他的抉择进行正确或者失误的判断。





Ⅳ　世界所面临的新挑战

核心问题

邓小平1979年领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苏联1989年开始解体，俄国、波兰以及所有的苏联卫星国也都相继对外开放；恐怖分子2001年袭击纽约世贸大楼，随之美国在小布什率领下独自出兵伊拉克。由此以来，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连串的棘手问题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那些老问题，也就是那些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也就只剩下了一个——全球裁军——还算是棘手的。就全世界所拥有的毁灭性军事力量而言，现在可供使用的至少数千倍于二战时所有的，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德国在限制核武器协议上签字，就已迈出了小小的一步。此外，1990年通过《2＋4协议》（德国统一的国际规则）以及《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也使德国从武力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我们因此也很关心，不要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毫无限制地发展军备，我们愿意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关这些问题的决定大权，无疑是掌握在美国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手中，而小权则握在有核武器的国家，如

英、法、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也就只能出现在"常规"武器国家的名单上(德国为什么要推动欧洲常规武装力量限制条约,我随后将谈及)。

虽然由来已久的裁军问题在 20 世纪曾经震动整个世界,但众所周知,它在今天已经不是特别复杂的问题了。如果从伊朗和朝鲜这些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国家这个角度来看,从近东和远东的局势这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绝大部分政府的外交政策重点还集中在冷战时期的问题和任务上,也就是说,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前的那段历史和经验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足够注意。

尽管美、法、英的政治家在 1945 年后就已经很快地意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福利上所面临的危机,而且世界银行和发展援助机构也已就此采取对策;尽管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WTO)或者世界卫生组织(WHO)把这些拥有主权的国家作为平等的成员国予以承认,但它们却依然把自己作为"第三世界"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继续生活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即便是苏联和西方也都一直在尝试着,让一些昨天还是殖民地的国家在政治上独立。事实上,在那些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或者巴西,那些有影响的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他们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也就是触了一个边儿。等到西方,尤其等到美国真正地认识到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发展,那还需要一些时间。而要美国真正地去学习尊重这两个国家,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同样，直到我们真正地理解了，我们欧洲的人口处在萎缩之中，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却在膨胀这个事实，已经花费了许多时间。在过去的100年中，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口数量翻了几番，到20世纪中叶，相对于1900年增加了6倍。我们现在也能感受到，人口朝着欧洲和北美大规模地迁移。遗憾的是，文化和政治上的民族融合这个迫切的问题尚未在欧洲哪个国家得到满意的解决，或者至少还没有看到，有谁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即便是我们德国，情况也是如此。无视现存的种族矛盾，有可能在世界政治中造成影响巨大的冲突元素。

作为在20世纪末才出现的世界性问题，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和技术一体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力量的转化和迁移首当其冲。尽管世界性贸易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或者在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1]的时代就已经出现，可也就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介入世界经济的人数成倍增加，世界性进出口贸易总额迅速提高。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的加速发展，我们同样也要看到，所有新的科学认识、新的发明创造以及新的技术，将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来。不管是心脏移植，还是基因培植、核能动力、新型汽车，或者火箭和卫星，技术的全球化也同样开始了。这种趋势和进程是不可逆

---

①Vasco da Gama(1469—1524)：一位葡萄牙探险家，历史上第一位从欧洲航海到印度的人(1498年)。



转、持续不断的，但出现逆流和抵制也是在所难免。

同样，商品和服务的全球一体化也是不可扭转的。譬如德国现在的出口已经接近社会总产值或者说国民总收入的一半，可它既非联邦政府的安排，也非联邦议会的安排所致，更多的是开放所有边境限制并且消除原来世界上流行的绝大部分限制的结果，尤其是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结果。与此同时，德国企业的成功愿望和成就能力在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德国企业和协会原来对未成熟的，或者恶化了的“生产环境质量”进行抱怨，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实之词，而那种从意识形态上反对我们经济上走向全球一体化者，虽然持的是相反的观点，但也同样不合实际。如果哪一届德国政府试图降低我们国民经济世界一体化的程度，那么大幅度的就业岗位流失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就在所难免了。

对外经济的超高比例使德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巨大影响。早在 70 年代那两次世界性石油价格暴涨中，我已经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这种相互关系及其意义。因为我们完全依赖于进口外国原油，因为石油限用只能在一个极为狭窄的领域进行，所以联邦德国的消费者和德国经济就被迫要支付上升 10 到 15 倍的油价。同样无奈的是，我们的账面出现高额负数，我们的经济增长萎缩，因为在突然之间，我们必须额外地为使用石油而支付高额的费用，所以我们就无力像以往那样有钱去购买其他商品了。

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是我们经济对外依赖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随着时间推移，以美元为计算方式的石油价格继续

攀高，仅仅自70年代初以来的这些年中，就几乎上涨了50倍。近几十年来，油价的上涨并非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推进，而是全球的石油需求量剧增的结果，尤其是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用量猛增。唯有长期、逐步开发新能源，把风力、太阳能以及核能的利用放到首要地位，才能缓解我们对石油的依赖。

其他许多主权国家也面临与德国类似的局面。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尽管可以一如既往地影响或者领导自己国家的社会、经济，控制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国家财政以及税收和支出，但却无法面对世界经济发展而对本国进行保护。即便是卷入世界经济中的成分相对比较小（占国民生产总值8%的出口和14%的进口）的美国，就其国际收入的平衡状况以及经济增长的情况来说，它对外国的依赖也相当大。目前每年国外资金的流入约占美国社会总产值的6%到7%，以此计算，也就意味着，美国每年增加的外国债务大约9000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如果基于某个原因，各国对美国国民经济或者美国政府的信任感发生了动摇，并因此大量地撤回外国资本，那么一场长时间的经济萎缩在美国将不可避免。所以，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霸权国家，也由于对进口外国石油以及外国资本的依赖，相当大程度地卷入世界经济链锁之中。

中国、日本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现在更多的是获得巨额的出口盈余。由于他们积攒了大宗的外汇，尤其是美元，他们无疑也就成了美国信誉力的重要支柱。可事实已经

显示,这些国家正在把手中的一部分美金现钞储备兑换成其他货币,譬如兑换成欧元。他们也可能以此在其他国家购买原料或者工业产品。中国已经开始了这两种做法,而其他外汇储备盈余的国家,随后也将陆续开始。

相对于东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的国际收支高额剩余来说,美国现在的国际收支巨额负数是相当鲜明的反差。市场经济对这种严重不平衡的反应就是,美元贬值以及中国的人民币、日本的日元、俄罗斯的卢布升值,同时也将迫使欧元升值。这种兑换率不平衡的时间拖得越长,投机和兑换率发生问题的危险越大。因为石油绝大部分出产于中东,从伊朗经波斯湾,然后到沙特阿拉伯,因此美国出兵干预伊拉克的强权政治尽管可以理解,但从道德和人权上绝对没有合理性、合法性可言,所以现在也就不必再提了。同时还需看到,持续的军事干预伊拉克有可能影响中东局势的稳定。对世界石油供应、对能源价格、对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兑换率的干预,都有可能引发额外的不平衡和兑换率的风险。

显而易见,无论是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还是对于世界性国际收支以及大宗货币的兑换率,德国无论从方法还是从实力方面,都无能为力,不可能形成一种独立的、强调德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不仅那些为波兰和波罗的海共和国所批评的俄罗斯通过东海进入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在世界能源政策中不能扮演什么举足轻重的角色,就是那些在德国马克时期所积攒下来的、储存在联邦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在世界政治中也不能有多大的砝码。在石油政策上,我们保持与

我们的欧洲合作者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合作;在货币政策上,保持与我们的欧元合作者的合作。只要我们想在某个富有成效的能源政策和富有成效的国内经济政策方面获得支持,那么我们就要围绕这两个方面在欧盟框架下争取分量。

虽然在世界经济中,今天的德国所具有的分量不仅远远超过魏玛共和时期,而且也远远超过了两个德国在那 40 年间任何时期的影响力,但必须明确的是,绝对不可高估它在政治上的分量。这样的尝试已经有过,那就是人们所看到的,一些德国政治家和外交官员对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常驻理事会席位所做的那些——一场毫无希望的努力(一场有成果的努力也许要与扩大成员国相联系!)。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外在的等级标志是不需要的。如果我们试图进入核武器装备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上,那么就可能引发怀疑和不信任。况且,那种在财政上不成比例的会费支出绝非地位标志,到处都愿意收钱,可外交政策绝对不会因此而改变。

保持谨慎态度尤其符合我们的中东和近东政策。如我前面所讲,我们与以色列的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比较棘手。我们在 2003 年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无论从国际法和道德的角度都是合理的,它使我们避免了一场政治上毫无意义的血腥战争。联邦总理施罗德的拒绝参战正好还没有超越德国自由决策的界限,法国政府也宣布拒绝参战,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有利条件。相反,我们当时外交方面在联合国所进行的反美活动却没有人响应,结果只是给我们与这

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留下了阴影(此处所指的更多的是报复心态!)。

在联合国安理会所批准并且随后也参与的军事干预阿富汗问题上,我们从一开始就清楚,打击恐怖分子,要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那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德国的参战无论从国际人权还是从道德方面讲,都是无懈可击的,它符合我们与联盟伙伴的互助协作精神。尽管如此,我从一开始就对德国参战的目的特别怀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怀疑越来越大。派遣军队进入陌生国度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想平平安安、不留后患地撤出来就难了。美国在越南有这一方面的经验,他们今天又再一次有了伊拉克的经历。我们德国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en-Herzegowina)和科索沃(Kosovo)有过这样的经验,而今在阿富汗的情况又类似于此。随着基地组织逃到巴基斯坦,西方又面临着出兵干预的问题。如果伊朗由于传言的核武器试验而受到武力干预,或者说要面临战争的话,我想德国人应该会特别谨慎小心,而且审慎地斟酌。中东是当今世界上最不安定、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我们德国人生活在另外的一个洲,我们对中东的兴趣只是全球性石油需求问题。

相反,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的和平问题是我们的基本利益所在。世界上 1/5 的人信奉伊斯兰教,现在有大约 300 万的穆斯林生活在德国,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此外,还有不断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移民,以及穆斯林移民的高出生率。现在,有 1500 万穆斯林生活在欧洲,还有 2000 万生

活在俄罗斯。在我们这里,穆斯林的融合问题也像在俄罗斯一样,并没有解决好。“文明的冲突”,这是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①]十多年前所呼吁的,今天,人们已经开始重视穆斯林与西方之间冲突的问题了。这样的一场冲突有可能从印度尼西亚或者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起,一直蔓延到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并随之也包括俄罗斯、巴尔干地区以及其他的欧洲大城市。宗教动机、社会革命鼓动以及政治权力目的等因素有可能搅混在一起,一个意外的事件有可能使某种伊斯兰方面的混合情绪迅速地推向膨胀爆炸。这种爆炸也可能由于西欧、美国或者以色列而引发。

把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上的穆斯林移民,或者穆斯林技术移民的历史倒退回去,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是对丹麦、英国、法国,还是对荷兰或德国来说,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审慎、准确地调查、分析,武力干预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是否确实符合我们的利益。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黎巴嫩海岸线到非洲之角,这个链条是够长的了。

在国内政治方面,要使穆斯林公民相应地进入德国学校、进入德国劳动力市场、介入我们的政治,这需要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努力过程。我们的国家、教会和新闻媒体应该以对待天主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态度来对待伊斯兰教问题。在

---

①全名 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

欧盟以及其他的国际机构中，我们应该代表“平等对待”的态度和声音。同时，我们也应该对欧盟理事会、政府领导人以及欧洲议会施加压力，要求对穆斯林敞开大门。让世界认可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我们必须注意到，伊斯兰国家许多地方所出现的恐怖主义并非是伊斯兰教固有的或者天生的缺陷。在基督教历史上，也多次反复出现过战争犯罪和恐怖主义，可也没有人由于中世纪的宗教法庭焚烧异教徒的历史事实，而把这些归为基督教的代表特征。阴险的暴行、谋杀以及绑架人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与宗教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把追捕、判刑归属于国家法制、警察和刑事法庭。如果像小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所做的那样，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动用武力打击恐怖分子，那就可能因此而引发愤怒、怨恨和其他恐怖主义行为。在 21 世纪，西方不可能消灭恐怖主义，西方也许可以更多地使用政治手段对它施加压力，但请务必注意，绝对不要因此而引发与整个穆斯林的冲突，也就是说，方针、措施需不断调整，目的是令恐怖主义得到控制。

最近，一种这样的冲突苗头似乎在蠢蠢欲动，而且仿佛难以避免，以至于让美国觉得，似乎伊斯兰政治和宗教领袖要比高层、重要的西方领导人更重要。可是至今，美国在对待 50 多个伊斯兰国家问题上，尚缺乏一个明确的基本认识，或者说还没有形成设想。美国政治家对于打着伊斯兰烙印的中东地区认识有限，至少伊斯兰国家的地理以及历史对美

国人似乎太遥远了。尤其是面对伊斯兰世界，美国人无权用两种声音讲话：一面一连串地批评中东国家没有民主，不尊重人权，同时却与穆斯林军事独裁者串通一气，并且在沙特阿拉伯，以石油这张支票就把所有一切都给遮盖住了。这也是美国议会的一个特点。

如何面对世界的伊斯兰部分，欧盟也没有什么长远的设想，尽管他们直接面临这个问题，长此以往是非常危险的。围绕如何对待伊斯兰教这个问题，形成一个正面的、合适的、长期的总体战略，这是 21 世纪向我们提出的新任务之一，这一点对于欧洲非常重要，对于俄罗斯也同样。在这个战略中，不仅要考虑到文化因素，也要考虑到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值得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根本上的宗教宽容，这个任务就无法完成。

形成一个包括气候政策在内的长远性环保政策，也同样属于具有重大意义的世界性政策。环保问题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自所能解决的，而更多地属于泛民族、泛国家的全球性任务，它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政治要处理的对象。因为一条跨越国界的河流一旦被污染，那么另一国境内也必然受到污染，而那里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将受到伤害。如果一个国家由于自己的工业以及煤、石油和天然气的燃烧，使大气层受到污染，那么生活在遥远地方的，甚至其他洲的居民也将受到伤害。在现代生活中，这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人类由于工业化、机械动力化以及石油和煤用量的急剧增加，加剧了全球变暖的速度。

理论上有许多可行性办法,可以减缓人为的地球变暖的加速度,可是对已经形成的国际共识《京都协议书》,不仅中国和印度迟迟没有签字,而且美国也拒绝。可正是这三个超级大国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举足轻重。从长远看,人们不可以这么讲:如果大国拒绝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小国就自律,并且自认倒霉吧!巴厘岛的联合国气候会议必须继续增大努力的力度。

在此,世界各国面临一个新挑战,一个 50 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挑战。德国对此能够作出贡献,但如果德国是唯一对此努力的国家,而且只是唱独角戏的话,那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尽管乐于自命为气候政策方面的世界领导,可我要劝告说,还是稍微收敛一些的好;另外我们还得承认,在二氧化碳等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所引起的大气污染方面,我们德国在全球的肇事者名单上位居第六。在水土保护方面,我们德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走在前列,但那些造成大气变暖的主要、关键地区却还没有动作。在这个问题上,唯有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在世界环保政策问题上有足够的分量。

与此同时,也对气候问题提出一种心理警告。科学已经证明,几百万年以来,我们地球表面的气温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知道冰期和坚冰期。在德国也曾经有过特别炎热的时期,如果谁在自己的花园里偶然发现了海贝壳,就说明这地方在那个炎热的时期,肯定是海底世界。即便是个别作家危言耸听,似乎世界气候走向末日,似乎只要我们愿意,就

能避免这场灾难，似乎气候的变化原本就在人类手中，但我们对此绝对要保持头脑清醒。

我们既不能控制地震，也不能控制火山爆发，我们既不能控制一年四季，也无法改变冰期和坚冰期的自然顺序。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面对自然现象及时做好准备，并承受自然变化所带来的一切。人类尤其要对由自身因素所造成的全球变暖采取措施，使其得到缓解和限制。具体讲就是，减少排放到大气中的废气，尤其是二氧化碳和甲烷。这无疑需要大量的技术，譬如风力发电设施，譬如汽车、飞机以及轮船上的低耗油量发动机。在此方面，德国必须也能够作出巨大贡献。

如果我们对这里所介绍的观点做一个总结，那就是：我们已经看到，21 世纪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一些我们在上世纪没有看到，或者准确地说，只是感觉到了的挑战。一份可怕的纪要！德国可以而且必须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因为我们的经济强大，而且有能力为之。但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以 8000 万人口这个数目，我们仅仅是现代人类的百分之一，而且这个比例还要下降。也就只有在同我们的欧洲合作者以及大西洋联盟的合作中，我们的外交活动能力才能有分量。我们希望，欧盟团结一致并形成一个统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从而有一天使其成为现实，尽管这些在目前对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

欧洲有能力自卫吗?

在持续多年的欧洲内战结束之后,于 20 世纪末所达到的欧洲民族融合状态,当属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成就。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洲有如此多的国家能在自愿放弃一些主权的基础上主动地联合起来。在这种联合中,尽管没有哪一个国家放弃了自己的民族和语言,然而一些国家之间的旧仇、怨恨甚至个别国家的自傲却被放弃了。

1946 年,当温斯顿·丘吉尔向法国建议,共同与德国(但是没有英国)建立一个"欧洲联盟国"时,他当时也就是一个站在被战争所摧毁的荒凉废墟上的孤独呼唤者。大约 5 年后,基于法国的建议,欧洲煤炭和钢铁联合会建立。回想起来,这个欧洲煤钢联合是欧洲统一进程中的关键性第一步。正是根据它的思路,诞生了对其他所有产品形成共同市场的设想。在 20 年的进程中,6 个创始成员国学习着协作联合。由于苏联的高度军备化、扩张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所造成的威胁感受,这六国政府——法、意、荷、比、卢、德——携手共同渡过了所有危机,并一步步地建立起了这个共同市场。

逐步融合的原则保证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扩大和发展,

对此,我们首先应该感谢让·莫内(欧洲人应该给他立一个纪念碑!)。70年代时,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10年后,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90年代,瑞典、芬兰和奥地利也加入。对于所有的重要决定,一律实施全票通过的原则,它一方面有助于各方基于所形成的压力而接受妥协、共渡危机;另一方面,随着成员国的增加,这种全票通过的原则似乎变成了一种阻碍。在后来的欧盟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1991年会议上,也许应该修改这个内部游戏规则。我们多年来只有12个成员国,所以希望有一个大规模的扩展。而今有27个欧盟成员国,要在70多个领域内明确地实施全票通过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27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都对70多个领域有一票否决权。

出席马斯特里赫特欧盟会议的政治家们严重地忽视了这一状态和问题,这就导致了极不好的后果:一方面,它深刻影响了欧盟的政治行动力;另一方面,它使得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以及所有的部长联席会议把他们的活动都集中到第二位甚至次要的从属领域,从而形成了漫无边际的官僚主义大泛滥。在2003年,美国政府单方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欧盟的没有政治行动力以戏剧性方式显现得一清二楚:大部分成员国参与这场战争,小部分成员国保持沉默。那个可供欧盟外交部长们没事儿穷侃的"共同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成为一纸空文。即便是2007年欧盟各国领导人在里斯本正式签署《里斯本条约》,也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行动力。世界暂时与27名不同的欧盟外交部长发生关系,当然还有

一名经常更换人选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所以欧盟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谁也不必对欧盟感到害怕。但欧盟也可能在21世纪在某些领域就共同行动形成新的有代表性的要求,可能性比较大的也许是经济领域。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欧盟不会成为世界强权者。

自从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后,也就是自欧盟增加了15个新成员国起,欧盟就陷入持续的危机之中。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时间,但是其方法绝非消除这种全票通过的原则,最好的办法是对这种原则的影响程度做些限制。毋庸置疑,欧元作为共同货币是稳定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家,能在不严重伤及自己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国家从这两个方面解脱出去。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能力把他们的国民经济民族化。"民族经济"的时代对于欧洲人已经成为过去时,相反,欧洲经济联盟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很大的分量,而它的货币欧元也同样如此。

幸运的是,欧盟委员会在成员国从15个发展到27个之前,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就于1992年作出了共同货币的决定,并且确定了其具体的发展进程。要是在今天来作共同货币的决定,那么在许多成员国将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现在,欧元自身的购买力(即它的贬值率)远比其他大货币要稳定。它的对外购买力(即兑换率)远比其他的两种大货币——美元和人民币——要坚挺,比日元、卢布和英镑也要稳定。如果我们仍然使用小民族货币,如法郎、里拉、德国马

克等，那么国际投机基金就有可能对我们的货币进行投机活动。如果在这个共同市场上没有欧元，那危险的货币投机就可能在27国的兑换率改变上做文章。我因此特别自豪，我与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我们的总理任期以及离职后，一起为我们今天的共同货币做了准备工作。

由于现在国际收支结构上的严重不平衡，即东亚和石油、天然气输出国持续的盈余，美国的严重赤字，美元无疑将进一步失却其价值和分量。因为我们同时也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如果对银行、基金以及其他日渐增多的不透明的金融机构缺乏一种有效的监督机构，那么我们就要想到出现全球性金融和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而且它有可能会沉重地打击现实的经济。1929年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五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危机。2007年美国一些房地产市场的暴跌，在美国导致了严重的银行危机，同时也波及英、法、德和瑞士银行。这场金融危机对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打击不小。如果哪里发生了不幸，基金的老总和银行董事们的反应犹如一群羊：一个跑过去、出售、拒绝新借贷，第二个就接着跟上去，随后很快，整个羊群就朝着同一方向跑起来。

置于金融经纪人之下的群众情绪不仅对于全球性互联、交叉、网络化的金融市场是一种巨大的危险，而且对于现实经济也是如此。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的发生，大权在握的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乐于以不断降低利息的方法去吸收更多的流动现金。他们同时还主张对大型基金银行实施抢救，因为担心它们引发多米诺骨牌链式反应。英国

中央银行也步美国后尘,采用同样的原则。这样,那些进行投机的私人金融机构是获救了,可世人却要为此所带来的持续增长的通货膨胀以及兑换率对现实经济的负面影响买单。谁也不能在这个不良发展的灾害面前幸免。

与1914年前或者二战后到70年代末期这些时期相比,现代金融和货币内部结构的易受破坏性,从程度上看更加严重。世界经济在70年代时的衰退只是由于美元的贬值所引发的,而且更多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基于政治动机采取地缘战略,有意识地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所造成的。那时,我和吉斯卡尔·德斯坦共同召集世界主要工业国首脑经济会议,就各国的财政政策进行一番协调性交谈,一场持续性的全球性通货膨胀以及可以预见的后果随之也就可以避免了。现在,人人都试图通过八国峰会的帮助来引导世界经济,这只能是一场黄粱美梦,充其量也就是有助于电视台的广告经济效益。没有中国、印度、巴西、非洲以及中东石油国就根本成不了事,因为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那些最重要的银行所扮演的非正式合作角色,并不能担负起协调国家经济和财政政策的重任。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显然亟须某种有国际性影响的倡议者,而美国根本不能指望,因为一方面美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有限,另一方面他们又靠高额的外国资金流入来补血。所以,欧盟应该肩负这个领导重任。就这样的角色而言,欧盟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它作为进出口大户远比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分量要重,因为欧元所扮演的角色远比人民币和卢布要重。此外,欧

洲——当然也包括德国——对世界经济有效运作的兴趣和要求远比世界强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要大。不可否认,由于内部的程序规则以及官僚主义的影响,欧盟在这一领域内的实际能力是有限的。

作为组织、领导者,我建议,首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该组织是根据美国以美元作为所有各方货币兑换率稳定的挂钩货币这个倡议而在1945年后建立的,但这个功能早已逐渐地丧失了。在以美元作为固定兑换货币方面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负债进行抢救和减缓工作。尽管它们的工作变了,但该组织的专业人士却还在。故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有可能开始一项新的工作:发展和形成一种对世界金融市场进行透明化监督的国际性系统,其中包括对所有它们投资、介入并发生关系的金融机构的透明化监督。此外,在国际性金融和资本市场中,也应像海上和空中交通那样,需要往来和交通安全性的规则。

其他欧洲机构担负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机构的组织、领导也是有可能的。譬如世界上重要的财政部长的定期私人聚会,这也可以作为一个起点。一种非正式的私人经济年会,大约15个重要角色都参加的方式。或者类似的一种,也许是比较受欢迎的方式。千万注意别搞那种画蛇添足的新闻和电视表象,否则就只能弄巧成拙。

现在,我们回到目前欧盟的状态及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休

克这个问题上来。人们都希望借助于《马斯特里赫特协议》和成员国迅速扩展到27个的速度,有效地克服这种停滞状态。至少,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新基础性协议有可能赢得这样的结果。尽管在委员长吉斯卡尔·德斯坦的领导下,欧盟成员国大会在新世纪初就对形成这个原则性基础作了准备,但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错误也在所难免。然而,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依然被排除在外,因为法、英两国不想为了欧盟而放弃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更不想放弃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核武器的独断权。还有,27个成员国没有哪一个愿意放弃自己的外交部和大使。尽管欧盟各国在环保政策、气候政策、发展援助、瘟疫防御和医疗卫生政策等方面可以形成统一行动,但是距离形成一种统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还比较遥远。

如果2007年在里斯本形成欧盟原则协议的尝试未能如愿,并因此而维持那些至今为止所逐渐形成的协议、条款、纪要和说明的话,那也许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也绝对不至于令欧盟走向瓦解。随着时间的延续,成员国之间基于进一步的协作,也许将形成一个核心,这在全体成员国中是完全有可能的。还有令各方都满意的"里斯本协议",也将有助于在不远的将来形成一个有政治行动能力的核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肯定愿意属于这个核心,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由于我们不久前的那段历史以及位于欧洲大陆中部这个不太舒服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对欧洲融合的迫切性远大于绝大部分其他欧盟国家。

假如27个欧盟成员国在融合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并继续保持着这种内部协调的停滞状态，甚至还通过匆忙地继续接收东欧国家，如乌克兰，或者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Armenien），再加上土耳其和其他的非欧洲国家来扩大欧盟，那就极有可能使欧盟退化为一个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数量越大，他们的利益、兴趣和目标的差别和层次性也就越大，从政治上获得协调也就越难，至少在与俄罗斯、美国以及中亚的关系上是如此。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取消彼此之间的海关也许是一个现实的最低目标，在此之外的所有其他追求，只能是一枕黄粱。

对欧盟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也许美国政治阶层中那些有潜意识的霸权和帝国要求者会由衷地欢迎。对欧盟形成这样一种快速扩展，一些美国人早就在施加力量、进行努力。一个富有政治行动力而且强大的欧洲，并不符合美国人关于世界秩序和控制的设想，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维持世界这点事儿，有美国就足矣。早在21世纪初，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就已经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努力，他要从地域战略上把欧盟分化成一个"新"欧洲和一个"老"欧洲。这种尝试现在还处在一种口头说说而已的状态，但也不排除继续往下走的可能。谢天谢地，在美国社会中还有一股不小的力量，他们意识到，美国人与欧洲人之间在文明传统（德国人的说法是：文化）上的共同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不以超级霸权的范畴来对待欧洲人。

在持续多年的冷战时期，把自己当作欧洲的保护者，并

且以他们的领导和指挥机构在北约对西欧诸国进行指挥，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很自然的、没什么可商量的。尽管在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的这种传统思维已经为个别欧洲国家所轻视，但当欧盟内部软弱时，美国肯定希望保障它对欧洲的决定权，至少在北约结构中要维护这种共同的北大西洋军事化外交领导权。

英国政府和绝大部分英国人民也许是正确的：作为生活在岛上的人，目前欧盟的状态及其政治行动力已经可以了，因为对于几代英国人来说，依赖美国人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包括整个欧洲在内的自由贸易区就足够了，至少这对他们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限制。许多东欧人所看中的，恐怕也是类似于此的利益。对于波兰人来说，美国人似乎是作为自由的精神所在，特别是在苏联控制时期。

对于法国人来说，在欧洲融合方面保持停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早在戴高乐、蓬皮杜、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时代，法国人就把欧洲融合与联合德国放在同样的战略地位。欧洲统一的进程几乎都与法国人的倡议密切相关，从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和让·莫内，再到雅克·德洛尔，法国人不断作出贡献。同时，自戴高乐起，法国人与美国和北约保持一定距离，尽管法国当年面对苏联的攻击，向美国和北约求援。在苏联危险解除 20 年后，在对美国以及对北约关系上，法国第一次表现出保持距离的态度。即便是以前法国人所致力的促进欧盟内部融合进程的

努力,在雅克·希拉克的时代也已经找不到痕迹,2005 年更是对欧洲宪法草案的公民表决持反对意见。由此可以想见,即便是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能满足于把欧盟的分量削减到一个自由贸易区的程度,并且也就只在几个无足轻重的机构上做一些修订和改造而已。相反从德国人的利益角度,却希望法国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时参与构成一个合作的欧盟核心的工作。

鉴于自欧盟大量扩展以来在英、法、波兰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中日渐增多的分歧,那些刚刚加入欧盟的成员国有可能在未来的联盟中,带来至今尚未想见到的问题,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围绕未来欧洲安全政策和军事利益的不同考虑,势必也造成分歧。

完全不同于 20 世纪的是,欧洲在 21 世纪初似乎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大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欧洲内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且在我看来,外国对欧洲某个国家的军事威胁也不太可能出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会构成这类危险,今天的俄罗斯与其历史上的角色相比,更多地趋于和平,帝国主义的特色越来越少。而中国从来还没有对谁造成过威胁。美国则是我们绝对强大的联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之争已经消失,中国和印度现在正在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再晚些时候也许巴西和墨西哥也会成为超级大国,但它们无法威胁欧洲。

尽管有些地区还存在着危险的冲突,战争在那里一触即

发,如果欧洲人参与这样的位于欧洲之外的冲突,那么就有可能把某些军事威胁引入欧洲国家。这样的参战——譬如在美国领导下——在未来也不是不可能的,譬如涉及伊拉克或者阿富汗,以及许多所谓的通过国际干预去其他洲创造和平、维持和平等行动。

有可能危及欧洲和平美景的潜在因素,当属当年在南斯拉夫大地上尚未解决的民族问题和宗教冲突,与此有关的还有那些存在于当年苏联国家内部之间可以想见的矛盾。西方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一般性冲突,也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欧洲难免受到牵连。恐怖主义的有些行为已经构成了对欧洲的威胁。

在所有这些相互联系的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在 21 世纪开始的全球性权力结构状态下,我们士兵的任务是什么?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也就是到世界政治大转变时为止,联邦国防军的任务都非常清楚。从二战结束直接进入冷战的过渡以及苏联的扩军,从而在 40 年代末促成了北大西洋联盟,这是必须的。当时,西方由于在数量上的明显劣势,对苏联的核"报复"性攻击感到害怕。当人们考虑要从数量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平衡时,西方战胜国要求西德对参与防卫作些贡献,所以建立国防军的事情就被提出来。联邦德国被北大西洋联盟所接收,军队置于北约指挥机构的领导之下。在东西方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冲突白热化之后,西方进一步认识到,和平不会受到核报复的威胁,也就是不会受到所谓的世界核大战的威胁,这更多的是通过军备实力相

当来保障。

在这个战略大转移问题上，西德的政治阶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早在1959年，我就对核“报复”恐吓的构思原则提出了怀疑。后来，我又致力于“平衡战略”（这就是我1969年出版的书的题目）。平衡意味着：不仅常规武器要通过一个协议的装备限制而保持均衡，核武器也要如此。

包括苏联的领导人也都持这种平衡的观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后来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中导条约》等，都是双方共同为平衡军备战略而努力的成果。尽管有时还发生冲突，但它从总体上保障了东西方之间的和平。直到进入90年代，西方的防卫努力保持在强有力的北约军事组织中还是必要的，联邦国防军也因此是必要的。

今天，俄罗斯成了当年咄咄逼人的苏联霸权的继承人，但它既没有对美国形成威胁，也没有对欧洲显示出威胁，即便是一些美国人和许多波兰人总喜欢那么认为。当年强大的华沙条约军事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俄罗斯只是一个要求予以尊重的世界强权国家，但绝对不是可以远征的再建军事强国。而西方却没有多大的改变，北约组织及其理事会依然在有效地运转，甚至通过吸收东欧的一些国家参加，进而把势力范围推到了俄罗斯的边境。它虽然对俄罗斯没有什么危险，但俄罗斯政府面对此情此景不可能没有想法。

整个北约，包括它的将军、外交官和其他官员们都致力于把这个联盟为自己所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提到一个“新北约”的说法。那么要问，21世纪北约的任务究竟应该

是什么？从美国方面看，如果北约理事会及其秘书长在未来继续作为美国世界政治的一个工具，那么就可以用来监视欧盟各成员国，这就挺有实用价值的。欧盟并非这个联盟的统一成员国，而是欧盟各国作为自己国家的代表单个地加入北约的，所以各国所发出的也不是统一的声音，这就使美国比较容易维持自己的超级霸权。在美国试图把北约变成自己的世界秩序维持部队这一点上，我们至少不应该去帮忙。

从欧洲人的角度上，美国世界政治战略中一些思路越来越令人怀疑。2002 年官方的美国战略说明竟然提出，进行预防性战争，甚至先发制人的战争，令人无法理解。随着小布什要进军伊拉克，这种不可理解性在不断地增加。当时，欧盟成员国和北约成员国分裂成两个阵营，而且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出现，尤其是有不少的欧洲国家更乐于对美国的地域战略性决定助一臂之力。即便是北约这个组织机构越来越多地失却其在世界政治中的意义，但北约这个联盟还会保持。对德国人来说，北约失却其意义不会带来战略上的问题，因为某种对我们国家的军事进攻或者武力威胁已经不可能了。

在 20 世纪末的 10 年中，开始形成了一种对主权国家(或者解体国家中的地区)中的内战进行国际武力干预的趋势。这一发展无疑将对德国军队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我们未来也将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这种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绝大部分是以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为基础，德国自己的部队也多次参加了这样的行动。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地区，我们参加了出于国际人权保护而进行的武装干预。可以看

出，而且未来很可能遇到的是，这样的干预，即便是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为依据，也绝非仅仅出于道德和人性的动机，其中依然有国家权力利益和美国全球驻军意识的作用。

同样，不参与者也大多是顾及自己民族、国家利益。如果说前十多年我们的联邦议会和新闻媒体中还围绕着防御战略和策略问题经历了一些大讨论，虽然很乏味但还算得上思想深刻，那么自 1990 年以来，就这些基本的原则问题，尤其是就德国参与干预应该依据的原则问题，从未认真地讨论过。在冷战时期，保护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士兵的唯一任务。绝大部分德国人明白这个任务，而且对此坚定不移。如果今天的德国政治家就德国的加入干预行列以及德国军队派往外国进行论证，说明我们何以要必须“承担责任”，而且对现代联邦军任务没有明确可信的佐证的话，那就很可能酿成祸害，这与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情况一样。在对外政策上，我们可能没有危机而卷入到许多异国他乡的冲突中去。在对内政策上，如果我们的士兵被动地卷入到大规模流血的战争中去，联邦军对保家卫国的目的和意义就可能失却信任。如果参与人道主义的武装干涉确实应该作为国防军的主要任务，那么就对我们现在几近极限的军队提出了一个更大程度、更广范围上的重组问题，其中包括对军队的训练、教育和装备(而且现在的兵役制度根本无法满足适者生存的征兵要求)。不同于此的是，我们要更保守一些，也就是开展一场有关联邦军未来任务定义的基本讨论，这也是我所主张的原则。

在这场大讨论中，我们潜意识中既不能忽略对联合国宪章的义务，也不能忘记“2＋4 协议”对我们军事力量使用的限制条款；即不能忽略欧洲常规武器限制协议，也不能忘记不介入主权国家内部问题的国际人权原则。在未来打击全球性恐怖主义威胁的活动中，德国的行动也不能违反国际人权。恐怖主义不能用武力方式消灭，只能通过令人信服的、明智的方式，逐渐地感化、影响来根除。德国对此有很大的兴趣，我们也能够在这一方面发挥正面的作用。由此也许会形成与美国的分离，但这种与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统一意见也许是面对美国所需要的。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一种欧盟的共同态度并非是绝对不可能的。

西方的帅印在美国手中

我想在此就一个应该避免的误会，即德美关系做一些基本的说明。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国内出现了对他们现任政府的一场比较严重的信任危机。我相信，尽管需要一些时间，但这场信任危机将会随着美国内外政策的改变而消除。自从有人类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一贯正确的领导者还没有出现过。没人会因为埃及人或者希腊人或者罗马人那遥远历史上的污点而不钦佩、不尊重这些民族和国家，同样，也不会有人因为小布什作为领导人的错误决策而对这个国家、民族失却钦佩和喜欢。尤其是我们德国人，一直怀着真诚感谢之情保持着这样的记忆：是美国人把我们从希特勒的残暴统治下解救出来。同时，我们还记着 1945 年以来从美国人那里所获得的所有帮助和支持。我们德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围绕着 1990 年两个德国的统一，美国人所给予的决定性的帮助。

自 1950 年以来，我已经上百次去美国访问、参加会谈，我相信自己对美国人非常了解。美国人的大度、民主本能、内心民主政治的原则性以及他们的天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基于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旅行经历,我明白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俄罗斯以及中国,绝大部分人对美国都有类似于我的这个看法。许多国家也正是因此而紧跟美国,而其他的也因此而担心与这些国家的冲突。尽管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时不时地与美国有观点分歧和利益冲突——甚至包括英国在内,但在这种冲突中,欧洲人至今也没有忘记他们文化上的近亲以及与美国人的血缘关系。因此,我赞成在未来继续保持这种跨大西洋的联系。

尽管与美国在未来还会不断出现新的冲突,但这样的冲突(这种冲突我在前面已经谈及,并且在此还想强调)非常类似于在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互利益冲突。一方是五个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另一方是所有在不扩散核武器协议上签字并放弃核武器的国家。放弃核武器的国家有权要求这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销毁他们的核武器。在不扩散核武器协议的第六条就针对这五国写到:"明确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就结束核军备竞赛以及销毁核武器的有效措施进行商谈。"

在不遵守他们于 1968 年所签署的这个协议、不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方面,最严重的是美国和苏联,其次就是中、法、英三国。事实上,所有五国对它们所承诺的削减核武器的责任都保持沉默。美苏尽管把它们所拥有的有效核武器数量减少了,但此前它们大量增加了同样的核武器。尽管它们削减了运载导弹的能力,但它们各自仍然还拥有几千枚核弹头。为了不束缚自己设置反导弹系统的手脚,以免其他国

家运载导弹拦截他们的弹头，美国甚至还宣布，解除反弹道导弹系统协议。如果美国把这种防御体系建到了俄罗斯的边境，也就是安装在波兰和捷克，那就无疑会造成与俄罗斯关系的紧张化，势必在核战争优势方面挑起某种技术上的装备竞赛。欧洲的北约伙伴对双方都没有兴趣，至少德国如此。在核武器方面，尽管美国政治阶层所走的是一条连自己也目标不清的政治路线，但他们所追求的，似乎是一种绝对超越所有其他国家的目标。鉴于不够强大的经济实力，俄罗斯领导人也就只能小声说说而已。

自 1968 年以来，这五个核武器大国没有兑现自己在裁减核武器方面的诺言，相反却把它们在核武器方面的总能量以及运载武器从技术上进行了持续的改进和现代化，所以其他的国家也就接着发展核武器。这五个老牌核武器国家也必须接纳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而这三家还没有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相反，就朝鲜解除核武器不扩散协议，美国以制裁和威胁予以回答。与此同时，对于试图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美国也予以威胁，尽管伊朗政府并没有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就是说，他们仍置于有关机构和条约的监督之下。无论在朝鲜还是在伊朗问题上，人们也许都应该想到，在不久的几十年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绝不仅只是 8 个，而可能是 12 个或者更多，因为许多国家早就已经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事实上，那五个最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自己就不能保持不扩散，他们不可能真正地阻止核武器的扩散，更不能阻止

其他核武器国家的出现。随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增长，这个危险程度就会加大：无论是有意识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谁也无法禁止），还是出了差错，或者是由于监督不够，也许某一天，某个国家就真的点响核弹头。有助于防止这种危险的有效方法也许是，这些老牌的核武器拥有国不断地对自己的核武器和运载系统进行技术鉴定，以保证它们绝不出意外，此外还要使新型核武器置于被限制的影响之下（最低核影响）。

目前世界上的2万枚在役核弹头和3万枚废弃核弹头，其中的一些监控权就握在它们的政府手中。万一它们落入不该拥有者手中该怎么办？这也是令人担忧的危险。恐怖分子不需要把导弹作为运载体，他只要有一个放在港口或者机场的集装箱，这就足矣。这种令所有人感受到的威胁，未必一定是通过核教训的威胁（同样未必是通过反恐怖的歇斯底里）。

在21世纪，这个世界就军备限制、核武器控制以及销毁核武器问题需要一个原则性新定义，德国对此特别感兴趣。同时由于我们也参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在第六条规定上的特殊动议，所以我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可以考虑的是，为强化这一方面的力量去寻求支持，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日本、意大利、波兰和其他没有核武器的大国，都可能与德国一起，共同向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最终履行自己在不扩散协议上的义务和责任。可以肯定，这样的要求首先会遭到美国的拒绝。但如果仍然是

毫无结果的话，这些基于协议而放弃核武器的国家所处的地位就逐渐下滑，那么他们也就会因此而自己去进行核试验。

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有特权的国家和放弃了此特权的国家，这种现实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如果美国、俄罗斯和其他的特权国家在有常规武器的情况下，另外还拥有核武器和反导弹系统，那为什么要让其他的武装力量——比较小的国家放弃核武器呢？

即便是那些通过不扩散协议拥有特权的国家只是承诺，他们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那这也算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可是至今为止，唯有中国表示，他们绝不最先使用核武器。一个这样的核武器拥有国的协议，也就是不最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会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尽管事实与否仍然是不确定的。

毫无疑问，美国限制核武器或者仅仅限制核武器使用目的的提议，会富有成就的。遗憾的是，目前那种眼观全球的战略思想家——以昔日外交家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或者杜鲁门(Truman)和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为代表的思想家——在美国看不见了。过去的十多年中，在美国政治阶层中，帝国主义的态度占了上风，它取代了昔日美国的历史传统，不仅淹没了美国的孤立主义，也覆盖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所意味着的泛国际主义。早在克林顿时期，就有了轰炸贝尔格莱德的行为；在小布什时期，又开始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所有这

些都明显地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美国外交策略的三个传统——孤立主义、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在200年的历史中多次被分离开来。在美国的驱动下，北约成员国正在向乌克兰以及格鲁吉亚、向着高加索南部推进，如果法国和德国今天尝试着延缓其推进的步伐，肯定会寄希望于未来的美国总统能够放弃此举。因为这无益于西方的安全利益，相反更多的是在刺激俄罗斯政府，激发新的紧张局势。

美国究竟还要等多久才会修正现在的这种扩展主义战略？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政治的重心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要从对外政治转向国内政治。21世纪中叶，非洲裔美国人以及西班牙裔美国人将在美国选民中拥有一个决定性的分量，因为他们是社会下层的广大群体，所以他们对社会平等以及社会安全方面的要求，远比其他美国人对世界霸主的要求更为迫切。从长远看，仅仅这一条就会使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得到修订。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缺乏政治行动力的欧洲人也就只能为超级大国美国做些补充，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那些很有自信心的政府，如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和印度，也将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就其长远性而言，借助于北约帮助来维护美国独自霸权的情况，将受到制约。

首先，这也许是迈向稳定和人性方向的重要一步，那就是，要把签署一份全球性限制武器出口，尤其是禁止所谓的小型武器（冲锋枪、轻武器、手榴弹和地雷）国际性扩散的协议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每年在地区性战争，譬如因起义、内战以及恐怖袭击等而死亡的人中，死于进口小型武器的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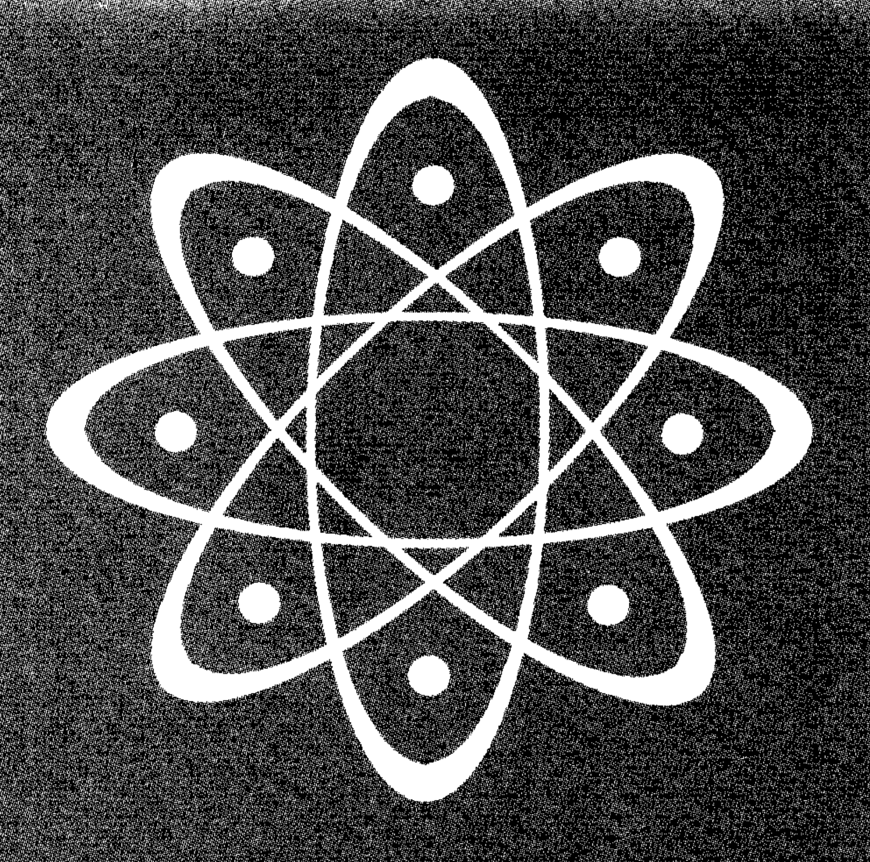
多数。德国在此应该做个好榜样。我们的国民经济和国际收支并不是靠武器出口。至少可以期待着，我们确定正确的方针对武器出口予以严格控制。不过我们目前的武器出口涉及面还比较宽，因为在两德统一后，我们把大量多余的武器销往国外，所以德国甚至成为世界第三大武器出口国。

至今为止，那些活跃在近东、中东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恐怖分子，只有小型武器和爆炸性武器。如果那些受到袭击的民族和国家仍然认为，只能借助于战争并通过军事方式才能打击、制止恐怖分子，那么他们只能是把暴力的螺旋又拧紧一些。多少年以来，近东地区所发生的那些令人心悸的例子，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打击与报复之间不断反复的连锁反应。

我非常希望，我的国家也能够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获得成功，而这也是我们在国内的实践和终极目标之一。因此，我在苏联扩张威胁的几十年中，致力于东西方的军备平衡以及双边的军备限制，但我并非和平主义者，我清楚地看到近在眼前的、令和平受到威胁的其他危机。尤其是在美国、近东和远东，也包括个别亚洲国家。我看到了军国主义观念的增长，它导致了危险的军备计划。我们德国人千万不要为任何歇斯底里所感染。

维持和保护与美国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我们的利益。在此，我们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但是，与一个把世界各国分为好的和“无赖的”两分法、与一个一般化的“用

战争打击恐怖主义"的思想、与坚持实施武力威胁和军备竞赛策略的国家,我们必须保持距离。德国不是世界强权,我们也不想成为世界强权,就连欧盟也不想成为世界强权。因此,如果在其他洲发生了冲突,我们德国就应该明确地克制自己,更不要搞什么"文明的冲突"或者"神圣的战争"宣传。我们的领域不是世界政治,我们的外交政策区域在欧洲。



V　德国必须改变自己

老结构与新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德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极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之所以说“极其紧密”,就在于它与整个世界经济的这种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远比其他工业国家要大得多。比较而言,其强度是美国的五倍,是日本的三倍,远远大于中国。因为绝大部分人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就容易为那些卖“万能药”的社会舆论所误导。看看这些简单的反对口号就一目了然:“反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抵制中国人的工资毒害”、“抵制福利消减”、“反对核电厂”、“抵制石油垄断企业集团”、“抵制泛国际”。因为我把这种普遍心理看做有害的,所以准备在本章中,尝试着笼统总结并介绍一下我在政治生涯中所获得的经济和政治观点。幸运的是,不同的职务和工作,使我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去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而这样的机会并非是所有政治家都有的,或者愿意寻找的。

任何想进入政治领域的人,都应该先学一门职业并先在这个行业中干一段时间。他应该把宪法内容消化在心中;他应该了解德国史以及德国那些特别重要的邻国史;他应该至少在一个专业领域能够成为专家。有关这一方面的知识和

能力，我在本书的开头就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基本前提条件作了介绍。其实，在那里也应同时把一定的经济理解力作为基本前提条件。但我的经验是，这个题目对于绝大部分政治家的难易程度与其他人并没有太大区别，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强调。对于绝大部分政治家来说，经济中那些相互交织、影响的关系是很难看透的，即便他们从政的时间很长。经济是错综复杂的，而认识和理解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则更为艰难。谈到对经济缺乏了解，这不仅是一般政治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连一些国家总统、政府首脑，甚至是有些经济领导人也都有此问题。许多人是基于他们的兴趣、希望以及对自己判断力的自信而工作在这个领域的，但要真正地处理政务，他们依然离不开专业顾问这个拐杖。

几乎所有的社会舆论和公开发表的观点，通常都把它们的注意力和批评集中于个别的经济问题，集中在某个孤立的经济领域或者具体企业的某个问题上，而那些相互关联以及彼此依存的复杂关系却大部分都被忽略。尤其在本国经济发展对其他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这个问题上，大部分政治家都置若罔闻，尽管有关的文章和介绍在专业性刊物中比比皆是，可它们也就只有那些专业人士能明白。

相对而言，政治家们最容易看见的恐怕是财政这一部分，可是却不太乐于了解国家财政与社会总产值以及公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这里也有个自然本能问题：政治家们通常所能看到的，总是自己专业领域的财政情况。从事福利政策事务的、从事交通政策事务的、从事国防政策

事务的、从事科技和教育事务的议员和部长们，他们通常都希望为自己所致力的那个专业领域多搞到一些钱。在绝大部分的政府中，唯有财政部长去理智地把握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的极限状况。一旦政府首脑不能给他以支持，那么财政部长所面临的常常也就只有这么两种选择：要么让国家高赤字，要么辞职。故此，从 1945 年建国到 2008 年期间，联邦德国所任命的财政部长数目为何是总理的两倍，这个谜底也就不难揭开了。

对于大部分政治家来说，税收政策领域不像财政那么大众化，尤其是在呼吁降低收入税和工资税这个问题上。其特点就是，只强调减税有可能在今后带来经济的增长幅度，从而也将会提高国家的收入，但却不提降低税收就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个事实。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乔治·W. 布什属于这方面的大师，可他们的每次杰作后果无一例外的都是美国财政赤字的再次剧增。在 1990 年后，赫尔穆特·科尔也尝试着以不提高税收的方法去保证两德在经济上统一，其结果与两位美国总统所获得的大同小异。

比收入税和工资税的税率问题稍微复杂一些的是税收法律中的特殊优惠和例外规则。政治家们对这一方面的题目缺乏谈论的兴趣，因为这对公众舆论影响力有限。在今天的德国，引入、增加特殊规则真是大泛滥，以至于离开了专业税收顾问，没有哪一个手工技师或者零售商能把他们的税收报表处理了。即便是一名职工，没有税务人员的帮助，也很

少有人能独立完成自己的年终税务平衡报表。收入税法的文字(不包括注释、说明)在2007年时已经高达454页！那些专业政治家和专业协会的说客们对此状态是很满意了,但有些税收政策的目的却与个别、具体的财政项目的目的相矛盾。譬如,当欧盟农业政治家试图从欧盟财政中给烟草种植争取补助时,卫生部长们却在想方设法要对烟草工业实施公告禁止,而财政部长们则在绞尽脑汁提高烟草税。

简化税法在社会、国民经济以及国家财政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此真正有所了解的政治家并不多(原来的司法院大法官保罗·凯希豪夫不属于此列)。举个例子来说：在2001年,财政部长汉斯·艾歇尔(Hans Eichel)推行企业所得税改革,目的是改善德国的企业生存环境,但其直接影响就是:把整个国家一年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全给免掉了。对德国税法来说,一个富有说服力的删减尽管是当务之急,可一定要一步步稳扎稳打地往前走,以便把难以预计的风险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

在整个经济政策方面,党派政治家最感兴趣的就是福利政策。这是一个分配如何用钱的领域,所以也是争取选民声音的重要地方。这个领域囊括了从国家养老金、失业金、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子女补贴费一直到单身母亲的住房补贴和幼儿园补助等内容,所涉及的也是国家财政单项支出中的最大项目。在1957年把国家养老金调整为随工资提高前,国家财政的39%归劳动和福利部部长支配。尽管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现在已经增长了16倍(从当年的160亿欧元上升

到现在的2600亿欧元),可是劳动和福利部部长所支配部分的比例却依然继续上涨,到现在已经达到51%!在此不仅表现出了德国议会日益增长的维护社会福利的信心,但同时也有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支出而不断增加的社会负担问题。

在所有社会福利政策和税收政策的讨论中,世界经济因素以及对外经济的影响在德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常被忽略。事实上,1966—1967年那场使增长中断了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的德国萎缩,原本是可以通过调整我们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到克服的,然而这场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高失业率却导致了艾哈德政府的垮台和新一届大联合政府的组建。自60年代末,所有的起伏摇摆以及德国经济萎缩的盖子,不仅都通过出口经济而揭开了,而且国内结构的强化使这些问题由此一成不变了。

这一点在70年代初还看得不太明确。1972年初我所领导的委员会还提交了一份关于1972—1985年《经济与政策指导纲要草案》,对国内经济做了一个全面预测。可先是在1973年,随之又在1979—1980年,两次出现世界经济停滞,我们所有的发展前提条件全都毁了。一方面,美国为了使美元获得运作上的自由(实际上也就是贬值),于1972年撤销了自1945年以来在世界运行的固定货币兑换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另一方面,由于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斋月战争、十月战争),石油出口国家有意识地减少石油出口,从而引发了油价飙升。

欧洲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大量买入美金来维持美元兑换率，这实际上就是被迫增大欧洲货币发行量，并由此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当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9年再次提高原油价格时，引发了全球性的燃油、煤油、汽油和柴油价格暴涨和世界经济滑坡。随之，美元贬值而形成的世界通货膨胀与石油价格暴涨一起相互影响和作用，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而德国也就被拖下了水。1972—1985年的"指导纲要"中预计增长率为4.5%到5%，而事实上低于2.5%，可是联邦德国的失业率从1973年的1.2%却上升到1985年的9.3%。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德国劳动力市场僵化、结构板结阻碍了发展，由世界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战后两个德国的经济统一，使1990年以后的失业率又创新高，因为制定政治和经济决策时并没有注意到劳动力市场上所面临的问题。

在我出任联邦总理时，滑坡的经济发展形势使我在1974年就已经意识到：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必须收缩战线，致力于最重要的项目，绝不能增加其他大型开支。那时，我明白了经济因素的巨大作用，而且令人感到欣慰的是，70年代德国的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的水平至少能够控制在略微低于西欧其他大国的程度。同时，这个"指导纲要"的影响也基本上平静地从公众意识中给消除掉了，唯有教育和科技超比例的开支在政治阶层中作为必要的要求而保持着，可后来的政府在实践中却也无法兑现。

尽管如今司空见惯的名词"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当时还

闻所未闻,但在1973年时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对于一个深深卷入世界经济中的国家来说,纯粹的民族经济政策不会取得太多效益。无论如何,一种接受“对外经济同样重要”的观点已开始逐渐增强。要想保持相对稳定的货币兑换率和平衡的国际收支(准确地讲:成就能力平衡),就需要更大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的支撑。

这方面认识的逐渐提高集中表现在这一点: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对欧洲各国的国民经济至关重要。正是这种思想促使我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75年夏季,提出了定期召开世界重要的工业国家经济峰会的建议,并且在1979年开始筹建欧洲货币体系。

在开始的10年中,每年的经济峰会多少还发挥了一些作用,它使当时七国的国民经济免于遭受因国际政治对抗和通货膨胀而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七国峰会也许对美国的自我中心强制计划还能进行更深层次的自卫,尤其是当德国和日本通过国家高额支出,通过国家高赤字支持形成了一个世界性市场需求增加的态势,并构成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时。另一方面,尽管世界经济峰会在这10年的发展中有作秀的倾向,但是我们的欧洲货币体系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形成了西欧15国共同的欧元货币。由此之后,那种在15国之间的货币贬值竞争就再也没有了。

在今后的10年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全球占绝对优势的美元将一步步失去其影响力。持这种观点的绝非我一人。有关美元影响逐渐下降和欧元影响逐渐增强的观

点，我在 2003 年就与我的朋友——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谈论过。朱镕基也提到，他在自己总理任期的最后一年里，也曾就美元的下降趋势建议中国中央银行，在中国的外币储备中逐渐加大欧元部分。中国贸易的持续盈余和中央银行超过 160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中央银行拥有了长期影响美元兑换率的因素。譬如，在 2006 年末，一家中国国家企业集团就开始把他们从伊朗进口石油的付款方式由原来的美元基本上变成了欧元。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把外汇储备用于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私有经济投资，以便保证自己的原料进口。

随着美元和欧元兑换率的变化发展，中国的人民币将在这个进程中变成最重要的货币三角——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之中的一角。由此要形成华盛顿的美国中央银行、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和北京的中国中央银行的合作，以及这三家银行共同委托的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督的国家机构。实现这样的合作，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无论如何都可以这么认为，不仅欧洲共同市场将持续下去，而且欧元这个货币也将继续保持。这对于德国来说，一方面意味着把自己融合在欧洲联盟中；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德国永远告别了"民族经济"。只要所有的雇员和企业主自由地呆在欧洲共同市场中，那么不仅民族化形式的经济秩序很难继续保持，而且民族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福利模式也将改变。但必须看到，在这个共同市场内的过度快速扩展，有可能对欧盟境内雇工的自由流动产生某种限制。

如果我们德国人对未来的经济感到担心的话，那绝大部分就在于担心工业领域的工作岗位，譬如西门子、拜仁、奔驰、蒂森克虏伯、大众、博世或者空中客车等这类生产型企业生产岗位的减少。实际上，生产型企业（包括农业经济在内）所创造的产值在整个统计数中还不足30％，而70％的价值是靠服务行业创造的。

服务行业所创造的价值将由诸如汉莎航空公司、德国铁路，或者手工维修行业、地方储蓄银行、地方医疗保险、街道清洁、诊所或者律师事务所、零售商、国防军的士兵或者警察等带来。德国绝大部分的就业人员是靠提供不同方式的服务来挣钱，而并非靠冶炼、安装汽车或者种庄稼。自从联邦德国建立以来，生产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服务行业更是成倍扩大。50年前，服务行业所带来的经济成就不足社会总产值的36％，至今它已经翻了一番，而且还将继续增大。这个转变过程是一个成熟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尽管它被人们以错误的且忧心忡忡的“非工业化”概念所涂抹。在这个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美国、英国，还有丹麦等国家已经远远先于德国迈出了一大步。

社会产值（以及收入）向服务行业的转移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生产型企业提高生产力依赖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因此对于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所需要的工人数量却不断减少。转移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把对产品的需求逐渐地转移到对服务的需要上，没有人可以同时开两辆汽车，但人们对业余和空闲时间的享受却增加

了。越来越多的人去旅行,而且也能够承受得起(仅仅每年飞往马略尔卡岛的德国人就达 400 万人次,而且在那里所需要的是西班牙的服务行业)。我们这个人口年龄老化程度不断增加的社会无疑也将使这个过程加速。

这种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行业的转化是国家自身的原因,它与外国竞争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没有太大关系,它更多的是我们富裕生活水平提高的直接结果。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结果:如果某些政治家还在固守着工业化之美梦,如果我们 400 万失业者都幻想去生产型行业工作,尽管现实中存在的服务性行业岗位越来越多,那么这就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老化和衰退催生的变革

德国有 8200 万人口，其中有 4000 万就业者。这些就业人员有的是全职工作，有的是半个或者少半个位子，也有的是独立经营。绝大部分的就业人员作为雇员处在一种社会保险性工作关系中，其余那 4000 多万人靠社会福利成果生活，也就是靠那些不足半数的就业人员（以及自己家庭或者邻里那些义务贡献）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就业人员的比例显然不到整个国家人口的 50%。大约 2100 万居民获取他们的法定养老金，这个数目约为全国人口的 25%，而 1967 年时的比例约为 10%。现今，大约 600 万人领取失业金或者社会救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失业者的数量在减退，有时有所浮动）。总体上讲，在德国，大约 2700 万人作为国家社会福利成果的获得者，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不缴纳工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费。

任何人看到我们社会的这种持续老化的状态，读到面前的这些数字，都会立刻对未来获得两个基本的认识：一是，如果想使国家的财政能力得到保障，并以此而使福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长期获得保证，就必须把失业大军消化到就业人员

队伍中去;二是,必须对高福利的社会需求和发展趋势进行减速和调整。高失业率和高养老金比例与社会的低就业率不协调。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那么这个福利国家就会陷入严重危机。大约在80年代末期,我们开始发现了这个问题,可自从两德1990年统一以来,这个问题却又被搁置了起来。在1990年,我们满怀信心地把基本法第20条传遍德国:"联邦德国是一个民主和社会福利国家。"事实上,我们由此也把这个福利国家推到了更危险的境地。

在欧洲诸国中,就业比例低、未来的富裕生活缺乏一个有足够财政来源的健康基础,这种情形并非德国特色,但这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丝毫安慰。在我们周围就有一些小国家的正面例子,尤其是像丹麦、荷兰、奥地利,他们就不错。尽管东欧中部有一些国家还不如我们,但这也不能作为我们自我安慰的理由。

事实上,在欧洲设计并流传起来的福利性国家这个思路,当属欧洲人在担惊受怕的20世纪为人类所带来的最大的文化贡献。在绝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对社会福利的要求已经与法律联系在一起。在德国,社会福利包括了多方面的社会保险内容:子女生活补贴、抚养费、住房补助、社会救济、助学贷款、子女出生时期的父母补助、失业金和寻找工作的基本保险、医疗保险、阵亡抚恤、护理保险、养老金、养老补助、伤残人的补助等。在一百年前也就只有俾斯麦提出的老、残保险,此外什么也没有。从那时起,我们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建立起了这样的福利国家。一些欧洲之外的国家也犹豫不

决地效仿我们的做法，而欧洲的国民们也在期盼着他们的政府把至今所执行的社会福利政策继续下去。尽管所有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尽管社会人口严重老化、人的寿命延长，但绝大部分人仍然把眼前的社会福利看做理所应当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高喊着要撤掉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但对他们自己也许是一种例外，因为他们也希望保持这些。

如果我们在德国无法解决大规模的失业问题（这个问题在东德尤其严重），那么我们就无法继续维持现有的社会福利国家，甚至还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大批选民将放弃民主党派。而那些所谓的平民政治家却以更多的社会福利为香饵，最终将危及这个福利国家的存在。无论如何，减少高失业率的问题必须被放到首位，然后才能谈到其他改革。只要想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岗位，那么更多的半个岗位或者推迟退休年龄的改革也就毫无意义，因为根本就没有创造出新的劳动岗位。

就创造新的劳动岗位来说，2003 年前联邦总理施罗德所提出的“2010 年改革纲要”迈出第一步。尽管来得很晚，但总算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尽管具体项目的实施还不够，但有些改革已初见成效。可那种法律化的、具有共同约束力的统一的工资等级制度仍然有效；企业职工委员会仍然无权与企业负责人签署个人工资和工作时间合同；行业工会强制性仍然合法；劳动岗位基于高要求而不予以安排的规则仍然存在；仍然还有许多人靠失业金或者社会救济（现在人们通常使用“哈尔茨四”这个词）和打黑工生活得挺不错，

而且黑工收入大约占到国民收入的15%左右。

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是过于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却更多地受制于劳资规定，也就是存在着带有许多限制规则的非官方权威。我们说的虽然是市场，可事实上这个市场的重要部分却为内心相互敌视的垄断者所控制。权力巨大的两大垄断者——企业家协会和工会——决定着基本劳工协定和工资标准，而且不太考虑这对社会和国家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尽管恰恰是国家通过官方规定的“共同约束力”使这对立的两方变成强制卡特尔(这种在手工业协会中依法强制会员认可协会为工资协议方的做法，是借鉴德国中世纪的做法，但只是强制卡特尔的一种纯粹形式)。工资等级自治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是一种国家不卷入工资确定的原则，可由此却使工会和企业家协会等私人机构在德国变成了国家化的特权官僚机构。

也许唯有大幅度地减少劳动力市场的规则，才有可能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补救，所以忍痛割爱的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企业领导层和职工委员会必须获得决定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的权力；那种介于非官方的企业家协会卡特尔和雇工协会卡特尔之间的共同约束力必须取缔；解雇保护法的使用要受到严格限制；一个健康的失业者，如果不接受所分配给他的工作，那么就应相应地减少他所得的失业金数量；失业金II(失业救济金与社会救济金之合并)无权多年持续提高，要让它的数额与最低工资线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使申请者对接受劳动岗位产生一点儿兴趣。

这些步子中没有哪一个是受欢迎的。早在90年代,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些建议时,就已经受到责备。有些责备来自工会,也有些来自极端左派和右派。一些工会组织以及某些大型企业家协会的权力现在发展得太大了,以至于他们能够从两端一起用力,促使许多年纪大的人提前退休,从而就把扶养这些人的任务转嫁给了国家。工会组织和企业家协会一起滥用自己的权力,其结果的一部分转化成就业人员的负担,而一部分转化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可即便如此,立法者却对他们的滥用职权熟视无睹。

松动对德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禁锢,使它摆脱那些陈旧规定的束缚,这对于社会民主党是十分困难的,对于基民盟和基社盟姐妹党的福利委员会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可是,若继续固守劳动法中的那些应该放弃的东西,那么最终的结果也就只是维护高失业率。若想继续推行最低工资制度法律,那就等于强迫企业家减少劳动岗位,因为生产型企业的老板们有可能因此而把那些有最低工资限制的行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同时,也就导致企业家把那些非生产型行业的雇员,也就是那些工作在无法转移到国外去的行业的雇员,以黑工的形式来取代。这一点尤其集中地表现在家政业和种植业的工作人员身上,也就是那些至今通行低工资的群体。因此,国家一方面规定工资底线,避免国内可供的经常性劳动岗位减少,而导致劳动岗位流向国外和黑工数量剧增。另一方面,最低工资又必须明显高于社会福利所得,以免人为造成失业者对可能性工作岗位失去兴趣。因为他有社会福

利垫底，再加上黑工照样生活得挺不错，何必去工作呢？就目前的情况看，最低工资这个原则在短期内恐怕问题还是比较多。从实际情况看，这个原则比较适合于劳动力市场不太规范的国家。

在失业问题上，德国东部的六个州属于特殊情况。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那里就一直保持着两倍于西部的高失业率。每年从西部投到东部的国家帮助资金高达 800 亿欧元，占德国国民总产值的 4%。这笔资金一方面提高了东部基本设施的现代化水平，而另一方面也充实了国家和私人的消费。不仅科尔和施罗德政府没有真正地采取措施，而且默克尔政府也没有就强化德国东部地区经济活力，对其发展予以有效扶持。如果这种不干活儿的情况继续保持，那么按初步估计，这些东部地区恐怕需要 40 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起来。这些年以来，这里的恢复速度可以从这么两个数字看出来：1995 年，东部六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西部各州平均水平的 60%。10 年后，也就是 2005 年，也就达到 67%的水平。

加速恢复进程的办法早就被提出来了，包括我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的一些收集到 2005 年出版的论文集《德国统一之路》），遗憾的是所有的建议、尝试都由于西德多数人的利己主义而告失败，尤其是由于西德各州政府的利己主义，他们不允许单方面的重点扶持东部，所以对东部的经济援助也就只能是那些为联邦可以调拨的部分。如果对东部的这种援助继续保持下去的话，那么这每年社会总产值 4%的大

放血有可能导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落在西欧诸国之后，因为投到东部去的可是相当大的一笔款（作为参照：庞大的美国国防开支“仅仅”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

比巨额经济投入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和政策上的影响，这些有可能使东部恢复的进程变得迟缓。东部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去打工，东部反复出现极右党派获得高额选票，这种现状令人深感不安。

1993年，当我与几位朋友基于联邦总统的提议，在魏玛筹建德意志民族基金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东、西部的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在基金会的第一次年会上，也就是在1994年的年会上，我们就着手于民族状态这个问题。在这些年中，我们多次把德国东部这个问题列入议题。在基金会2003年年会上，我们出版了一本书——《柏林——我们首都的价值是什么?》，把柏林作为德国首都的作用问题提了出来。随后，在2007年的首都协议条约中，也就是自1992年以来第三次调整，把联邦给予柏林市的首都财政拨款由每年3800万欧元上调到每年6000万欧元，并且保持到2017年。但到此为止，在首都的财政补助问题上还是没有做到明朗化，因为除了首都财政补贴以外，联邦还在首都文化协议条约的框架下，每年给柏林的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以及柏林的其他文化机构4.3亿欧元财政拨款。此外，联邦还给柏林的国家歌剧院一次性维修费2亿欧元，联邦财政拨款修建从柏林火车站经过政府区到亚历山大广场的总理地铁，以及柏林的博物馆岛和夏洛滕堡宫（Schloss Char-

lottenburg)。除了参与修建特木普林机场的投资外,联邦还从财政上拿出 5.52 亿欧元帮助修建柏林城市宫殿(Stadtschloss)。除了这些促进首都建设的单个项目外,在联邦为数众多的法律性财政拨款中,柏林市属于全德 16 州中获得拨款最多的。因为这座百万人口的都市在其经济发展水平上明显地远远落后于西部大城市许多年,所以柏林的财政问题依然属于德国经济联邦中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我看来,对于联邦政府以及执政党占多数票的联邦议会来说,一个长期的重要任务就是,重新启动德国东部经济恢复之列车并把它坚持开下去。作为最低限度的条件,联邦要把自己的服务产业以及自己付费的服务产业尽可能地向东部转移。这一点也适用于那些还留在波恩的部委以及其他的联邦机构,尤其是新的研究所、研究项目以及到 2013 年为止的联邦财政支持的高校建设。如果连联邦政府自己的管理机构都不在乎整个德国发展的必要性,那么东部发展进程的停滞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究竟是好是糟,一个像样的有效结论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出,但在我看来,我国人民的本能和天性完全能够承受得了这一切。

如果想维持我们的福利国家并以此继续保障我们社会内部的和平,那么我们就得解决日渐增加的社会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在 1891 年,也就是在俾斯麦时代结束时,政府引入了对工人的老、残保险(现在称之为养老保险),获得养老金的年龄是以 70 岁为起点,而那时一名 5 岁孩

子的平均寿命期望值也就是58岁。这也就意味着,当时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获得养老金。到了1957年,在大约半个世纪后,当男人的平均寿命提高到66岁时,获取养老金开始于65岁生日。到2005年,人的平均寿命提高到72岁,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则刚刚超过60岁。男人们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大大地延长了。30年前,也就是在我在位时的政府时期,我国领取养老金的平均时间大约不足12年,而今的平均值却已经达到17年,而且仍然呈上升的趋势。形成这一延长的原因一方面是医学、保健、护理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善和进步,它们使人的长寿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还在于对实际开始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多种法律性降低(专业术语:提前退休)。

我们德国人的老龄化之构成早就不再呈现为一种金字塔式,而更像一种圆柱体。退休人数持续地剧增:在2005年,65岁以及超过65岁的人口占全国居民的19%;在2030年有可能增长到27%。与此同时,年轻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却在下降。自60年代以来,我们就经历着出生率戏剧性下降的事实,当时一名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为2.36;在2005年我们面对的平均生育数却为1.36。尽管自60年代以来有大量的移民,可是我们所面对的依然是社会人口老化的持续增加和全国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从长远看,能向养老基金中投钱的年轻人可能将越来越少。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年轻人的税收和支出提高了许多,同时也对养老金的要求给了一些限制。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不对至今为止所通行的办法进行限制、调整,那就无法继续下去。

目前社会上有两种解决办法，人们正在进行着争论，我对这两种办法都不敢苟同。因为其中之一是，借助于税务政策和福利政策的刺激把目前的出生率提高到2.1，这是一种空想，即便是这种措施富有成效，那它的影响要等到21世纪中叶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另外的一种方法是，通过非洲和亚洲移民来填补我们的出生率缺口。这对我来说更加不现实。因此明智的结论就是：我们必须把德国民族的老化作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予以接受，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个必要的适应过程中去。这包括从解除劳动力市场的禁锢和提高就业率，到缩短基本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时间，直至子女补助和出生补助。

为了让公民充分了解我们法定的养老金制度的改变，并且使选民接受它，在职的政治家们就要把这些因素和数字经常地、不加修饰地公之于众。同时，这也是所有那些富有责任心的媒体所面临的任务。对于许多政治家来说，这也许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人也许会对此现象所带来的可能性结果保持沉默，而有的也许会借机搞些投机的漫天许诺。尤其是当年那些富有阶级斗争意识者，也就是今天德国新出现的所谓的“左派”，将趁机借题发挥、大肆宣传，以便用他们主观臆想的灵丹妙药去欺骗茫然的选民。事实上，他们的这些方法不外乎当年东德所搞的那一套，最终只能把社会经济引向破产。仅仅凭借西德的资本注入，当年的东德政府也就能把他们经济的崩溃再延缓上十多年。今天已经扩大了5倍的德国经济也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给予那些明知是打水漂的资

本。

有关这场改革的讨论也不会被局限于一届或者两届议会的合法期限内，真正有效的观点只能随着时间而逐渐成熟，那些必要的改革随后也只能一步步地实现。极左的和极右的煽动者也极有可能不断地出现，人们易于或者乐于相信的幻想将不断地扩大和蔓延，诸如"社会福利的强盗"，或者"全球经济一体化要对我们的社会经济问题负责"等等还在不断流传。故此在这里就要突出强调个别真理：我们的养老金制度本身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并不影响我们的国际或者全球竞争力；尽管我们在国际竞争力方面是很强的，但我们依然面临着这个艰巨的任务——必须让我们的养老金制度与我们社会人口普遍老化的趋势相适应。

福利民主主义观点的要点就在于，养老金绝非靠个人以前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来资助，而是靠现在就业者和纳税人所支付的资金来解决的。这是一种所谓的世代协议，它所依据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每代人的养老金都靠下一代人所支付的保险费和税金来保证。今天的一代人有权利相信，一旦他们到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这个原则依然有效。所以这个震耳欲聋的句子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确实挣下了我们的养老金。"

如果在今天的欧洲各地，尤其是在德国，退休人员数量不断增加，而下一代的人数却在持续减少，那么养老金的金额要想维持在至今为止所具有的水平上，恐怕就相当困难。理论上有三条解决途径可以考虑：

——推迟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使领取养老金的总年限缩短，从而借助于延长工作年龄的方式，使每年所需的养老金数量得到稳定保持；

——减少养老金金额；

——让养老金继续按照至今为止的方式上升，但所需的资金无疑也需增加，那么就相应地提高现在就业人员和有收入者应缴纳的保险费和税金。

当然，在解决我们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这三条途径之间也有多种可能性的交叉联系。可是必须注意到，只有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现在工作的这一代人实施增大经济负担这种政策。延长工作年龄的方式肯定是首选，甚至不仅延长工作年龄，而且还要增加每年的工作时间总数。

联邦总理施罗德已经在“2010 年改革纲要”中揭开了延长工作年龄的公开讨论，而实质性决策将在 2006 年开始。在公开讨论中，反应最强烈的却是那些到了退休年龄的人，尽管他们并没有受到这项改革的影响，或者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因为提高退休年龄真正开始实施是在 2012 年。出生于 1947 年的人，因此就要多工作一个月；出生于 1948 年的人，就要多工作 2 个月，以此类推。对于出生于 1963 年的人来说，按照现在的有效法律就需工作到 67 岁。对于年轻人，也就是那些真正受到这个延长工作年限新政策制约的人，却相对的没有太多的抗议性表示。而比较多的是工会方面对延长工作年限的抗议。社民党的两位部长瑞斯特(Riester)和

明特费林(Müntefering)在辩论中坚定不移,从而使立法的第一步富有成效地迈了出去。

基于人的寿命已经延长和将继续延长的事实,基于人的健康水平明显改善的实况,在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工作绝对是可以承受的。有人提出一种理论上的极端假设:所有的人都活到100岁,他们最后的40年领取养老金,但同时只从20岁到60岁工作,也就是工作40年。在这种极端假设下,一名工作者不仅要养活自己和家庭,还要养活一名退休者和他的家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名工作者的经济压力就太大了。事实上,我们已经走上了逐渐获得结论的路上。

到现在为止,许多政治家,尤其是许多福利政策方面的政治家,为社会上有关未来养老金支付的种种幻想所淹没。譬如在2005年时,国家养老金保险部门给养老金保险者发来一封所谓的养老金信息通报,这份通报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信中所计算并且在此通报中所提的养老金基于未来的养老金调整事实上还会提高。我马上就此与"德国养老金保险会"的主席和劳动部长联系,并且指出,就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真实背景以及德国人口发展的下降趋势来说,这份信息通报所介绍的情况恐怕不实,它有可能引发人们对养老金的过高期望值,然而国家却有可能兑现不了。此后,这样的乐观主义观点再也不蔓延了。现在的养老金信息做得非常清楚,未来养老金的提高是一个不确定数,唯有真正地实现了前面所提到的逐步改变的法律内容,今天的现实养老金水平才能得到维持。

因为现在的一些政治家喜欢讲“把养老金的一部分从国家保险转移到私人保险上去”这个观点，所以我想在此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便是私人资本养老金保险，这笔钱也需同时出自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这个篮子中；私人老年保险也必须以繁荣的国民经济为前提，也就是要以国家的财政、经济健康发展为先决条件。仅仅那些为退休人员居住的无需付租金的私人住房（也许还有一个花园）对其个人的晚年生活就是一笔保障费（只要没有借贷款的压力），而这也是靠自己挣来的。

一部分养老金实施国家的和私人的养老保险补充衔接（专用术语：“瑞斯特养老金”）的这个想法似乎没有什么错，但这里有一个私人资本的形式和质量（偿付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风险问题。美国一些大的养老基金组织的那些投机基金经纪人所引发的经济崩溃已经给了人们一个警号，因此绝大部分的德国储蓄者对他们附近储蓄所的信任度远比对自己不熟悉的、不透明的投资基金要大些。

然而，无论在欧盟共同市场上，还是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现实都可能迫使我们在未来的社会保险制度中改变资金获取方式。一个多世纪以来，德国的社会福利保险基本上采取的是雇员和雇主双方缴费的办法，也就是双方都与工资毛收入挂钩。雇员所缴纳的保险费类似于缴纳额外的工资税，这一部分将从他的工资中被直接扣除。雇主所缴纳的保险费部分作为雇员毛工资的附加部分而计入企业的额外人工费，并由此也提高了生产成本。以此方式在德国就形成了这

样的局面:雇主在2007年协议毛工资100欧元,而事实上企业所支付的工资总数平均值为133欧元,可雇员从中所得纯收入平均值为63欧元。

现在德国工资在全世界相对而言是最高的(这当然也是德国富裕生活的源泉之一),可是通过工资附加费又使德国的人工支出额外地提高了一些。由于这种工资和工资附加费最终都要加到产品上去,由产品来消化,所以它可能会变成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不利因素,相对于那些“低工资的国家”尤其如此。所以从长远来看也许值得考虑,譬如,改变国家养老金保险通过雇员和雇主双方缴费的方式,代之以通过普通税的方式来支付,也就是以提高税率的方式来相对地降低工资支出。在我看来,从长远计未必一定要靠逐步提高社会福利保险费的方式来保障我们的福利社会,也就是不要靠持续增加工资附加费的方式,而是要逐步过渡到完全通过税收来保障的路上来。况且,现在所有养老金领取者中也就只有33%的人属于法定缴费的社会福利保险者,而所有国家退休人员,如文职人员、官吏以及军人,他们的养老金都是100%靠税收来支付。

毫无疑问,德国人寿命的延长也对法定医疗保险产生了影响。因为老人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大,那么老年病所需要的花费也就随之持续增长;医学技术在大步往前走,随之也就新出现了各种比较贵的检测和治疗仪器、方法和药物,这自然就增加和提高了我们在医疗方面的开支。这些发展包括对心导管的心电图描记器、心脏起搏器、磺胺类合成抑

菌药、抗生素、阿司匹林、抗血小板凝聚药物、X 线诊断、计算机 X 线体层照相术。

相对于其他大国来说，德国的医疗和服务水平是一流的。谁在英国、美国或者在日本生过病，那他就有亲身感受。当然，在德国也有浪费和不守规矩的事情发生，但默克尔的大联合政府在 2006 年却把一个言过其实的医疗改革(《新苏黎世报》称之为“怪老鼠”)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福利话题，它所证明的也只是他们严重缺乏经济判断力而已。毋庸置疑，我们社会在未来将不仅继续老化，而且用于医疗的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将相应地不断增大。1995 年所实施的护理保险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早就陷入财政危机之中，而且它今后所需要的费用还将继续增大，所以这显然还是一个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们严重老龄化了的社会中的人口负增长问题远比医疗保险问题更为突出。

退回几十年，也就是在我担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的时候，我就提出了必须对德国人口老化的问题采取措施。我当时建议，延长退休年龄，改变所有社会福利与在职工作人员纯收入挂钩的政策。我还提到，反对统一的工资等级政策。我呼吁，社民党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许多年以后，1998 年，社民党从在野党以红绿联盟的方式变成了执政党，随后几乎再一次连续五年的执政期，直到施罗德总理在 2003 年就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的后果问题提出了一个计划，才引发了突变。“2010 年改革纲要”这份意向书是在经济理念方面的一种勇敢突破，这种经济理性不仅

是基民盟/基社盟在其执政时期不敢面对的，而且是他们成为在野党时也不敢考虑的。因为施罗德没有成功地获得其大多数选民以及追随者对这个计划的理解和支持，从而导致了2005年默克尔所领导的大联盟取代施罗德红绿联盟执政的一幕。由此，当社民党在工会的影响下还在猜测，施罗德是否还真的走得并不远时，默克尔的党派却在摘取施罗德改革的果实，也就是施罗德改革给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那些明显的好转数据。人们可以把这称为一种误解，因为施罗德在客观上确实走得还不够远。

说到底，施罗德的改革确实就像一种世界经济复苏的春风，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变革。如果政府领导人出于担心，尤其是担心吓着选民们，而把“纲要”中所计划的继续改革搁置下来，那么失业数字随后就会重新增高，我们富裕生活的财政来源就会陷入危机。相对于以社会福利进步作为根本理念的社民党来说，从其基本观念上作为保守党的基民盟/基社盟以此局面还可以轻松地生存下去。不管怎么说，一旦上述改革发展不再继续，那么损失最大的无疑是这个左翼大党——社民党。

能回想起魏玛民主终结的人会警告说：谨防机会主义。1930年，魏玛民主大联盟由于一个很小的修改案（也就是因为失业保险提高0.5个百分点）而导致了分裂和解体，从而开始了德国总统的危机专制独裁时期，随后仅用了3个年头，它就被希特勒“夺得了权力”。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风险和机遇

前面已经谈到，就卷入世界经济的强度而言，德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之最。在 2007 年，德国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5%，而美国只占 10%，日本只占 15%，法国和英国占 27%，中国占 35%。这种高出口额带来了德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起伏涨落的高度依赖性，以至于每次世界经济的萎缩对德国的打击都远比美国大。可美国国民经济的倒退却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而联邦德国的经济复苏计划却只影响国内的利益，对于我们的出口仅仅是间接的作用，尤其从时间上有很大落差，换句话说就是，几乎没有多大影响。我们的社会舆论和大众媒体至今尚未明白，德国的国民经济对外高度依赖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只乐于以“出口大国”之名而沾沾自喜，却不愿斟酌与此相关的危险一面。

在过去的 30 年中，德国这种高出口比例的增长速度很快。在 70 年代时，它还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22%，可到了两德统一前夕就已上升到 33%。统一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当时的东德几乎没有什么可出口的。到本世纪头一个十年的中期，德国的出口比例又迅速地回升到 45%。

这种发展无疑也与欧盟共同市场不断完善有关，因为我们出口的半数以上都在欧盟内，而只有小半数到了欧盟以外的国家，其中包括从中国到非洲的所有国家。同时，这种高出口比例也与德国出口企业的流动性密切相关。不可否认，由于合理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也由于产品的高质量和信誉性，使德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也由于联邦银行相对保守的金融政策使德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发展在一段时间受到了限制，而其他国家却相反，因此也就把德国企业间接地引上了出口。

欧盟从 15 个成员国扩大到 27 个，这也促进了供货商和初加工向国外的快速转移。所谓的“委托加工”，主要是在东欧，也有去中国和印度开展这类初加工的，这些客观上加大了国内价值创造中的出口比例份额，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缩小了国内的劳动部分，相应也就增大了德国进口部分。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估计还将持续下去，不仅在出口比例方面，还包括在进口比例方面，德国也远远超出其欧洲邻国。德国经济通过进出口而与外国密切交织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把服务行业的进出口也计算在内，那么这种密切程度将更令人惊讶）。

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将继续发展，同时进入世界经济创造活动中的人数也将在欧洲之外的地方继续增加。后来的竞争者们在挑战昔日老工业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日本和西欧曾经绝对领先的领域。今天还是在相对简单的工业生产领域，后天将进入到高科技领域。欧洲之

外的那些参与世界经济的人们，尽管现在还都处在低工资、低社会福利以及整体上比较低的生活水平上，但他们却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满意的生活态度生活着；不仅如此，他们工作的时间长度和努力程度也都远远超过了欧洲人。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竞争者所提供给市场的产品，其价格也就相对比较低（这就使德国产品面临着被挤出市场的危险）。这个推挤的过程刚刚开始，昨天还是围绕着塑料儿童玩具，现在已经涉及汽车以及大型货运船、软件和计算机、手机，明天的对象将是飞机和机械设备。

科技的全球一体化早就开始了，同时也还有能源和原料市场的一体化（石油、天然气和钢材是最高层）以及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所有工业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虽然刚刚开始，但势在必行，不可扭转。如果一名德国政治家、企业家或者工会人士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那他就对不起他的职业。用所谓的反对东亚"激素工资"这类抗议活动，并不能改变德国原装的中档汽车在上海滞销的趋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生产的汽车很快地就达到同样的质量水平，可价格低廉；东亚生产的手机同样在德国以低于德国产品的价格出售。谁想以关税的方式去抵制廉价物品，那他只能引发其他方面的怒火，从而让一个类似的抵制德国或者欧洲产品的进口条例出台。亚洲崛起国家的廉价产品与欧洲国家昂贵产品之间的贸易战最终只能让欧盟受损。

德国和欧洲此时此刻究竟能做些什么？我们面临这样的严肃抉择，要么接受生活水平相对下降的现实，要么现在

就改善和加强我们在亚洲的能力。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现在”这个词上，因为在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大陆的其他部分，人们处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们希望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欧洲人在各方面的进步。这种发展将不会停滞，亚洲人与欧洲人之间在技术上的距离差将越来越小。我们德国人今后在竞争力方面是否还能自豪，关键就取决于我们的科研、我们的高校、我们的职业教育是否有能力拿出高于现在的成绩。

对德国来说，竞争力绝不令人沮丧。德国 19 世纪末期 10 年的经济史已经显示，当年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美国竞争，我们德国人形成了自己强大的科技能力，并在经济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 20 世纪，我们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尽管有无数的人死于非命，尽管有多次的国家崩溃，尽管有纳粹时代和 40 年的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但我们不仅建成了一个不可否认的普遍富裕的社会、一个世界著名的富裕国家，而且还建成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稳定的政治秩序。另外，还有在欧洲历史上堪称伟大的一页，一个几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事实：20 多个欧洲国家联合在一起。只要看到这富有成效的历史，就不会担心我们在 21 世纪缺乏能力，就不会担心我们在全球一体化中失去竞争力。

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世界经济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快速发展。世界经济自 80 年代以来基于两种方式在深刻变化和发展着，对此我们的社会舆论也必须学着去理解：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持续性的质的飞跃时代，而同时又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量的飞跃时代。质的变化就在于以非同寻常的加速度进行着的技术进步，还有那几乎遍布全球的快速传播。仅现代化技术进步在交通和通讯领域所带来的发展，就使 21 世纪的世界相对于 20 世纪的世界旧貌换新颜。这种变化跨越了过去 400 年，超过了自 1500 年人类开始新时代之后的所有变化。在今天，人们可以借助大型集装船、飞机，经过卫星与计算机联网，尤其是借助于因特网，轻松地让科学成就以及所有新技术在一瞬间传遍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所需要的只是受过足够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便在五大洲同时使用那同样先进的技术。科技的快速一体化不仅使距离遥远的人们彼此成为邻居，而且也成为竞争者。谁想在竞争中屹立不倒，谁就需要聪明、智慧和教育，也就是说：他需要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量的飞跃就在于，参与世界经济交流的人数一下子翻了几番，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形成这一发展的有两个影响因素：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个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解体。这使过去 20 年间参与世界经济创造的人数翻了两番。仅仅中国就在短短几十年间人口从 9 亿增加到 13 亿，而且这种增加还将继续下去。

对人类增长到 2050 年以后的情况尽管很难预测，但可以想见，到那时仅中国或者印度所拥有的人口总数，恐怕就相当于 1900 年时的世界人口总数。这惊人的发展主要在亚、非、南美，很少出现在北美，更不可能出现在欧洲、俄罗斯

和日本。亚、非和南美的人均可生存空间面积将减少1/3，现在可以说人类的半数生活在城市，在未来将只能是许多人一起生活在大都市。我并不认为城市化有什么问题，况且所有文化无一不是以城市为前提的。我所担心的是，随着人口剧增和都市化而使个性特色消失。大型城市如墨西哥市、开罗市或者圣保罗市很难管理，治理更是谈何容易。如果柏林发展成为一个有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那么民主的秩序在有些城区恐怕就很难维持。所以德国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人们正在大量地放弃世代居住的故乡，这种流动趋势将不断增加，经济难民的数量也随之持续增多。也许政治冲突、战争以及内战的可能性也将增加。有关整个人类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观点，我想先放到一边，而只谈一下经济的影响。就智商而言，生活在东亚的人绝不低于生活在欧洲的人，但由于他们尚未普及高等教育，无法迅速使用新技术，所以他们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欧洲人和北美人。

日本是第一个意识到这种状态并明确作出改革抉择的民族。经过百余年的对外闭关自守之后，日本于19世纪60年代向西方开放。与此同时，他们在一个涵盖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改革中，开始大办教育。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叶，日本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就赶上了西方。到了70年代，日本人就成了欧洲人和北美人的竞争者。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以日本为例急追直上，以惊人的成就创造了普遍提高生活水平这一事实。人口众多的中国内地自

邓小平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也走上了迅速发展之路。

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离开来,所以她在毛泽东时代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也就是富有吸引力的谜。可 30 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面目一新。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在 1975 年,也就是 30 多年前,此后我一直定期访问中国。如果我今天到了北京或者上海、广州,也就是那些当年所访问过的城市,我简直目瞪口呆:在解除了昔日的计划经济之后,他们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在不久的几十年后,中国将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世界经济强国,也许到了本世纪中叶,她甚至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因为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她的人口数量甚至 4 倍于美国、10 倍于日本、15 倍于德国,所以她的现代化进程有可能不会像新加坡和韩国那样快,也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快,包括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也将继续保持落后的状态。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还在盯着发达国家的富裕标准,尽管中国的一小部分地区及其城市在科学水平上相对地发展很快,甚至很快会在技术上和经济能力上赶上欧洲。

地球上的许多国家都在紧跟中国的发展步伐,包括印度和越南,还有一些阿拉伯石油国家、伊朗甚至巴西。科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民族和国家是否利用这个趋势、如何利用这个趋势,完全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特点、她的政治领导人、她的宪法以及政府的能力,取决于内外和平环境的保障。从总体上讲,这些新兴国家有承受相对低于欧

洲和北美工资和社会福利条件的思想准备，而且国民保持这种承受力的时间越长，这个国家向富裕生活水平所迈出的步子就越大。

持续的富裕生活也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外部和平环境。世界上约 200 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没有哪一个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能获得稳定的外部和平。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军事霸主，也不免因恐怖分子突然袭击而向阿富汗进军，并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战争，这两场战争有可能在整个近东和中东继续蔓延。即便是维护国内的和平，这对许多国家也依然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譬如像俄罗斯的高加索部分，像巴基斯坦、苏丹，所以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任务在这几十年来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从规模上类似于 30 年玫瑰战争，或者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或者一场近似于二战后的“冷战”那样的战争，那都是不可能的。但即便是一场小型战争，也有可能严重地阻碍彼此密切交织、利益攸关的世界经济发展，并且危及个别具体国家的经济生存能力和国民的幸福生活。就以那几次极为地区化的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战争为例，它们在 70 年代所引发的石油价格飞涨使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受到沉重打击。和平问题在 21 世纪也同样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且仍然是保障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欧洲国家尝试着通过欧盟这个纽带联合起来，至少可以保障欧洲大陆上的和平，这无疑是必不可少的。

欧盟成员国，尤其是其政府领导和政治家们必须清楚：他们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以及他们社会的富裕生活紧紧地系在世界经济稳定这个柱石上，也毫无疑问依赖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定。科技和经济的进步，尤其是那不可能逆转的全球一体化，迫使我们去维持和平。

残暴的资本主义——弱者何以自卫?

未来世界经济的最大危险，很有可能从全球一体化了的金融市场爆发出来。引发这些危险的弊端也是我自己最近几十年来逐渐认识到的，我把它们称为残暴的资本主义。对此的认识可以追溯到70年代，也就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兑换率混乱时期。当时就有那么几个从自由兑换体系中钻空子赚钱的投机者，可他们的人数近年来在逐渐地增加，到明天，从事国际投机的至少也恐怕是成千上万人。一个投机者所投机的就是一个美元的下跌：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以大宗的美元兑换欧元，可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这笔美元，而他所寄希望的是在某个预定的时间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把美元再买回来。在卖出和买入两种情况下，代之以转出和转入具体货币的仅仅是一种协议的证权(优先购买权)，随后他就免于亲自去经营进入或者退出，当然所有的都是以手续费为条件的。

这种投机业务使现代社会紧张到了以秒计算的程度。在此，人们所操持的是新股票，也就是所谓的金融衍生产品(Financial Derivatives)。事实上，这类衍生产品远比我所介



绍的例子要复杂许多，现在有几十万种不同的衍生产品，它们与不透明的风险和机遇相连接，不是通过公开的股市交易，而是通过某种有潜在交易功能的金融机构进行。世界上各大银行的老板们都很难对这个领域做到一目了然或者准确判断，尤其是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已经成了投资银行、对冲基金(Hedge Fund)、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其他私人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早在2006年时，这种方式的业务每天的成交额都是全世界当天直接商品贸易的几千倍。由于许多地方性银行也大量地参与了这类衍生产品的业务，甚至德国各州银行都介入了，可他们却无法对风险情况作出判断，所以当2007年美国抵押市场出现危机时，许多银行则损失惨重。一个全球性的、还在持续的信任危机和借贷危机就是它的直接结果。

金融市场的这种退化堕落也许是可以控制的，如果它们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区域里运作的话。可情况并非如此！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这些金融经纪人从世界任何一个大型金融中心就可以对另外一个中心的价格浮动作出反应。如果美国、英国、德国或者瑞士的私人银行必须对国家银行进行支持的话，那么就马上会出现世界性不安反弹。当俄国和阿根廷在上世纪90年代无法以外汇支付他们的到期利息时，全世界的金融中心都作出了反应，因为短线外国资本无处不在。2007—2008年的信任危机将以我们今天还无法想见的程度继续蔓延。

活跃在全球性金融市场上的几乎都是诞生较晚的私人

机构。其中许多是以恶意收购整个企业为专长,他们在收购这些企业之后,把它分解、拆除并出售——当然是对这类衍生产品加以人为的粉饰后出售。这所有的一切都令经纪人和老板个人大发横财。那些通常的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和其他的特定目的机构都是投资银行家建立的,他们对公开发布的财务报告和正常调查的银行财务报告都采取回避态度,并且不受任何国家金融监督。还有那些大型生产和贸易康采恩,他们在全球一体化方面的不断增加也给那些干预基金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和机遇,从而在参与投机金融业务时合法地摆脱其国家银行的监督。对于许多为世界上的大财团所建立的对冲基金来说,瞥一下他们动机和思想灵魂,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一帮没有祖国的家伙。当准备以伦敦或者以纽约的华尔街为基地进行投机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把自己的企业注册到某个有主权的,可是既无银行监督,又没有财政局的小岛国,以便逃避国家对他们的影响和干预。

金融经纪和管理人已经习惯于根据一条新消息或者信息即刻作出投机反应,在此刻只要一个举动,马上就会传染数百人,并同时在一瞬间开始向同一方向冲刺,譬如说买进或者撤出。早在1929年那个所谓的黑色星期五(原本是星期四),也就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群众性冲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70年后,一场在银行家中的冲动引发了整个东南亚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1998年,一个类似的大规模惨剧侥幸被制止了。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即LTCM)的投机完全错误,美国中央银行使出浑身解

数去拯救这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的是免除可能引发的世界性贷款银行危机。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活动却随之导致了“新经济”股在短期内的歇斯底里大爆炸，实质上毁灭了信息技术股。在世纪交替后不久，类似的“炸弹”再次爆炸，而这更多的是贪污受贿所埋下的祸根，所造成的仍然是大量的损失。

在由于私人机构那不负责任的金融投机所造成的危害方面，这场美国借贷市场危机给我们提供了最新的、同时也是十年来最危险的例子。尽管预先就看到，这些贷款人有可能在付债和还息方面存在问题，却依然以抵押贷款资助大规模地修建私人住宅和开发房地产。为了使抵押贷款银行作为债权人摆脱已经出现的损失，这些无力偿付的抵押借贷被粉饰，摇身一变成了新的、深不可测的股票，随之向债权人（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的私人股民）出售。当其中的危险被披露时，有人想把这些作为衍生产品出售，就这样这个吹起来的气球给炸了。随后，许多银行和私人金融机构陷入了惨重损失的状态。

随之而来的就是，为了免除更多无辜的客户陷入泥潭，就必须以国家方式——譬如在英国、德国——对有些银行进行抢救。与此同时，这些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也得被解雇。一场普遍的信任危机也就遍布整个金融市场，这使所有银行都紧紧地控制住手中的流动资金，唯有在特别高利息的情况下，才肯贷款。为了缓解一场普遍的借贷危机，那负责美元的美国中央银行——还有负责欧元的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其

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给他们的经济中投放大量的流动资金,但他们这种增加现钞数量的方式,势必引来通货膨胀。这种拯救也给这些金融经纪人造成一个这样的心理效应:他们可以因此而认为,他们的国家银行会在他们下次面临崩溃时出面拯救。这种心理效应也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人们由此也同样可以得出一个教训:私有金融经纪人的投机危害本国乃至世界现实经济的发展。这场由美国借贷市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令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幅度明显减小。

这场金融危机是由于抵押贷款银行的轻率引发的,而并非由于其他的原因——譬如投资基金——造成的,这一点可以说纯属偶然。在当今的世界上,至少有一万多家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的投机性私有金融机构。很少有哪一国的财政部长能对这种投机业务的风险做到心中有数,更不用说对那些远离统计报表所公开发表的资料之外的信息,而那些政府首脑以及立法机构对此就更加不知所以然。就对经济发展的威胁而言,这类投机活动所带来的危险性绝不亚于战争;就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而言,实力强大的私有金融机构绝不亚于经济大国及其政府的政治影响程度。

可以说,1914 年以及二战后到 70 年代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中,金融和货币结构的稳定性远比 21 世纪初要好得多。世界主要经济国家的密切合作是保持未来经济发展稳定性的决定因素,所以唯有当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诸国以及经济实体在金融监督方面形成了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时,一个安全的全球性金融市场结构才可以想象。到达这一点的路

程还很远，而且还有许多个人的和民族的自私自利性对抗存在，这些都需要得到克服。由此可见，形成世界性危机的潜在可能性依然存在。

在未来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的经济因素中，还有一些老牌工业国家出于民族利己主义而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进行抵制的政策问题。同时还有美国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以及其不断增长的巨额外国债务，与此相关的也还有中国、日本等国的巨额国际贸易盈余，以及由此而在东亚诸国所形成的高额美元外汇储备及其不断增长的趋势。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美国的领导作用应该逐渐地变为在结构不均衡状态下作为平衡的砝码，因为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民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头号单一的债务国，而且小布什在 2003 年令美国在全世界的权威严重地下跌。即便如此，欧洲人也别有非分之想，就凭欧盟政治上缺乏行动能力这个状态，现在的欧洲不可能担当领导的角色。可另一方面，实现世界经济、财政和金融状况的改善，没有欧盟区，或者说没有欧盟的坚决参与，那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我还想提出一个忠告，因为有人建议说：把 1994 年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与半个世纪前建立起来的欧洲共同市场衔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我想劝阻实施这个建议，因为就美国对外经济的严重萎缩来说，此举毫无意义，还有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变成美国金

融政治和美国利益挑战欧盟的工具。现在欧盟政治上的不成熟使其还不足以和美国抗衡。

在我看来,为了保障欧洲和世界经济有效运作而去促成世界经济大国之间的政府合作,这倒是很有成功希望的。这需要把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峰会从 8 国扩大到 15 国,同时需要改变观望而代之以切实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对于一次峰会来说,两个最现实、最重要的问题当属目前国际收支的平衡问题,以及如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应对那些危险的、不负责任的投机活动问题。让国际货币基金负责组建一个有效的国际性监督机构,对各种形式的私有金融机构和所有现存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督,这也是可以考虑的,或者也可以把这种任务委托给一种高层的国际组织来进行。

对在全球金融市场建立一种更好的秩序这个建议,美英两国到目前为止仍持异议,这完全是出自其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纽约和伦敦是全球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两个中心,当危险被分摊到世界各地去的时候,给这里留下的就是大宗的益处。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以往的大型减免债务和抢救活动几乎绝大部分都为这两个中心的私有债务机构所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者所得甚少,而这两个设在华盛顿的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实际上还是受美国指挥。这种依附于美国这个大户的局面恐怕还得无可奈何地持续一些时日。

同时,我们早已经注意到,美国经济及其增长和社会繁荣都是依靠外国资本的净流入来支持的,美国国民经济的

5%到6%是靠这种资本流入实现的。这种对世界其他国家极不公允的状态到底能持续多久，完全取决于其他国家（其中也包括德国）公民对美国的这种信任度——所谓的“把资本存在美国比存在自己的国家更安全，而且获利更大”——还能保持多久。这种持续的外国资本流入无疑也促使美国的对外债务增加、利息负担加重。只要这些外国人把他们资金所获得的利息、分红以及其他盈利继续留在美国，那么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大国单方面依靠抚养的特点就不会为世人所见，华盛顿的要员们也就感受不到美元持续贬值所造成的威胁，尽管他们把所有不平衡发展的全部罪责都一股脑儿地推到了中国身上。

如果这个秩序在短时间内仍未好转，那么欧洲人（也包括德国人）就得自认倒霉。欧洲人有权利寄希望于欧洲影响力的增长，寄希望于欧洲中央银行，寄希望于未来共同的欧洲金融监督机构以及我们的全部力量，去维持我们欧洲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秩序。我们越早、越好地把欧洲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越能增强我们持续发展的信心。如果欧盟成员国（其中包括德国）回避这些必要的结构调整，那么这残暴的资本主义就可能从国际金融市场上非难我们。

德国在全球性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危险特别大，因为我们德国没有一家真正的大型国际性银行！这是既不同于世界其他经济大国，也不同于几十年前的一大特点。在我任联邦德国政府首脑时，我们还有三家可以算得上有国际声望

的、可以覆盖全球的银行,而今只剩下德意志银行一家。德意志银行虽然把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可它把自己业务的绝大部分早就在纽约和伦敦完成了,换句话说,它本身早就全球一体化了。当美、英诸国,也包括日本和俄罗斯还可以计划着,在危机情况下请本国大型私有银行配合政府行动时,而今联邦政府却无法指望大银行的爱国主义支持。

作为年轻的议员,我在50年代经历了战胜国怎样把这三个大银行分解到各地,后来又怎样把它们重新组装起来的过程。我认为,重组起来是明智的,因为我们的大型企业不可能把资金分放到那么多的私有银行中去。当时,阿登纳只能把德意志银行的一把手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派到伦敦去进行债务谈判,而且只能寄所有希望于他个人的判断力、谈判力和爱国主义精神。1975年,当我们由于第一次世界经济峰会而到达法国的朗布依埃(Rambouillet)时,我回想起了这件事情的前奏。美国对这样的峰会并不乐观,其外交部长亨利·基辛格担心,以这样的准备方式弄不好就先形成了许多官僚机构的层层设防,最终可能使它什么利用价值也没有。所以我当时就建议,避开国家官僚机构,代之以个人委托准备。我们称这个受委托者为"登山向导",我提的人选是当时德意志银行的发言人维夫雷德·古特(Wilfried Guth)。

每当需要建议和帮助时,我都找德意志银行。早在勃兰特任总理时,古特的董事会同僚F.威廉·克理斯蒂安斯(F. Wilhelm Christians)就为了加强东方贸易以及为此所需要的

经济运转作了许多贡献。当奔驰的一大宗股票面临落入伊朗手中的可能性时(当时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还是伊朗国王,但被推翻已是为时不远了,而且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正在准备),我马上请德意志银行介入,他们富有成效地完成了此事。此后不久我又获悉,那从战争废墟抢救回来的德国航空工业并没有随美国飞机制造业而得到发展,我再次找到德意志银行。当时,阿尔夫雷德·赫尔豪森已经是董事会发言人,他接受了我的请求,着手恢复德国航空工业,遗憾的是,他被红色旅谋杀,没能完成这件事情。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德国空中客车公司。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例子,就是想告诉人们,德国不仅曾经有过一家大型银行,它的业务遍及世界,声誉不错,而且它也曾明显地为德国利益作出反应,也接受政府所委托的任务,政府在需要时也能毫不犹豫地向德意志银行董事会求救。今天,德国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其强大的程度是其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我们的银行系统却与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脱节了。德国属于世界上的高存款率国家,所以德国资本在外国金融中心无处不可以调用,德意志银行也正因为如此实质上早就类似于纽约或者伦敦的国际投机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能向它们的董事会就什么问题求教?如果这些银行本身在经济问题上都是不知所措,那么德国政府、在野党、政治家们还能向哪家银行寻求咨询和建议?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承认,这问题至今还是一个问号。

这三家昔日的德国大型银行之所以在国际上相对地倒

退,并非是什么政治或者法律限制的结果,而纯粹为它们董事会的短浅目光所误。德国银行从总体上坐失了必要的集中优化过程;同时,在过去的25年中,德国政府、议会也忽略了我们中型企业不断增长的依赖性风险和整个工业界对境外大型私有金融机构的依赖性。我们的政治阶层没有意识到,不仅我们的大型企业,而且我们的中型企业也越来越多地陷入无法自拔的状态。这样的情况随着国际金融风暴而每况愈下,于是它们也就把自己交给了那不道德的、贪得无厌的全球出击的金融经纪人。难怪艾伦·格林斯潘称:这是"传染性贪婪病"。

面对这种残暴资本主义在世界金融市场的野蛮出生,德国人就面临两项结构调整的政策性任务:一项是为保证德国利益,就要从欧盟的角度,在世界经济峰会上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的框架内,提出建立有效透明的金融监督机制,并且取缔某种程度上的逃税岛,因为那里没有什么监督可言。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单方面努力肯定是不够的,尤其是美国的政治阶层还认为,建立金融市场的新秩序并非美国利益之所在。美国的国民经济是德国的5倍,纽约还是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实力的金融中心。欧盟的共同倡议或者欧元区国家的介入,应该说是铸就成功可能性的重要砝码。当70年代中期,一场世界大衰退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恐慌促成了一个世界性金融经济合作的倡议,法德两国的共同合作就解决了问题。而今,欧元已经与美元并列为世界性货币,那么一个由欧元区所提出来的倡议应该有足够的政治分量。由于欧盟

委员会自身缺乏政治行动力(自己的过失),欧盟目前无力提出这样的一个世界性倡议——全球金融市场这种不理想的状态另当别论,所以欧盟重建自己的政治行动力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另一项也是德国利益所要求的:在我们国内推动私有银行机构的优化组合进程,使我们那些传统的、分割成小块儿的公益性的、互助合作性的和私有的银行能够合作起来。这种必要的优化组合至今一直由于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意识而僵持在管理与监督委员会问题上,在此当然还有各州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不可否认,那些小的机构也在努力要把自己发展成独立的大型银行,可要想阻止外国基金以大规模的方式收购整个企业和整个住宅区,然后再粉饰、变卖的做法,我们富有协作精神的储蓄银行、互助银行以及抵押贷款银行从总体上都太小了,而且没有什么影响力。我们大众储蓄银行的董事会、监督机构、专业联合会以及州银行和大众银行、互助银行都必须设法向这一方面努力,基于民族利益而联合成有行动能力的整体。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向公众就必要性进行启蒙。这已经晚了,但还不算最晚。

无论德国银行的优化组合是否成功,欧元都将作为一个稳定的因素而存在。共同货币和欧洲银行将在欧洲融合中起到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到 20 年的短短时间里,欧元与美元以及中国的人民币已经形成了世界货币的三位一体,并且随之也将迫使三家中央银行进行合

作,同时也将期待并驱动政府间在金融监督方面进行合作。欧元以其相对低的通货膨胀率、稳定兑换率、大规模的数量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似乎已经变成一种担保,使欧洲人在全球性资本和金融市场的挑战中无论如何都能成功地顶下来。德国内部当年反对这种共同货币的大有人在,他们曾经把欧元斥为"世界语性货币",甚至向位于卡尔斯鲁厄市(Karlsruhe)的宪法法院提出上诉,要阻止欧元问世。那么,他们今天肯定看到了自己的误区:假如他们"保持独立德国马克"的要求获胜,那么以其相对有限的数量面对现在世界的经济规模,德国货币就属于分量较轻的货币,而它也就因此而有可能成为投机者的投机对象。那么德国马克也许会戏剧化地经历波峰谷底的跌宕起伏,这将严重影响德国经济进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感谢 1992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它赋予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独立性大于德意志银行。在明智的领导班子的率领下,欧洲央行充分发挥了它的独立性,并且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我感到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没有哪一个欧元国家能够放弃这个共同货币而去恢复自己昔日的小民族、小国家货币,除非它准备让本国的国民经济去承受巨大的风险和打击。欧元将稳定地站住脚,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欣慰。

换位思考与改革

前面所简单陈述的银行优化组合，只是德国社会必须改革部分的一个例子。因为德国社会人口老化的现象将继续下去，而且这种现象既非政治影响，也非企业和教会的努力所能改变的。因此继续深化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令它们与社会现状相适应，将是不可回避的任务。必须改革的内容除了经济、财政以及税收政策外，还将涉及德国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设置问题，而全球一体化的竞争力也将迫使我们德国人在科研方面必须投入更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既然存在各种既得利益者的抵制，那么深层改革在政治上不断遭遇争论和冲突就在所难免。遗憾的是，绝大部分政治家通常只看重本届政府的有效期，不考虑任期 4 年(或者 5 年)之后的事情。那些向选民介绍长期目标的政治家需要很有说服力，或者特殊的个人魅力。在联邦德国历史上就有那么两次，一次是 1957 年路德维希·艾哈德把“社会市场经济”作为长远的目标提出来，第二次就是 1972 年维利·勃兰特基于持久和平所提出的“新东方政治”。这两次也都只有

一届联邦议会的多数席位。

至今为止的所有经验都符合这样的可能性:未来的政治抉择——其中包括选民的抉择——通常并非基于长远观点,而是以未来 4 年的期望值为基础作出的。所以不管是德国社会老龄化还是经济的全球化问题的调整,只能慢慢地向前推进。几乎在所有的工业国家都有一个反对改变的内在阻力,而德国特有的联邦式结构使这种阻力越发显得严重,其程度和特点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为了使德国经济能够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继续保持增长势头,那么尽快地加强德国在科研、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指导和扶持是当务之急。尽管由于生产力持续地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我们的生产型就业岗位逐渐地朝着服务性行业主动转移和深化,如果要继续有效地保持德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强势,我们就必须继续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和能力。这就要求给研究所和大型科研机构以及高等院校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而无意义的长期学习时间必须缩短,进入职业生涯的时间也必须普遍地提前。

保证基本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平等是同样的重要。进入高级文科中学以及大学的机会,不允许由于父母的收入状况而受到限制,所以助学贷款制度必须继续保持。这个大前提绝对不可以用于反对大学征收学费,也不可以用于反对各门专业的期中考试。我想向大众化的国立高校推荐一下汉堡巴修里斯(Bucerius)法学院的办学原则:入学录取通知书考试;用一年三学期代替两学期和长假期;缴纳学费,实施

奖学金退还制。既然再提高国家支出份额(即国家支出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百分点)的可能性极小,那就别指望靠政策性划分之争去增加科研、技术和教育的投资追加了。

绝大部分的西部欧盟成员国都面临类似的结构调整问题,而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可能遇到这些问题和任务。联邦德国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欧盟成员国的特殊问题:对当年强制单一经济下的东部持续了二十年的政府财政补贴,从西部向东部进行大规模的补助。如果没有这一部分的持续性开支,西部的国家支出份额现在也就不会是 47%,而仅仅是 40%,那么国家财政上的空间就大了许多。欧盟中再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负担,而它也确实是导致德国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其他欧盟国家的主要原因。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政治家还没有为东德转轨变型提出一个成熟方案的思想准备。遗憾的是,泰勒·莱克尔(Tyll Necker)、卡尔·席勒以及我自 1990 年以来所提出的所有建议在三届政府中都没有引起反应。东部几个新联邦州需要一个从长远看优于西部诸州的可行性普遍有效的经济竞争优势,在这一方面,就我们采取决定性行为而言,欧盟的所有协议和规则都不可能限制和影响。

欧盟机构还处在一种不健全的状态下。但自从它以错综复杂的规则和网络把整个欧洲覆盖起来以后,它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就在逐步地显示出来。尽管如此,在其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方面,德国还是自由的(国家负债最高限是欧盟唯一的一个富有意义的措施)。同时,我们在劳动力市场、福

利政策以及科学和教育政策的设计方面，也是自由的，唯有把贸易、海关、竞争、农业、国家财政拨款以及（自共同的欧元货币以及欧洲中央银行建立以来）货币诸方面的政策权交给了欧盟机构。就欧盟现在所能达到的融合状态可以做这样的总结：在解决欧盟民族结构问题方面，欧盟各国是自由的，所以德国的转轨变型问题纯属联邦议会及其政府的任务。

在富有民主特点的国家对社会进行转轨变型有可能引发恐惧和担心，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一个电子媒体所支配的社会中，变革所产生的作用远比在一个主要通过报纸和书刊获取信息的社会中所获得的效用要大，而这一点对我们德国人的适用性远比对其他欧盟邻国和合作者要更强。正是这一缘故，我们的政治阶层必须具有理性领导的意愿和勇敢无畏的品德。经济和社会的转轨变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其差别只在于如何进行：是政治领袖以其坚定的态度积极有效地准备并安抚市民的极度恐惧呢，还是引发大规模的抱怨和大量的损失？

联邦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1997 年和霍斯特·克勒 2005 年的纲领性演说已经确定了正确的方向，而格哈特·施罗德 2003 年的“2010 年改革纲要”也类似于此。政治阶层在这条路上的态度越是犹豫不决、行为越是优柔寡断，这场结构调整就越发茫然、越发缺乏计划性，从而甚至有可能导致极度混乱。因为我们不可能期待企业家、工会以及其他所有人在决策时首先以社会福祉为出发点，所以只有政治阶层充分认识到他们的长期使命并且真正地肩负

起这个责任,结构调整才有可能为民族谋福祉。

没有哪一种经济状态会自动地形成市场秩序、竞争秩序,它们也不可能自愿地平等对待弱小经济体和后来者,古罗马或者欧洲中世纪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哪里的秩序是自然诞生,它们都是政府建立和维持的。只要每天穿过吕内堡那一望无际的自然保护区(Lüneburger Heide)的仍然就是那么一辆邮政马车,而且一望无际的荒野上也就只有欧洲盘羊在漫步,那么这里就不需要人们建立什么交通规则。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1927 年孤身横飞大西洋时,他不需要制定什么飞行规则;鲁滨逊(Robinson)和他的仆人生活在那渺无人烟的孤岛上,他们就既不需要宪法,也不需要市场,既不需要钞票,也不需要银行监督。一定的秩序也就是在那些人们密集而共同生存的地方才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认识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的事情。现在,即便是像吕内堡这样的自然保护区也使用国家规定,譬如右边行驶、最高限速以及红绿灯。人与人之间生活的距离越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越需要明确的界定,因此调整彼此之间距离的规则非常重要。在 20 世纪时,许多国家倾向于实施严格的规则,直到 21 世纪初,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目前德国有大约 10 万条规则,它们分布在一千多个法则、规定、条例中。随着欧盟委员会官僚机构的增长和权力的扩张,这种规则、条例泛滥的风潮愈演愈烈。随着国家部门和机构的增加,它们所需要的经费开支也相应

增加,这笔开支在德国已经从50年代中期时占国家支出的30%增加到现在的占47%。

在德国,绝大多数人以及德国两大党派都想维护我们的福利国家和富裕生活,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未来奠定一个国家财政高收入的保障。这也就是说,税收和支出原则上无法减少。谁持另外的说法,那他要么会令自己失望,要么就是一个骗子。事实上,在政治争论中很少涉及国家财政来源的减少问题,更多地是涉及这些费用以及福利如何分配。尽管我们的高福利还不尽完美,可这种国家高财政支出毕竟属于那种为国民所喜欢的国策,而且也是德国福利民主的一个标志。

确认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保持目前这种国家法规泛滥的状态,恰恰相反,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大幅度简化我们复杂的公文扯皮是可能的,而且这将使绝大部分国民的感觉轻松一些。尽管在科尔政府领导下,确实发生了一场"国家瘦身"活动,然而消除或者说简化复杂法规的尝试却由于涉及许多既得利益者而告失败。大型利益集团对国家生活的巨大影响,从技术上讲可以通过联邦议会的一揽子立法方式予以制约。若各位联邦部长通过法律规定去类推的话,实质上就为那些议会外的说客们打开一扇一扇的大门。

譬如在联邦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51条第一款写道:"在联邦参议院批准后,联邦政府被授权公布实施这些法律的细则,这对于保障税收的公正,消除不合理状态,对处在最低生

存保障线下者免除税收,或者简化税收过程是必须的。"这种授权旨在把纯粹的法律细则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消除在摇篮状态下,这不仅把很大的权力给了联邦政府机构各部门,而且也同样给了16个联邦州的政府机构。可议会对这些权力不仅没有认真监督,而且招来了议院外说客们的插手。因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各种协会以及工会组织早都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影响渗透到政府机构中去了,所以立法机构给予政府机构的这种笼统授权完全是一种有害的腐蚀剂。

联邦议会应该对这种立法方式予以限制。立法机构对法律的具体细节保留得越多,那么规则泛滥的旋流之门无疑也就被开启得越大。只要立法者继续采用那种沿用至今的立法方式,换句话说,只要继续授权政府机构去宣布法律实施细则,那么削减国家官僚机构的良好愿望也就只能作为花瓶摆设。包括立法者(此处首先是指联邦议会的议员!)也得约束自己,因为联邦议会在许多情况下都被诱使着去尽快作出法律决定,而且要绕经联邦参议院,所有法律在他们那里都需三分之二的赞同票,为此就要补充详尽的细则,而所有这些通常都是那些议院外说客的活动领域,他们借以在政府机构和联邦各州政治家之间进行运作。同样无耻的是,国际说客和国内的官僚机构加上联邦的内阁部长们,通过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也在那一团混水中瞎搅混。

尽管代表个人利益并不违反宪法,从道德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有些协会以及个别大型工业集团和媒体康采

恩出于他们的权力和影响而对这一方面的要求太多，在此还有一些议院外说客的行贿受贿。同时，一些老总们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和一些经济丑闻（譬如新家园房地产公司、曼内斯曼公司、大众公司或者列支敦士登的税务绿洲）也危及着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信任感。这样的阴影属于市场经济的一个部分，在一个专制政府形式下或者一种强制性经济形式下也同样有中饱私囊者存在，区别恐怕只是在公众舆论中看不到罢了。在我们德国，媒体、法制化民主运转正常，所以这些蛀虫就可以被送上法庭。

这一条当然不适合于那些在法律范围内专为自己算计的人。谁若把人们对贪腐行为的不满情绪置于一旁，那他就没有看清楚在深层动荡的政治不满，而这正是由这些富豪们的极端行为所引起的。把一名肩负重任的老板与同量级的政治家进行类比是很难的。譬如在 2005 年时，一名联邦内阁部长收入大约 20 万欧元（此外还包括他作为联邦议员的税务部分），他的年收入大约是一名专业工人平均收入（纯收入 33000 欧元）的 6 倍，是银行职员的平均收入（纯收入 45000 欧元）的 5 倍。这个明显的收入差距还算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我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我希望，高层政治家与专业工人在收入上的这种差距不要再继续扩大。然而，一家银行老总的收入却是联邦总理的 40 倍，一名工业集团公司老总的收入经常 100 倍于他的专业人员。

通过报纸信息，市民获知了那些人额外的津贴和补助如此之高，自然而然地产生强烈的不满。我也有同感。以数倍

于标准工资的津贴方式对特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奖励,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客观地说,他们的成就不外是不断地发现和利用金融机构进行新的投机。以这种方式,首先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域空间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假贵族的强盗骑士阶层——“投资银行阶层”,他们不惜加重社会和国家的负担而大把大把地填充自己的腰包。尽管这些云遮雾罩的新型金融业务是合法的,可它们与市场经济的供求原则几乎毫无关系。尽管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对此予以抵制,可这种社会毒瘤依然还是在德国经济中蔓延。

与金融投机的国际浪潮同时兴起的,则是大型德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工资收入疯狂飙升的现象。显然,我们有些监委会人事局或者主席团成员,他们的瞳孔放大,分辨不出数量的大小。遗憾的是,这也涉及某些监委会的成员自身,他们是基于相应的公司职工股和工会的共同决定法则进入监委会的,所以一旦当他们在某个方面的让步对公司职工股有好处时,那么他们通常就因此而表示赞同,或者保持沉默。

因为现在关于最低工资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多,所以我们想,如果同时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最高工资限额也进行讨论,这不算为过。他们的工资不妨确定为几倍于联邦总理的工资,或者几倍于公司所有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一个经常可以听到的反对观点就是:“牌子”,或者国际竞争要求等同于美国的工资。可是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德国高层管理人员基于高工资而转到美国去工作。这里有一个显然是经济学专家所能听到和看到,同时也需要讲出来的问题:哪

位高层管理人员选择了与本企业股票挂钩的额外高额工资形式,因为这种工资结构实际上是导致自己公司股票投机和做手脚的导火索。

无论如何,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成员的工资应该像联邦部长一样是透明的。不同于私有企业家的是,政治家和老总们对他们错误决策和损失所付出的代价,并非私人财产,而是他们的声誉和位置(与此相关也许还有随后而来的罚金)。我并非以此主张给联邦总理或者他的部长们实施高工资,而是赞同规范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

这种传染性贪婪病已经在我国引发了不小的骚动,甚至嫉妒。谁在宣布高盈利和高红利的同时却又准备宣布解雇上千名雇员,那无疑要面临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的质疑。同样,如果有人把股东盈利解释为企业老总的最高原则,那么他的道德水平也令人侧目。当然,对于股份公司状况的评判,尤其是通过独立新闻媒体和立法部门通报财务,这无疑是富有价值的。同时还希望,联邦议会和社会舆论要努力,支持建立经理守则。为了增强德国社会对企业领导层的信任,一个“德国企业管理守则”应该是有益的。这样的规则不仅有助于企业成就透明,也有助于企业监督,同时也对国内投资者公平。在2002年通过的股票透明与信息公开法则,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现在所面临的就是,经济审计人员如何使其得以实施。

在这个问题上,绝大部分的私有企业是值得赞扬的:他

们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通常比被雇用的老总们要强得多。譬如在我的家乡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有不少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和私人公益性基金组织。因为在汉堡没有出现过皇帝、国王或者有侯爵封号的主教官邸,也没有修建过什么剧院、艺术收藏馆、孤儿院、医院或者老人院,所以许多市民就以私人基金会的方式来填补这个空白。继希维金(Sieveking)、莱茨(Laeisz)以及西门子之后,譬如还有格尔德·布策鲁施、库尔特·柯尔柏和阿尔夫雷德·陶普芬、奥图家族、格雷威(Greve)家族,现在汉堡大约有上千家私人公益性基金会,这在德国可是独一无二。

除了汉堡以外,也有许多不寻常的然而可以作为社会福利资本主义典型的企业,无论是博世、克虏伯、贝塔斯曼·莫恩(Bertelsmann Mohn)或者克劳斯·奇拉(Klaus Tschira)和汉斯-威莱尔·海克特(Hans-Werner Hector),他们不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使公司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而且形成了大规模的财产,但他们却只给自己和家庭留下很小的一部分,而把绝大部分通过福利性组织、基金会或者救济性活动用于社会福利和公众福祉。所有这些私人企业家所想的不仅是有益于个人,而且想着他们对公众福祉的文化和社会责任。"财产应履行义务。财产权的使用应该同时有益于社会公共利益。"这个基本法的原则绝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一句话,而确实被许多私有企业家看做他们的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自己的社会圈子中成为榜样。

在德国,那些颇有影响的公益性基金会没有哪一家是大

型上市公司董事会建立起来的。它们更多的是由个人、商人和工业界人士建立起来的。它们的贡献是巨大的。赞助者和慈善家原本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可惜在今天的德国,它却已经与“捐款人”这个名词混在了一起。这些捐款人想借此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因为捐款人的牌子略微高于产品推销员。所以就道德层面讲,没有太多可以赞赏的。我们的社会需要那些真正的赞助者、慈善家以及基金资助者。

遗憾的是许多做善事的人一直保持匿名。令我感到忧虑的是,他们以私人资产所建立的公益性基金会需要社会的认可。为什么一个公益性基金会不能像一名好的电视演员或者一名政治家那样,至少在一定的范围获得社会认可呢?社会舆论的认可将激励人们的效仿。想象一下,是否可以考虑把那些做善事者的名字明显可见地雕刻在帝国大厦的墙壁上,或者刻在联邦议会的座椅上呢?

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有益于社会为出发点,无论这种追求是通过单个的人还是通过整个国家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经济学家把个人利益看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则与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观点相反,他由企业家(即“资本家”)引申出了“阶级斗争”,并且让其不可避免地结束于“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实现了民主原则,而另一方面却通过福利国家使 19 世纪曼彻斯特被驯化的资本主义继续开花结果。可是这种

意识形态还在蔓延：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身上，也表现在自由主义身上；要么就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福利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多变量，要么就是“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us）。秩序自由主义不仅不愿承认我们国民经济深深卷入世界经济之中的事实，而且主张经济保守主义，要让一切保持原状而不改变。

20世纪不仅带来了欧洲福利国家的诞生，而且也使两种新的经济学思想问世。凯恩斯主义坚信，通过国家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从而增加需求，克服经济增长的危机。这是一种为希特勒和沙赫特（Schacht）[①]所践行的政策，因为当时德国的对外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几乎不值一提，而国内则通过强制性外汇经济、通过工资冻结和价格冻结以及其他的强制性措施而实施领导。对今天的德国国民经济来说，一个按照沙赫特那种增加钞票数量的方式根本就不用想，所以经济政策上所追求的扩大市场需求也就只能通过提高国家支出的方法才可能实现，实质上也就是唯有通过增大国家赤字的方式才可能实现。它同时也将形成一个进口的高潮，所以就创造就业机会而言，从根本上恐怕也就只能是外国获益。所以我在德国马克的时代就曾拒绝了这种美国人的无理要求，因为这种通过刺激形成“消费热”的方式会把德国变成高赤字国家。

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和类似它的货币主义从一种国家“增强供方”的观点出发，认为通过降低国家支出——具体的

①全名 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1877—1970）：德国政治家、银行家，曾任帝国银行行长。

就是限制税收(最终也就是缩减福利!)——以及解除对个人追求盈利的束缚等方式方法,就可以使经济复苏。这两种偏方对德国现代国民经济都不现实,因为德国经济和社会已经在欧盟共同市场、欧元区域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中盘根错节,如果不顾及我们对国际的依赖性这一客观现实,生搬硬套经济理论,就可能导致我们对外政治冲突和对内经济危机。经济政策所依据的是客观实际状况,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路德维希·艾哈德所主张的就是,为了使实际运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一种富有成效的市场经济政策口号就要从内容上具有足够的不确定性。即便是福利国家或者说富裕国家的政治口号,原则上也要为政治家留出足够的空间。同样,作为社会平等的关键性口号也要考虑到这一点,无论它们是针对收入还是税收,或者就社会福利而言的。

既没有哪一种经济理论,也没有哪一种意识形态适合于二战后德国或者日本的重建。我个人所认识的那些富有成效的经济型政治家,有 40 年代末期和 50 年代初期的路德维希·艾哈德,60 年代中期的卡尔·席勒和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活跃多年的美国人艾伦·格林斯潘,1979 年以来的中国人邓小平和 1990 年以后中国的朱镕基,新加坡几十年的政府首脑李光耀。他们无一不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理性实践能力;同时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把市场、私有企业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看做理所当然的。

在 20 世纪后半叶,在绝大部分工业国家中,政治和经济彼此相互交织的状态远比所有经济学理论中所能认识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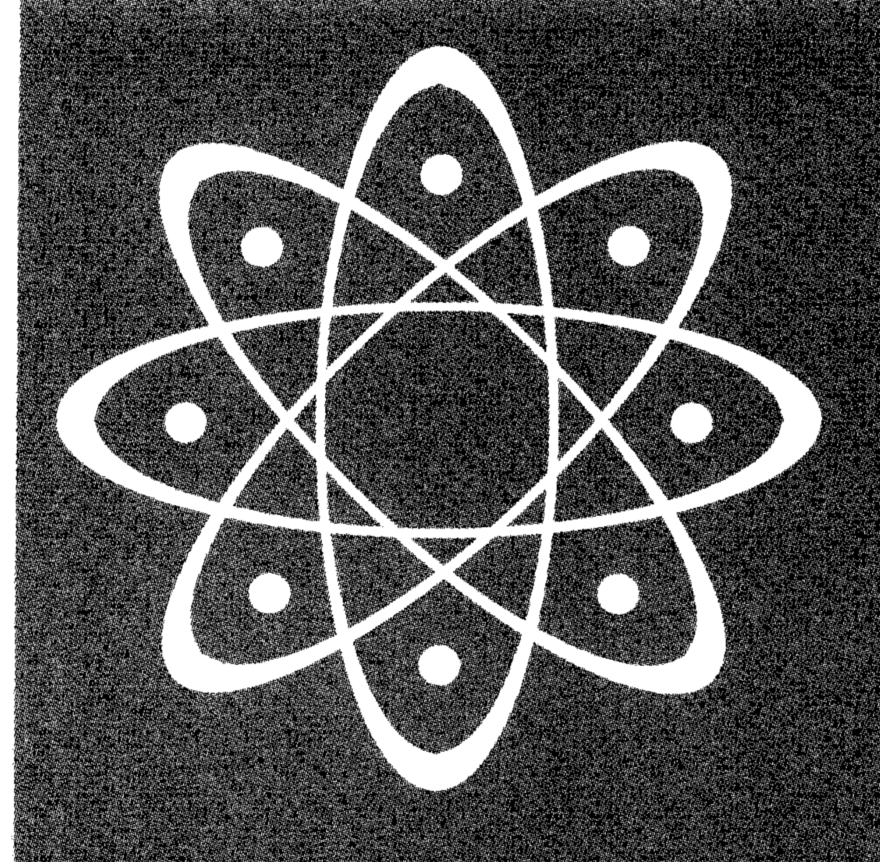
在形式和内容上所能概况了的要强、要大、要丰富许多。因此在世界许多高等学府中,经济学的数学化发展得很快、走得很远。许多意想不到的意识也在日常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中起到某些作用,而这些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无法预计,甚至不可能被考虑到,譬如政治性事件、其他国家经济决策失误的连锁反应,或者股市风潮等。

因为德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极大程度上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了,所以根本无法再用民族经济这个德语词汇;因为我们高比例的进出口份额使我们早就与国际经济捆绑在一起,所以就只能同生死、共命运了。由此就可以看到,当充分地考虑到了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中那丰富多彩的变量所带来的综合影响时,才能谈得上理解我们的国民经济,才能谈得上对它产生有效影响。在此面临一个迄今为止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我们的政治阶层对理解我国经济对外的依赖性感到力不从心,无法从中得出必然结论时,我们经济学界那过时的理论所能提供的帮助却极为有限。在此情况下,那些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也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实践理性了。

理性和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经济增长率,我们就不免会遇到分配之争,它可能导致政治的混乱;没有高就业率,我们就无法继续那些为解决社会人口老化问题而必须进行的转轨变型。尽管在民主制度下,由于选民的希望,由于重新当选的期望,政府通常都以 4 年为期进行领导,但我们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却只能从长远出发,因此必须要求我们的政治领袖们有一个长远的计划。他们应该相信我们民族那顽

强的生命力、勤劳的品格以及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的政治家和党派同时也不可以忘记:仅凭稳定发展的经济和高就业率虽然还不能保障国家和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可高失业率和对经济发展的极度不满情绪却有可能埋葬国家和社会的民主。





Ⅵ　宗教、理性与道德良知

是基督教的烙印吗？

直到二战结束，我还不十分清楚，“第三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唯一知道的是，我要反对它，可无法明确地回答为什么。随之面对的问题就是，究竟应该怎么办？我此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基督教上。我把自己看做一名基督徒，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外部的影响而形成的。我自己对基督教并不了解，对伊斯兰教也一无所知，对儒家思想更加陌生，对康德和启蒙运动也不了解。当我 1945 年结束了 8 年的兵役回到家时，已经 27 岁了。也就是说，我早已经成人了，可我知道的东西太少，我唯一清楚的就是：绝对不能允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我很快地就转向了争取民主与和平，但我并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

我的基督教启蒙并非始于父母影响，而是 1934 年起于成年坚信礼基督教课。在这个课上，我学习了最重要的信仰内容，可绝大部分也只是囫囵吞枣。圣父、圣子和圣灵，耶稣的诞生，空墓以及耶稣升天，那不同的奇迹，还有旧约全书中的那些故事，有关该隐（Kain）和亚伯（Abel），诺亚（Noah）和

他的方舟,关于召唤摩西到西奈山并授予他十条诫命,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来说,绝对是闻所未闻的故事。尽管我把上帝看做真实的存在,但是我却无法理解三位一体。我也没有办法相信,上帝把他的儿子送到地球上来,为的就是让他被钉到十字架上,然后再把他接到天国去。如果耶稣确实是上帝之子,那么为什么不让全人类都成为上帝之子呢?我尽管和别人一起作祈祷,但是那祈祷似乎对我很遥远,唯有其中的一部分是我感触很深地说出来的。当然,我也明白,只要谈到圣经作为一本神圣的书这个题目,不仅我们的牧师瓦尔特·乌萨德尔(Walter Uhsadel)相当严肃认真,而且许多人也都非常的严肃认真。

7年后——我们落入俄国人的手中,我也许早就该看到我们必然失败的结局以及德国不可避免的潜在灾难——我们炮兵连的一名士兵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一名正在学习的神父(或者教士)起初就是由于两句基督格言而加入基督徒行列的。我对他抱怨说,我们在这里战斗,而且许多人都牺牲了,但我们所期望的不是自己的胜利,而是结束战争。我们出于责任服从命令,但事实上我们对这位领袖的理性持怀疑态度。出路在哪里?这位年轻的神学工作者以圣·保罗的罗马书信中的一段话回答了我:“对有权柄者人人当服从……所有有权者都是上帝所命。”在这段对话中,我忘记了另外一句:请不要忘记,一切都是以上帝的意志而发生。这两句话令我在那天晚上得到了安慰。

无疑,这种帮助持续不了多久,因为谁都会反问,难道战争

真的是上帝的意志吗？为什么上帝能容忍这位在我看来发疯的“领袖”作为当权者？我清楚这一点：许多人在基督教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对信教者都一直很尊重，无论他们信奉哪一种宗教。所以我认为宗教的宽容、和谐是必需的，我觉得，基督教的传教使团是违背人性的，因为一个人在他的宗教信仰中获得了寄托和安全感，那么别人就没有权利把这个宗教从这个人的信仰中给剔除出去。

如果一名基督徒、一名穆斯林、一名印度教徒或者一名犹太教徒，把他的宗教信仰作为权力斗争、占领掠夺和压迫的托词，或者如果他自认为，唯有他所信仰的宗教源于上帝的启示和祝福，并因此把抨击、打倒其他宗教看做他的责任，这就侵犯了其他宗教信仰者的信仰自由和尊严，那么其所为也就走到了善行的对立面。人人都宽容他人的宗教和信仰，同时也要容忍他人的无神论。人类需要宗教信仰的宽容与和谐，因此对每个具体的宗教的宽容、和谐是必需的。

所有宗教都起源于人在精神指导上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所有神圣的典籍都是人写的；所有的宗教禁忌、规范、传统和礼仪都是人的杰作。绝大部分德国人是基督徒，他们进的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新教的教堂。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不想过圣诞节，也很少有人想退出自己所在城市的教会团体，就是那被战争所毁坏了的德累斯顿圣母教堂[1]（Frauenkirche），也

[1] 德累斯顿的圣母教堂是巴洛克式路德新教教堂，始建于1726—1743年，是欧洲教堂建筑艺术成熟的标志之一。二战时毁于1945年2月的空袭。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作为对战争的警告而保持着被毁掉的残垣断壁，在两德统一后，开始重新修复。



是由许多市民自愿重新修建起来的，而这些重建者之中不少人原本与基督教保持着距离。尽管启蒙运动已经有 400 年的历史，尽管有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但是人在精神指导上的形而上需求依然是生机勃勃地存在着。

当我和恋人露凯在战争中期准备结婚时，我们选择了教堂婚礼。我们俩那时都是 23 岁，对未来我们是一片迷茫，不知道能否活到战争结束，因此希望尽早地结合在一起。正由于类似的感受，当时造就了一些战争婚姻，可为什么非要选择教堂婚礼呢？

在家里，我们俩在反对纳粹这个问题上是相当坚定的。尽管我们对纳粹的大规模性犯罪一无所知，尽管我们对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无所知，可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其他罪行，所以我已经明白，纳粹是发疯了，德国的结局将很悲惨。我所想象的结局远比事实上的结局要糟糕得多。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我和一位长辈一起陷入激烈的战火。这位长辈是我父亲的好友，大约长我 25 岁或者 30 岁，是这支后备军的上尉，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小兵们有一定的权威。我朝他高声呼喊："这举动会把德国给毁了，那新德国的建筑风格肯定是临时木板房。如果我们能住在木板房里，而不是这地下坑道里，我们也许会很高兴！"这就是我那时对最后结局的想象，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了道德的衰落。

我当时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也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教会，所以人们就必须支持教会。夫人与我有同感，所以就

有了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决定。一些熟人把我们的教堂婚礼看做我们对当局的抗议，其实并非如此，况且我们也不属于那些抵抗者的行列。我们的教堂婚礼并非皈依基督教的标志，它更多的是我们对教会道德力量的期望，盼望着在结束了恶的一页后，能借助于它在德国重建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

我早已经明白，这个想法太理想、太天真了。我们所期待的那些，教会根本不可能创造出来。正是露凯的牧师理查德·雷默(Richard Reme)给我们以希望。作为出身于无神论家庭的露凯，要想在教堂举行婚礼，就先要接受洗礼。她的牧师相信旧约全书上的创世史，而露凯却相信查理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他们俩的讨论持续了半年的时间，雷默终于明白，他说服不了露凯，但他还是给露凯进行了洗礼，因为他理解她入教就是为了在教堂举行婚礼，并且认可了她的选择。

在纳粹统治和战争期间，不少德国人保持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一小部分从他们的信仰中获得了反抗的力量；在知道这场犯罪的人中，有少数被惊呆了，并且因信仰而增强了反抗力；在那些奋起反抗的人中，也有那些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却依然做出了壮举的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民众之所以能奋起反抗，关键是因为他们知道了纳粹的罪恶行径。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那些军官，他们在希特勒进攻战的早期准备及其实施过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当发现希特勒的疯狂犯罪以及不可避免的失败时，他们作出了谋杀独

裁领袖的决定。绝大部分德国人显然是要么喜欢绝对地服从命令,要么就特别反感。绝对服从当权者早在威廉二世时就出现并存在着,而且就这样在纳粹时代一步步潜移默化地演变成了绝对服从,就此可以说,楚克迈耶[1]没有杜撰"科佩尼克上尉"。

在现代的德国,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自由发展的基础上明显好于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一方面,国家在宗教信仰和世界观上的中立得到了保障。近几十年来,教会设法对政治进行影响的事情已经极为少见了,以主教通告的方式左右选民意志,或者诱导教徒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党派这种现象更为少见了,事实上教会在介入政治的影响方面也明显地减弱了。另一方面,教会也获得了自我决定权和自由,俾斯麦压制天主教的时代以及后来纳粹约束基督教新教的时代已经彻底地成为历史。

德国教会界的一些人士也许低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基督教的影响力在逐步地下降。至少 1945 以来,基督教信仰在市民的心灵深处早已不那么稳固,以至于教会在重新以道德为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方面明显地缺乏号召力。这一点早在 40 年代末期就已经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而且这对我来说,无疑带来一种难以抑制的失望。即便是 1945 年新成立的"德国福音教会"所发表的斯图加特认罪书也并没

[1] 全名 Carl Zuckmayer(1896—1977):德国著名作家。

有真正地揭示未来，尽管它公开宣告："我们必须忏悔的是，由于我们没有勇气认罪，没有真诚地祈祷，没有发自内心的信仰……那么现在，我们的教会应该有一个新开端。"实际上，这个新开端不仅需要美好的愿望，而且需要多方面的、强大的力量。可是这里所需要的力量，天主教和基督教两个教会所能给予的都非常有限。

除此之外，这种新开端其实早在一些精明能干的政治家那里就已经崭露头角，譬如魏玛共和时期的个别杰出政治家，后来的阿登纳、豪斯、舒马赫等。当两个教会及其教友们尝试着认可自己的政治状态时，一个成果在政治领域里形成了，那就是：一个不仅仅局限于忏悔的基督教党派问世。

我们同时也需承认，形成西德的现代民主制度并非是那些魏玛民主时期政治家的杰作，也非这个新建的基督教党派之功劳。德国人之所以自联邦德国诞生之日起就特别地赞成民主和自由，并且致力于建立法制国家基础，这更多的应归功于路德维希·艾哈德那令人惊奇的经济成果以及美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正是这二者增强了我们德国人对民主的信心。承认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令人难堪之处，卡尔·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说法的合理性就在于承认：如果执政党不能有效地保障国内的经济和就业岗位，那么民主制度就会面临危险。

在这个基督教党成立的第一年，路德维希·艾哈德还不是其党员，对于是否加入基民盟这个党派，他一直犹豫着。对此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基督教信仰与党

派政治之间的搅混有些不伦不类。尽管在1950年，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把矿山联盟计划看做天主教的教友式和资本主义式的联合计划予以排除时，我觉得他误解了这个计划。但是对于一个政治党派完全有意识地与基督教教会挂钩的方式，我也觉得这是一种倒退，是向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倒退。因为这种党派方式潜藏着贬低其他党派成员人格的成分，把他们划归为异教徒，看做是没有基本道德和价值观的人。在这个基督教党派中，把自己的政敌斥责为基督教信仰的敌人或者共产主义者的闹剧不在少数，甚至说："条条社会主义之路都通向莫斯科。"

我尽管对许多基督教教条表示怀疑，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名基督徒。尽管天主教与新教（基督教）分裂，它们之间的神学争议持续了几百年，可我对此不以为然。我乐于同有经验的教会人士进行接触和交流，从他们那里获得补充和提高。但在公开的讲话中，我当然要避免对任何基督教学派的依附。不可否认，我经常违反最后这一条原则。1976年，我在一个小册子里把战后30年所获得的所有认识概述为基督教信仰，但我在书中依然保持特殊信仰内容和神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基本区别。只要我还任公职，那么就不太乐意到教会去作报告，但以私人身份我却不愿意放弃许多教会团体所发来的邀请，尤其是从我离开总理府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结束的那8年中，我几乎每年都到东德的教会或者宗教团体去作报告。我提出的要求也就是给报告人摆上一张斜面讲桌，因为我不想像一名基督教传教士那样站在布道坛上去讲话。

绝大多数情况下，我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

告别政府工作后，我保持了与宗教界著名人士的联系。与维也纳退职的红衣主教弗兰茨·柯尼希（Franz König）见面使我受益匪浅。2004 年以 98 岁高龄去世的柯尼希是一个特别聪慧的人，他生前的威望可以说是随着年龄递增。当我最后一次在维也纳拜访他时，他住在一幢教会（也许是一个修会所属）的房子里，一名修女照顾着他的起居，并负责他的全部事务。临别时，他向我伸出手并说："施密特先生，请别忘了个人祈祷的力量！"在这一时刻，我明白，他这是在与我诀别，我再也不能见到他了，而这就是一个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者的遗言，我将终生难忘。我并未能如柯尼希所愿坚持祈祷，但我却在几年后再次来到维也纳，并且想拜祭一下他的陵墓。我获悉，这位红衣主教被埋葬在斯迪凡大教堂地下室的墓地中。我沿着楼梯拾阶而下，来到了地下墓室，维也纳历任已故红衣主教的棺椁都埋在下面，其中也有弗兰茨·柯尼希的。对这位智者的回忆不禁令我热泪夺眶而出，为掩饰自己流泪的举止，我一时间手足无措，让当时陪同的红衣主教大惑不解。

在离开总理府的 25 年间，我不仅与基督教、天主教教会的上层人士保持着联系，而且也结识了穆斯林、犹太教以及佛教的许多代表人物。同时在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一些朋友们的交谈中，我对至此依然陌生的其他宗教以及哲学的认识大有所获。这种充实虽然拉开了我与基督教的距离，但却强化了我的宗教宽容，可我始终自称为基督徒并且依然身在

教会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抗拒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沦落时，正是它给我们提供了某种支持。没有这种在基督教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责任和道德，我们德国人就不可能彼此和平共处。

基督教神学教育我们保持"三个美德"：信仰、爱和希望。同时还有四个基本道德"智慧、节制、正义和勇敢（敬神）"，也就是托马斯·冯·阿奎纳所强调的四个"善行"。我们现在常讲坚定不移、不屈不挠，或者说"果敢"，这就是勇敢这一美德的替代。果敢作为美德得到宣传和颂扬，尤其是当自卫成为正确而必要的行为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它们的基本美德中都没有包含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和认可，相反只有我们的基本法把人的尊严作为国家的基础，而且是以全部法律的名义。没有对他人尊严和权利的尊重，就既不能有平等，也不会有自由可言。

基本法没有提及其他的道德，但"常人"的道德使我们明白，一种很深的误解有时也被看做"道德水准太低"的表现。一旦个人对大众福祉不负责任、失去大局意识，那也就失去了礼貌、诚实、纯洁和秩序的感觉，那么一个自由的社会就无法维系。几十年前，我的好友玛蕾恩·登霍夫伯爵夫人和赫尔贝尔·维希曼（Herbert Weichmann）就明确地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一个没有道德礼貌的社会将不断地相互蚕食并且因此而走向毁灭。为了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就有义务给后来者们以榜样。我们的教会也应该在此给我们以勇气和支持。

不久前一位朋友问我，我在就职宣誓时所补充的那个句子："上帝将帮助我"——我在出任联邦总理宣誓中的一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必须承认，我对此问题没有办法给出理想的答案。如果一定要我给出一个回答，那我就只能说：这话表现了我的信仰形式，认为上帝会帮助我，可这不是真话，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信仰。即便是上帝这个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是一种支撑我们道德信念的表述方式，但是这种对宣誓诺言保持诚信的责任感却深深地潜藏在我心中。

再深想这个就职宣誓，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否有"上帝将帮助我"，这种誓词都作为一种欢乐的诺言，形成于几百年前，而且将继续长期地保持下去。它实际上是对王室、代表大会或者联邦议会，或者法官和国王的许诺。我们的法律制度把在法庭上发假誓看做一种故意做伪证，那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但相反的是，违反了某种誓词却不受惩罚，譬如宪法法院把一个为联邦议会所批准的法律，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判定为违反宪法的，在此情况下则没有任何人受到刑罚。

政府首脑宣布维护、遵守宪法，但每年都有许多争议问题。在此不仅常人对政府具体行动是符合还是违反宪法争吵不休，有时候甚至就连法官们也意见分歧，这既不是政府首脑的就职宣誓改变得了的，也不是法官的就职宣誓所能改变得了的。所以说，就职宣誓也就只是对自己心灵的提示，或者说是对违反责任行为的一种预先警告。同样，宗教的信

条也不可能对此有所改变。

尽管这个附加句子所表现出来的内容非常明显：我，宣誓人，相信上帝。但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在耶稣基督名下发生了那么多的战争和犯罪！它们的名称从血淋淋的十字军到教皇波奇亚(Borgia)，从无数的焚烧异教徒和焚烧妖人到掠夺性战争。1914 年，在德国士兵皮带扣子上还出现有这样的词："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这里的上帝当时指的就是基督教的上帝，甚至牧师还以宗教仪式来净化军团的旗帜。到了现在，宣誓者口中的"上帝"才出现多样化，有可能是穆斯林的真主，也有可能是犹太教的上帝。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这种以上帝名义的宣誓以及那些在上帝名义下的额外补充实际上都是徒劳的。

当然，我对这种与宗教形式相连接的就职宣誓是可以理解的。我知道，我们国民的绝大部分都相信上帝，而且他们期待着上帝的召唤。满足并迎合国民的这种心态，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我个人更喜欢没有额外的宗教形式，而是按照我的良知去努力，去实现自己就职宣誓中所许的诺言。就职宣誓是基本法中唯一提到上帝的一处，但基本法明确地表述："就职宣誓也可以在没有宗教保证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就职宣誓，还是在法庭上的证人宣誓，这都需要当事人自己来决定，他是否愿意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宣誓。我当时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就职宣誓，而且丝毫没有犹豫，尽管我怀疑，究竟马丁·路德或者罗马教皇是否承认我是一名基督徒。

世界宗教之间的宽恕

关于良知有不同的神学解释和哲学解释。“良知”一词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后来圣·保罗和基督教神学家们用它来表述人对上帝及所期盼的秩序，而且任何对这种秩序的违反都是对上帝的罪过。我们以良知来区分“好”和“坏”，有些基督徒称之为“上帝对人的规定”。我从好友理查德·施罗德身上觉察到，也许我们是从圣经思想与古希腊文化世界的融合中来理解良知的。

伊曼努尔·康德终生致力于对良知的思考，但是他却把宗教的影响排除出去。对他来说，良知就是“人的内心庭审的那种意识”。无论良知是源于人的理智，还是上帝所给予的，重要的是有人的良知存在，这一点至少是无可置疑的。无论他是一名穆斯林，还是一名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徒；无论他是不可知论者，还是自由的思想家，所有活着的人都有良知。唯一不同的是人可能会违背自己的良知，或者良知陷入误区。我们都曾或多或少地经历过被迫暂时或者长期游离良知，这大多源于人的软弱。

对我来说，何为良知这个问题类似于灵魂之所在。在大



约100年前,奥古斯特·比厄[1]给许多人做了手术,但他没有在哪一次手术中发现一个灵魂。即便如此,也从没有哪一位对我们都有灵魂这个命题表示怀疑。令我一直难以理解的是,既然良知是上帝给予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看到宗教的排他性,譬如在基督教或者在伊斯兰教中经常看到、听到的:你错了,而我却获得了顿悟。我的观点,我的目标是上帝之意,但你的不是。红衣主教拉青格[2](在他被选为教皇前)就这样写道:"基于感性的良知我们可以说,假如基督教信仰的道德权威突然从人类消失的话,那么人类的生存就将面临灭顶之灾。"这种自我确认的"宗教良知"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导致了难以计数的灾难和痛苦。无论是威廉二世把自己标榜为"上帝庇护"的君主,还是乔治·W.布什——以接受上帝派遣的名义却犯下有悖宗教信仰之罪过——发动"制裁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进攻性战争。这样的政治家都认为是在完成基督的使命,可宗教不过成了他们政治合法化的工具而已。

我早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典型结论:无论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宗教领袖或者一位国家领导人,只要他把宗教信仰变成自己争取权力的工具,那么此人就不可信;如果有人试图把那种以彼岸(天国)世界为基础的宗教思想与现实的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那么请注意,务必与这样的人保持距离。此告诫既适用于国内政治,也适用于那些靠宗教信仰

[1] 全名 August Karl Gustav Bier(1861—1949):德国外科医生。

[2] 全名 Joseph Alois Ratzinger(1927—):现为教皇本笃十六世。

来实现自己利益的市民。我们必须要求政治家给其他宗教信仰者以宽容和尊重，作为政治家，谁做不到这一点，那他不仅有可能会对国内和平带来威胁，而且有可能会危及对外和平。

令我不安的是，在21世纪初，一场因宗教信仰而引发的或者与宗教有关的全球性“文明冲突”似乎不可避免。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恐怖事件以及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将宗教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动机与无节制的统治欲搅混在一起。而对贫穷的不满、对其他富裕者的嫉妒再加上巧言令色的群众性煽动，很容易形成反抗、侵略以及暴力心态，而且对立的双方也都在这样做。是啊，西方奉为理想、典范的人，却以武力的方式强令完全以另外一种方式发展起来的社会和文化接受民主和人权，那您对此会作何感想?！一些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及基督教福音评论家和政治家也在鼓动民众的情绪。从曼哈顿正在燃烧的两栋世贸大楼那令人瞠目结舌的图片，到位于伊拉克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的美国监狱那令人震惊的录像，所有这些通过电视、报纸传播开来，引爆了人们的愤怒和仇恨。每天都有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的新照片、新消息，它们不断带来新刺激。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在所有各方都在不断地增长，理智那冷静和审慎的声音很难找到听众。在一个为歇斯底里所淹没的、极度兴奋的群众浪潮中，对理性或者对个人良知的声音显得特别微弱。

半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是自以色列国与它的阿拉伯和穆

斯林邻国之间开始冲突以来,在双方都有些审慎而深思熟虑的人,他们为了和平而主张理解和妥协。在牧夏·达扬的晚年,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这一点,伊扎克·拉宾对和平的愿望也同样坚定不移。也有一些视野跳出地区性冲突的人士,他们主张不同宗教之间的世界性和平。早在 90 年代中期塞缪尔·亨廷顿那醒目标题性口号提出来之前,安瓦尔·萨达特就已经指出,世界性宗教文化面临冲突的危险。

当我 1977 年在埃及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时,我和萨达特就成了朋友。我们一起沿着尼罗河行船到阿斯旺水坝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是一个星光闪烁的夜晚,我们坐在最上层的甲板上。就在我们观赏繁星之际,萨达特向我解释了世界上最大的三个一神论宗教的共同未来。他谈到了诺亚、谈到了亚伯拉罕(Abraham)和他的两个儿子艾塞克(Isaak)和艾施迈尔(Ismael),也谈到了摩西(Moses)和旧约全书中的犹太预言家。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这些名字也都出现在古兰经中。萨达特向我解释说,古兰经把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看做"文字民族"予以尊重和保护。尽管他们是不信伊斯兰教的民族,但他们有文字,那是真主给予他们的。萨达特知道这些彼此一致的道德戒律以及共同的和平信条,譬如那些在犹太教旧约全书中的,在基督教中有关上帝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中的,或者在穆斯林的古兰经中的道德训诫,它们从内容上彼此相互一致。

第二天,我就萨达特所讲的这些作了一个记录,在后来与所有这三大宗教界人士的谈话中,萨达特所讲的这些都得

到了证实[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他对摩西与埃及法老埃赫那吞(Echnaton)之间有某种联系的猜测,埃赫那吞在公元前1340年投注了很大的力量,试图把埃及的泛神用一个阿吞神来取代]。

萨达特的说法对我影响很大,如果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最终真正地明白,他们的宗教原本同根生的话,那么这三大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是可能的。一旦他们真正地认识到彼此间的共性,那么争取和维护相互间和平的愿望就一定能够实现。萨达特是一个将军,一名职业军人,他参加了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所有战争。显然,近年来,他已经在以宗教宽容的思想方法去从政,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拜访昔日的敌人,尝试着去与以色列握手言和。我们就此作了详尽的交谈,当1977年11月真正面对这个问题时,他早已经做好了必须面对何种政治风险的思想准备。他也知道,这是以自己的人生为赌注。在我所认识的所有国家领导人中,他是唯一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人,因为他明知危险,却依然服从自己的良知。1981年10月他被谋杀,这消息令我痛苦万分。

与萨达特的谈话引发了我对伊斯兰教的兴趣,我由此也努力去加深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理解。通过学习我得知,这三个宗教在欧洲中世纪就有过几个和谐的时期。斯陶芬·弗里德里希二世①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以西西里为基地进

①Staufer Friedrich II(1194—1250):也有人将其翻译为腓特烈二世,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德意志国王(1211—1250年在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20年加冕),也是西西里国王(称腓特烈一世,1198年起),耶路撒冷国王(1225—1228),意大利国王和勃艮第领主。



行着统治。在他着手制定的“梅尔菲宪法”中，他对基督教、穆斯林和犹太教一视同仁。不仅在基督教领导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宫廷中，也包括在穆斯林领导下的巴格达和西班牙的都市科尔多瓦，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的理论家们都一起为奠定欧洲科学的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成就涵盖了从数学到医学、哲学的所有领域。其中的著名人物如 1135 年出生于科尔多瓦、70 年后逝于开罗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他作为穆斯林统治者的宫廷医生，属于著名的犹太教理论家；大约 980 年出生于现在名为乌兹别克斯坦(Usbekistan)的阿维森纳(Avicenna)，以及 1126 年出生于科尔多瓦的阿威罗伊(Averroes)，他们在几个世纪中都属于欧洲最重要的医学家和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仅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交给了我们，也把阿拉伯穆斯林的理论中心建立了起来。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阿拉伯—穆斯林翻译工作，那么我们今天对古希腊那些重要文章所能获得的认识恐怕就极为有限了。不同宗教之间的这种富有成果的合作由于西班牙的复地运动而葬送，而这场所谓的运动不过是基督徒要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和宗教权力的争夺战。1492 年，当“天主教国王”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完满地结束了这场战争时，就连犹太教徒也被赶走了，欧洲的宗教宽容与和谐也就由此而告结束。

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和平共处在今天依然是可能的。新加坡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在那里所实施的是一种权威主义的严刑式领导。而另外的一个例

子是我 1986 年在印度尼西亚看到的。印度尼西亚大约 2.4 亿人口，在所有穆斯林国家中是一个人口大国。大大小小的数千个岛屿漂浮在数千公里的海面上，许多不同宗教的人们和少数民族生活栖息在这里。在经过多年的抗击荷兰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流血奋斗之后，苏加诺总统用一种单一的官方的印度尼西亚语——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代替了国内的多种语言[①]。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说，这也就是一种新的、相对容易学习和掌握的语言，这种语言在报纸、电视以及国家政府部门全部通用。

难以比拟的还有苏加诺的领导艺术，他不仅要把穆斯林而且还要把其他宗教信仰者(其中也包括基督徒)聚集到一起，使他们所有人都信奉一神而且是同样的神，对上帝的信奉被写进宪法，成了五个基本价值观之一。围绕着这些国家教义，当年的政治家和军界人士通过他们的代表进行了反复的谈判。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我此刻并不敢保证，自己多年前的正面感受如今是否还能看到，印度尼西亚是否还能继续走在那时的路上。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总是传来暴力反对华人、致使多人死亡的坏消息，但是苏加诺的尝试及其思想方法还是很有价值的。

自离开政府职务以来，在多次的国际宗教公共场合，我都尝试着就这三个宗教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观进行介绍。

---

①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第四人口大国，有 100 多个民族，其中爪哇族占 45%，巽他族占 14%，马都拉族 7.5%，马来族 7.5%，其他 26%。除官方语言为印尼语外，还有民族语言和方言约 300 种。



我从开始介绍就明确地指出，事实上这三个宗教的圣书都强调和平。古兰经说：只要这些无神论者不打扰你们，不与你们发生冲突并且给你们显示和平的话，那么真主就不允许你们去对这些人发动攻击。在马太福音有耶稣之言：和平共处是最美好的，因为这就是上帝之子。在旧约全书第 34 章中写到：存留慈爱，赦免罪孽；需求和平并追随它前进。

我尽管也知道，从圣书中也能读到那些相互对抗的原则，但没有哪一位否认，所有这三个宗教都呼吁和平，而希伯来语的 Shalom 以及阿拉伯语的 Salam 都是和平、安宁之意。谁想寻求不同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就应该宣讲宗教信仰的宽容与和谐。无论这些听众聚集在哪里，无论是在犹太教教堂，还是在基督教教堂或者穆斯林的清真寺，或者是在中学、大学，或者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他们都需要明白，其他宗教信仰者也是像他们一样的有信仰者，他们与上帝的距离就像我们与上帝的一样。尽管那些教徒的祈祷方式、传统习惯、教规等不同于我们，但他们对认可和尊重的要求，也像我们自己所期望得到的一样。我坚信，不仅这三个宗教，而且印度教、佛教等都同样需要宽容和尊重。

我同时也知道，在 2000 多年前有两位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不需要宗教，这两位就是苏格拉底和孔子。他们两位没有留下亲笔撰写的著作。从他们的学生那里，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把他们的道德伦理学说纯粹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他们既没有创立宗教，也没有改造、翻修或者重新整理宗教，他们的力量来自认可宗教的基础和前提。他

们只是借助于对话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讲述了出来，可是他们的思想至今依然对人类发生着作用和影响。没有苏格拉底就没有柏拉图，没有亚里士多德，也许就不会有伊曼努尔·康德；没有孔子和儒家，中国以及这唯一的一种在人类历史上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文化就无法想象。一名哲学博士也许会认为这样的说法过于简单，但我在此却想对它做进一步的明确定义，那就是：著名的认知和科学成就、道德伦理学说和政治学说未必要与宗教相挂钩。只要个人明确自己的理智责任之所在，这就足矣。

在我所认识的当代思想家中，汉斯·库恩(Hans Küng)当属与众不同者，他坚信世界上的所有宗教在其理论和伦理道德原则上有着共同的基础。这位天主教神父以与世界其他宗教共存的动因，在温和的福音文章中，对所有宗教的共同伦理道德原则进行了探讨和归类。寻找出所有宗教的共同价值原则——“世界伦理”，这就是他致力于此的目的。这个词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而他的整个项目却更富有意义，所以它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因为如果穆斯林得知，古兰经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戒律绝大部分与希伯来圣经、犹太教预言或者基督教新约全书中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如果基督徒获悉，他们的那些重要的伦理道德信条也同样地写在佛教和印度教经书中；如果世界上所有各个宗教的教徒们明白，千年来各宗教都以同样的方式信守着大同小异的基本规范和道德信条时，那么这对于彼此的相互理解会有决定性的帮助。

在世界各种宗教中,有一条所有宗教共同具有的普遍有效规则,康德在他的伦理范畴中把它重新表述为绝对命令,并且为德国人所普遍流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库恩的福音项目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富有责任感的文章与安瓦尔·萨达特当年的出发点和努力方向完全一致。因为库恩所概述的是三个一神论宗教,所以他完全可以被看做一名宇宙论思想家。就在最近,教皇本笃十六世也对他表示了尊敬。

每个人不仅生来具有某些本能,而且天生也带来了说话、思想和反应的能力。属于人的自然能力的还有形而上思维以及宗教信仰的要求和愿望。因为地球上人类的所有文化都是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而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所以其哲学和宗教的不同也包含着不同自然条件的作用和影响。我也正因为如此而坚信,所有的宗教,无论其规模大小都同样有权利获得尊重。

世界上有一种观点: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以及所有的宗教和文化都具有或者说应该具有一种自然权利。早年这种观点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尽管年轻时我对自然权利这个词在法律、哲学以及宗教上的意义还不十分明确,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自然权利也就意味着要存异,存在不同的内容、表述。我后来进一步认识并了解到,早在远古时期,斯多葛派就从某种自然道德法则出发,认识到自然权利。

1000 年后,托马斯·冯·阿奎纳从自然权利的意义上就

上帝在山上对门徒们的训诫作了解释，认为山上的这些训诫符合人的内心本性。我不明白的是，上帝的这些训诫不是教导人们去关注明天，而是让人把自己完全拱手交给上帝，这与理智相矛盾嘛！每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活、每种经济、每个政治家都必须直接地面对明天，即便是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告诫也不能没有针对性，也不能太偏离方向，因为哪里有冲突和犯罪，哪里也就必须有法官。

在随后的数百年间，自然权利的概念几乎全部被弃之不理。1555 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事实上就严重地违背了自然权利，因为它把决定其臣民宗教信仰的权力交给了诸侯。然后就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也就是在付出了百万人生命的惨重代价之后，关于自然权利的思想才再一次被提了出来。启蒙运动把哲学和科学从教会的监督下解放出来，在这个大背景下，大法官胡古·格劳秀斯(Hugo Grotius)①在 17 世纪借助于一系列具体的权利规定对自然权利作了明确定义。这些法律规定使自然权利理性化了，目的在于使人们在国家和宗教的独裁和专制面前得到保护。

尽管 1648 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②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

---

①Hugo Grotius(1583—1645)：出生于荷兰，是国际法鼻祖、基督教护教学者。

②英语 Peace of Westphalia，德语 Westfälischer Friede：是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在德国明斯特市和奥斯纳布吕克市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的一方是统治西班牙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大公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巴伐利亚公国，另一方是法兰西王国的波旁王朝、瑞典王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公国等诸侯国。而在 1648 年 10 月 24 日签定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一系列和约，并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政治学者一般将该条约的签订视为民族国家的开始。



但正是在它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和约才形成了今天国际法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联合国宪章的内容。尽管今天的国际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违反，但这个国际法本身与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观念基本上没有多大关系。我也逐渐地明白了，伊曼努尔·康德为何要在其《论永恒和平》一文的结束语中呼吁，放弃幻想和狂热，事实上他是正确的。他在那里所讲的是一个任务，一个也许只能“不断反复”解决的任务，他同时也明确了自己的观点：每一具体的进步之间的时间距离“将不断地逐渐缩短”。

总体来说，自 1945 年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把这个并非与某个具体宗教和文化有意识地衔接在一起的联合国宪章作为共同有效的国际法，但是许多宗教领袖和神父在他们的国家和文化中，却傲慢地对待其他宗教，甚至经常以煽动性的说法来表示他们排斥异己的态度。可事实证明，这不断密集地挤在一起的人类需要宗教宽容与和谐。宗教宽容不仅不允许对其他信仰视若无睹和藐视，而且还要尊重其他信仰，就像别人认可我们的信仰一样。在德国，在上一代人的生活进程中，尽管容忍其他宗教信仰的心态在增长，但那种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宗教宽容却并没有增加多少。这就不仅对精神领袖、神学家，同时也对政治家提出了一个使命，宽容和让步的思想准备以及心态在明天要比昨天更为重要。

政治道德的组成部分

客观地讲,几乎所有的宗教以及它们的经文都给自己的信徒以许多的责任和戒律,但却很少承认他们的权利。即便是现在的国际法也很少提到个人的权利,日内瓦公约中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1949年日内瓦第4公约)只是一个例外。在联合国宪章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是作为目标出现的,联合国人权的通用性解释并非国际法所要包含的内容部分。

完全不同于宗教的是,在德国基本法的第一章(第1条到第19条)中几乎只有个人的权利,却很少出现个人的责任。我研究、探讨这种不同已有些时日了。我发现,一方面,德国基本法的基本权利规定表现了某种对极端消除个人自由的一种忏悔性反应(此处的消除个人自由问题包括在纳粹统治时期所出现的这一方面的全部问题)。另一方面,德国基本法的缔造者们也考虑到了德国历史的问题。马丁·路德在农民战争时以最严厉的言辞对起义农民发出了警告,责令这些下层人物要“虔敬、守规矩并且顺从”,“要以身、心服从统治者的调遣”。路德在此也许可以借助于上文已经提到

的新约全书的罗马书信第 13 章中的一段话:"对有权柄者人人当服从,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自于上帝的,所有有权者都是上帝所命。"

对在罗马遭受到无数次镇压的那些早期的小基督徒团体来说,圣·保罗在罗马书信中所提出来的那些建议也许很有帮助,但在几乎两千年的时间里依然把这些作为基督教的戒律,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延续。直到 19 世纪晚期,我们的教堂传教还没有从路德经文中的罗马书信第 13 章中解脱出来,而且在 1941 年,我和我的神学工作者战友通过罗马书信第 13 章还得到了安慰。1934 年,艾伯费勒德-巴尔门(现在北莱茵州的乌勃塔尔市)的新教大会作为对纳粹国家压制的反抗,间接宣布放弃罗马书信第 13 章。那个极大地受到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影响的巴尔门"神学启蒙"提出了"对政府和领袖责任意识"的不同看法,可惜对于实现一个像这样的启蒙已经为时太晚了。在我看来,这份巴尔门启蒙尽管是正确的,圣·保罗在这一点上是绝对错误的,但同样还要说明的是,政府必须负责任!

德国历史不像英国的"大宪章",不像美国的"权利法案",也不像法国大革命,但分别在 1806 年、在 1918—1919 年出现了德国专制国家的垮台,而且在 1945 年又再一次发生。所以从这些背景原因来说,在 1949 年的基本法中单方面地突出、强调个人权利是可以理解的,可权利与责任应当相辅相成,对这一点的认识许多德国公民似乎并没有在意。无论如何,我在谈话中经常觉得,我们失却了权利和要求与责任

和义务双方同时并重这个意识。在我们的中学、高校,在新闻媒体和政治中,谈及个人对国家已经拥有的和应该拥有的权利和要求确实不少,可提及市民个人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却很少。包括对我们邻国的责任也很少提及,尽管在我们的教堂经常提及仁爱。

在 25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颇有分量的作家围绕着政治道德把所有可能性的因素都收集在一起,其中也包括许多带有争议的成果。我在此想对所论述的观点做一些限定,也就是局限在我自己作为政治家和政治著述出版者所赢得的这些内容上,其中不仅有在本国所获得的内容,也有在与我们邻国交往中以及在同其他文化交流中所获得的。有一点我在这里可以首先肯定,在德国的国内政治中,相对提到上帝、基督教、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观和戒律等的比较多,可是与外国政治家对话则比较少,萨达特纯属例外。

我并不认为政治家的伦理道德要求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之处。一种普遍有效的共同伦理道德基础是基本的前提,尽管对于特殊的职业或者特殊状态也许会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我所说的譬如像对医生的希波格拉底的誓言(医生行医道德准则),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或者其他特殊的道德规范,譬如对商人、对贷款人或者银行家,对企业家或者对战争中的士兵是有特定职业要求的。进入 20 世纪以后,那些立法机构中的政治家也像执政党的政治家一样,所从事的工作已经不再是名誉性的,而常常是主要职业,所以在我看来,到了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尝试着制定职业政治家伦理道德的时候了。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言，目前还没有人进行这样的尝试，至少在欧洲和北美还没有。不可否认，人们在有些政治家的回忆录中也许可以零零散散地看到一些，但这终究只是沧海一粟，也许只能作为建筑材料和构件。也就是说，职业政治家伦理道德的大厦还需要去修筑。

职业政治家的道德规范至少像公民的政治道德一样，需要一个宗教信仰或者某种特殊的宗教信条作为基础。许多德国人现在已经放弃了耶稣基督，退出了教会，有的甚至宣布不信上帝，可是他们依然还能做善事，依然还能成为好邻居。许多人需要宗教信仰，但道德和良好的举止绝非取决于一个人是否信奉佛教或者印度教的教义，或者遵守古兰经或者新约全书、旧约全书的戒律。现代绝大多数的德国人（其中也包括绝大多数德国政治家）把内心的基本信念看做最重要的，我在此所指的首先是不可转让的人权、民主的原则和社会平等的原则。对这些基本价值的内部信念显然是独立于个人的宗教信仰，可是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三个原则没有一个是包含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的。

德国的基本法是基于善的理由，而不是基于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学说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它是对所有人都普遍有效的法律。值得称赞的是，人的尊严作为不可侵犯的权利被写在基本法的第一条，并且成为我们国家立法的基础。所有基本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议会民主、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还有政治家的责任都是以此为基础推导出来的，尽管就把整个国家有效地置于宪法的保护之下而言，这

些白纸黑字的宪法条文显然是不够的。除了多种多样的精神的、科学的、宗教的、艺术的和经济的力量外,我们还需要政府和执政党对宪法的绝对服从。我们还需要通过最高法院、通过议会以及最终通过选民对执政者的监督。在每个国家都不仅有无意识的违法事件,也不断地有故意违法事件发生;也有许多这样的状况:一名公民经过审慎思考而自认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可后来却被法庭确认为违法。这样的争论和冲突通常都是利益的冲突,同时也是道德的冲突,但行为举止的道德、礼貌问题通常很少属于法律管辖范畴。

如果简单地把所有竞争某个政治席位的人都笼统归结为是争权的话,那么我认为,这种对职业政治家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因为还可能有其他的动因,譬如说,争取为公众所认可。事实上,许多投身于政治的人都出于自己的信念,要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有些政治家则致力于在其人生中为公众的福祉作出些贡献。

在二战刚结束的那个十年中,有许多议员是以"为了道德责任"这样的意识从政的。他们把杜绝纳粹时代的悲剧重演看做自己的使命,并为之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他们的个人生活水平非常有限,不少人如果从事其他职业,生活水平可能远比作为议员要好。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直至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尽管在现代,许多人是基于政治信念去接受某个工作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影响置于首

位),但其中依然有不少人考虑的是高收入。现在,议员们所获得的生活质量保障通常比他先前所从事的工作要高一些。当年康拉德·阿登纳、路德维希·艾哈德以及库尔特·舒马赫,甚至恩斯特·鲁特尔,基于他们的使命而不得不"经历政治生涯",而今天一些人却选择把政治家作为职业和人生规划,因为这份职业的经济收益颇高。尽管这里边确实有一些个例,但我不想就此进行批评,因为这绝非德国特色。

我 1982 年退出所有政府公职时,我自己所买的连体房的贷款还没有还清。这栋房子属于德国工会"新家园"许多福利型房地产项目之一,是 70 年代初建的一排一排连体房中的一栋。尽管贷款所剩余额的数目不大,但我这么多年还是无力一下子把这个洞填平。联邦总理有许多难以避免的支出,就他每天所遇到的开支来说,这个职位的收入并不高。现在的一名普通议员所获得的收入就挺不错,一些甚至远比他从前任职时所获得的要高许多。他也许从前是一个企业工会主席,或者联邦军的一名少校,可现在突然成了联邦议会议员,他有一张联邦铁路免费乘车证和一项相当于其津贴那么多的免税补助。

50 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施密特家的生活水平,在我 1953 年进入联邦议会后就明显地下降。我夫人开始做家庭收支登记:一磅糖多少钱;半磅咖啡多少钱(账本现在还在)。我开车往返于汉堡和波恩,为的就是获得联邦议会付的里程补助;我开车往返于波恩和布鲁塞尔之间,为的也是获得里程补助费,以便用它来偿还自己买这辆二手车的贷款。现在

联邦议员的情况在福利和经济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这就变成了许多人从政的吸引力。按照我的感受，联邦议员的待遇没有理由继续提高，无论如何，在联邦议会有 600 名议员的情况下，不断提高议员待遇是不可以的。只要议员的待遇不提高，部长们的待遇就不能提高，那么有些议员也许会基于经济的原因愿意出任部长。

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第一个审慎考虑“政治作为职业”这个题目的人，他在 1919 年所作的报告至今依然值得一读。尽管当时的职业政治家很少，但他所做的分析却深入细致，一针见血，他对职业政治家所提的一些要求相当深刻，至今依然适用。韦伯用三个基本素质对职业政治家进行了特征性描述：献身精神、责任感和洞察力。与此同时，他还用两个根本不同、彼此对立的范畴对所有道德行为作了归类：“信念道德观”和“责任道德观”。

对职业政治家应该特别要求的是，他能对自己决策和行为的后果负责。他不仅要对那些由他直接、有意识引发的结果负责，而且要对那些副作用以及间接、无意识所带来的结果负责。这种责任意识迫使他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对所有可能性因素理智地思索、斟酌，从而在取得成效之际也做好接受负面作用的准备。韦伯以“洞察力”这个词所描述的就是这样的能力：“尽收现实于眼底，并令其平静地发挥影响”，也就是自己实际所具有的理智和判断力程度。理智也可能导入误区，所以良知是最高的仲裁，政治家是从良知出发去行使责任的。对自己良知的践踏无疑也就埋葬了道德和尊严，

而别人的信任来自自己的完美人格。

通常来说，一名政治家在作出决定之前都有足够的时间对各种可能性选择进行考虑，从各方面获取建议；通常要考虑的不仅有多种可能性及其各自的后果，还有许多方方面面的因素和细节。不仅围绕着基本方向会有所分歧，而且围绕着许多个别、具体的情况都会发生争议，不仅在政府内阁成员之间会有争议，而且特别是在议会、在媒体以及社会舆论中也会有争论和分歧。按我的理解，许多德国人至今还没有真正地明白，争吵性辩论是民主的本质。有些记者把同一党内或者执政联盟内政治家之间的意见分歧泛泛地解释和评价为蔑视软弱领导者，究竟是不是当真如此，要看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最终是否能形成一个合理的决定。

一名政治家的“信念道德观”越是受制于某种固定的理念或者意识形态，在决策时越是考虑本党派的权威和利益，那么他在具体问题上对方方面面因素的考虑就越少、考虑的面就越窄，从而他陷入误区、作出错误抉择的几率也就越大。他无论如何都要为后果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常常有可能使他感到特别的压抑。仅仅凭借一个良好的愿望或者信念并不能推卸个人的责任，所以政治家必须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智，以使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能够对得起良知，承担起责任。因此我觉得，马克斯·韦伯关于责任道德观与信念道德观彼此对立的断言是合理的。

另外，我们也知道，许多人是基于信念而不是出于理智步入政坛的。我们同时也得承认，有些内政决策符合信念，

但未必是理智的抉择，此类情况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不乏其例。我们不必为此感到失望：相当多的一部分选民基于信念或者流行的感觉冲动对他们的选票作出决定。所以我几十年来一直通过文章和演讲反复强调理智和良知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对政治决策的意义。

理论上听起来就这么简单，但在民主实践中却不那么简单。因为在一个推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单个的人去作某个政治抉择纯属例外，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大多数人在作决定，这一点对于某个立法机构来说也类似。为了在议会中获得一种立法机构多数同意票，就必须让数百人在某个共同的议案上获得统一。即便是一份并不特别重要的资料，在特殊情况下也有可能把事情复杂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就求助于有名望的专家，或者各自议会党团的领导们。也有许多这样的情况，这个或者那个议员的异议在某些点上有充足的证据，为了获得更多的同意，就得寻求他人的妥协。一言以蔽之：任何民主的决策都必须以妥协的思想准备和能力为提前。

就适用性而言，这一点对于一个议会民主制度的重要性远甚于对于一个总统民主制度。在美国或者在法国，其总统尽管类似于德国总理，但他们在个人抉择的权力方面远比德国总理的要大。从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力上，联邦总理依赖于多数票，而这通常可以在政府联盟中通过妥协获得。没有妥协就不可能获得多数票的结果，所以妥协的原则属于议会民主制度的核心。谁缺乏妥协的能力或者思想准备，那么

他就无法在这种民主制度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每个妥协都以互易、互换的平等交换契约(do ut des)法则为基础,所以民主就必须有为了富有说服力的、持续的政治行为作出某些牺牲的准备。一名政治家通常最初是在议会开始学习妥协的,尽管他也许在入选前坚信自己会永不妥协,甚或把这误解为一种优秀品德。可惜,一些局外人不时地说出一些冷言冷语,譬如“肮脏交易”或者“不道德的”妥协等,尤其是大众媒体经常以这种表面判断对他们的读者和听众进行误导,以便发泄他们对这种所谓的“不道德的议会规则”的愤怒。此外,新闻界以及社会舆论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这种态度。某些经济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从讲台上出发,向一届又一届政府兜售他们的理想化建议,可是他们的建议在民主的现实中根本无法兑现,因为不考虑其他人意见和利益的行为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在实际中无疑也有令人唾弃的妥协出现,譬如以牺牲第三者的利益,或者以牺牲未来为代价的妥协。也有许多妥协并没有解决问题,而仅仅是给人以寻求解决办法的表象。所以,必要的妥协是一种美德,它与完全出于卑鄙投机的尝试完全不同,尤其是与那种迎合社会舆论或者迎合社会的投机妥协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一名有妥协思想准备的政治家只能以自己的良知为基础,如果违背自己的良知,那么他就无权作出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他无疑就陷入政见与其他人相悖的境地,有时就只有辞职或者失去他的席位。在我40年的从政生涯中,我不仅从社民党,也从基民盟/基社盟以及自

民党同仁那里，目睹了无数次这样的事例。

最引起轰动的是内阁部长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①]的辞职事件，他于 1950 年为反对阿登纳重建军队的政策而宣布辞去内务部长职务，两年后又宣布退出基民盟。在他参与筹建的全德人民党失败后，他于 1957 年加入社民党(10 多年后成为一名著名的联邦德国总统)。在后来出现的一些转换党派实例中，也有类似于此的。当然，在党派变换中也不乏出于投机而选择妥协者，他们的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席位，使连选连任成为可能。一名部长出于深思熟虑或者确定的理由辞职，但考虑到政府或者党派的声誉，对外总是宣布另外的辞职理由，而一个议席的放弃通常都要推迟到下届选举时。在我所熟悉的那些辞职情况下，常常都是多种因素在综合发生作用，其中经常有个人动机，最后的决定也是相当的艰难。与媒体中所流行的看法不同的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让他们做出抉择的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他们个人的权力，令人感到艰难的不是“权力的失却”，而更多地在于失却了一个使命，失却了社会的认可。

①Gustav Walter Heinemann(1899—1976)：1949—1950 年任联邦国内务部长，1966—1969 年任司法部长，1969—1974 年任联邦总统。



和平要求妥协

在外交政治中，为了获得和维护国家之间的和平，妥协也同样是必要的。尽管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s Groβen）时起，经过恺撒大帝（Caesar）一直到希特勒，这个和平的理念在外交政治中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凭借着自我神圣主义（sacro egoismo）能持续和平。即便如此，和平这个词却很少进入国家道德观、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学中去，相反在一千多年以来，早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①和克劳斯威茨（Calusewitz）②以前，战争就毫无疑问地被作为政治的工具和组成部分。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喜欢把他们关于社会、政治和国家的理想以简明扼要的口号概括出来，一个典型的证明就是那种三个概念的结合体。在我看来，托马斯·杰斐逊的"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确实全面地实现了人的个性化，而"自由、平等、博爱"听起来却更加

①全名 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著有《君主论》。

②全名 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著有《战争论》。

悦耳动听、易于接受，尽管就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言，那是大同小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三个基本价值观（在1959年的戈德斯堡决议[①]中，我作为发言人参与了这项工作）就是“自由、公正、互助协作”，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再后来，在考虑这种三部曲的结构时，我突然醒悟，所有这些三位一体的概念中都包括自由的原则，却没有民主的原则，也没有个人的责任原则以及和平的原则。

“和平”最初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作为富有价值的政治理想而提出来的，持这种思想观点的有胡古·德·格鲁特、伊曼努尔·康德等人。但在整个19世纪，对于欧洲各大国来说，战争似乎无一例外地被看做政治以其他方式的继续，这种状况和认识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揭开了一个新时代：民众把战争看做人类可以避免的恶魔，这种认识也开始为高层政治家所接受，日内瓦国际联盟在1919年所作的努力以及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都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苏美之间所签署的一系列限制军备竞赛的协议，以及50年代以来欧盟内部的融合进程都是这一方面的证明。

波恩在七八十年代对莫斯科、华沙和布拉格的东方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强调了和平政策的一个根本前提条件：作为国家领导人，谁想促进和平，谁就要与对方的国

---

①1959年11月15日德国社民党在波恩的戈德斯堡召开特别党代会，在会上通过决议，将社民党由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派改为今天的群众性党派，同时修订了党的基本原则。这是社民党历史上的一次方向性改变。至今社民党仍然保持其作为群众性党派的特征。



家领导人进行对话。这就是说，与以前的或者未来可能性的敌人进行交谈，而且必须倾听对方。谈、听，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形成一个妥协。譬如，1975 年在赫尔辛基所形成的《欧洲安全和合作最后文件》就是作为一种妥协而被签署的：苏联收到了西方国家领导人所签署的东欧边境确认文本；西方收到了这些国家领导人签署的人权文本。而以色列与其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邻国之间那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的战争和暴力事件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如果对立的双方彼此不对话，那么妥协以及和平就纯粹是一种空想。

自 1945 年以来，国际法以联合国规定的方式禁止任何外部武力介入一国内部事务，唯有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在此规定上作为例外。可是有一连串颇有影响的政府首脑、外交部长以及他们在安理会的代表却违反这种不介入原则，对这些人、事进行反思，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例如 2003 年武装干涉伊拉克，还有那些谎言论据，显然都违背了不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的原则，是公然践踏联合国规定之举。在这起违规事件中，许多国家的政治家都参与了。同样，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德国）的政治家对许多次所谓的出于“人道主义理由”而进行的军事干预也都负有一定责任。

1990 年，我们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与二战的四个战胜国一起形成了“2＋4 协议”，在其中确定了德国统一的外交政治事务观点。在这个协议中规定了我们的责任：“统一的德国将永远不使用武力，除非完全符合宪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如果没有这个协议，二战后所形成的两个德国之统一是

不可能的，所以它是我们国际规则的基础。在“人道主义的干预”的口号下，新的联邦德国于1999年参与了军事干涉巴尔干半岛的介入他国内政事务，尽管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可是却没有安理会的决议，所以这也就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不可否认，当时的考虑中有很大的理性成分，其中也有德国自己的利益问题：要避免东欧大规模的难民蜂拥而来。可是摆在桌面上的却是所谓的人道主义观点：要阻止在昔日的捷克斯洛伐克有可能发生的一场流血的内战。外交部长菲舍尔为了对我们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辩护，甚至不惜以当年数百万德国犹太人在奥斯威辛被集体谋杀为据。那些在七八十年代作为和平主义者代言人所倡导的为“和平斗争”的口号，在90年代末期却绝大部分变成了武装干涉的行动，难怪有人以“好战分子”来称呼他们，这也许是最合适的词。对贝尔格莱德的轰炸就充分显示，从一场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会多么快地发展成一场粗暴的自我政治权利干预。只要开始介入他国内政，就很快会出现这样的转化，干涉贝尔格莱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自从德国多次参与军事干预以来，他们有时以人道主义为由，有时以对恐怖主义必须采取的自卫为由。但无论是在波斯尼亚，还是在科索沃，在阿富汗或者在黎巴嫩海岸，德国频繁地参与这种武装干预，这越来越令我深感不安。我坚信，面对外敌的侵略而保家卫国，保护我们民主制度化的法制社会，这不仅符合国际法，而且是道德的。但同时我牢记心中的是：谨慎、小心地维护我们与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

个任务远远高于参与任何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任务。

维护和平绝不仅仅依赖于政治家。宗教的狂热不单在人类历史上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人被判处死刑、绞刑或者谋杀,也导致了无数次的战争。为了扩大、弘扬自己的宗教,宗教领袖们总是一个接一个地竭力去扩展他们的权力。各种宗教与其说是通过思想观念、说服和证明去发展和扩大,不如说更多的是通过宝剑铁骑、通过占领和征服去传教。各教派之间的相互争斗,其核心不过是权力和统治地位之争。借助于宗教的帮助来影响和控制群众,做起来总是比较容易些,而且有些宗教导师、神父和领袖们经常自己就变成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发动者。

从而和平的原则也就只能作为政治道德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也就是说,负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应该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可面对掠夺者那赤裸裸的强权和无条件占领,和平主义就有可能意味着本民族和国家的灭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38年秋的慕尼黑协议。由于自1938年5月以来不断增大的德国入侵之威胁,捷克斯洛伐克集结了自己的军队,而法国和英国也公开表示了他们对捷克的支持。9月末,法国总理达拉第(Edward Daladier)和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却出乎意料地突然同意把苏台德地区划割给德意志帝国,根本不考虑捷克方面的利益。这个同意划割的协议使希特勒更加意识到,英法两国对于一场与德国公开为敌的战争还没有做好武力准备。半年后,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从客观上和道德上讲,捷克人从

一开始就把慕尼黑协议看做无效的，他们是对的。

当一个国家遇到别国侵略时，联合国宪章绝对无权禁止这个国家进行自卫。如果一个国家借助于武力强迫另外一个国家保持和平，那么这个被强迫的国家从道德观上有权利对强迫者予以相应的还击。可现实中这种对强迫者进行的军事反击（“自卫战争”）却常常从道德上受到怀疑。因此在我看来，联邦总理施罗德拒绝联邦军参与 2003 年武装干涉伊拉克的态度，不仅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也是道德的。

老联邦德国在冷战时所面临的情况与此却完全相反，那时苏联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军备不仅威胁着德国人，也威胁着西欧的其他国家。美国、法国和英国以核武器来抵消他们在数量上的弱势；北大西洋联盟和北约以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来威胁苏联。我不仅认为北约的共同防御准备是必要的，也认为德国的参与防卫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核报复的战略措施越来越表示怀疑。对我来说，有一个基本的思路很关键：在德国，联邦政府必须对任何一种核武器的使用都拥有监督控制权，因为一种核武器的使用不仅会毁灭大多数德国民众，而且会使大片的土地变成不毛之地。保障本国人民的生命和幸福是我从政的基本道德标准。正是基于这一道德观才有了 1979 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双重决议，而这个决议在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 1987 年形成了在全欧洲范围内的双边相互销毁核武器。

领导一场有可能使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毁灭的战争，那是



愚蠢的英雄气概,所以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了两颗原子弹之后,日本马上提出投降。希特勒却相反,他准备以毁灭整个民族为代价,这是一种多么不道德的举止。发动一场致使一个陌生民族毁灭或者令其部分畸形的战争,从道德角度上同样是卑鄙无耻的。因此,美国从越南战争中撤军是绝对必要的,即便是有些为时已晚,可尼克松终究是出于美国自己的利益才解决了这件事情。

形式多样的跨越国界的恐怖主义事件——最具代表性的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在纽约的恐怖袭击事件——对现代国家提出了如何自卫的新问题:反恐怖应该针对谁?我们有权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以铲除恐怖主义来威胁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譬如像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ud Ahmadinedschad)在 2005 年 10 月对以色列那样,这就有可能使问题发生质的变化。要审慎考虑解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必要方式,理智而道德的解决方式是以不介入的原则去求得和平。

如果一场军事冲突的危险已经存在,那么国家领导人不要表现出那种常人般的歇斯底里,他既不可以去引发群众性激情,也不可以使自己的决策受到大众媒体的影响,也不能听凭煽动者在国内造成影响。他要凭借自己的理性、判断力和道德价值观来应对一切。在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应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后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通过"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Vertrag)、"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Vertrag)以及"反弹道导弹条约"等,

多次这样默契地解决了危机。小布什当属例外，他 2001 年宣布解除 1977 年与苏联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却随后在 2002 年提出进行预防性战争，并把它作为美国的战略原则，最终发展到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如果某个错误的判断难免引发某种严重的错误后果，那么为了避免战争和失败，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恐怕也就只有废除这个政府。

自 1949 年以来，没有哪一届联邦总理陷入了这样的危险境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根植于欧洲融合之中，根植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中。可以说，直到武装介入阿富汗为止，我们德国在半个多世纪期间没有战争，这也是联邦政府的功绩之一。歇斯底里和群情激奋的情况尽管有过（我想起的那些煽动性口号如：“士兵就是杀人犯”、“宁见红，勿死亡”），但却绝对没有哪个是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

在我看来，我们所讲的保卫和平就是对外政策的根本性原则，这个标准强迫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要努力去寻找妥协。那些我们在国内冲突中所适用的道德标准，也同样适用于外交冲突：解决冲突的所有方法都要以良知为基础。把所谓的“现实政治的必要性”作为外交政治本身所固有的道德依据是不可行的。我赞同民族主义，但我所讲的民族主义与任何意义上的“德国、德国，无处不在”，或者“不管对错与否，优先考虑我的国家”毫无关系。德国宪法第一条中的“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绝非局限于德国人，它作为基本大法对任何人都有效。这里的“人”，既包括昔日的对手，也包括现在的敌人。

道德良知作为最高的审判标准

民主政治家不仅通过其行为来实现领导，而且也通过其言论。早在伯里克利(Pericles)[①]或者西塞罗(Cicero)[②]的时代就如此，而今依然如故。在20世纪的历史中，也不断有聪明出众的演讲者，他们不断地通过自己的演讲鼓动着人们去运动，引导人们去实现某种政治思想。1961年，当肯尼迪在他的理想主义式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向美国人民发出呼唤时，他不是问人们对祖国有何期待，而是反问我们能为祖国做些什么。这确实令我感到欣喜若狂。肯尼迪是这么说的："不要问祖国能为你做些什么……先问你能为祖国作何贡献!"我后来才逐渐明白，为什么肯尼迪会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越南问题正是他最大的一个错误决策。

政治论争容易使辩护者夸大言辞、走向极端。所以，我在公开讲话时尽可能地持保守一些的态度，所以不免使许多国民意识不到(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认识)，我是以理智和道德

---

①Perikles(公元前490—公元前429)：古希腊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民主政治家。

②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

的原则进行领导的。也许我为人们所误解,因为有的人也许原本就不想认可,其中包括那时的反对党领导人赫尔姆特·科尔。当时,围绕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引导问题,爆发了一场持续数年的争论。基民盟/基社盟要求红黄联盟(社民党和自民党)解决肩负“精神和道德领导”这样的任务,而且科尔要求回答“未来的大前景”。我始终反对把政府当作国民和社会的最高精神指导的观点,认为“政府和议会的任务主要是维护自由与公正,努力促进互助协作,同时还要使自由、公正以及互助协作变为国民可以感受到的。”在一个社会中,丰富多彩的宗教和哲学的基本思想更多的属于精神和道德领导的任务,而不是政府的工作。国家的精神生活建立在“丰富多样和宽容”的基础上。

这场讨论已经过去20多年了,即便是在当时议会讨论的高潮,人们的观点也很少走向极端,但我依然坚持我的立场和观点。我还记得,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当时也赞成这个观点,他强调:指导国民的精神生活,这并非是联邦总理的任务。我们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基础只是建立在基本法所规定的那不可改变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尤其是建立在基本法第一条,也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这个绝对不可以更改的原则上。政府的指导只能朝着这个方向,而不能朝着其他方向。实实在在地讲,当科尔1982年作为总理宣布“精神、道德的转变”时,也就只有自民党转变了一个合作者,而且他们是出于党派利益变换了一个执政合作对象。就我所知,黑黄(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联盟政府在科尔的领导下,既没

有做什么精神领袖的工作,也没有做任何道德领袖的事情。

当然,从总体上讲,领导社会的是政治党派和政治阶层,因此政府也可以提出倡议。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维利·勃兰特对东欧国家寻求理解的政策,这些政策通过他在华沙隔都(Ghetto)犹太人墓前的下跪表现了出来。事实上,这行为所表达的是对当年德国灭绝性集体屠杀犹太人所犯罪孽的忏悔。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作为总统于 1985 年 5 月 8 日在联邦议会的讲话。他的这次讲话帮助许多德国人终于认识到,1945 年的德国投降,与其说是德国的一场失败,还不如说是一场对德国人的自由和解放。在这两个事件中,政治行为都建立在尊重人的尊严的基础上。勃兰特和魏茨泽克的行为都与德国宪法保持一致,而不是基于基督教或者其他价值观对德国历史进行推演。两次行动也都同样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和攻击,这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来说是正常的,开放性社会就要拥有色彩斑斓的多种多样的价值观。

政治家完成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使命,并非是一个简单、抽象的概念。他是在日常生活中反复不断地与那些具体的问题打交道,不断地与复杂而难以透视的矛盾发生关系。这些问题中,简单者如一个税收条例的修订,复杂者如是否参加某场打击亚洲或者非洲独裁者的战争的决定。所以反复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什么是必须做的?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什么有利于我的祖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所承担的具体责任是什么?

一名政府首脑当然必须对议会负责，一名议员必须对自己向选民（也包括党内的“基础”）所作的承诺负责，所有政治家都必须经受住社会舆论的考验。在一个民主制度中，选民是最后的判决者，但选民以其选票所作出的也只是某种一般的方向性决定，有些甚至只是一种直接的个人抉择。所以与其说选民经常未必基于深思熟虑来作出选择，不如说他们是根据灵感、直觉和社会舆论来决定自己的选票。任何选民都没有责任一定要就自己的抉择结果作出说明，相反被选出来的政治家却要对此作出负责任的回答。这种回答不仅要在下一次选举时（如果他想重新当选的话）对选民作出，而且在两次选举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也要向议会作出。即便是拥有议会多数席位，即便是代表了社会舆论的大多数，即便是在例外情况下，政治家的行为都需要服从宪法法院的判决：每个政治家都必须使自己的言行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在我看来，个人良知是最高的审判标准。

那些为道德所要求的东西并不是宪法所管辖的范围，尽管在基本法第二条写着“伦理规则”的字样，它不允许任何人违反，但其中的内容却非常模糊。因为整个伦理道德基础是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所以人类有许多种文化对这个题目进行论述。伦理道德与善行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学习、历练的结果，譬如通过奖励和惩罚。“伦理规则”也因此不过类似于文化，是人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教育、积累的结果。

在德国，迄今为止所提到的基本价值观或者共同价值观



中，绝大部分都不够明确，有的甚至还有诸多争议，也就是人们对内容所指仍不清楚。同样，尽管自从社民党1959年的戈德斯堡决议以来，“基本价值观”这个概念已经在政治过程中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但在决议中仅仅把“自由、公正与互助协作”划作基本价值观范畴。而在其中只把自由作为基本权利，公正和互助协作并没有定义为权利，而只是作为美德、善行。虽然我们在戈德斯堡决议中既没有提出基本价值观的完满范畴，也没有对善行和美德进行完满的规范，同时我们也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考虑要去宣布“最后的真理”，但我们确实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富有深远意义的标志性命题。

现在到了解决这关键性的善行、美德问题的时候了，因为个人的权利似乎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保障，而共同的社会道德却似乎面临着威胁。一些协会、高层管理人士以及官员，甚至还有一些政治家，他们成了反面教员，而好的榜样却太少了。所以在人们的意识中，社会责任感和富于道德责任感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有可能逐渐消失。因此，引导和教育人们去想着责任义务，去学美德、为善行成为必不可少的大事。这种必要性向所有关心社会政治的公民提出了一种紧迫感，尤其向政治家提出了责无旁贷的任务。每个尽职尽责的人，绝不仅仅要为自己的目的或者期望负责，同时还要为自己之所为和所不为的后果负责。一个人手中的权力越大，他的人生责任及其对别人的影响就越大，譬如作为父母亲，作为领导，作为老师或者记者，作为企业家、总经理或者政治家，那么他对于谋求社会共同福祉的责任也就越大。

无论是纳粹分子，还是德国的其他独裁者，都严重地蹂躏了我们的责任意识。也正因此而使得一些晚出生的德国人相信，他们的个人权利优先，而责任不过就是那些国家权力和法律规定的事。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那我们的权利将无法持续地得到保障。离开了国民的道德行为，没有哪一个社会能持续地保障国民的自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仅需要基本权利，而且需要高尚的伦理道德，这二者共同构成国民的基本价值观。我们的民主会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

可惜，很少有哪一位政治家在他的政治或者哲学思考中，到宗教信仰中去寻求决策和帮助，他总是不断地求助于自己的理性。所以问题越是艰难，理性的功能就越重要，而最后就涉及个人的良知。良知使政治家想到基本价值观。没有基本价值观的政治家也就失去了良知，那么他就可能走向犯罪。如果一个人能下意识地始终保持道德行为，让自己的言行与社会道德密切相符，那么他就能致力于为全社会谋福祉，就会为社会公益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并不想与哲学和政治大师们进行竞争，既不想与卡尔·波普或者马克斯·韦伯竞争，也不想与伊曼努尔·康德或者马尔克·奥莱尔(Marc Aurel)[①]竞争，更不想挑战孔子。另外，在人生的最后一站，我也无意为民主制度的国家去编写什么绝对的道德规范。在基督教所确立的道德规范中，这

①Mark Aurel(121—180)：罗马帝国安托尼努斯王朝皇帝、青年斯多葛派的最后一名最有影响的代表。著有以希腊文写作的《自省录》。



两个最神圣、最重要的道德范畴，也就是自由的意志以及和平的意志并没有被标志出来，而且似乎连这种意愿也没有。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误区，自由、和平的良知及其真理性既非神学的道德范畴，亦非古希腊道德范畴，因此也就只能放到那里了，所以这同时也就被划归为不受重视的所谓次类道德规范了。

而我所要论述的美德就是“平民”美德，它包括责任意识的美德、理性的美德和内心坦然的美德。尽管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我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些，但我心中时刻有两个道德要求在不断地触动着我，那就是基督教的主祷文以及后来的美国人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写的“宁静的祈祷”那段祈祷词[①]：“给我以良知去平静地接受那不能改变的事；给我以勇气去改变那能改变的事情；给我以智慧去分别这二者的不同。”

我想对我们的政治家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危难之际想一想古罗马的智者名言：“公众的福祉是最高原则”；在犹豫不决之际应该让社会的福祉高于你们个人的事业成功，让大局的成就高于你们个人的或者你们党派的成就。

我们没有权利期待我们的民主制度出现什么奇迹，或者

---

①Reinhold Niebuhr（1892—1971）：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和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这段祈祷词的大意是：上帝，给我以良知去平静地接受那不能改变的事；给我以勇气去改变那能改变的事情；给我以智慧去分别这二者的不同。一天一天地生活，片刻片刻地享受，把困苦当成通往安宁的道路，像耶稣基督那样接受这罪恶的世界，如其所是，而非如我所愿，相信你将使万物修直，要我顺从你的意志，我将在此生获得适当的快乐，并在永生与你同享幸福。

根本就无权提出这类要求。民主制度总是处在不成熟和不完美的发育状态下，而且将不时地遇到争论。尽管近代历史上我们屡遭磨难，但只要我们德国人小心谨慎地维护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制，那些困难和危机都将在反复不断的努力中得到修补和完善。只要我们记住这一点，那么这个"自由、公正和统一"的漂亮花瓶就能够保持美艳。



政治家的良知

——施密特《不在其位》译者后记

这是我4年来翻译的第8本德文著述。可不敢说是一口气,但确实是集中精力三个月把赫尔穆特·施密特先生的《不在其位》这本书翻译完了。这是一位伟大政治家的"理性作品",也是一位理性政治家的"良知呼唤"。

历史上有不少的著名政治家,也有不少的政治理论家。而在施密特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两者有机融合的特征。作为一名职业政治家,在30多年的活跃政治生活中,他任过政治秘书、处长、局长、议会党团主席、部长、总理,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在国内政治中,他强调政府的任务首先是把本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办好,主张德国的利益首先在于欧洲的稳定,在于同邻邦的和睦相处,而不是到中东、巴基斯坦去进行所谓的"维和";在国际政治中,他不仅主张欧洲统一、联合东方,形成"平衡势力"以制约美国的绝对霸权,还呼吁维持国家之间的平等、尊重、安定与和平,认为以牙还牙不是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最好办法,对不同宗教也应该平等、

宽容……所以他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一名务实的德国政治家。

他不仅在从政之际围绕自己的政务开展研究、著书立说，而且在1982年离开总理职务后，进入《时代周刊》发行人行列。在这27年的“不在其位”期间，他出版了“为自由负责”、“西方战略”、“德国与其邻邦”、“政治家的责任”等几十本专著，阐述德国与世界，解析世界的发展与政治家的责任，所以他同时也是政治理论家。《不在其位》一书是在他90岁高龄时与德国读者见面的，他说这是对自己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总结，可我觉得它多少有些像《出师表》，当然对象并非“刘禅”，而是德国读者、议会、政府和政治家。他以“不在其位”的方式平心静气地观察，是在尽一个公民、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他“如是说”德国（面对社会人口老化、高福利、东西德发展不平衡、与邻邦关系、宗教文化问题……）该怎么办？政治家该当何为（责任、义务、道德规范以及从政的基本条件、准备等等）？政治游戏该秉承什么规则？选民（期望、抉择……）该怎么当？他批评说，政治家早已经职业化了，可现在还没有“职业政治家”道德规范，所以他尝试着从自己的经验、感受中去撰写。

正像施密特先生所讲，东西方文化传统不同，而学习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尊重个人意愿，譬如日本学习西方至少用了两代人的时间，才挤入西方列强（工业国）之列。他在此告诫西方，对此要有两点思想准备：一是如果将西方的标准强套在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国家中，势必引发

战争，那是玷污民主；二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现在又有中国、印度，西方遇到新对手，就得有失落的思想准备，就得在那些还没有为东方人所占领的领域尽快地发展，以便保持自己生存竞争的优势。

施密特先生是从德国政治家角度讲的，但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学说有助于中国政治家解读中国问题。譬如，和平与安定是经济发展的保障，不仅有国内的民族融合问题，而且有与邻邦的关系问题（第Ⅱ章）；恐怖主义与宗教宽容的关系（第Ⅳ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影响；全球一体化对福利国家与人口老化的挑战（第Ⅴ章）。除此之外，关于政治家的基本条件、党内关系和党派关系（第Ⅰ章）、政治家的职业道德与行为原则（第Ⅵ章）以及政治抉择与政治家的个人命运（第Ⅲ章）等，则对我们认识当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具有帮助作用。

许文敏

于波恩



感谢

（浙江）angeliq

（海外）walkerpeng

（上海）yangbos8246

（北京）hcqenjoy

（浙江）蛋爸1975

（上海）thriller_wu

（江苏）changcheng2005

（上海）kihoon_kim

（北京）grassgreensun

（上海）吴敏灵

（海南）molaw1

（四川）贝妮600

（江西）zhangfeijun

（上海）icysilence

（河南）zdwcwx

（浙江）肖上霖

（上海）zeyang1990

（福建）lqz1129

（广东）xxbbusiness

（广东）我爱辉辉1314

（北京）tommyjiangbb

（浙江）m2008101

（北京）飘凌的风雨

（甘肃）绝壁whitechamber

（湖北）第五文修

（广东）shirleyhan117

（四川）骆驼傻傻

（辽宁）ac148w32546er

（上海）hongfei_009

（广东）sipinan

（福建）wadagaga

（天津）cherryofmay

（山西）xixuegui88

（陕西）黄黄的猫

（上海）沙罗双树sun

（辽宁）dragon4ce

（山东）匿名

（上海）chenyunie

（上海）ophire

（北京）itapple1992

（浙江）kalikaba

（上海）lqsfsf

（广东）huo304

（上海）bovey8922

（辽宁）匿名

（上海）卖玉米的熊

（陕西）envyoung

（江苏）hx9999_nj

（天津）junichen1986

（北京）badbear2008

（江苏）fdsa0751

（北京）doggymona

（安徽）max2abe

（吉林）zmkdayueliang

（吉林）ronagain

（四川）lixijmylh

（江苏）tb_1800858

（山东）匿名

（湖北）与雪飘

（云南）深语涧

（西藏）沧海微茫

（广东）yuandaoyang1986

（上海）tbcwlk

（山东）tesla2

（山西）k_3028446

（辽宁）st*****ne

（浙江）ceciliarian

（天津）tb3124421

（广东）anderslane

（湖北）woodrow88

（海南）匿名

（河南）syzdxq

（上海）aolygc

（山东）skyxzp

（重庆）tb_3332083

（安徽）小跑不停

（江西）zengxingab_2008

（海南）ahchou

（浙江）felixlee

（河南）kengpianz

（吉林）xellos1080

（广东）tb1692320_2012

（江苏）zh670223

（安徽）子珏wnh222

（山东）纳兰赋

（山西）阳春一面

（北京）hhyyhhyy_007

（天津）alansmith282

（湖南）chhxjx

（山东）kkhunterster

（北京）ken6527

（山西）andymum2008

（湖南）九命猫1999

（山东）root123456789

（北京）枯木堂主

（黑龙江）fanghaochen90

（北京）合鸟尔

（辽宁）letusshare

（海南）lkjnm1

（浙江）落花剑影

（浙江）海军王子

（广东）szmichaelchen

（浙江）myqqher0058

（云南）青马大桥

（北京）cxwoyaoying

（广东）ykyk11188

（广东）tb88561_22

（广东）zcwtop

（河北）六额驸

（云南）米线米线5

（北京）yuan7009

（山西）lm476229074

（安徽）妞妞爸1129

（浙江）tb8wjy

（上海）jxg77jun

（甘肃）tb_9071954

（江西）bacy98

（北京）jasonhao

（广西）24312bill

（北京）fanlibuaa

（广东）pasacal

（北京）tarnival

（辽宁）wangce881204

（山东）凡夫2008

（浙江）jjdjjdjjd007

（河南）kaifengzq

（安徽）dfq0810

（天津）gauss00

（江西）我就是他哥

（上海）nocturnetian

（江苏）zhangyixi

（上海）huasheng19***2

（山东）暴福龙

（河北）蝴蝶小鸟

（安徽）allstarshine

（四川）newlifechou

（上海）ifancy21st

（江西）九阳神功的秘密

（广东）windowl9174

（内蒙）疯狂阿特

（辽宁）yudi46****75

（北京）natao2988

（上海）aquaticbotany

（北京）qy20***27

（江苏）**zg6768**

（北京）deathtroll

（河南）杨孝忱忱绛

（广西）山高情长

（江苏）jiaozijing

（甘肃）vincentheaven

（浙江）林澄心

（上海）xi_xiang_er

（上海）zlopiery

（上海）李娟橘子1984

（辽宁）山风 olive

（上海）frankso

（北京）handianyu

（安徽）tezukay

（浙江）小斌来淘啦

（广东）lgy72

（内蒙）tb_****716

（天津）cailz2008

（安徽）liuran246

（上海）salzq

（山东）tb****595_11

（上海）hsske

（广东）老熊维尼 33

（广东）deng_凡

（四川）ricoh1

（山东）翩然蝶舞prdw202

（上海）金融大资本家

（浙江）江梁琪

（山东）胖头鱼 1230

（浙江）ninuodx

（广西）浮生不语

（广东）亚桦 1987

（江苏）gao23h

（重庆）幽兰草心

（云南）wglyfhb

（广东）柳星君

（四川）wyc2hope

（陕西）docie

（北京）自由左翼

（浙江）若爱你

（上海）fangyto1

（天津）realbargin

（甘肃）王晓斐6***o

（天津）神勇小白鼠1 号

（湖南）yake_floyd

（广东）hwjchung

（陕西）windchanting2009

（河北）原来非同

（浙江）wo 诚信走天下

（上海）moux4

（四川）xjhjk

（江苏）xu501_51

（江苏）benjilimi

（广西）胡海 2011

（湖北）半夜鸡不叫

（广东）w27****359

（福建）**侠 lee

（湖北）流传香港

（广东）当时明月在1989

（广东）pan****10

（山东）ybzhao1

（吉林）rubyz66

（四川）米兰小王子

（江苏）陈向阳 01

（北京）xqh***5

（陕西）tb_****273

（吉林）谢正华

（上海）wsh31****045

（江苏）kennel32

（四川）jeremyxu333

（重庆）牛嚼大牡丹

（上海）gongyi****1

（湖北）syberia2005

（江苏）吕杰森

（北京）夜市的萝卜

（上海）lotuszhu2012

（上海）wxy1815

（重庆）流彩年华

（浙江）nx002

（湖北）千秋雪 6

（湖北）eclipse179

（广东）liuxingbei5

（湖南）老虎桶子

（山东）zhong***qiang

（上海）candlechen

（北京）kaokaoka0110

（河南）简 jane007

（江苏）jslylq88

（广东）colourful777

（天津）和 80 长大的 90

（广东）hxmei292

（上海）crystalljbj

（黑龙江）cxkuno

（浙江）米兰很迷茫

提供的贊助

再次謝謝你們的支持！

（截止日期：2012/06/18.以上赞助排名不分先后）